

《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现代性”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的一系列政经文章中,对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作出了深刻的观察与研究,这使他不仅客观地认清了美国,也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俄国现代化纲领。这一纲领在其《怎么办?》中体现为薇拉的“水晶宫”之梦。因而,在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水晶宫”理想的争论中,其“水晶宫”的内涵就更多的是“美国梦”的内涵。这一对美国模式的借鉴,是他为俄国现代转型指出的道路之一。因而,我们在他的“美国倾向”中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仅有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也有和平建设的诉求。如果将这一思想排除在外,不仅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也是对“俄罗斯理念”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国倾向;“水晶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01-07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这又一次引发了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高潮。可是,我们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一个人物却不能不提,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老一辈来说,早已是老掉牙的人物;对于当年轻人来说,却未必熟悉他,或对他感兴趣,甚至是否知道他也未可知,因为,笔者在课堂上无论询问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有谁读过《怎么办?》,结果竟无一人。问题来了:近2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这里热得不能再热,但我们却忽视了他的对手;过去那个时代,热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读不到他的论敌。这样,在陀氏与车氏这一对矛盾辩手之间,两代研读者手里,要么只有矛,要么只有盾。

在已有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中,多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框架内进行;也有不多的几篇文章将两者并列对比的^①,这时主要涉及围绕“水晶宫”意象在两人之间的论争。不过,在所有涉

及两人关于“水晶宫”论争的研究中,无一例外,都将这一意象的原型指向伦敦1851年世界博览会会址的“水晶宫”,他们的论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参观过伦敦“水晶宫”,有《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为证^②;车尔尼雪夫斯基1856年6月参观了伦敦“水晶宫”。但是,首先我们注意到,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56年参观了伦敦“水晶宫”时,无一例外,均没有指出任何出处,任何佐证,只说他没有留下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意象有没有其他来源?其次我们注意到,关于“水晶宫”意象的内涵及两人的争论,无一例外,均界定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为思想资源,设想了一个人类未来社会的“乌托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以人性的非理性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驳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水晶宫”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均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思想内涵来源于欧洲。这种界定是否准确?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谈论车尔尼雪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夫斯基时,更多的或几乎全部都倾向于谈他的“革命”倾向。他还有没有其他倾向?

最近,有几个机缘促成了对以上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给研究生的一次讲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性》。自然这一问题要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思想的批判。为此笔者重读了车氏的《怎么办?》和陀氏的《冬天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罪与罚》《荒唐人的梦》(当然他的其他作品同时在笔者思考的背景中)。另一个机缘是,近几年笔者一直在研究俄国《现代人》杂志各时期的状况,在19世纪50—6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系列政经文章发表在《现代人》(以及《祖国纪事》)上。笔者注意到,不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涉及“水晶宫”,在《现代人》等刊物和著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只涉及“英国的水晶宫”,还大量涉及“美国的水晶宫”。同时,《怎么办?》中,不仅仅有“水晶宫”的意象,也有大量关于美国的情节和政经论述。

我首先看《怎么办?》,其中三位重要人物:拉赫梅托夫、洛普霍夫和薇拉。

《怎么办?》中的两位重要人物——拉赫梅托夫和洛普霍夫,均与美国有关。拉赫梅托夫是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人物(笔者认为这是该作品的生硬之处),在交代拉赫梅托夫离开莫斯科后的去向时,借一位同行人的说法,他走遍斯拉夫国家和欧洲各国,“为了对比”,“一年之后,他无论如何‘需要’到美国去,他觉得研究美国比研究任何其他国家更‘需要’,他将在那边久住,也许一年多,也许永远住下去……”^{[1]324}。

而假自杀后的洛普霍夫,首先就是到了美国,从美国回到俄国后,他化名查理士·比蒙特,向卡捷丽娜讲述美国:“我们美国人可不知道什么叫烦闷。我们没有时间烦闷,我们的事情太多了。”^{[1]478}卡捷丽娜向他讲述薇拉的事业,他说:“您忘了这一切我早已在我们美国见过……我是太熟悉了,它在你们这儿才算新鲜。”^{[1]491}卡捷丽娜担心比蒙特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时,比蒙特说:“大家都断言我们民族(即美国——笔者)的唯一目标和心思就是捞钱,一个属于这种民族的人,还会这样责备您吗?”^{[1]488}比蒙特讲述一番关于美国妇女的状况:“人家对你们说我们的妇女多么自由,那全是真的。”^{[1]489}这引起卡捷丽娜的向往,她对父亲说:“爸爸,等比蒙特先生盘下您的工厂,我们上美国去吧。

我要在那儿干点儿什么。啊,那我该多高兴!”^{[1]489}在小说的第一版中,比蒙特还称“自由的北美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2]626}。总之,《怎么办?》的主角之一洛普霍夫假自杀,到美国,又回到俄国娶卡捷丽娜为妻,应该说是该作品的主线;洛普霍夫带回众多的关于美国的消息和认识,以及他对美国社会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的叙述,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构成了《怎么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均是积极肯定的认识和叙述,这同样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同。

当然,《怎么办?》中还有大家所知道的薇拉的第四个梦:关于“水晶宫”的梦。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856年参观的伦敦“水晶宫”的投射,而更多的是美国的“水晶宫”。这需要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及《祖国纪事》和其他著作)中所发表的政经文章涉及美国的文字。

二

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15岁时就对美国产生了兴趣,当时在一篇小札记《发现美国》里他写道,“美国,尤其北美,正快步走向国家的强大和幸福”,而“发现美国应该具有重大意义”^{[3]371}。这样理解北美诞生和发展的意义,将贯穿他整个的政论。

他在1854年《祖国纪事》上连续4期(第8—12期)发表《文学、艺术、科学和工业的新气象》。其中在第8期他讲述了纽约世界工业展览会(也就是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当然必然讲述了纽约世界工业展览会址“晶莹宫”(Кристалльный дворец),并称因故中断的展览将在“今年5月重新开放,届时会有2万观众”^{[3]108}。然而在介绍“晶莹宫”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用大量篇幅极尽详细地列出大量数据介绍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会址伦敦的“水晶宫”(Хрустальный дворец)(这里我们将英美两个“宫”的不同形容词,但意义接近的词,也用不同的词翻译),很显然,他非常熟悉伦敦的水晶宫。不过,他只是把英国的“水晶宫”作为美国的“晶莹宫”的前身来介绍,文中充满兴奋与赞叹。

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国的文字涉及面很广,甚至在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美国的关注。在1854年第9期《祖国纪事》的《新闻》栏目中,他让读者注意希腊政府寄给华盛顿一块帕特农神庙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献给乔治·华盛顿,英雄—统帅。——以这块古老的石头表达来自梭伦、忒弥斯托克勒和伯利克勒斯的大地的敬意与仰慕!”^{[3]155}

在严酷的预先审查制度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没

有可能直接涉及美国独立宣言,但是他总是以极大的尊敬提起那些美利坚联邦缔造者的名字。1857年他写道:“华盛顿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不仅因其刚直不阿和过人的才能,还因为,即使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也同样热忱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他却是作为整个民族事业最高领导者而生。他,最高的统帅和领袖,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分队的优秀军官,而是一方领土的优秀管理者。”^{[4]670}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富兰克林·皮尔斯归于“天才的总统”^{[5]315}。在《评亨利·托马斯·巴克的书〈英国文明史〉》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写道:“第三阶层的领袖常常与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商讨。”^{[3]612}他同样高度评价自己的同时代人废奴运动者林肯:“(1860年)11月6日,拥有自己候选人林肯的党派胜利的日子,这是个伟大的日子——是合众国新时代的开始,是伟大的北美人民政治发展的转折的开始。”^{[6]353}

三

美国的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快速发展的经济?

1860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的俄译本由阿·雅库鲍维奇翻译在基辅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译本及原著的评论发表了著名的《对权威的不敬——论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美国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原则,是秩序原则,权力平衡原则,真诚而深刻尊重权利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必需的。”^{[7]687}接着他诠释道:“托克维尔著作的价值主要在于这一爱国精神和清醒的思想——研究美国制度的目的在于运用他们的知识更好地建设法国的事业。”^{[7]687}那么换言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美国制度,也是要解决俄国现代转型问题。1859—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开辟有专栏《政治》用以观察西欧政治生活。在1861年第1期《现代人》上,评论凯利的《给美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称那些只看到这个“伟大和崇高的民族”生活中不足的人是“进步的敌人”^{[7]916}。同时,这篇评论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车氏认为,“自由贸易的理论更符合民族的利益”^{[7]909}。

我们知道,从1860年底到1861年2月初,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7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政府,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1年第2期《现代人》的《政治》栏目中写道:“报刊上满是预测,说春天前欧洲正在酝酿非常重大的

事件。但是无论这些期待如何重要,读者也不会奇怪这次我们的‘观察’的大部分篇幅将用于北美的事件,这些事件使我们在上个月几乎完全忘记了欧洲。……现在北美所经历的危机,不会不对文明世界的命运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如果这一危机的结局是,正如现在整个欧洲所预言的那样,一个政党投降了,社会意见就转向了另一方;如果北美的事情是另一种结局,那么西欧将会显著地加速事件的进程。自然,无论何种情况,北美历史对西欧的影响都不会立即显现,不会是某个有效力的事实的源头。不,不是的,这是另一种关系,联系不在于个别事件,而在于西欧思想的总体态势是守旧还是渴望向前,是害怕未来还是期待未来一切美好的东西。这里,联系不是表面的,不是稍纵即逝的,不是显现在某些个别事实中,而是深入到西欧事件根底的联系。北美这个榜样,是一股常在的力量,它应当要么将欧洲引向众所周知的道路,要么使其背道而驰。也许在一两年内,西欧历史不会显现由当前北美转折的结局而带来的变化,但是未来几十年它将对欧洲未来的走向发生作用,正像先前北美的创立本身所产生的作用那样,区别仅在于,现在这个榜样不再是与西欧国家相比是弱小的人口稀少的一个部落,而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外部力量上已经在所有国家中居于首位。深入领会这一转折的性质,努力猜透层层隐秘,预见它的出路,这一任务对于规划即将到来的夏天和明年冬天欧洲的事业毫无益处,但是对于评估未来的政治思想运动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思想将决定整个我们的事业,也许还有我们下一代的事业。”^{[6]409-410}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国的存在本身,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对人类命运的许多方面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多么有预见性!

不只是政治制度、国际地位,美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令他吃惊。他在1860—1861年对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基础》(4卷)进行翻译并注释,其中第1卷发表在《现代人》上,2—4卷因体量太大而单独出版。该书的翻译,主要是注释构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工人经济理论”完整和详细的表述,其中指出:“美国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令人吃惊的榜样,其体量之大足以称其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8]499}其实,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854年在《祖国纪事》第8期上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工业的新气象》中,他就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最新公布的数据证明合众国的财富与实力迅速增长……仅一年的收入(1852年7月1日—1853年7月1日)就增长了(折合)18,000,000银

卢布。”^{[3]114}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注意到美国经济收入的数字,同时还注意到美国的现代化建设。自然,美国的铁路建设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铁路建设鲜明地反映了经济的总体水平,正如我们现在亲身目睹和感受到的中国的铁路建设水平代表着中国现在经济的总体水平。众所周知,1851年俄国第一条铁路——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交付使用。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铁路交通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而此时在美国早已开始了铁路建设的真正热潮:1840年铁路总长度达到了4410公里(而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仅长为645公里),在国内战争前已经达到48000公里。在《现代人》1854年第8期“外国新闻”栏目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让读者注意“(各国)新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规划”,他指的是,有可能很快开始建设的“从位于密西西比或密苏里州的城市开始到圣弗朗西斯科结束”的铁路,他形容铁路的长度将是在上面可以行驶“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3]264-265}。还有资料表明,一个更宏大的洲际铁路计划在1862年被林肯签署生效。^[9]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强调铁路的长度,还写了沿北美铁路出行的舒适性:“现在可以舒适地乘美国铁路出行,整整数月可以不用走出车厢;车厢是按照新系统设计的:为每一位客人提供的座位、空间非常宽敞,旅客可以躺着休息,美国人还对铁路进行了另一种完善:所有的车厢都可以通过有线电报与机车司机联系,这样必要的信息瞬间就可以到达司机那里。”^{[3]265}三年后,在1857年第3期《现代人》的《杂志札记》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注意到铁路这一主题,他在评论1857年开办的一份新杂志《经济指南》周刊时写道:“在我们所读的已经发行的七期杂志上,不只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我们尤其注意到了韦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哈格迈斯特(Гагемейстер)和Д. Г. 先生关于铁路的文章。”^{[4]712}《经济指南》头七期杂志就发表一系列论述铁路的文章,其中出色的是Д. Г. 先生的《铁路札记》,此外我们发现还有哈格迈斯特先生的《给〈经济指南〉编辑的信》和韦尔纳茨基先生的《谈谈交通手段》。^{[4]713}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相当的篇幅解读了这些文章,并比较了俄国与美国的铁路状况,分析了美国的经验。他看到了俄国农奴制经济与合众国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但他也相信自己国家现代化转变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国现代化建设(以铁路为代表)的成就、惊人的经济与国家实力增

长充满了赞赏,而纽约的“晶莹宫”更因其集中反映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而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在这个巨大的“晶莹宫”内不仅实现着“美国梦”,也实现着人类美好的梦想,这成了他对俄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期待。这样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怎么办?》中薇拉的第四个梦里,对俄国未来图景的描述,简直就是“晶莹宫”(或“水晶宫”)的模样。

四

薇拉的第四个梦中,在田地里工作的人住在“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中,“它耸立在田野和草地、花园和树木当中。……这座建筑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建筑式样?今天没有这种式样。不,已经有了一个雏形——塞屯汉山丘上的宫殿:到处只见铸铁和玻璃、铸铁和玻璃。不,不只是铸铁和玻璃,这仅仅是建筑物的外壳,它的外墙;里面才是真正的房屋,一座高大的房屋:这道铁骨透明的外墙仿佛一个匣子似的包蔽着它,跟它的每层楼中间有一圈宽阔的走廊相连接。这内屋的建筑式样多么灵巧,窗与窗之间的墙壁多么狭窄啊。……这是怎样的地板和天花板啊?这些房门和窗框是用什么做成的?这是什么?银?白金?家具差不多也全是这样。”^{[1]427-428}这种描写不正是“晶莹宫”(或“水晶宫”)的钢架结构、玻璃幕墙的外形!

如果说,这还仅仅是外形的相似,很难说它是英国的“水晶宫”还是美国的“晶莹宫”,那么,“宫”内的生产、生活模式更能说明问题。

还是在薇拉的第四个梦中,阳光灿烂的原野上,鲜花盛开,飞鸟歌唱,“原野就是我们俄国的原野;可是这样的花朵今天只能在我们的花圃中见到”^{[1]427}。“田间种着我们俄国常见的庄稼,不过又跟我们的庄稼不同,而是长得密密麻麻,一派丰饶景象。”^{[1]427}“这些田地里散布着一群一群的人,到处是男男女女,老人不多,是因为这儿的人不容易衰老,这儿的生活又合理又安定,能让人保持朝气。田地里干活的人群差不多都在唱歌。不过他们在干什么活呢?哦,他们在收庄稼。他们干得多快!他们哪能干得不快,他们哪能不歌唱!原来收割、打捆和运送几乎全由机器代劳,人几乎只要走动走动,管管机器就行。”^{[1]428-429}他们是怎么吃饭呢?“收工以后,所有的人都朝那座建筑物走去”,大厅的一半摆满了餐桌,桌上早已摆好了考究的食具,桌子中央摆着一瓶瓶鲜花,“有一千人或者更多,这不是全部,愿意单独吃的都在自己家里吃”,不下地的老太太、

老头子和小孩“做饭、干家务、收拾房间，干这些活计”；“菜已经端上桌子，下地干活的人进来了，他们和做饭的人一同用餐”；“谁要愿意吃得更好，也可以吃到他愿吃的，但是得单独付钱。如果不要吃得与众不同，他连一个钱也不用付。各方面都是如此，凡是照公家的财力来说，人人能得到的东西，个人一概不付钱”^{[1]429-430}。吃完饭闲暇时，人们举行舞会，“他们多么健壮有力，多么标致清雅，他们的面貌多么神采奕奕、善于表情！他们是幸福的美貌男女，他们过着劳动和享乐的自由生活——幸福的人啊，幸福的人啊！”^{[1]436}“这些人都是我们俄国人”，“将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和夏天，永恒的欢乐”^{[1]430}。也就是，俄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欢乐而自由地劳作、生活，人们“从心胸中唱出欢乐与幸福、爱与善的歌”^{[1]415}。

车尔尼雪夫斯基 1862 年被捕，他是在潮湿阴暗的彼得堡要塞，听着涅瓦河的涛声写成《怎么办？》。在这里，他构想着未来的俄国，思考着俄国大地上依然以中世纪的方式被统治着的巨量的农奴，他们应该有的生产和生活，那“光明而美丽”的未来应该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文化繁荣的光辉时代。人们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作，享受自由生活。这种“自由的劳作”和“自由的生活”，正是《怎么办？》中从美国回来的比蒙特给卡捷丽娜所描绘的一副美国社会的生活图景。如果我们还要找证据的话，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争中，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众多人物都要跑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体验“自由的劳作”和“自由的生活”，他指向的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和主张，只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讽刺的态度：“跑到那里体验的人，得到的却是资本家的拳头。”^{[10]112}

同时，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作品中的这一“梦想”，早在他的政论或书信中就有体现。他给阿·谢·泽列诺伊^③的信中写道，期望“保留那一原则：‘每一个农民应当是土地的拥有者，而不是雇农，应当是为自己，而不是为雇主或地主工作’”^{[11]347}。这一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在美国找到了样板：“在北方（即北美，下同——笔者），土地是由平民耕种的，而且他们热爱劳作，他们从英国逃离，成为大洋彼岸的独立的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块土地，可以让他的家庭在上面充分劳作……北方的农村人口都由不为任何人服务的人组成，他们自己也没有工人：那里的每一个

农民都是他们耕种的土地的独立所有者。”^{[6]410-411}这是他在寻求现代化地解决“俄国农民问题”时，欲以美国的状况为借鉴，形成自己关于俄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埃·雅·巴塔罗夫在《俄罗斯理念与美国梦》中指出：“杰斐逊，像美国革命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倾向于将美国的独特性解释为一条不同于欧洲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一条防止老太太式的欧洲遭受的社会缺陷和疾病在年轻的（美国）社会蔓延的道路。杰斐逊梦想着一个不是通过工业发展，而是沿着农业道路发展的农业国家，正如《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亦即杰斐逊——笔者）所认为的那样，它产生了一切有益的后果。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笔记》中写道：‘我们有广阔的土地，农民可以在那里施展他的辛勤工作……因为我们有土地可以劳作，让我们的公民永远不要走到机器前，坐在纱线后面。木匠、石匠、铁匠需要农业。至于一般的生产业务，让我们的车间留在欧洲吧。最好为工人把食物和材料带到那里，而不是把工人连同他们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带到这里。’”^[12]这里是将欧洲视为一个衰老的老太太，受着社会缺陷和疾病的折磨，美国应该避免走这一道路，也拒绝欧洲的生活准则。实质上，这是指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理念”与美利坚奠基者之一、美国之父的杰斐逊的“美国梦”是相吻合的，因为，一百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复制了杰斐逊的话，认为美国“所有阶层消失了”^{[8]410}，“没有强迫劳动的北美在自由劳动中繁荣起来，他们的所有居民——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认为，如果他们有强迫劳动，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毁灭”^{[7]410}。所有人平等、自由地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推崇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北美经济。自由劳动——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现代化道路寻找的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政治结构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此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样引证了北美的经验，以强盛的美国得以形成的历史加以论证。他在评论 1857 年第 10 期《现代人》上发表的经济学家伊·巴布斯特（И. К. Бабст）1856 年在喀山大学发表的一篇精彩演讲时，专门引用了一段话：“很难想象，糟糕的政府、缺乏安全、任意的课税、抢劫、不良的行政机构，在国民资本的节俭、积累以及倍增方面的致命影响会到一种什么程度；自相残害的战争、政党斗争……饥饿也不会有像专制和管理的任意性那样对国民财富产生致命的影响。”^{[4]429}车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说：“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的习惯和生活中发现

了其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其资本的增加,换句话说,有利于它的财富增加,我们必须知道,它应该感谢的不是身体的部落特征,不是国家的气候,而只能是国民自己的行政机构;相反,如果我们看到人们养成了阻碍国家资本增加的习惯,我们必须知道,这里的问题无非是国家民事机构的问题。”^{[4]429}

北美的共和制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重要,他在1859年的《作为政论家的奇切林》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对这种国家管理模式的好感,认为正是在这里才能看到民主原则最充分的体现。^{[13]652-653}1860年,他又在我们前面提及的《对权威的不敬》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民主的看法。^{[7]694-696}此前1858年他也曾在《包税制》一文中,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与那些认为俄罗斯不能接受共和制的人争论:“许多人发现,在美国,邪恶的无政府状态占了上风。也许这种观点是公正的;我们甚至赞成它。但是有位爱尔兰人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是一个无知、肮脏和懒惰的醉汉来到纽约的。他被雇去打工,最初他并不好好工作,所有挣的钱都喝光了。但很快他注意到,无论他赚了多少钱,它们都留在他手中,没有人从他那里拿走多余的钱,也就是,这在他原来的东家那里似乎是多余的。他开始更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多的钱。他或他的同伴有时会与雇主发生冲突。这些争议由美国政府来裁决,裁决结果让这位爱尔兰人觉得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的。他很快确信,政府和裁判员不是他的敌对力量。他不再害怕不公正。很快,过了一年,一年半,你看到他彻底改变了。他努力工作,节俭,酗酒的习惯也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他已经开始拥有一点资本,他去了西部,获得了一块土地,盖了房子,成为一个模范农民,他关心教育他的孩子,他自己,尽管他40岁或45岁,还是学会了阅读。”^{[13]333}他就用这个小故事来说明美国制度的公正及其促进社会、经济与个人发展的能量。

除了论证美国的政治结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注意到美国社会的道德力量使其社会充满活力。

在我们前面指出的他分析巴布斯特的演讲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了巴布斯特使用的“民族资本”概念,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引入了“道德资本”的定义,即“最重要的民族资本是人民道德力量和精神发展的储备”^{[4]472}。这个储备的过程中,教育居首要位置。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在1854年《祖国纪事》第12期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工业的新气象》中,就已经注意到美国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在对儿童的教育中的新措施,例如,他谈到了一个北美组织的

一次“全民育儿大会”,会议提倡“教育者应该采取最具关怀的健康和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3]221}。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指出,“移居美国的欧洲平民子女比留在欧洲的平民子女享有更多免于繁重工作的时间”^{[5]863},这里的教育更为普遍,社会生活更丰富充实,“具有阅读报纸和书籍习惯的人的比例比英国高得多”,“即使是农村平民也具有在西欧只属于大城市的贸易阶层的习惯,这些人充满热情,他们的精神生活相当活跃;因此,会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的精神比欧洲平民更强大更有力。问题不在于气候,而在于经济生活的特性,在于人们普遍希望上升到社会的更高阶层。许多欧洲平民被剥夺了这种希望;而每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人都拥有这种希望”^{[5]864}。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国家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与发展。

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绝没有对美国的其他社会现象视而不见,特别是南美的奴隶制。在进步的俄罗斯媒体中,一直将这种奴隶制与农奴制联系在一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中指出:“在联邦的另一半,在南部或奴隶制州,贵族占主导地位:所有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几万富有的种植者,他们不仅使黑人,而且使这些州的白人处于无知和贫困之中。”^{[7]228}

不过,不能仅仅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俄国农奴制斗争的角度看待他对美国的态度。他对美国充满了信心。他在1861年《现代人》第1期的书评《评凯利的〈给美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中写道:“在北美的公共事务中,确实有很多坏事。北美爱国者希望,他们很快就会清除玷污国家的那些污渍;他们谁也没有否认,到目前为止,国家有很多非常肮脏的污渍。”^{[7]916}他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困难和缺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一的缺陷,就在于它还有奴隶制。”^{[7]917}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东西,他对美国现实、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所作的研究,使他不仅客观地认清了美国,也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俄国现代化纲领。这一纲领中对美国模式的借鉴,是他在俄国现代转型中给出的道路之一,属于众多俄罗斯思想家在“现代性”语境中为俄国寻求的出路之一。因而,我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中,看到了他的“水晶宫”理想的美国内涵,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仅有激进的社会改革主张,也有和平建设的诉求。如果将这一思想排除在外,不仅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也是对

“俄罗斯理念”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

注释:

- ①童明. 自然机器·人性·乌托邦: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争[J]. 外国文学, 2009(1); 单世联. “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重思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1(2); 金美玲. “水晶宫”与“黄金时代”之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1).
- ②有的研究者甚至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晶宫”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出现过, 而说第一次出现是在《地下室手记》。可见研究之疏漏。
- ③Зеленой (Зеленый)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822—1875), 50—60年代社会活动家, 政论家, 剧作家, 教育家。

参考文献:

- [1] 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办?》[M]. 蒋路,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2]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XI.
- [3]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XVI.
- [4]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IV.

- [5]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X.
- [6]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VIII.
- [7]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VII.
- [8]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I.
- [9] Невероят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ранс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в США [EB/OL]. [http://shnyagi.net/34004 - neveroyatnaya - istoriya - transkontinentalnoy - zheleznoy - dorogi - v - ssha. html](http://shnyagi.net/34004-neveroyatnaya-istoriya-transkontinentalnoy-zheleznoy-dorogi-v-ssha.html).
-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幻想与憧憬[M]//作家日记(上). 张羽,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11]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XIV.
- [12] Эдуард Батало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мечта [EB/OL]. [https://iknigi.net/avtor - eduard - batalov/ 49361 - russkaya - ideya - i - amerikanskaya - mechta - eduard - batalov. html](https://iknigi.net/avtor-eduard-batalov/49361-russkaya-ideya-i-amerikanskaya-mechta-eduard-batalov.html).
- [13]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 собр[С]. соч. : в 15 т. М.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1953. Т. V.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in the Period of Chernyshevsky ——Chernyshevsky's “American Incl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series of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ticl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ernyshevsky deeply observes and studies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ives in America, which makes him not only objectively recognize America, but also gradually take shape of his own modernized guiding principle of Russia. The principle is demonstrated by Vera's dream of “Crystal Palace” in his novel *What Is to Be Done*. Therefore, in the debate on the ideal of “crystal palace” between him and Dostoevsky, Chernyshevsky's connotation of “crystal palace” reflects more like “American dream”. This reference for the American model is one of roads which he points out for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Thus, from his “American inclination”, we see Chernyshevsky more fully, who not only has radical assertion of social reform, but also has appeal to peaceful construction. Without this thought, it would be insufficient and incomplete to understand Chernyshevsky, either the “Russian Idea”.

Key words: Chernyshevsky; American Inclination; crystal palace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杨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收录《七哀诗》5首(曹植1首,王粲2首,张载2首)。这几首同题诗歌的创作者身份不同,内容各异,但都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分别代表了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和仁人志士的乱世悲歌,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刻影响。这些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格,既抒发了魏晋士人浓郁深厚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七哀诗》;魏晋士人;乱世情怀;家国理想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2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08-06

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此书遵循着“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1]的编纂原则,共分37类文体,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纂和分体研究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选》所收的各类文体中,“哀伤”类诗歌共收录了9位作家的13篇作品,其中以《七哀诗》为题的作品有5首,即曹植《七哀诗》1首、王粲《七哀诗》2首、张载《七哀诗》2首。这几首五言古诗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表现出魏晋士人胸中郁积的乱世情怀和家国理想,从一个侧面映射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与繁荣状况。

一、情兼雅怨:贵族公子的个人感伤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曹丕《典论·自叙》中有段话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场景:“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

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当时,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序和失范状态,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都涂上了一抹浓浓的乱世色彩,“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呈现出多种文化竞相争奇斗艳、并行不悖的状态”^{[2]38},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是建安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中开风气的人物。陈寿《三国志》中记载有不少关于“三曹”推崇建树功业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史料。据《魏书》记载,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3]54}。他善于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其《短歌行》《蒿里行》《薤露行》等诗作,用洗练的语言表现出雄浑阔大的气势和无比深沉的悲愤。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对曹操诗歌的“诗史”贡献品评得颇为精到。作为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

收稿日期:2021-08-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历代类编唐诗总集整理与研究”(2020BWX011)

作者简介:杨波(1975—),女,河南新蔡人,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整理和中原文化研究。

也称得上“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3]89}，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更为深沉的战争之思和治国理想。《艺文类聚》卷五九收录有曹丕作于建安八年的军旅组诗《黎阳作》，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他随父从征袁谭时由邺城至黎阳途中的经历与感受，其中诗句“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其一），“追思太王德，胥宇识足臧”（其三），“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其四），反映出老百姓久乱思治的朴素愿望，以及作者希望尽快结束国家动乱分裂的政治局面，以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陈思王曹植少年早慧，“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3]557}。这既与曹操的精心培养息息相关，也与当时的审美好尚密不可分。

受时代风气的熏染，曹植早期同样渴望建功立业，向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旅生活，认为“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与杨德祖书》）他善于将特殊的人生经历浸润于文学作品之中，其诗作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后来，由于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3]557}，加之私自违反禁令，“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3]558}，惹得曹操大怒，失去了竞争继承人的机会，又受到兄长曹丕的严加防范，“徙封雍丘王”^{[3]562}。他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常自愤怨”，认为自己，只能寄情于文学创作，时常流露出“抱利器而无所施”^{[3]565}的苦闷和悲愤。《文选》卷二三收录的《七哀诗》，就是曹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录之如下：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历代关于“七哀”的解释很多，其中以《文选》六臣注、吕向注和元人李治《敬斋古今甝》传播较广。吕向注文曰：“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元人李治《敬斋古今甝》亦有解释：“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这两种解释都有望文生义之嫌。据今人余冠英《三曹诗选》阐释，《七哀》属于乐府歌辞，“所以名

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这种说法比其他解释更有道理，所以也更能学界所接受。

曹植《七哀诗》以自问自答的表现形式和独守空闺的怨妇口吻，生动地表现出曹植在政治上建功无路、生活中苦闷无边的凄苦心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皎洁流转的月光，清辉映照的高楼，独自凭栏的怨妇，愁肠百结的诗人，身份地位虽然悬殊，人生境遇何其相似。面对此情此景，文才富艳的诗人满腹哀怨，他将当道者和自己分别比作“清路尘”和“浊水泥”，发出了“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的深深叹息。即便如此，诗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一腔忠君爱国之心始终萦绕于心头，还多次上书兄长文帝曹丕和姪儿明帝曹睿，幻想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一展平生抱负。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太和初年，曹植在其封地雍丘时，“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称“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3]565}，认为“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3]566}，其最终目的在于“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3]568}，殷殷报国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曹植言辞恳切的上疏并未得到皇帝的认可，万般无奈，只能含蓄委婉地感慨一句“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魏晋以降，世人对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创作评价有别。如刘勰认为，曹植“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曹丕则“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槽焉”，并指出世人对曹氏兄弟评价有所倾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但俗情抑扬，雷同—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4]428}。钟嵘《诗品》盛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元末明初文士刘履则认为，“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从不同侧面表现出曹植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慷慨悲凉的风格。如果曹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雅士，也许他就不会这样痛苦。但是，历史无法假设。曹植既是“天才流丽”“誉贯古今”（王世贞评语）的贵族公子，又是上疏求自试，却不为当政者所用的政治上的失意者，二

者极大的反差映射在诗人身上,于是只剩下“情兼雅怨”的个人感伤了。

二、苍凉悲慨: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早年随父西迁居长安,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初平年间遇关中骚乱,不得已前往荆州依附刘表,过了十多年郁郁寡欢的客居生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卒,刘琮投降,王粲归曹,赐爵关内侯,才华始逐渐绽放。王粲善属文,《登楼赋》《为刘荆州谏议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等传诵千古。沈约将其与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相提并论,称“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可见其文才之高。可惜天不假年,建安二十二年春天,王粲在跟随曹操南征孙权的途中病卒,终年41岁。

以诗言志是王粲诗歌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王粲《七哀诗》共有3首,《文选》卷二三收录2首,其一“西京乱无象”,其二“荆蛮非我乡”,主要描写客居荆州的见闻和壮志难酬的感慨,生动地再现了汉末因战乱造成的田园荒芜、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景象,表达了忧国忧民的乱世情怀和乱世思治的儒家理想。

第一首诗开篇交代了诗人背井离乡、远赴荆蛮的社会背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长安,王粲曾随父亲徙居长安,是第一次远离故土。后来,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大肆劫掠百姓,王粲为了避难第二次迁徙他乡,离开中原地区去投奔与祖父王畅有师生之谊的荆州刺史刘表。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尘封的往事涌上心头,敏感细腻的诗人心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凄楚与哀伤。“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得知诗人要远赴荆蛮地区,亲朋好友纷纷相送,依依惜别,诗人心头平添了几分生死别之感。接着,诗人连用四句话来描述自己离开长安之后,一路之上见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那些“豺狼虎豹”留下的累累白骨,那个将亲生子女抛弃在荒草之中的饥饿妇人,那个被遗弃的嗷嗷待哺的可怜孩子,那句看似决绝实则无奈的“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无不令诗人肝肠寸断,不忍卒听,急忙催马飞奔而去。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对这几句诗的评价非常精辟:“‘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

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5]最后,当诗人距离西京越来越远,“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时,禁不住想起长眠霸陵岸边的汉文帝刘恒,想起刘恒父子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而开创的“文景之治”,又由此联想到“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这才突然明白下泉人喟叹的真正意义。“下泉”一词,出自《诗经·曹风·下泉》:“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本是曹人赞美邠伯能勤劳王事之诗。《文选》李善注此条云:“《毛诗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云:“‘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两人对此诗主旨的阐释言简意赅,含蓄隽永。

第二首诗主要写诗人虽然长期客居荆蛮,但是常常思念故土的复杂心情。“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诗人开宗明义,直接将问题抛出。接着,诗人讲述自己因为心怀惆怅,所以眼前的一景一物都抹上了一层忧愁之色。乘坐方舟溯流而上,日暮时分更添几分愁肠,甚至连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等都变得愈发凝重,斜晖、江水、倒影、山岩,无不如此。接着,作者用一排对偶句描摹自己急于回到故土的心情,“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作者不顾“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自一人夜不能寐,于是披着衣服起来抚琴,可是乐器演奏的曲子也因为演奏者的心情抑郁而发出悲苦的声音。最后,作者用“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来总结全诗,反映出汉末社会动乱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深化了故国忧思这一主题。

第三首诗“边城使心悲”收录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生动地描绘出诗人为了生存漂泊至边城那一时期真实而又痛苦的生活。录之如下: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

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

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

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谗。

这首诗开篇即以“边城使心悲”定下了全诗的情感基调,接着详细叙述了诗人目之所见的种种悲惨场景,刺骨的冰雪和怒号的寒风在百里之内荒无人烟的旷野上飘荡,登楼远眺只见烽烟四起、戍旗猎

猎,连年战乱造成了残酷的后果:出征之人一去不返,留守之人多被俘虏,无论是出征还是留守家园,同样都逃不脱凄苦悲情的命运。作者还继承了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在诗作最后化用《诗经·魏风·硕鼠》中的诗句“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用一个表达强烈哀怨情绪的反诘句“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与“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谥”这句凝聚着无限辛酸和悲哀的诗句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刻地表现了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哀伤而不沉沦、痛苦而又无可奈何、惆怅却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复杂情感。

王粲少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说,并幽赞微言之能。这三首诗悲壮凄凉,意境幽远,场景阔大,跌宕起伏,发人深省,诗人忧国忧民的拳拳深情现于笔端,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建安十三年,王粲被曹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3]598}。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时,征引了《文士传》中一段王粲力劝刘琮投降曹操的精彩辞令,从侧面反衬出曹操一代人杰之风采。文曰:

粲说琮曰:“仆有愚计,愿进之于将军,可乎?”琮曰:“吾所愿闻也。”粲曰:“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恒受其福。今将军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对。粲复曰:“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梟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粲遭乱流离,托命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琮纳其言。^{[3]598}

王粲凭借其敏捷的才思和卓著的辩才,纵论当时的天下大势,详细分析了曹操作为一代人杰的雄才大略和顺天应时的历史趋势,成功说服刘琮归降曹操,为曹魏政权走向统一立下大功劳。王粲著有诗、赋、论、议等各种文体近六十篇,尤善辞赋,所谓“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3]599},甚至达到时人经过深思熟虑也无法再增减字句的地步。据《典略》记载,“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锺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搁笔不能措手”^{[3]599},名重一时。曹丕《典论》中有关于“建安七

子”文风的评价,其文对王粲尤为推崇,文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楨,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驎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3]602}张衡和蔡邕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大家,曹丕却认为王粲的上述赋作“虽张、蔡不过也”,能够与张衡、蔡邕的赋作相提并论,可见时人对王粲之推崇。无怪乎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盛赞王粲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4]428}曹植称赞其“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方东树称赞其诗作“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确为千古至论。

三、乱世悲歌:仁人志士的生命体验

张载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张载性情闲雅,博学多闻,西晋时期曾任佐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后因世乱而托病告归。《晋书》卷五五有小传。张载原有文集七卷,早已散佚。明人张溥将张载和张协兄弟二人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集》,收录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其作品现存《七哀诗》《拟四愁诗》《剑阁铭》等篇,分别收录在萧统《文选》卷二三、卷三〇、卷五六。现将《七哀诗》二首录之如下:

(一)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膻膻。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

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柩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登童竖。

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

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

(二)

秋风吐商气,萧瑟扫前林。阳鸟收和响,寒蝉无余音。

白露中夜结,木落柯条森。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沉。

顾望无所见，唯睹松柏阴。肃肃高桐枝，翩翩栖孤禽。

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

丘陇日已远，缠绵弥思深。忧来令发白，谁云愁可任。

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

汉代末期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最高统治者带来灭顶之灾，甚至连尊贵无比的刘汉王朝陵寝也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第一首诗由远及近，托物起兴，大量用典，诉说着仁人志士的慷慨悲歌。诗作前六句首先描绘出一幅苍茫悲凉的汉陵丘山图：“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廡廡。”在高大巍峨的洛阳北芒山上，诗人极目远眺，看着经历了汉末大动乱的垒垒青冢，心中起伏万千。据曹丕《典论》所载：“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既是对帝王陵寝惨遭破坏的深沉感慨，又是对张载《七哀诗》相关内容的准确注解，更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付诸笔端，其中“垒垒”一词力透纸背，一股苍凉之感扑面而来。“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面对煊赫百年却杂草丛生的帝王陵墓，作者以“借问”一词总领下文，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对历史往事的回顾与思考。中间十四句，诗人再次回顾汉陵被掘的历史事件，从最初的远观慢慢变成近观，审视事物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但表现汉陵荒败、人世沧桑的目的却更加清醒。“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生动的比喻随处可见；“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客观的写实言简意赅，一串串典故内涵丰富，一声声叹息让人感伤。文章中的“一抔”意为“一捧土”，语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当时有人盗走了高庙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大怒，想要株连其族。张释之则根据律法为嫌犯力争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6]2755}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这里“取一抔土”即是盗墓的含蓄说法。再如“珠柙”两句，主要写陵内的珍宝被掠，语出《西京杂记》：“汉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些帝王生前不可一世，死后随葬品多不胜数，但仍逃不脱季世大动乱的命运，往日的一切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古今盛衰的反差令人唏嘘不已。最后，作者直抒胸臆，慨叹那些帝王“昔为万乘君，

今为丘中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将历史之哀和现实之思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盛衰无常、富贵难永”的人生哲理。这里“雍门言”又是一个典故，出自桓谭《新论》：“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臣窃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儿牧竖踯躅而歌其上，行人见之凄怆，孟尝君之尊贵，如何成此乎！’孟尝君喟然叹息，泪下承睫。”诗人借雍门周与孟尝君之间的一次谈话，来表达自己的愤慨。

张载才华横溢，官至中书侍郎，职掌著作，刘勰称“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4]429}，对其才略评价甚高。他现存作品不多，但仍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太康初年，张载到四川探望任蜀郡太守的父亲张收途中所写的《剑阁铭》，就抒发自己对朝代更替、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而《晋书》卷五五《张载传》中节录的《榷论》一文，则以“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7]1517}为切入点，详细地论述了古往今来那些有大作为、成大功业者的事例，指出他们“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居太平之际，而吐违俗之谋，此犹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7]1517}，认为“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7]1518}，较为直接地阐释了一个人建功立业的高度与其所处时代提供的机遇和个人遭际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论进退仕隐，张载都在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方式，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暗合。张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得非常清楚，不愿意在乱世的政坛上蹉跎岁月，于是称病归家。他认为，贤人君子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与其人生遭际有着莫大的关系，所谓“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不能无水而浮”，“不能无云而飞”，“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否则，即便身怀颜孟之术或伊管之略，如果缺乏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也无法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在《七哀诗》（其二）中通过撷取大量常见的秋日景象，如“秋风”“商气”“阳鸟”“寒蝉”“白鹿”“松柏”“桐枝”等，抒发了“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的感慨之情，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安静和平生活的渴望。这些诗作中表现出来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家世背景息息相关，是作者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正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序。”^{[4]408}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中原地区瘟疫横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耳闻目睹了自然灾害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痛苦,曹丕发出了“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的感慨。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却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不朽于世的人生追求。《文选》中收录的这几首《七哀诗》,创作于“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4]403}之时,表现出类似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格,即“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4]404},既抒发了魏晋士人胸中郁积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曹植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还是王粲等人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抑或是张载等仁人志士的乱世悲歌,都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集中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卫绍生.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C].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唐]房玄龄.晋书[C].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Troubled Feelings and the Home Country I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from Seven Sad Poems in Selected Works

YANG Bo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Xiao Tong's Selected Works is the earliest extant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in China. Among them are 5 works entitled "Seven Sad Poems", including one written by Cao Zhi, two by Wang Can, and the other two by Zhang Za. Although those seven poems sharing the same title coming with different poet's identity and content, they all reflect poets'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on reality, society and life, represent the aristocratic Childe-style personal sentiment, the painful expression of literary courtiers and the sad songs of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refle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n stylistic style. The thematic tendencies and creative styles of these poems express the thick troubled feelings and the Ideal of family and nation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ch have a distinctive paradigm characteristic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Key words: "Seven Sad Poems"; intellectual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roubled feelings; the ideal of family and nation

穆木天的一首佚诗及其他

陈佳慧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系穆木天于1941年所作的一首纪念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至今未见于各类穆氏作品集与年谱资料。这首诗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在统一,这与他同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风格是迥异的。通过对该诗创作前后的厘析和内容与形式层面上的探讨,对我们重新认识穆木天后期的诗歌创作模态和诗歌理论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穆木天;佚诗;马雅可夫斯基;内生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3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14-06

1941年10月16日,《北战场》(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文艺特辑出版发行,其中刊登了一首长诗,题为《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署名穆木天。这首诗未收入穆木天于1942年出版的诗集《新的旅途》,也未见于《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及其他各类穆氏作品集,亦不见于陈方竞《穆木天著译年表》及其他学者关于穆氏的传记材料,属于佚诗无疑。可以说,该诗的发现对理解穆木天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模态和诗歌理论实践都是有所裨益的。诗歌照录如下: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在这生活中,死亡并不是一件难事,创造事物,却是更难的事。”马雅可夫斯基嘲笑着叶遂宁的自杀,然而却离这不久,在他自杀的遗书上:“意外是终结了,爱情的水流撞碎在奔流的生活上,我和生命没有纠葛了。”这多么不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啊?……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苍茫的黄昏
你挥动离别的手

凄厉的风沙
我听到你疲弱而干哑的叹息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你枯沙的步履
随叹息隐入辽远的山谷
泪的濛烟
遮断我悲伤的视线
你走了
你孤独地
告别了祖国的河山
你的胸襟,再没有
火烧的石榴花
你不再听,那农家篱梢上
鸣鸟的呼唤
你只是无言地跋涉你的长途
寂寞地涉过了河
翻过了山
在那尘扑的大野
在那森黑的林荫
或者静夜里河滨的草径
我听到你低啞而绝望的呜咽

四年了

收稿日期:2021-09-10

作者简介:陈佳慧(1996—),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学。

那是野火烧红枫叶的深秋
天空飘着繁星的夜晚
黯黯的茅棚下
你跨出了祖父的马
怀着一颗摇动的心
骋驰在寒冷的大漠
骋驰在五月樱花的大别山
是那匹健壮的马
陪伴着你
陪伴着你摇动的心
迎着熹微炮声里的烟雾
或者在摸袭敌人的暗夜
你的马长啸着
尽情地抛开了四蹄
你的面前
闪着枪弹迸裂的火花
你的笑声
像春雷似的响亮
像瀑布似的朗爽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你懦弱地低垂了头
深沉而悲哀地啜泣
现在,你走过了千重山
万重山
你怆凉的足声
响在受难的土地
风逐着沙
沙逐着风
风沙的混沌
吞蚀了你瘦弱的身影
也许怪你经不起过大的风暴
你在深夜里
憧憬七月的故乡
你想把无处流的热泪
流尽在老人的怀抱
你想把无处说的话
吐诉给还等候你回归的
那放牧的姑娘
也许你惦念着白杨的萧瑟
秋日园林里的绿叶变红
在雪花饰耀的大地
你说:这儿是无花的沙漠
沙漠永远不会开花
(但是,你一度

也会为沙漠中稀有的鲜花
你、我,还有无数你
斗争的伙伴)
于是……
你想走向那有花的地
通过我们英勇的哨岗
不过那已不再有
秀丽的家园
温馨的乡井,到处是
荒芜的野草
焦黑的屋架
卷一道青烟
老人早挥罢长剑死去
那放牧的姑娘
也遗弃了你留下的
那只脱节的牧鞭
还有热望的伙伴
到处的是舞动的红缨枪
青纱帐里
浮起胜利的歌唱……

一把泪洒下辽漠的天空
乌暗的云球
低压着远方的山峦
你仍是无言地走
无言地叹息
寂寞地自语着
冰雪里祖国的土地
永久不会开花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但是,我的伙伴
冰雪底下
有潜伏的生命之流
我们正以心底温暖
向寒冷搏斗)

刊载此诗的《北战场》(半月刊)于1941年1月在国统区河南洛阳创刊,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出版发行,属时政类综合性刊物。该刊多介绍国内北方抗日战场的战况,对国内外的经济问题也有所关注,文艺类作品刊载数量不多,与该诗同期刊载的还有谢冰莹《毛女洞游记》、力夫《痛苦的灵魂》、天纵《流亡曲》等作品。总的来说,该刊物的办刊宗旨仍是从民族大义出发、鼓励人民参加抗战,所刊文章内容皆以爱国情怀和战斗精神为主要基调。1941年前后,正值抗战之艰难时刻,此时的穆木天跟随国

立中山大学由滇返粤。1941年1月,诗人的妻子彭慧也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来到中大师范学院所在地碎石镇管埠村,一家人遂定居于此。^[1]

在理解《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一诗的独特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并梳理穆木天的诗歌创作脉络,以明晰他在该诗创作前后的思想轨迹。1927年4月,穆木天的第一部诗集《旅心》经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发行,该诗集中所收诗作多为穆氏留日期间写就。从此时的《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泪滴》《江雪》《水声》等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法国象征诗派在穆木天思想深处所留下的魅影——强调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性书写,排斥理性,突出诗的神秘性体验。穆氏此时即强调“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并提倡诗人追求“纯粹的诗的感兴”^{[2]140},这一时期的诗“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3]8}。《心欲》一诗中,“我愿化一飞鸟/高飞向云际/逐着红紫的天空/飞坠西海里/我愿化一飞鸟/长飞向密林/栖在翠柳的梢上/静听牧歌声/我愿化一飞鸟/静坐船桅梢/看渔人秉烛对饮/漫将长夜消”^{[4]22-23},这几句极富节奏感和音韵感的句子将诗人惆怅、憧憬的情愫表露无遗。《水声》这首诗显然是在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与音韵的和谐——“我们要找水声到渔人的网眼/我们要找水声到山间的泉源/我们要找水声到海口的沙滩/我们要找水声到那里的江湾”^{[4]31}。然而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包括穆木天在内的中国新文学作家,普遍遭遇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精神危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逐渐丧失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颓废、焦灼、无力之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萦绕在他们心头,方向的迷失和前路的渺茫也让穆木天不禁发出了“我不知/哪里是明/哪里是暗/哪里是朦胧/应奔哪里行”^{[4]98}的感喟。“在与法国象征诗直接相联系的穆木天身上,悲观绝望的境遇感受蒸发掉的恰恰是他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是一种丧失精神追求的表现。”^{[5]204}但这样的境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回国之后,在无边的空虚的包围下,他以“数年的沉默”^{[2]420}来对抗着那个令他无言的年代。而正是这数年的沉默,恰恰喻示着他已经做出了与过去诀别、向未来前进的历史性抉择。

1937年7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流亡者之歌》收录了穆氏于1930年至1936年间所创作的诗歌21首,刊载于《现代》杂志1934年2月第4卷第4期的《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一文,被穆氏用作此诗集的“代序”。应当说,《流亡者之歌》与《旅心》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风格与形式皆相异的两

部诗集。《流亡者之歌》里“民众的苦痛”“殖民地的贱民”“日本的利刃”“农民的热情”“马牛的呻吟”之类的概念,在《旅心》当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此类颇显粗糙的语言已经昭示着穆木天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以及形式的转变上所做出的努力。这样的转变显然是在目睹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人民的惨痛生活之后,穆氏所自觉做出的个人反应。此时的穆木天重又回到了杜甫、雨果和歌德那里,强调诗歌对“人间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反映”,伟大的诗歌要具有“客观的真实性的崇高强烈的感情”^{[6]289}。他在为“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所写的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中,就高声呐喊着“我们要唱新的诗歌/歌颂这新的世纪……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4]133-134}的誓言,这分明是口号式的呼声,除了激情和斗志,诗的原有的韵味和美感已经不复存在了。《流亡者之歌》中的诗作若按穆氏自己的界定,可以说“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血泪的产物”^{[2]414},是在描写民众的悲惨遭遇和现实生活,是在控诉罪恶的战争,是在期盼和平而幸福的未来。如果说在《旅心》阶段,他是将李白的诗歌创作水准置于杜甫之上的话——“李白飞翔在天堂,杜甫则涉足于人海”^{[2]141};那么在《流亡者之歌》阶段,杜甫的意义在他这里就显然是高于李白了——“诗人是应当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族解放之路。……我们现在不是需要杜甫、密而顿、惠特曼、雨果、雪莱一类诗人吗?”^{[6]242}

穆木天自编的最后一部诗集,也即他整个诗歌创作生涯当中的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于1942年9月在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录了他于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诗作共19篇。此诗集中的诗歌多创作于武汉时期和西南时期,1937年10月作于武汉的《民族叙事诗时代》可以视作他在这一阶段当中诗歌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你们要做清亮的回声,你们要做广博的号筒,诗人们! /歌唱吧!现在,民族的叙事诗的时代到临了!”^{[4]201}《我们要做真实的诗歌记录者》再一次强调了这一信念:“民族的战斗的行动/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诗歌记录者!”^{[4]209}这一阶段的诗歌完全是个人情绪与民族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诗人与时代之间的互动,这是诗人的个体生命在主动融入历史的浪潮之中后所发出的自觉而又坦然的呼声。《关于抒情诗》《我们的诗歌工作》以及《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等文章,都是在论证诗歌创作必须与大众相联系、与革命战争相联系之类的问题。《武汉礼赞》《初踏进了牧歌的天

地》《昆明！美丽的山城》等诗作无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抗战必胜的高昂情绪。在1940年11月从昆明迁至广东碎石之后所作的《月夜渡湘江》一诗，应当是穆氏在这一时期当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一首了——“今夜我渡过了这琥珀色的湘江/远望去是一片苍茫/在雾影里飘动着往来的小舟/在空气中浮荡着朦胧的月光……湘江原野上是一片苍茫/我战栗地憧憬着他的未来的荣光。”^{[4]250-253}这首诗作兼采柔弱与刚强两类意象，浪漫气息与战斗精神并存，让我们在枯燥、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看到了一个诗人对美的关怀与渴望，看到了祖国那满目疮痍的河山仍旧拥有着秀美的风姿，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充溢了雄浑壮阔之气的华夏大地当中所滋养出来的。从《旅心》到《新的旅途》，在穆木天将近三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我们得以窥见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诗人的命运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诗的内容与形式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在穆木天这里，个人与社会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未来的追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未曾离开过土地，他永远是“大地的儿子”。

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这首诗作了。当我们将这首诗放置于《新的旅途》这一历时性阶段当中时，就不难理解穆木天为何会发出这般既裹挟着忧伤又掺杂着激情的喟叹之词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诗人、剧作家，他的诗歌创作虽然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革命化和大众化的内质始终在他的诗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后期的诗作俨然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歌颂和赞美之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战斗热情的诗人，却在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打击之下于37岁那年（即1930年）悲愤地自杀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瞿秋白、蒋光慈等人就先后向国人介绍过马雅可夫斯基，与穆木天同为中国诗歌会主要成员的任钧等人最推崇的苏联诗人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同时，这位无产阶级战士还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感情和无限同情的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相继写下《不许干涉中国》《莫斯科的中国》和《你来读一读，踏上巴黎和中国》等诗作，可以说，在二三十年代的诗坛中，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诗坛的联系，在此不想过多赘述。事实上，仅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五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以及其他出版社所印行的

马氏的诗选和传记材料的这些历史事实来看，就已经可以从历史的维度印证马氏对于中国的影响了。

穆木天与马雅可夫斯基具体是从何时发生的精神上的联系，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七七事变以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实践和战斗精神已经被穆木天所认同并践行了。有学者在论及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朗诵诗倡导者高兰的影响时，着重提到了高兰创作于1945年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一文^[7]。其实，早在1938年，穆木天在《论诗歌朗诵运动》一文中，就已经号召中国的朗诵诗人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了——“把那些诗歌经过朗读的方式传达给大众，教育大众。……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时代所完成的东西，我们的诗歌工作者在我们的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也要同样地加以完成的。”^{[2]226}当然，穆木天的这篇关于诗歌朗诵运动的文章未能受到相关学者重视的原因，还在于穆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按照陈方竞的说法，穆木天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失踪者”。我们有理由认为，穆木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广泛地接触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大部分诗作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民间的山歌、大鼓书词等民间文艺体裁的时候，是颇为赞赏苏联的民间歌谣的。他曾经翻译过两首小民族赞美列宁的歌谣，他认为，“那是比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的诗还要动人的”^{[2]215}。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穆木天的妻子彭慧曾在1940年第1卷第4期的《文学月报》（重庆）上刊载过一篇《怎样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译作。这一对在抗战烽火中饱经离乱的伉俪，都曾对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给予过相当的关注，我们可以想见，他们二人也许会在一个静穆的冬夜里，借着烛光一同重温并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那饱含热情与暖意的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穆木天对马氏诗作以及对马氏其人都是有相当的认识与感触的。

在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之际，即1940年，《文学月报》（重庆）、《中苏文化》（南京）、《中国诗坛》（广州）等刊物都相继开设了“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栏目。穆木天为上述刊物分别译介了马氏的《呈给同志涅特》《专在开会的人们》《乌拉迪密尔·伊里奇》三首诗作。《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便作于次年。这首长诗显然是为了纪念马氏而作，类似纪念性的诗歌在同期还有另外几首：如1939年7月2日发表于《云南日报》上的《悼高尔基》，11月1日发表于《文艺阵地》上的悼念鲁迅的诗作《秋风里的悲愤》，以及次年11月3

日刊载于《救亡日报》上的《为阿尔风斯·都德诞生百年纪念而作》一诗。然而,《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与这些同类题材的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同的。拿《秋风里悲愤》来说,“鲁迅老人! /你确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 /如同我们祖国一样, /你从苦难中生长出来, /你过了苦难的一生! ……你要用你的愤怒的火/把我们的敌人/一个一个地/烧死!”^{[4]232-238}这几乎全是宣誓性的、呐喊性的语调了,诗人的情绪是激动的,心情是沸腾的,这是基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与处于危难当中的民族命运而发出的肺腑之言! 对照这一时期穆氏所发表的其他诗作,几乎全是抗战岁月中的呐喊与长啸,悲愤之音震彻寰宇,艺术性已经完全隐退于大众性和政治性的身影当中了。

然而,当我们反观《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时会发现,在这首诗中,诗人那宣言式的呐喊之声已经减弱了,情感也趋向于平实与深沉,总体的格调可以说是内敛式的低吟。诗人别具一格地在诗歌的开头加上了一小段引言,全诗的情调随即在一汪惋惜与困惑之情的漩涡当中缓缓流转开来了。在苍茫的黄昏里,马雅可夫斯基独自一人伴着凄厉的风沙悄然步入辽远的山谷里,他孤独地离别了祖国的山河。“苍茫的黄昏”经由诗人的深化,成了负载诗人沉痛心情的表征,以黄昏作为起兴,诗人的情感一泄如注,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分节。但就是在这样的长诗中,节奏的紧促越发能使我们听触到诗人内心当中充满惋惜和悲痛的回音。农家篱梢上鸣鸟的呼唤已经随往日的时光一同逝去了,在无尽的长途中,诗人听到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低噎”而“绝望”的呜咽,诗人那沉郁的感情经过想象的升华,已经进入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似真似幻的“现实世界”当中了。诗人甚至随着马雅可夫斯基那匹奔腾的骏马一同在暗夜里飞驰着,作为战士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毫不畏惧炮声和枪弹的,他在枪林弹雨中尽情地驰骋,并时时发出似“春雷”般响亮、如“瀑布”般爽朗的笑声! 这是多么勇敢而又潇洒的战士啊! 接着,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孱弱的、悲戚的马雅可夫斯基又复现在我们面前,他在风沙中艰难地跋涉着,他回想起了那放牧的姑娘和故园里的白杨,但这一切都已随着风沙消散在了无垠的荒漠当中了。“秀丽”的家园也已经化为了“荒芜的野草”与“焦黑的屋架”,这是战争带来的恶果,不仅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乡已成焦土,诗人自己的家园也已经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荡然无存了! 诗人遥望马雅可夫斯基逝去的地方,那片土地上满是“冰雪”。然而,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又从低

沉、失落的情绪当中挣扎出来了——即便是“冰雪底下”,也有“潜伏的生命之流/我们正以心底温暖/向寒冷搏斗。”我们也随着诗人的奋起而重燃起了希望的火炬,我们的心也跟随着诗的情绪而由阴冷走向了温暖,这是未来的温暖,是由战斗而赢来的温暖。当时代的重担摧压在诗人肩上之时,个体的经验会不由自主地服从于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对一个文人来说,他只能以笔作枪,以自己微弱的能量去催生出新的希望,马雅可夫斯基是这样,穆木天也同样如此。

关于穆木天前后期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学界似乎已成定论,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穆氏后期的诗歌较前期的《旅心》相比,在艺术上是明显倒退了的。也许是,“千万的刀枪打入了民众的身躯/千万的刀枪刺入民众的心上/民众总有一天会想到苦痛/他们那时要举起旗帜向你们反抗”^{[4]123-124}。“你们听! /全民族在怒号! /你们听! /全民族在吼叫!”^{[4]208}此类充满战斗热情的诗句,同“我听见你的水晶的泪滴/滴滴在你的鹅白的绢上/滤在徐徐的吹过的夜风/对着射出湖面的光芒”^{[4]25}和“渺渺的冥濛/轻轻地/罩住了浮动的村庄/茅茸的草舍/白土的院墙/软软的房上的余烟”^{[4]62}相比,从艺术水准上而言,显然是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看《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一诗,大概就会重新考量我们之前的成见了。我们看这几句诗:“你枯沙的步音/随叹息隐入辽远的山谷/泪的濛烟/遮断我悲伤的视线”;“一把泪洒下辽漠的天空/乌暗的云球/低压着远方的山峦”,这实在是诗人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对他早年所追寻的美的内质和诗的理想的一种回溯和复原。这里面的色彩、声音、想象,难道不是穆木天在20世纪20年代时就极力追寻的诗的“内生命”吗? 我们难道不觉得这首诗的旋律形式有散文诗的影子吗? 这难道不是诗歌的音乐性与诗人主体意识的内在契合吗?

事实上,“内生命”和散文诗恰恰是穆木天早期所极力提倡的构成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要素。他认为“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要去写出“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诗的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2]140}。而这首诗恰恰具备了他早年所要追求的诗的内质。“你的胸襟,再没有/火烧的石榴花”,“黯黯的茅棚下/你跨出祖父的马/怀着一颗摇动的心/驰骋在寒冷的大漠/驰骋在五月樱花的大别山”,“火烧的石榴花”是

诗人的想象,也是诗人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象征就是暗示一种境界,在诗人所营造的诗的世界或者说是想象的世界里,马雅可夫斯基的脚步甚至还曾丈量过那红旗飘扬的大别山。马雅可夫斯基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的印象完全是基于书报、讯息层面上的认识,而这丰富的极具塑造意义的想象也正是诗人的魅力之所在。同样的,穆木天也是如此,整首诗作始终是想象与现实交织的产物。按照往常的说法,穆木天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期,前期倾向于象征主义,而后期又转向了现实主义,以历史的逻辑来支撑这一看法自然是合理的,但在他后期所创作的这首《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中,我们分明看到他在“时代需求与诗人自身某一层次的艺术个性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统一”^{[5]363}。反映现实的呼声固然重要,但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的渴望和对意境的追寻。国民意识和他所倡导的纯诗意识并没有在后期完全走向对立的两极,他在《谭诗》中所揭示出的“诗人的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交响’的问题”^{[8]88},在《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中,已经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效果。诗歌对大众化、政治化的崇拜并没有完全限制穆木天的创作路径。因此,这一首诗完全可以印证这样一个事实——他在风云变幻的革命时代当中始终没有遗忘他最初的理想,在苦难和血泪面前,他毅然坚守着一个时代的良知。

当然,穆木天其人与其诗有待我们去继续探寻的地方还有很多,文学史的书写并非能够完全契合过往的历史事实,记忆的存在方式总是微妙而又具体的。文学领域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归纳推理和演绎逻辑,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的奇妙关

系远远不是一些所谓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趋同原则所能够束缚和制约的。对于经典的祛魅也并非能够用达达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所简单概括,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浅层意义上的解构与重构。我们对旧事物的认识应当随着新的时代精神、凭依着新的文献资料来逐渐延展并且深化,在那些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角落和过往记忆中,还隐藏着许多我们未知的历史真实。用客观的视角和思辨的逻辑去重新审视和发现那些已经被我们下过“判决”的作家和作品,在广袤的文学原野中去找寻那一座座遗失的记忆的宫殿,是我们从文学史中探掘新的收获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陈方竞.穆木天传略[J].新文学史料,1997(2):196-205.
- [2]陈悖,刘象愚.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3]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4]穆木天.穆木天的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5]陈方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6]蔡清富,穆立立.穆木天诗文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 [7]常文昌.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新诗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97-102.
- [8]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Lost Poem by Mu Mutian and Others

CHEN Jiahui

(College of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How Unlike Your Voice* is a poem written by Mu Mutian in 1941 in memory of Soviet poet Mayakovski, which has not been found in all kinds of Mu's works and chronicles. This poem shows the inner unity of symbolism and realism in writing art,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style of his poetry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understand Mu Mutian's later poetry creation mode and poetry theory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poem before and after its creation and discussing its content and form.

Key words: Mu Mutian; lost poems; Mayakovski; inner life

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 响机制研究

——基于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欧绍华^{1,2}, 范 伟¹

(1.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2. 东莞城市学院 商学院, 广东 东莞 523419)

摘 要:在资源约束的创业环境中, 创业拼凑是关注的热点。基于拼凑理论, 从学习的角度出发, 研究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 并且引入创业学习这个变量, 探究其在上述两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根据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 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和 Bootstrap 方法检验后, 实证结果显示: 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以及创业学习的三个维度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 创业学习的三个维度也都明显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 并且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 增添了创新创业领域中员工创新能力和创业学习的前因变量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创业拼凑理论。

关键词:创业拼凑; 创新能力; 经验学习; 认知学习; 实践学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4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20-08

在创新和创业的浪潮中, 我国不断出现智慧供应链、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模式, 个体创业者、初创企业等在各行业中汹涌澎湃。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本、技术以及其他适合内部发展的资源。所以, 企业人员要善于抓住不可错失的机会, 从而去重建组织内的资源^[1]。通过创业拼凑, 改变资源的原本属性和用途从而突破资源约束^[2], 提高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初创企业人员使用各种拼接手段来创建更多与资源属性及其组合方法相关的知识或技能, 从而在满足自身需求中, 不断为企业人员构造“知识走廊”, 并丰富行业经验^[3]。这有助于初创企业人员通过内外部信息整合, 挖掘创新创业的有利机会^[4], 进而不断增强资源整合、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经验。面对资源匮乏的创业环境, 创业人员在尝试重新连接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失败。通过不断的反复试验, 使他们拥有逆向思维, 有利于加强

个人经验和认知学习, 从而更好地实践^[5], 打破“框架效应”, 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中, 学者们得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研究大多汇集于创业拼凑对企业或者团体组织创业绩效的影响, 以及部分研究把创业拼凑放在结果变量中, 而创业拼凑与个体创新能力之间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 本文把创业拼凑放置前因变量, 探究其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 同时引入创业学习这一变量, 厘清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

1967年, 法国人类学家 Lévi Strauss 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到“拼凑”(Bricolage)一词^[6], 指出“拼凑”是一种思维模式。创业拼凑这一概念是由 Baker 和 Nelson 于 2005 年第一次提出的, 他们将其描述为对手中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整合, 并且要就将就

收稿日期: 2021-09-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研究生创业意愿向创业能力转化的提升机制研究”(2019JGZD069);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创业拼凑、绿色创新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研究”(CX2020)

作者简介: 欧绍华(1964—), 男, 湖南邵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 东莞城市学院商学院客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

利用^[7],其中“手中资源”包括创业者所拥有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比如:设备、商业模式、知识财富等。“将就”指的是企业或创业者不必等待机会的来临,而能够在不稳定的市场中及时拼凑手中资源,抓住机会,通过不断的重组整合,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力。

Burns 和 Stalker 在 1961 年最先提出创新能力的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本组织提供新模式及新思维等并由此取得了良好成绩的行为。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从个人层面出发对个体创新能力进行研究,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离不开员工创新能力。Amabile(1996)提出创新能力的成分模型,他认为员工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流程、内部动机三大要素会严重影响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能力水平^[8]。同样的,张爽等(2006)认为个人储备的知识量、要实现创新所必需的理论基础和之前的经验都是员工创新能力的根基^[9]。

企业在初创或成长中总会面临着资源的有限、匮乏和部分资源的摒弃与浪费问题。之前被认为无用的资源,通过创业拼凑,将其调配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问题。创业者执行“选择性”的资源拼凑,可以形成具有差异性的资源和创新能力^[10]。通过创业拼凑在企业内外部建立新的桥梁,连接多方资源渠道,开发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的价值,挖掘潜在的信息,将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11]。因此认为,创业拼凑可以使初创或成长型企业打破现有的资源限制,不按照常规和惯例,从而对失败产生更大的容忍度,为企业员工创新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2]。此外,祝振铎等(2017)发现创业拼凑并不是一味地简单堆积,而是用系统的逻辑进行创造性和选择性的拼凑活动,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创新能力^[13]。创业拼凑还有助于企业员工产生自身的经验知识,这些都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带来肥沃土壤^[14]。创业拼凑的过程中包含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重组与创造,以及有创意的产品或想法,这些都力求有效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而这种重构整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创新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

H1: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二) 创业拼凑与创业学习

王浩宇(2017)指出在企业中,创业学习必不可少,实证了资源整合积极影响创业学习,并且初创人员可以从资源整合行为中学习到大量的创业知识^[15]。刘人怀(2017)根据 213 份问卷,证明了创业

拼凑能直接正向影响创业学习^[16]。创业拼凑是一个短时间学习和拥有灵感能够即时创新的过程,相反,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学习与积跬步、积小流的过程,对创业学习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创业学习包括:创业经验学习、创业认知学习和创业实践学习三个维度,并且这三种学习的内容通常是相得益彰的,并不是相对独立的过程^[17]。在创业初期,企业人员经常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通过对市场、硬件、内部和外部操作环境的了解,以及不断的反复试验,将现有的企业运营经验转化为创业经验^[17]。认知学习是指人们对资源的整合和使用,或对成熟企业的相关模型的引用和模仿,以及对有助于企业运营的知识提取等方面的思考。在大量的创业过程中仅仅凭靠个人的经验往往是不够的,因此要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实践学习是将所学习到的经验和认知用于创业实践中。通过创业拼凑对手边资源实施创造性的组合,加强企业寻求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对经验学习有个良好的反馈作用,还能够打破原有的僵硬认知^[18]。然后在反复试验试错和创新的过程中深化和延伸公司员工的认知能力,重新审视公司的资源价值,并建立起新的技能和知识。实际上,通过对手边资源进行拼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业拼凑的效率,从而有效应对动态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即刻行动可以帮助企业员工积累更多隐性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是企业人员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因此,提出假设:

H2: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H2a:创业拼凑对经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H2b:创业拼凑对认知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H2c:创业拼凑对实践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三) 创业学习与员工创新能力

Ravasi 等(2005)认为持续不断的创业学习使员工能够获得新技能和新知识,当员工拥有的知识储量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新颖的思路^[20]。员工不断在新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供应链管理实践中等学习,提升自身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企业人员通过不断创业学习,对以前的行为进行反思总结,就能够对所获知识进行愈加适合有效的利用,能够促进其创新能力。吴晓波等(2017)研究发现,企业人员通过创业学习能够改变他们原有的认知,有助于他们培育创新能力^[21]。刘井建(2011)指出通过创业学习积累等既能促进企业员工的整合能力,又能把它转为组织中的资源,进而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22]。

经验学习是创业者将积累的有关管理、产品等

各种经验集合转化为知识的路径^[23]。通过经验学习,可以尽快熟悉市场状况和行业趋势,使初创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克服劣势,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个体的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有效提升^[24]。因此,经验学习有利于提升企业人员的创新能力。认知学习是人们通过仔细观察然后效仿他人的行为^[25]。比如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他非常善于留意摩根、洛克菲勒等其他名人的行为举止,通过发掘他们的信念,接着有效模仿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造就了不可思议的伟大成果。由于企业要面对动态的市场环境以及自身过于贫乏的经验,认知学习是创业学习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各式各样的认知学习,企业人员可以将获取的知识经验与目前现有的认知联系起来,不断地积累和实践,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及时应对变化多端的市场。

因此,提出假设:

H3:创业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a:经验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b:认知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c:实践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四) 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活动鼓励受资源约束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高性价比的资源优势,运用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企业人员进行创业学习的动态过程^[26],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积累各种经验、提高认知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进而推动员工接连进行创新活动并创造有差异性的流程管理或产品。因此,企业员工的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是创

业拼凑活动提升员工创新能力的重要桥梁。

创业拼凑对已有资源的重构和新资源的探索,能改变个人的学习状况,从而深入理解和重新塑造资源,为企业员工带来更多的创新活力。创业拼凑十分注重摆脱根深蒂固的认知,积极寻求特别的方案以有效解决问题。在资源拼凑过程中,初创企业员工要对原始资源或剩余资源的用途提出质疑^[27],从而激发新认知、获得新经验、产生新实践,促进初创企业员工的创业学习,为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奠定基础。刘人怀等(2017)从知识视角研究得出,创业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12]。开展创业拼凑活动还可以从消费者、行业中竞争者、政府报告中等获取更多信息,初创企业人员通过持续的创业学习提高个人创新能力,进而有效改进与创新已有技术、产品或服务。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4a:经验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4b:认知学习在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4c:实践学习在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构建了创业拼凑、创业学习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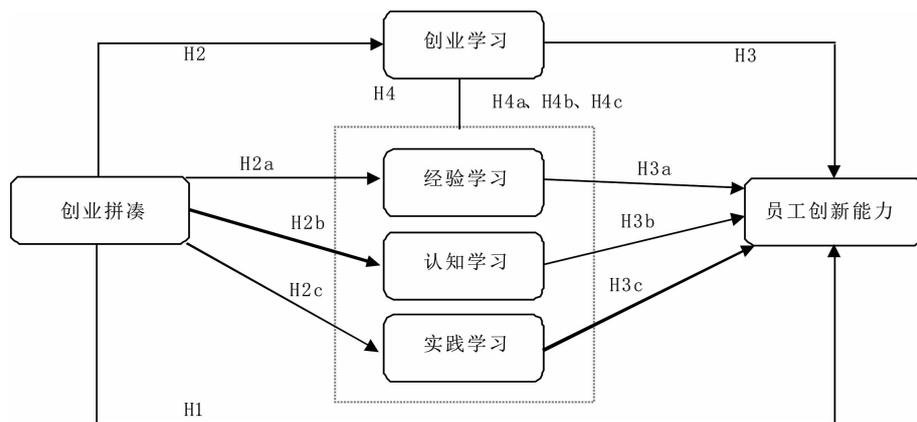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概念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为了尽量让样本多样化,本文选取不同年龄、教育程度、行业属性的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企业个体数据。参考国内外已有

的被广泛应用的量表与创业者、创业学者和教授的宝贵意见,再结合本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特点初步调整设计了本次调查的量表和问卷。在小范围的发放回收验证后,适当调整量表和问卷,并将修改好的问卷通过各个网络平台、社交平台 and 现场投放的渠道

进行发放。

此次调研活动在线上和线下一共发放问卷 340 份,收回 282 份,回收率约 83%;接着剔除 35 份不

合格问卷后得到 247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约 73%。样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信息

样本特征	类别	所占比例	样本特征	类别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48.58%	职位级别	普通员工	50.61%
	女	51.42%		基层管理人员	29.96%
年龄	21 岁以下	2.02%		中层管理人员	17.00%
	21—30 岁	53.44%	高层管理人员	2.43%	
	31—40 岁	27.94%	行业属性	制造业	14.17%
	41—50 岁	12.15%		互联网	23.48%
	50 岁以上	4.45%	金融业	14.98%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48%	政府或公共管理组织	11.34%	
	高中/专科	27.53%	专业服务类	16.60%	
	本科	53.04%	其他	19.43%	
	硕士及以上	12.96%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9.43%
工作年限	1 年以下	21.46%		民营企业	41.30%
	1—5 年	38.06%		外资企业	10.93%
	6—10 年	19.03%		中外合资	4.45%
	10 年以上	21.46%		事业单位	13.77%
			其他	10.12%	

(二) 变量测量

借鉴国内外已发明的具有权威的成熟量表,再结合中国的发展情景以及本研究的特点,经过重新整理后得到本文使用的量表。使用李克特(Likter)量表 5 点分类法对变量进行打分测量(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

借鉴 Senyard 等开发的量表对创业拼凑进行测量。根据需要选取修改:(EB1) 我们有能力使用现有资源找到有效方案以面对新挑战;(EB2) 面对新问题,我们可以整合内部资源或者从外部获得的便宜资源来解决;(EB3) 假定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并立即行动抓住机会等 6 个题项。

参考单标安等开发的创业学习的量表。量表提到了 9 个题项:(EL11) 不断反思失利行为;(EL12)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EL13) 本企业的创业决策很依赖已有的经验;(EL21) 时常与企业人员沟通;(EL22) 时常参加企业内外部正式或非正式的研讨会;(EL23) 经常看有关创业的书,从中抓住有价值的信息;(EL31) 创业路途中不断整理信息;(EL32) 重视在创业实践中巩固的创业知识;(EL33) 从创业实践中反思已有的经验。

使用 Zhou & George 基于 Scott 创新量表提出的员工创新能力量表。选取并修改:(EC1) 我时常运用新的方式完成任务;(EC2) 我可以想出利于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EC3) 遇见问题,我会从多角度出发考虑;(EC4) 我为新想法制订详细的计划等 10 个题项。

为避免潜在条件影响研究的结果,根据以往的

经验和研究,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所在行业四个变量加以控制。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共同方法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验效果,所以在设计编排问卷时要尽量减少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测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不高于 40%。说明同源性误差问题对此次的问卷数据影响不是很大。

(二) 信度和效度检验

(1) 信度检验

本文使用 SPSS 25.0 对变量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通过 Cronbach's Alpha 值检验问卷的信度,如表 2 所示,各个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创业拼凑 0.882,经验学习 0.802,认知学习 0.795,实践学习 0.880,员工创新能力 0.957,均大于 0.7,说明这些变量的题项具有较好的信度。另外,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示,创业拼凑的 KMO 值为 0.845,经验学习的 KMO 值为 0.710,认知学习的 KMO 值为 0.707,实践学习的 KMO 值为 0.725,员工创新能力的 KMO 值为 0.952,各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7,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均小于 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 效度检验

本文变量所测量的量表借鉴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开发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小范围预测试,然后调整以适应本次

研究,因此内容效度较高。通过 AMOS 24.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变量的每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在 0.695~0.898 之间,均大于 0.6,说明每个题项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所在的维度。此外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 AVE 值分别为 0.557、0.575、0.567、0.715、0.688,均在标准值 0.5 以上,且组合信度 CR 都大于 0.7,表明本文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由表 3 可知,各变量间相关系数都小于 0.6,而且每个变量的 AVE 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区分效度较理想。

表 2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Cronbach's	KMO	AVE	CR
			Alpha			
创业拼凑	EB1	0.800	0.882	0.845	0.557	0.883
	EB2	0.695				
	EB3	0.703				
	EB4	0.761				
	EB5	0.725				
	EB6	0.788				
经验学习	EL11	0.771	0.802	0.710	0.575	0.802
	EL12	0.707				
认知学习	EL13	0.795	0.795	0.707	0.567	0.797
	EL21	0.756				
	EL22	0.783				
实践学习	EL23	0.718	0.880	0.725	0.715	0.883
	EL31	0.849				
	EL32	0.787				
员工创新能力	EL33	0.898	0.957	0.952	0.688	0.957
	EC1	0.858				
	EC2	0.835				
	EC3	0.832				
	EC4	0.811				
	EC5	0.857				
	EC6	0.814				
	EC7	0.851				
	EC8	0.818				
	EC9	0.794				
EC10	0.825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与区分效度分析

变量	1	2	3	4	5
创业拼凑	0.746				
经验学习	0.347**	0.758			
认知学习	0.315**	0.307**	0.753		
实践学习	0.365**	0.356**	0.389**	0.846	
员工创新能力	0.479**	0.444**	0.427**	0.400**	0.829

注:(1)***为 $P < 0.001$,**为 $P < 0.01$,*为 $P < 0.05$;(2)对角线为 AVE 的平方根。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 4 可以看到:创业拼凑分别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均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347, P < 0.01$; $r = 0.315, P < 0.01$; $r = 0.365, P < 0.01$)。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也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479, P < 0.01$)。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与员工创新能力也有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r = 0.444, P < 0.01$; $r = 0.427, P < 0.01$; $r = 0.400, P < 0.01$)。为下一步回归分析提供了有力保障。

表 4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创业拼凑	3.464	0.831	1				
经验学习	3.208	1.005	0.347**	1			
认知学习	2.895	0.704	0.315**	0.307**	1		
实践学习	3.429	0.895	0.365**	0.356**	0.389**	1	
创新能力	3.67	0.881	0.479**	0.444**	0.427**	0.400**	1

注:***为 $P < 0.001$,**为 $P < 0.01$,*为 $P < 0.05$ 。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

为了验证创业拼凑、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以及员工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分层回归来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模型 1—5 的因变量为:员工创新能力。针对模型 1: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0.502,并且具有显著性($p < 0.01$),表明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所以假设 H1 得到证实。针对模型 2:创业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0.586($p < 0.01$),意味着创业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假设 H3 成立。同理,模型 3 表明:经验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beta = 0.276, p < 0.01$),假设 H3a 成立。模型 4 显示:认知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beta = 0.330, p < 0.01$),假设 H3b 成立。模型 5 显示:实践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beta = 0.122, p < 0.05$),假设 H3c 成立。

模型 6—9 以创业拼凑为自变量,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为因变量。模型 6: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0.364,并且呈现显著性($p < 0.01$),意味着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假设 H2 被证实。在模型 7 中:创业拼凑对经验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0.406($p < 0.01$),说明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经验学习,假设 H2a 被证实。模型 8:创业拼凑对认知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0.270($p < 0.01$),说明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学习,假设 H2b 被证实。同样,在模型 9 中:创业拼凑对实践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0.414($p < 0.01$),说明创业拼凑对实践学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假设 H2c 得到验证。

为验证中介效应,运用 Bootstrap 方法,在 95% 置信区间下,选择样本数为 5000 对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6 显示:创业学习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0.209 ($P < 0.01$),且区间均不包含 0 [0.123, 0.280],即创业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4 成立。经验学习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0.116 ($P < 0.01$),且区间均不包含 0 [0.060, 0.168],即经验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4a 成立。认知学习在创

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0.102 ($P < 0.01$),且区间均不包含 0 [0.042, 0.161],即认知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4b 成立。实践学习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0.100 ($P < 0.01$),且区间均不包含 0 [0.042, 0.163],即实践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4c 成立。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员工创新能力					创业拼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性别	-0.108	-0.051	-0.048	-0.046	-0.048	-0.098	-0.217	-0.040	-0.036
年龄	0.012	-0.045	-0.005	-0.062	-0.059	0.098 *	0.063	0.181 **	0.049
教育程度	0.086	0.053	0.062	0.037	0.044	0.057	0.089	0.088	-0.007
所在行业	-0.018	-0.022	-0.032	-0.031	-0.026	0.008	0.052	0.004	-0.032
创业拼凑	0.502 **	0.289 **	0.390 **	0.321 **	0.291 **				
创业学习		0.586 **				0.364 **			
经验学习			0.276 **				0.406 **		
认知学习				0.330 **				0.270 **	
实践学习					0.122 *				0.414 **
R^2	0.240	0.387	0.325	0.382	0.393	0.227	0.140	0.146	0.140
调整 R^2	0.224	0.371	0.308	0.364	0.373	0.211	0.122	0.128	0.123
F 值	15.206 ***	25.217 ***	19.273 ***	21.086 ***	19.277 ***	14.182 ***	7.857 ***	8.241 ***	7.869 ***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创业拼凑→创业学习 (路径 a)	创业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 b)	间接效应 (路径 a * 路径 b)	直接效应 (路径 c')
β (CI)	0.360 **	0.581 **	0.209 ** (0.123, 0.280)	0.299 **
	创业拼凑→经验学习 (路径 a)	经验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 b)	间接效应 (路径 a * 路径 b)	直接效应 (路径 c')
β (CI)	0.420 **	0.277 **	0.116 ** (0.060, 0.168)	0.392 **
	创业拼凑→认知学习 (路径 a)	认知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 b)	间接效应 (路径 a * 路径 b)	直接效应 (路径 c')
β (CI)	0.267 **	0.383 **	0.102 ** (0.042, 0.161)	0.406 **
	创业拼凑→实践学习 (路径 a)	实践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 b)	间接效应 (路径 a * 路径 b)	直接效应 (路径 c')
β (CI)	0.393 **	0.255 **	0.100 ** (0.042, 0.163)	0.408 **

注:(1) CI = 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如果 CI 不含 0,表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2) *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四、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拼凑能够直接而且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绝大多数人极少关注被扔在黑屋的闲置资源,而创业拼凑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与配置手段将这些不起眼的“无用资源”中脱颖而出,打破原有的认知,提升个体的创新能力,赋予它们新的属性。另外,创业拼凑还有助于经验学

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创业拼凑是利用手头资源即刻行动,不等待“正确的”资源,而这通常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来探索“不正确的”资源如何满足需求。任何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资源短缺是一个永恒的约束,管理者通过拼凑不断地冲破制度,不断地触碰资源环境约束创业活动的边界,拼凑是一个不断的尝试—试错—再尝试的过程,很多节点和结果是创业者不可预测的,此时仅凭借自身的先前经

验往往是很难支持后续的创业活动,因此需要不断反思现有经验,而创业拼凑强调即刻行动很好地促使了创业者不断创业学习和反思。

创业学习的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均对员工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新创企业的行业经验往往是十分贫乏的,通过创业拼凑时常会给新创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验和认知,为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源泉。在拼凑过程中,涉及内部认知模式的转变和重构,而这都有利于创业学习。拼凑中旧资源孕育新元素,新元素提升旧资源,新旧资源在转化中,不断获取经验、认知和实践,进而提升个人的创新能力。

(二) 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1)近年来有关创业拼凑的研究越来越多,关于它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也涉及颇多,但是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却十分少见,由此本研究增补了这部分的研究。(2)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及员工创新能力的研究同样不多见,本文实证研究了创业学习三个维度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增添了员工创新能力的前因变量研究。(3)添加了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拼凑和创业学习理论。(4)在探究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时,引入第三变量发挥中介作用,为提升员工创新能力增添崭新的路径。

本研究对创业实践也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一是积极利用创业拼凑行为开发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态、创造新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个人的创新能力。比如“花小猪”和“滴滴”打车平台不用自己买车,高效地整合配置社会上闲置的汽车,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二是不断从旧资源中孕育新的元素和结构,加强经验、认知学习,不断进行实践,激发个体的创新能力。从旧制造转向智能制造,单纯的物流孕育智慧物流。三是新旧经济的融合、新旧动能的融合、虚拟实体的融合。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纳入传统产业将改变新世界。旧经济拥抱新经济,激发新的活力。例如,传统车和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结合;实体店正在进行线上和线下集成,并且O2O处于活动状态;先进的技术(例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传统的制造业插上羽翼,助力飞翔。

(三) 研究不足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不

足之处。第一,有学者研究把创业拼凑分为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本文没有对创业拼凑进行细化分析,缺乏变量维度与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第二,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的是截面数据,不具有动态性,未来可长期跟踪,收集更丰富的数据。第三,本文引入并验证了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未来可继续研究创业拼凑、创业学习和员工创新能力的前因和后因变量,构建完善合理的模型,比如有中介的调节效应、链式中介效应等,增添新的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 [1] Hooi H C, Ahmad N H, Amran A, et al. The Functional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Ensuring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16, 39(12): 1616 - 1638.
- [2] 李雪灵,李玳珂,刘京,等. 创业拼凑还是效果逻辑:理论适用条件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1): 17 - 29.
- [3] 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 217 - 226.
- [4] 田莉,龙丹. 创业过程中先期经验的作用解析:最新研究成果评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29(11): 41 - 45.
- [5] 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6): 604 - 623.
- [6] Lévi Strauss.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 - 366.
- [8] Amabile T M. Creativity in Context [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9] 张爽,周海炜. 知识转化理论下企业员工知识创新能力评价[J]. 情报杂志, 2006(11): 130 - 132, 129.
- [10] 姚柱,罗瑾琏,张显春. 勤俭节约:创业拼凑对创业者节俭式创新的影响[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42(2): 96 - 111.
- [11] Boxenbaum E, Rouleau L. New Knowledge Products as Bricolage: Metaphors and Scripts in Organizational Theory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2): 272 - 296.
- [12] 刘人怀,王娅男. 创业拼凑、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7): 1 - 8.
- [13] 祝振铎,李非. 创业拼凑、关系信任与新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7, 38(7): 108 - 116.

- [14] Duymedjian R, Ruling C C. Towards a Foundation of Bricola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J]. Organization Studies,2010,31(2):133-151.
- [15] 王浩宇. 资源整合、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7.
- [16] 刘人怀, 王娅男. 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10):137-148.
- [17] Green S G, Welsh M A, Dehler G E. Advocacy, Performance and Threshold Influences on the Decision to Terminat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3,46(4):419-434.
- [18] Simonin B L.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Know-how: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5):1150-1174.
- [19] Wiklund J, Shepherd D.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13):1307-1314.
- [20] Ravasi D, Turati C. Exploring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5,20(1):137-164.
- [21] 吴晓波, 赵子溢. 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问题: 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1):114-127.
- [22] 刘井建. 创业学习、动态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支持模式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 24(32):128-131.
- [23] Politis D.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5,29(4):399-424.
- [24] 葛宝山, 王浩宇. 资源整合、创业学习与创新研究[J]. 南方经济, 2017, 35(3):57-70.
- [25] Holcomb T R, Ireland R D, Holmes R M Jr, et al. Archite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xploring the Link among Heuristics, Knowledge, and Ac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09,33(1):167-192.
- [26] 祝振铎, 李新春. 新创企业成长战略: 资源拼凑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1):71-82.
- [27] Freeman R. Epistemological Bricolage: How Practitioners Make Sense of Learning [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7, 39(4):476-49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Ability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U Shaohua^{1,2}, FAN Wei¹

(1.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Dongguan City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China)

Abstract: In a resource-constraine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s a focus of attention. Based on the bricolage theor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mploy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introduces the variabl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to explore its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ccording to the valid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tes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experiential learning, cognitive learning and practical learn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lso obviously positively affec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mployees, and play a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employees. As a result,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added, and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has also been further enriched.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novation abil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gnitive learning; practical learning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李 雪, 李晓翔

(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判断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这一能力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中小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但是其规模小、资金薄弱、抗风险能力弱, 疫情影响下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成为当务之急。故本文选取了中小企业板2011—2019年568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样本横跨“十二五”“十三五”两个政策规划周期。利用Stata 15.0、Excel 16.0软件和系统回归方法分析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探究发现, 资产专用性在二者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本文对中小企业风险承担、资产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有所启示。

关键词: 经济政策; 企业风险; 资产专用性; 中小企业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5

中图分类号: F272;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6-0028-05

一、引言

中小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疫情之下无数中小企业受到重创, 如何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现实意义重大。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实现有序复工复产,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运用政策“指挥棒”,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面对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工信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全力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进一步加强财政扶持、金融扶持、创新支持、公共服务和统筹协调等6个方面20条措施; 安徽省政府着力降低中小企业租金、要素、税费等负担, 强化服务保障措施, 提供便利金融服务, 多渠道多举措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这些打破常规施行的经济政策,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小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力, 保障了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持续经营和发展。当我们把视角从短期切换到长期来看, 我国政府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例如“四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

划”, “十二五”期间提出的“互联网+”“双创”计划, “十三五”期间提出的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从长期来看, 政府根据国内外各种情况频繁调整政策, 政策波动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经济活动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政府频繁调整经济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从宏观落实到微观, 就是每一个企业实现有质量发展。企业成长过程中必须能够承受住各种风险才能长久存活下来, 风险承担水平构成了企业实力要素之一。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追求利润最大化意味着要承担高风险,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风险和收益权衡后的结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反映了企业对于发展中风险的态度和倾向, 在存续经营中对于决策风险的判断, 这些决策包含企业经营活动、投融资活动等日常经营活动。当组成宏观经济的每一个微观企业, 都能有着较高的风险承受力, 有效化解各种风险, 那么将提高我国

收稿日期: 2021-06-18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AHSKZ2019D002); 安徽大学社科基金重大培育项目(S030314003)

作者简介: 李雪(1996—), 女, 安徽蚌埠人, 安徽大学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国民经济风险承受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提升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和创新实力。但是每个企业由于规模、管理制度、经营方针等不同,对于风险承受力也有所差异。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市场认可度低、风险承担水平低,但其在促进改革、增加就业、普惠民生、防范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承受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作为中小企业的代表,自2004年设立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彰显了其存在的历史意义。疫情冲击之下,无数中小企业经营受到重创,收入锐减,维持生存困难,对于突发的风险承受力较差,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刻不容缓。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临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但是长远来看调整的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却不得而知。基于这一背景,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变化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企业内部资产配置水平在二者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加深入了解经济政策变动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中国经验。除此之外,通过资产专用性视角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究也有助于我国政府结合中小企业资产配置的特点制定相应政策,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Julio^[1]、Gulen^[2]和Kang^[3]等学者开始注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金雪军^[4]、王义中^[5]等学者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国内的房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就业质量,也会影响微观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投融资决策等。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企业进行高风险项目投资时重要的考量因素,企业作为政策接收者而非政策制定者,对于未来政策导向难以预测,选择何种程度风险水平的项目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即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受力。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企业投资时面临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项目预期回报率不确定性增大,管理者对于预期收益抱有悲观预期,对于一些风险水平较高的项目,管理者从规避风险的角度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暂缓甚至放弃投资;其次,中小企业获取资金主要通过银行融资和

股东投资两个途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对于银行来说借贷政策会更加严厉,企业的信用等级会下降,对于股东来说会对企业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或者减少甚至取消投资,从而导致股东和银行来源的资金减少。从银行融资和股东投资二者综合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很可能将会暂停或者取消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以保持收益稳定,抗风险能力降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未来经济形势如何走向,企业难以预知和应对,为了稳妥起见企业往往减少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短期来看这种做法可能避免了高风险,但无形中降低了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不利于企业长久经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Williamson^[6]首次使用了“资产专用性”的概念,他把资产专用性定义为企业现有资产考虑重新配置时,不影响其所包含生产价值的程度,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7]。这种“路径依赖”在后续会引发“套住效应”,专用性资产本质表现为唯一且不可逆的特定交易与专用性投入的匹配,这种“套住效应”可能使企业面临很大的损失,体现在企业前期花费大量成本投入的专用性资产很容易变成沉没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常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出现,为了避免这种行为发生,我们可以预期企业未来发展中可能承担较高的被“敲竹杠”风险。中小企业规模小、筹资能力差、风险承担水平低,为了应对资产专用性的“套住效应”和“敲竹杠”风险,倾向于选择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资产专用性越高,越会减少甚至取消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以确保投资收益稳定,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降低。因此,资产专用性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发挥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资产专用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初始样本选取了568家中小板上市公司,样本期间是2011—2019年,政策周期横跨“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样本中剔除ST类企业、金融类企业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企业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筛选得到3976个样本观测

值。本文主要从国泰安 (CSMAR) 系列数据库中选取企业层面的数据,一些必要但缺失的数据在巨潮资讯网站搜集并加以补充。本文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水平上下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以避免极端值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 采用的是 Baker 等研究的指数^[8]。

(二)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在当前的研究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Risk*) 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种:(1) 股票收益的年度波动;(2) 企业盈利波动性。目前我国股票价格相对波动较大,投资股票所得收益并不真正完全反映企业价值。当一个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增强时,未来经营过程中现金流量波动的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大,故学者多采用盈利波动性衡量这一指标。本文借鉴主流观点的做法^[9-10],对这一指标用 3 年期 ($t=3$) 盈利波动性加以衡量。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盈利水平差异较大,研究中为了消除行业因素产生的影响,首先计算出经行业均值调整后的 3 年期企业 *ROA* 的波动性如公式 (1); 然后在公式 (1) 的基础上确定企业经行业调整后每一观测时段内 *ROA* 的标准差作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如公式 (2)。

$$AdjROA_{i,j,t} =$$

$$EBIT_{i,j,t}/A_{i,j,t} - \left(\sum_{k=1}^{X_{j,t}} EBIT_{i,j,t}/A_{i,j,t} \right) / X_{j,t} \quad (1)$$

$$Risk_{i,t} =$$

$$\sqrt{\sum_{i=1}^n (AdjROA_{i,j,t} - \sum_{i=1}^n AdjROA_{i,j,t}/n) / (n-1)} \quad (2)$$

其中, $A_{i,j,t}$ 、 $EBIT_{i,j,t}$ 和 $ROA_{i,j,t}$ 分别为在 t 年企业 i 在行业 j 的年末资产总额、息税前利润和资产收益率; $X_{j,t}$ 表示在 t 年 j 行业的企业总数量。

2. 解释变量。Baker 等人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提到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键词组合,将这些报道加以统计得出的数值与总报道数值相除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企业、家庭和个人做决策时都会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该指数正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关注度来衡量。本文以该指数作为计算指标,为了能与其他数据保持一致,研究中企业层面数据均采用年度数。借鉴顾夏铭等^[11]的做法,将 12 个月份的该指数汇总后除以 12 再除以 100,最终得到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即 $EPU = (\sum \text{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12)/100$ 。

3. 调节变量。目前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度量资产专用性的方法,主要流行的有以下几种:用“无形资产与总资产比值”表示,由 Collis 和 Montgomery

两位学者提出;用“固定资产与企业总资产比值”表示,由 Demsetz 研究得出。国内当前是以“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为代表性度量方法来刻画,本文借鉴了这一做法,即资产专用性 = (固定资产净值 + 在建工程 + 无形资产 + 长期待摊费用) / 总资产。

4. 控制变量。企业内外部的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力。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做法,企业内部层面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资本结构 (*Lev*)、盈利能力 (*Profit*)、流动性 (*Liquidity*)、长债比例 (*Ltdr*)、资产周转率 (*Ta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外部层面控制了 *GDP* 同比增长率 (*Gdp*)、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 (*M2growth*)。此外,模型对行业与年份的虚拟变量也进行了控制。变量相关定义与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选择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i>Risk</i>	基于调整后资产收益率波动计算
解释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i>EPU</i>	月度 <i>EPU</i> 指数的算术平均数/100
	企业规模	<i>Size</i>	Ln 总资产
	资本结构	<i>Lev</i>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盈利能力	<i>Profit</i>	息税前利润与资产总额
	长债比例	<i>Ltdr</i>	长期负债/总资产
控制变量	流动性	<i>Liquidity</i>	流动资产/期末总资产
	资产周转率	<i>Tat</i>	企业销售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之比
	股权集中度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数之比
	经济发展水平	<i>Gdp</i>	实际 <i>GDP</i> 环比增速
	社会总需求变化	<i>M2growth</i>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
	年度变量	<i>Year</i>	样本属于某一年度取 1, 否则取 0
	行业变量	<i>Ind</i>	样本属于某一行业取 1, 否则取 0

(三)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 1,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Risk_{i,t} = a_0 + a_1 Epu_t + a_2 Controls_{i,t} + INDUSTRY_{i,t} +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为了验证假设 2,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Risk_{i,j} = a_0 + a_1 Epu_t + a_2 Asi_{i,t} \times Epu_t + a_3 Controls_{i,t} + INDUSTRY_{i,t} +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Risk_{i,t}$ 代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Epu_t 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Asi_{i,t}$ 代表中小企业资产专用性, $Controls_{i,t}$ 是所有控制变量。在模型 (1) 中, 主要观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_t 的系数, 如果 α_1 显著小于 0, 那么假设 1 得到验证, 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会降低中小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在模型 (2) 中,

主要观察企业资产专用性 $Asi_{i,t}$ 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_t 乘积的系数,如果 α_2 显著小于 0,那么假设 2 得到验证,即资产专用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总体样本涉及 3976 个观测值。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Risk$ 的均值为 0.041,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392,最大最小值的差异表明中小企业对风险的承受力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 的均值为 2.646,最小值为 1.139,最大值为 4.605,最大最小值的差异说明在部分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差异较为显著。本文中其他变量总体分布相对合理。此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存在于本文的模型中。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Risk$	3976	0.041	0.063	0	0.392
Epu	3976	2.646	1.243	1.139	4.605
$Size$	3976	21.936	0.885	20.139	24.480
Lev	3976	0.377	0.183	0.048	0.817
$Profit$	3976	0.074	0.119	-0.501	0.410
$Ltdr$	3976	0.145	0.146	0	0.634
$Liquidity$	3976	0.855	0.146	0.366	1
Tat	3976	0.660	0.390	0.139	2.450
$Top1$	3976	33.301	13.895	9.436	70.444
Gdp	3976	0.072	0.004	0.067	0.079
$M2growth$	3976	0.072	0.005	0.067	0.144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间的关系,然后从资产专用性的独特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模型 1 所示,二者在 1% 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控制变量方面,中小企业规模 ($Size$)、盈利能力 ($Profit$)、资产周转率 (Tat)、股权集中度 ($Top1$) 和经济发展水平 (Gdp) 均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资本结构 (Lev)、长债比例 ($Ltdr$)、流动性 ($Liquidity$)、社会总需求变化 ($M2growth$) 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回归结果 R^2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假设 1 得到了基本的检验。

资产专用性的调节效应如模型 2 所示,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在两者间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控制变量方面,中小企业规模 ($Size$)、资本结构 (Lev)、盈

利能力 ($Profit$)、资产周转率 (Tat)、股权集中度 ($Top1$) 和经济发展水平 (Gdp) 都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长债比例 ($Ltdr$)、流动性 ($Liquidity$)、社会总需求变化 ($M2growth$) 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回归结果 R^2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假设 2 得到了基本的检验。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Epu	-0.145 *** (-7.64)	-0.105 *** (-14.18)
Asi		-0.004 (-0.21)
$Asi \times Epu$		-0.010 ** (-2.27)
$Size$	-0.008 * (-1.66)	-0.006 *** (-3.226)
Lev	0.134 *** (5.95)	-0.043 *** (-3.16)
$Profit$	-0.148 *** (-9.32)	-0.065 *** (-4.09)
$Ltdr$	6.990 (0.15)	5.762 *** (5.18)
$Liquidity$	7.015 (0.15)	5.759 *** (5.18)
Tat	-0.014 * (-1.82)	-0.007 *** (-2.68)
$Top1$	-0.000 (-1.24)	-0.000 *** (-2.08)
Gdp	-29.028 *** (-8.29)	-23.067 *** (-15.54)
$M2growth$	0.033 *** (5.17)	2.005 *** (3.70)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Constant$	-4.187 (-0.09)	-3.701 *** (-3.41)
Obs	3969	3969
$Ajusted R^2$	0.211	0.292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括号中的值为稳健 t 统计量。

五、稳健性检验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采用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第一种,随机效应回归法。第二种,替换解释变量,用每季度末月的指数代表该季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然后取四个季度的均值代表年度指数变量。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将该均值再除以 100 消除与其他企业层面数据之间存在的数量级差异,即 $EPU = (\sum \text{季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4)/100$ 。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 第(2)列所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149,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解释变量替换以

后的检验结果如第(3)列所示,二者回归系数为-0.071,也是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由此得出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随机效应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i>Epu</i>	-0.149*** (-4.80)	-0.071*** (-7.89)
<i>Size</i>	-0.007 (-0.94)	-0.005 (-0.96)
<i>Lev</i>	0.149* -1.94	0.135*** -5.92
<i>Profit</i>	-0.106 (-1.39)	-0.140*** (-8.81)
<i>Ltdr</i>	6.015*** (-2.65)	6.85 (-0.14)
<i>Liquidity</i>	6.033*** (-2.64)	6.871 (-0.14)
<i>Tat</i>	-0.014* (-1.71)	-0.014* (-1.83)
<i>Top1</i>	-0.000** (-2.21)	0 (-1.43)
<i>Gdp</i>	-30.021*** (-5.08)	-20.987*** (-7.04)
<i>M2growth</i>	0.591*** (-3.01)	0.556 (-0.34)
<i>Year</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i>Constant</i>	-3.193 (-1.41)	-4.986 (-0.10)
<i>Obs</i>	3969	3969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括号中的值为稳健 t 统计量。

六、研究结论及理论启示

企业作为政策信号接收者,宏观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会作用到微观的企业个体上,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随之变动。本文通过梳理中小企板2011—2019年568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间的关系加以检验,最终得出下面两个结论:(1)伴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政府频繁调整经济政策,中小企业投资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管理者对于项目预期收益抱有悲观的预期;银行融资和股东投资减少,中小企业融资变得更加困难,风险承受力降低。(2)从资产专用性的视角出发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边界调节效应发现,资产专用性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资产专用性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中小企业变得更加保守谨慎,越会偏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降低。此外,本文采用两种方法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疫情之下,困境中谋求生存的中小企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且疫情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中小企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走向要予以重视,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走出当前“困境”迫在眉睫。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有:第一,中小企业应该扩大自身规模,完善内部治理监督机制,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力度,增强自身实力。第二,中小企业应合理配置有限的资产,资源配置错误问题可以通过适度的资产专用性进行缓解,中小企业应合理配置资产专用性资金,有效发挥其稀缺性优势规避黏着性劣势,理性安排各项资产债务的比重。第三,中小企业要拥抱科学技术,通过互联网实现线上化、数字化。疫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企业的经营模式、组织架构模式、商业运作模式等都应该结合互联网变得更加数字智能化。第四,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要结合中小企业资产配置水平尽量保持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效减少政策波动,为中小企业经营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经营环境。

参考文献:

- [1] Julio B.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1): 45-83.
- [2] Gulen H, Ion M.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6(3): 523-564.
- [3] Kang W, Lee K, Ratti R 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irm-level Investment[J]. Journal of Microeconomics, 2014(39): 42-53.
- [4] 金雪军, 钟意, 王义中. 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2): 10-18.
- [5] 王义中, 宋敏.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资金需求与公司投资[J]. 经济研究, 2014(2): 8-10.
- [6] Williamson O 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2): 112-123.
- [7] 李青原.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 来自中国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6(7): 66-71, 94.
- [8] Baker S R, Bloom N.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4): 1593-1636.
- [9] Faccio M. Large Shareholder D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11): 3601-3641.

(下转第39页)

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影响之研究

张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近年来,随着在线零售业规模在中国迅速发展,经常不可避免地发生服务无效事件,如何改善这一现状并实现有效的服务补救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相关企业的做法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讨论,验证了在线零售企业的服务补救与其客户的负面行为意图之间具体有哪些影响,以及验证了上述关系中感知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情绪的中介效果、服务无效归因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果。

关键词:服务补救;客户负面行为意图;感知服务不公平;服务无效归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6

中图分类号:F713.3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33-07

一、引言

在互联网虚拟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服务体系是否完善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原因在于人们网购消费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B2C领域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至关重要,这也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线购买行为发生时,买卖双方不是面对面沟通的,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一旦出现服务无效,客户就会觉得还不如在实体店购买得放心,心理无形之中就产生恐慌,初步判断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无形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自身的情绪,丝毫感受不到被企业公平对待,客户的购后行为意图和满意感也会受到影响。本研究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购物平台“天猫”为例,选择青年网络购物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商城如何实施服务补救以及补救成效是否会影响客户行为意图,以感知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情绪为中介变项,以服务无效归因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为调节变项,归纳出下列研究问题:a)服务补救是否会影响客户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 b)服务无效归因是否会影响客户感知服务不公平及负面情绪? c)感知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弱化客户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

二、文献综述

1. 服务补救

Bell和Zemke(1987)^[1]提出服务补救是企业转变客户不良体验(比如客户埋怨)的一种行为变化;Gronroos(1988)^[2]指出服务补救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良性的交易关联,实施成效的好坏是最重要的。Tax和Brown(1998)^[3]告诉我们服务补救是一个企业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要实时、确切地预测并处理好服务无效问题。国内学者韦福祥(2002)^[4]阐释这种管理过程是一种即时性、主动性的反馈,直接影响客户是否对补救措施满意、对企业品牌仍然支持,这种补救行为也是一整套能动长效服务质量提升机制。本研究依据Gronroos(1988)^[2]和Gronroos(2006)^[5]将服务补救内涵定义为企业面对客户遭受服务无效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解决此类问题,以最大可能挽回顾客的过程。

2. 服务无效归因

Smith和Bolton(1998)^[6]提出企业如果没有提供给客户心理预期的产品或服务,不愉悦的采买情感就会充斥客户内心,产生原因归于企业;Adrian(1998)^[7]阐述服务无效让客户感觉背离自己的初

收稿日期:2021-09-15

作者简介:张欣(1988—),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衷,客户认定企业的服务不合格;Fisk、Grove 和 Stephen (2001)^[8]指出只要没能提供客户预期的产品或服务,原因就是企业服务无效;Parasuraman (1991)^[9]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企业不能满足客户希冀的接受水平,或是客户等待和请求时间过长都属于服务无效。本研究依据刘永芳(1998)^[10]将服务无效归因定义为客户对服务无效的发生经过内部认知、思考和推理对信息加工处理,找出无效问题发生的原因的一种过程。

3. 感知服务不公平

谢礼珊和龚金红(2008)^[11]指出企业服务不公平是一种经济利益不平衡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交关系上的不平等表现。这种不公平会深深伤害客户的自尊心,影响其对企业的情感归属和行为归属;同时,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容易爆发埋怨情绪。本研究据此将感知服务不公平定义为客户在购物过程中体验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对企业丧失信心、没有归属感。

4. 客户负面情绪

网络零售企业的服务补救与客户情绪变化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双方买卖行为属于高互动性,从开始接洽到最后的交易完成都是在线进行的。因此,客服人员往往与客户存在语言的频繁交互,十分吻合情感感化产生的社会情境,客户内心很容易形成正负两方面情绪。本研究借鉴 Westbrook 和 Oliver (1991)^[12]将客户负面情绪定义为客户在使用或消

费某种产品或服务之后的体验不是很愉悦,导致内心深处诱发出消极情绪的一种反应。

5.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本研究依据何俊(2011)^[13]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企业对周边利益相关者负有一定的义务以及对社会、人民的利益需承担一定的社会发展责任。

6. 客户负面行为意图

本研究将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分成两个构面加以研究——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本研究依据陈书林和梁世安(2006)^[14]将负面口碑定义为客户经历了不满意的购买体验,将自身遭受的事情告诉其他好友,劝导其不要再购买或使用此商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本研究依据李东进、张成虎和李研(2015)^[15]将品牌转换定义为客户遭受服务无效后内心产生负面情绪,不再相信原始商家,另选其他商家或品牌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认为发生服务无效后,在客户负面情绪与感知服务不公平之中介效果下,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有影响;服务无效归因对服务补救与客户负面情绪或感知服务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对客户负面情绪或感知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行为意图的两个维度负面口碑和品牌转换两两之间有调节效果。基此,本研究特提出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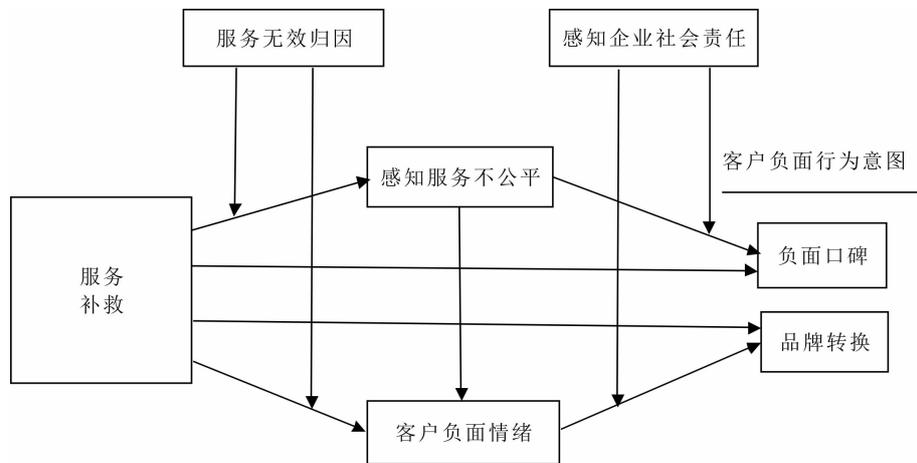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母体选择是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伶仃洋沿岸的粤港澳大湾区 H 学院的大一至大四本科生共计 15000 人。本研究属于探测性调查,大学生作为网购的年轻消费群体,又是网购的主力军,每一个被调查个体都是同质的,又考虑到时间、成本与便利性等因素,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本研究恳请 H 学院本科教师协助

在每个年级任意抽取两个班级的本科生,每个班级本科生人数为 85 人,四个年级共计 680 人;教师利用每个班级上课前的十分钟时间,将网络调查问卷链接发送到该班级学生微信群或 QQ 群中,供学生们作答。回收问卷后,剔除漏答、无效回答、选项回答明显与题项表述不契合或选项一致的问卷后,使用软件工具 SPSS 22.0 中的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进行分析的 Cronbach Alpha 值确定了问卷的可信度。

本研究收集数据的工具为电子版调查问卷,基于充分考虑本研究所建构的研究框架及作出的研究假设,电子版调查问卷最终涵盖八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含受访者年龄、性别、年级等基本信息;第二至第八部分是关于服务补救、服务无效归因、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客户负面情绪、感知服务不公平、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的分量表,各个量表的测量都是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非常同意 - 5;同意 - 4;没意见 - 3;不同意 - 2;非常不同意 - 1”。

四、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 H 学院的大一至大四本科生作为受测对象进行问卷发放调查,共发出问卷 680 份,收回 680 份,剔除无效问卷 39 份,收回有效问卷 641 份,有效回收率约 94%。利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为八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为描述性统计分析、整体适配度、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果检验、调节效果检验。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各研究变量间相关性分析汇总表

	平均值	标准差	服务补救	感知服务不公平	服务无效归因	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3.629	0.568	1						
感知服务不公平	2.434	0.573	-0.538 ***	1					
服务无效归因	2.418	0.572	-0.498 ***	0.664 ***	1				
客户负面情绪	2.469	0.572	-0.512 ***	0.691 ***	0.573 ***	1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2.448	0.605	-0.430 ***	0.575 ***	0.481 ***	0.590 ***	1		
负面口碑	2.433	0.540	-0.424 ***	0.546 ***	0.552 ***	0.555 ***	-0.518 ***	1	
品牌转换	2.464	0.530	-0.352 ***	0.495 ***	0.514 ***	0.570 ***	-0.517 ***	0.672 ***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服务补救与感知服务不公平、服务无效归因、客户负面情绪、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均呈现显著性且负向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38、-0.498、-0.512、-0.430、-0.424、-0.352,至于因果关系,需进一步作后续分析。

3. 信度分析

为确保电子版问卷中各题项在其所属构面测量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本研究以 Cronbach (1951)^[17] 提出的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问卷信度的评量标准,判断信度准则为: Cronbach's α 小于 0.35 为低信度; Cronbach's α 在 0.35 与 0.70 之间为中信度; Cronbach's α 大于 0.7 为高信度。本研究各变量信度均大于 0.7(参见表 3),为高信度。

4. 整体适配度

整体适配度是评价整个量表的模式和可观察性

本研究对调查问卷样本进行了基本资料分析,通过均值、标准差、方差、偏差、峰度来判别样本的集中趋势、离散趋势以及分布情况。吴明隆(2011)^[16] 指出峰度和偏度的绝对值小于 3,则说明观测变量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从表 1 中可知,各研究变量的峰度和偏度绝对值均小于 3,属于服从正态分布,适合继续进行其他分析。

表 1 各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汇总表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服务补救	3.629	0.568	0.323	0.643	-0.284
感知服务不公平	2.434	0.573	0.328	-0.801	-0.192
客户负面情绪	2.469	0.572	0.327	-0.918	0.065
服务无效归因	2.418	0.572	0.327	-0.788	-0.111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2.448	0.605	0.367	-0.910	-0.099
负面口碑	2.433	0.540	0.292	-0.677	-0.193
品牌转换	2.464	0.530	0.281	-0.758	0.018

2. 相关分析

本研究分析选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就服务补救、服务无效归因、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情绪、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诸多变量间存在的关联及相关程度等作出检验,从而使得之后假设检验工作的开展有着可靠的依据,如表 2 所示。

适配程度的指标。Hair、Anderson 和 Tatham 等(1998)^[18] 指出整体适配度的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如表 4 所示。

表 3 各研究变量信度分析汇总表

变量	Cronbach's α
服务补救	0.837
感知服务不公平	0.893
客户负面情绪	0.901
服务无效归因	0.784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0.841
负面口碑	0.772
品牌转换	0.741

由表 4 可知, RMR 值大于 0 且小于 0.05,说明各变量之研究数据呈现相关数据矩阵。通常情况下,模型适配度拟合指标非常多,很难做到所有指标

都符合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只要依据几个常见指标进行拟合度判断即可,比如卡方自由度比、GFI、RMSEA、RMR、CFI、NFI等。因此,根据上表结论可知,卡方自由度比、RMSEA、RMR和CFI这4个指标呈现理想状态,NFI和GFI这2个指标呈现出接近标准值,则说明本研究之理论构想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结果呈现出一致性,具有良好的因子结构模型适配度,对于研究所选用的量表题项之验证结果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4 整体适配度指标分析汇总表

适配度	整体模型	判断标准	结论
χ^2	565.872		
df	303		
χ^2/df	1.868	<3	理想
绝对适配度	GFI	0.890	>0.9 接近标准
	RMSEA	0.051	<0.10 理想
	AGFI	0.863	>0.9 接近标准
增值适配度	NFI	0.896	>0.9 接近标准
	CFI	0.948	>0.9 理想
简约适配度	PGFI	0.714	>0.9 不理想
	PNFI	0.773	>0.9 不理想
	RMR	0.018	<0.05 理想
	SRMR	0.038	<0.1 理想

5. 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电子版问卷中的各题项是经过文献探讨整理以及采用先前相关主题学者研发出来的成熟量表之题项汇整而来,因此本研究之问卷各题项符合内容效度之要求。此外,本研究分析题项共计27

表6 区别效度分析汇总表

	服务补救	感知服务不公平	服务无效归因	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0.714						
感知服务不公平	-0.498***	0.751					
服务无效归因	-0.538***	0.664***	0.795				
客户负面情绪	-0.512***	0.573***	0.691*	0.805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0.430***	0.481***	0.575**	0.590*	0.799		
负面口碑	-0.424***	0.552***	0.546**	0.555**	0.518***	0.728	
品牌转换	-0.352***	0.514***	0.495**	0.570*	0.517**	0.672**	0.70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如果AVE数值的平方根值可以表示因子的聚合性,如果因子聚合性较强,则说明具有区别效度;如果某因子的AVE平方根值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并且所有因子均呈现这样的结果,则说明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也就是说AVE平方根值的最小值大于所有相关系数的最大值。由表6可知,7个因子分别对应的AVE平方根值最小为0.702,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值0.691,则说明此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6. 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只能说明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是否显著,还不能确定变量间的具体关系,也就

个,分析有效样本量641,超出分析项数量的10倍,样本量适中。因此,本研究之效度分析是采用严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这7个变量以及27个分析项进行收敛效度、区别效度进行评估。收敛效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来实现衡量,收敛效度之分析结果如下表5所示。

表5 收敛效度分析汇总表

因子	平均变异数萃取AVE值	组合信度CR值
服务补救	0.510	0.837
感知服务不公平	0.564	0.792
服务无效归因	0.632	0.895
客户负面情绪	0.648	0.902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0.639	0.841
负面口碑	0.530	0.772
品牌转换	0.592	0.743

通常情况下,AVE值大于0.5且CR值大于0.6表示收敛效度较高。由表5可知,7个因子对应的AVE值均超过0.5,且CR值均超过0.6,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AVE方法对区别效度进行评估。Fornell和Larcker(1981)^[19]认为应依据相关矩阵中对角线数值应大于两两构面间系数,作为判别区别效度的一般标准。区别效度之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是说需要利用回归分析说明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研究将分步骤验证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情绪、负面口碑、品牌转换各变量间的直接影响效果。

由表7可知,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0.524($t = -10.770, p = 0.000$), R^2 值为0.271,Adj R^2 值为0.258,则说明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情绪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0.535($t = -11.348, p = 0.000$), R^2 值为0.316,Adj R^2 值为0.303,则说明服务补救对感知服务不公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0.182($t = -8.373, p = 0.000$), R^2 值为0.195,Adj R^2 值

为 0.180, 则说明服务补救对负面口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 -0.081 ($t = -6.823, p = 0.000$), R^2 值为 0.142, $Adj R^2$ 值为 0.127, 则说明服务补救对品牌转换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感知服务不公平的回归系数值为 0.512 ($t = 11.401, p = 0.000$), R^2 值为 0.302, $Adj R^2$ 值为 0.289, 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负面口碑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 客户负面情绪的回归系数值为 0.522 ($t = 12.353, p = 0.000$), R^2 值为 0.334, $Adj R^2$ 值为 0.322, 则说明客户负面情绪对品牌转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感知服务不公平的回归系数值为 0.702 ($t = 17.144, p = 0.000$), R^2 值为 0.482, $Adj R^2$ 值为 0.472, 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客户负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7 各研究变量间回归与中介分析汇总表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感知服务不公平		客户负面情绪		
	M_1	M_2	M_3	M_4	M_5	M_6	M_7	M_8	M_9	M_{10}
服务补救		-0.182^{***}	-0.404^{***}	-0.333^{***}	-0.081^{***}		-0.535^{***}		-0.524^{***}	
感知服务不公平		0.512^{***}	0.414^{***}							0.702^{***}
客户负面情绪				0.522^{***}	0.481^{***}					
R^2	0.014	0.195	0.327	0.008	0.142	0.009	0.316	0.016	0.271	0.482
$Adj R^2$	0.007	0.180	0.312	0.000	0.127	0.001	0.303	0.009	0.258	0.472
F 值	1.856	12.990^{***}	22.283^{***}	1.017	8.917^{***}	1.141	24.802^{***}	2.119	19.966^{***}	49.877^{***}
D-W 值	2.085	2.039	2.094	1.946	1.913	1.960	2.061	1.758	1.893	1.85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7. 中介效果检验

依据 Baron 和 Kenny (1986)^[20] 之建议, 利用 SPSS 22.0 软件以层级回归分析验证中介效果时, 中介效果存在的条件为: (1)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分别与依变量间存在显著关系; (2)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间存在显著关系; (3) 置入中介变量后, 自变量与依变量间的关系应较未置入中介变量时变弱。

由表 8 可知, 在置入中介变量(感知服务不公平)之后, 自变量(服务补救)对依变量(负面口碑)仍然存在显著影响, 标准因子负荷量由原来的

-0.182 ($p < 0.001$) 下降到 -0.404 ($p < 0.001$), 符合 Baron 和 Kenny (1986) 之第三条建议, 证明部分中介效果存在, 感知服务不公平在服务补救与负面口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在置入中介变量(客户负面情绪)之后, 自变量(服务补救)对依变量(品牌转换)不存在显著影响, 标准因子负荷量由原来的 -0.081 ($p < 0.01$) 下降到 -0.333 ($p < 0.001$), 符合 Baron 和 Kenny (1986) 之第三条建议, 证明部分中介效果存在, 客户负面情绪在服务补救与品牌转换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表 8 各研究变量间中介效果分析汇总表

	负面口碑	感知服务不公平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客户负面情绪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0.182^{***}	-0.535^{***}	-0.404^{***}	-0.081^{***}	-0.524^{***}	
感知服务不公平			0.414^{***}			
客户负面情绪						0.481^{***}
R^2	0.195	0.316	0.327	0.142	0.271	0.340
$Adj R^2$	0.180	0.303	0.312	0.127	0.258	0.325
F 值	12.990^{***}	24.802^{***}	22.283^{***}	8.917^{***}	19.966^{***}	23.57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8. 调节效果检验

依据 Baron 和 Kenny (1986) 之建议, 若自变量 X 与依变量 Y 之间的关系为变量 H 的函数, 则说明变量 H 就是其调节变量, 即变量 H 对自变量 X 与依变量 Y 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影响。调节变量可以用于定性或定量研究中, 对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的关系方向(正向或负向)、强弱关系产生影响。在统计学中, 检验变量的调节效应也就是检验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是否显著。

由表 9 可知, 服务补救与服务无效归因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 标准因子负荷量为 0.063, 则说明服务补救对感知服务不公平影响时, 调节变量(服务无效归因)在不同水平时, 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

差异, 且为正向影响; 服务补救与服务无效归因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 标准因子负荷量为 0.038, 则说明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情绪影响时, 调节变量(服务无效归因)在不同水平时, 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 且为正向影响; 客户负面情绪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 标准因子负荷量为 -0.204 , 则说明客户负面情绪对品牌转换影响时, 调节变量(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水平时, 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 且为负向影响; 感知服务不公平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 标准因子负荷量为 -0.127 , 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负面口碑影响时, 调节变量(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水平时, 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 且为负向影响。

表9 各研究变量间调节效果分析汇总表

	感知服务不公平	客户负面情绪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0.278***	-0.317***		
服务无效归因	0.503***	0.434***		
服务补救× 服务无效归因	0.063***	0.038***		
感知服务不公平			-0.340***	
客户负面情绪				0.371***
企业社会责任			-0.296***	0.243***
感知服务不公平×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0.127***	
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0.204***
R ²	0.507	0.402	0.347	0.384
Adj R ²	0.495	0.387	0.331	0.369
F 值	41.128***	26.859***	21.299***	24.927***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五、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情绪、服务无效归因、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之间的维系假设,旨在探讨网购平台的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之影响。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验证假设并分析得出结论:服务补救负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客户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口碑以及品牌转换;感知服务不公平正向影响负面口碑;客户负面情绪正向影响品牌转换;服务无效归因正向调节服务补救与感知服务不公平间的关系以及服务补救与客户负面情绪间的关系;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向调节客户负面情绪与品牌转换间的关系以及感知服务不公平与负面口碑间的关系;感知服务不公平正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并在服务补救与负面口碑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客户负面情绪在服务补救与品牌转换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建议

本研究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情绪、感知服务不公平、负面口碑和品牌转换均具有显著性影响;感知服务不公平对负面口碑、客户负面情绪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对品牌转换具有显著性影响;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对服务补救与负面口碑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服务补救通过感知服务不公平的中介作用影响负面口碑;服务补救通过客户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品牌转换。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在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的减弱上,企业应该从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情绪以及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这几个方面提高最大效能。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管理建议:(1)切实做好有效的服务补救措施;(2)避免

客户受到不公平对待;(3)减少客户负面情绪产生;(4)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 [1] Bell C R, Zemke R E. Service Breakdown: The Road to Recovery[J]. Management Review, 1987, 76(10): 32-35.
- [2] Gronroos C. Service Quality: The Six Criteria of Good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J]. Review of Business, 1988, 9(3): 10-13.
- [3] Tax S S, Brown S W. Recovering from and Learning from Service Failure[J]. Management Review, 1998, 40: 75-88.
- [4] 韦福祥. 对服务补救若干问题的探讨[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2, 22(1): 69-82.
- [5] Gronroos C. Adopting a Service Logic for Marketing[J]. Marketing Theory, 2006(6): 317-333.
- [6] Smith A K, Bolton R 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ustomer Reactions to Service Failure and Recovery Encounters Paradox or Peril[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998, 1(1): 65-81.
- [7] Adrian P. Service Failure and Loyalty: An Exploratory Empirical Study of Airline Customers[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1998(12): 7-16.
- [8] Fisk R P, Grove S J, Stephen J. Interactive Services Marketing[M]. Beijing: Machinery Industry Press, 2001.
- [9] Parasuraman A, Berry L L, Zeithaml V A.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s a Customer-based Performance Measur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Barriers Using an Extended Service Quality Model[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1, 30(3): 12-29.
- [10] 刘永芳. 归因理论及其应用[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11] 谢礼珊, 龚金红. 服务失误归因与顾客感知的公平性关系研究[J]. 管理学报, 2008, 5(6): 903-911.
- [12] Westbrook R, Oliver R. The Dimensionality of Consumption Emotion Patens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1, 18(5): 223-236.
- [13] 何俊. 电子商务企业的社会责任[J]. 网络与信息, 2011(6): 56-69.
- [14] 陈书林, 梁世安. 探讨影响网路负面口碑因素之研究[C]. 2006年第10届科技整合管理研讨会, 2006: 233-248.
- [15] 李东进, 张成虎, 李研. 脱销的利与弊: 以感知稀缺性与心理抗拒感为中介的相似品购买意愿研究[J]. 营销科学学报, 2015, 11(2): 34-50.
- [16] 吴明隆. SPSS统计应用学习实务: 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17] Cronbach L J.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J]. Psychometrika, 1951, 16(3): 297-334.
- [18]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 - 50.

[20]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Distinc-

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1173 - 118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ervice Recovery on Customers' Neg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ZHANG X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cale of the online retail industry in China, incidents of service inefficiency have often inevitably occurred. How to improve this status quo and achieve effective service remedi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views of related companies,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discuss this. It will verify the specific impact between the service remediation of online retail companies and the neg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heir customers. And to verif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perceived service unfairness and negative customer emotions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 attribution of service inefficiency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perceiv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Service Recovery; Customers' Neg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Perceived Service Unfairness; Service Failure Attribution

(上接第 32 页)

[10] 余明桂, 李文贵, 潘红波.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 金融研究, 2013(1): 149 - 163.

[11] 顾夏铭, 陈勇民, 潘士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 基

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18(2): 109 - 12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Risk Taking Level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 Specificity

LI Xue¹, LI Xiaoxiang²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Enterprise risk bearing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judg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bility. This capacity will be affected by macroeconomic policy changes.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are small in scale and weak in risk bearing capacity. As the new force and cornerstone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risk bearing capacity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relevant data of 568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8 on the SME Board, and the samples spanned the two policy planning cycles of the 12th Five - Year Plan and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By using Stata 15.0, Excel 16.0 software and system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risk taking of SMEs. Furthermore, it is found that asset specificity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reduc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risk taking.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macro economy and micro business entities continues to ferment, this paper has implications for more enterprise risk taking, asset alloc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

Key word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nterprise risk taking level; asset specificity;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经济学视角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策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

张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北京100038)

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最快、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基于贝克尔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对犯罪原因进行分析。结论表明,电信网络诈骗收益可观并且成本低廉,悬殊的利润差值是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主要原因。此外,社会管理存在漏洞、诈骗亚文化的不良影响、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等也是导致犯罪高发易发的重要原因。在上述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从提高惩罚概率、加大惩罚力度、提高机会成本、减少犯罪供给四个方面出发,综合提出防控犯罪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7

中图分类号:D92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40-08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本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一罪名,作为传统诈骗与电信网络技术结合的产物,它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对于这种新型诈骗犯罪的概念,尚未形成定论,学界大多是以诈骗罪的基本定义为基础,同时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本质上来讲依旧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使用电信设备或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广播电视,在信息空间中传播虚假信息,使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物的行为^[1]。也有学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是指利用通信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编造和发送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转账或汇款的犯罪行为^[2]。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中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性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

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典型代表,发案数量居高不下并呈逐年攀升趋势。全国公安机关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积极贯彻依法严打政策,深入推进专项攻坚行动,阶段性成效显著。但打不胜打、屡打不禁,当前总体防控形势并不乐观。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2017年全国已结一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较2016年上升70.34%,其中网络诈骗占比由2016年的34.66%上升至2017年的60.89%。2018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3.1万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7.3万名,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亿元。2019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为20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3万人。2020年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为2018年的近2.5倍,抓获犯罪嫌疑人36.1万名,挽回经济损失1870余亿元^[3]。

近三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情况如图

收稿日期:2021-09-18

作者简介:张巧(1995—),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犯罪学。

1 所示,通过现状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总体发案量持续走高,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一方面是由网络犯罪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过程具有远程、非接触性的特点,犯罪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网络虚拟性导致侦查受阻,破案率不高。另一方面是当前打击治理存在一定问题。事后打击的传统犯罪治理思路治本效果有限,司法成本高,公安力量独木难支。第二,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社会危害性强。个人实施犯罪的成本极低,借助电话、网络就可以开展犯罪活动,高额获益刺激着犯罪人不断以身试法。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同时还扰乱经济发展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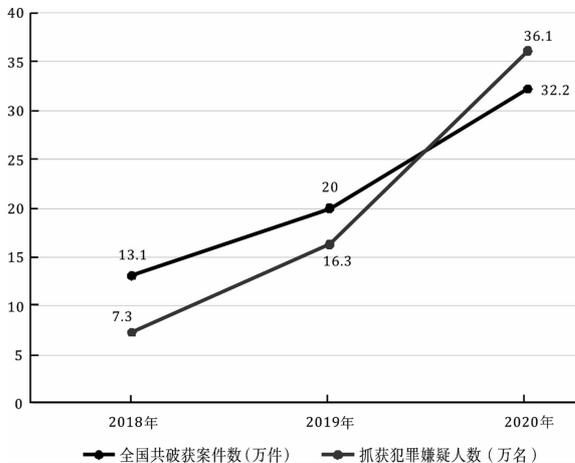


图1 2018—2020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本情况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一)成本—收益模型视角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首开犯罪经济分析的先河,他指出:“一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不是他们的基本动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的成本和利益结构存有差异。”^{[4]15}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追求犯罪收益,用 G (gain) 表示;实施犯罪所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等资源构成犯罪的机会成本,用 OC (opportunity cost) 表示;实施犯罪要承担风险,要付诸预期惩罚成本,用 PC (penalty cost) 表示。犯罪决策最终取决于对利润的考量,用 NG (net gain) 表示。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公式表示为:犯罪利润(NG) = 犯罪收益(G) - 机会成本(OC) - 预期惩罚成本(PC),对该式进行变换得到 $NG = (G - OC) - PC$ 。在该式中, $G - OC$ 的得值如果为正,说明犯罪带来的收益大于将同等资源投入合法活动所带来的收益,然而,对于理性犯罪人来说,其最终是否会实施犯罪,还要取决于对预期惩罚成本的测算,当行为人认为犯罪的收益为正,即 $NG = (G - OC) - PC > 0$

时,才会实施犯罪行为。

图2表示犯罪的决策模型,横轴表示实施犯罪所投入的各类资源(犯罪成本),纵轴表示犯罪能带来的预期回报(犯罪收益)。中间的水平直线为机会成本线,假设机会成本在一定条件下不变。负斜率曲线 R 为表示资源投入和预期回报二者关系的函数,资源投入与预期回报呈反比关系。对于理性行为人来说,当资源投入取 A 值时,三角形 BCD 为最大获益,如果不考虑预期惩罚成本,预防犯罪就只需提高机会成本。随着机会成本线上移,三角形 BCD 的面积缩小,犯罪的利润空间被挤压。然而,仅仅考虑机会成本对犯罪决策的影响并不现实,因为机会成本在短期内难有较大变动。所以,减少犯罪还需增加预期惩罚成本,使之对行为人的威慑足以抵消犯罪存在的经济利润,也即 $G - OC < PC$,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将不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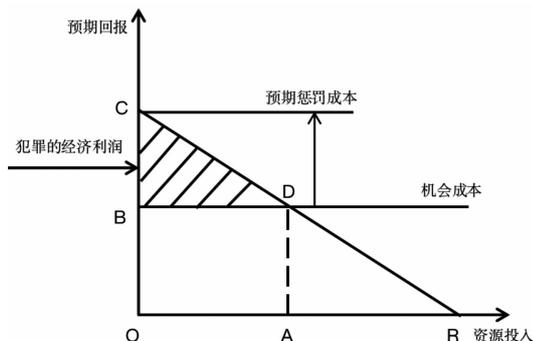


图2 犯罪决策模型^{[4]135}

笔者以诈骗罪为案由,以电信网络诈骗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抽取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2021年一审刑事判决书1553份。排除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犯罪未遂,共筛选、提取有效样本284份,对成本和收益状况展开具体分析。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收益分析

犯罪收益按照能否量化可以分为财产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犯罪人主要是为了追求物质性利益,故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在284个统计样本中,个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收益最高达到了960470元。参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截至2020年3月31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获得的收入远高于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报酬。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本分析

如果说犯罪收益是刺激犯罪的重要因素,那么犯罪成本则是关系犯罪行为实行与否的决定因素。

(1)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的是犯罪的物质支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的作案工具大多为电脑、手机、几张银行卡,还有的犯罪人只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就足以实施诈骗活动,与高额收益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支出。

(2)间接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以及犯罪结束后所要担负的心理和精神压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于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等严重暴力犯罪,并且由于具有过程非接触性、对象不确定性的特点,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实施犯罪不但不会让犯罪人产生精神压力,还容易心存侥幸,进而多次实施诈骗。

(3)机会成本。主要指的是时间机会成本,即犯罪人投入资源于犯罪活动而放弃的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其他合法活动可能产生的收入。它与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多少相关。处于的社会阶层低,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少,机会成本就越低。图3、图4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职业构成及学历分布情况,在284个案例样本中,农民、务工、无业人员占64%,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19%,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机会成本普遍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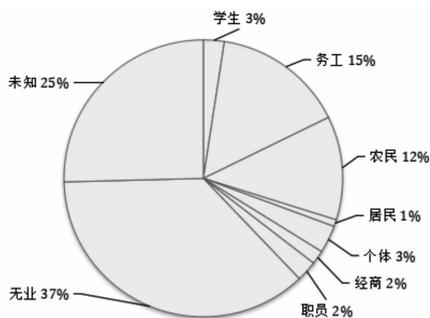


图3 职业构成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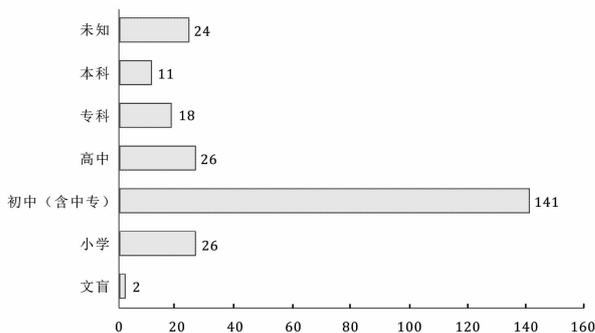


图4 学历分布情况

(4)预期惩罚成本。犯罪同样是明码标价的,在犯罪市场中,理性犯罪人会对犯罪“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这里的犯罪“价格”主要是指预期惩罚成

本(用EC来表示)。它受到刑罚的确定性/惩罚概率(用P来表示)与刑罚的严厉性/惩罚力度(用F来表示)两个因素的影响,其数量关系为: $EC = P \times F$ 。图5、图6对案例样本中284个犯罪人的诈骗所得金额及判处刑罚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平均收益约为7万元,平均刑期约为30个月,平均罚金额约为2万元,参考全国最低月工资1180元。假设惩罚概率P等于0.5,刑罚严厉性F统一换算成金额约为3.5万($F = 30 \times 1180$),预期惩罚成本 $EC = 0.5 \times 3.5 + 2 = 3.75$ 万元,远低于犯罪收益7万元,理性犯罪人铤而走险实行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5)定罪后续成本。也可以称为预期机会成本,等同于犯罪污点效应,指的是犯罪人的前科经历会对他今后选择合法行为机会的影响。运用犯罪学标签理论对其解释就是:一个人一旦被定罪处罚了,就相当于被贴上了不同于正常人的标签,其他人会拒绝与他发生交易行为,犯罪人也将逐步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刑罚没有规定从业禁止,且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政策渐趋完善,所以诈骗分子定罪的后续成本也很低。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真正能够对犯罪起有效作用的是预期惩罚成本和预期机会成本^{[4]139}。而在电信网络诈骗中,这两者的犯罪抑制效果都不理想,高收益、低成本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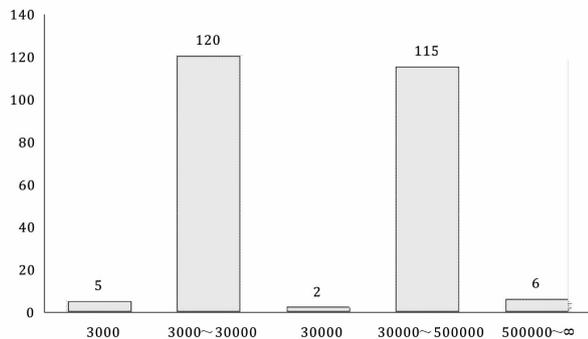


图5 电信网络诈骗金额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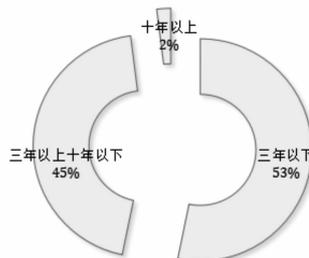


图6 判处刑罚统计

(二) 需求定理视角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随着物品的价格上升,该物品的需求量相应地减少;随着物品的价格下降,该物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需求曲线是将价格与需求量联系起来的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价格变化所对应的需求量变动情况。需求曲线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倘若其他条件发生了改变,某种因素引起了一种既定的价格水平之下的需求量变化,需求曲线就会发生移动,称之为需求变动。概括说,需求量的变动只与商品自身的价格相关,需求的变动则与商品价格以外的因素的变化有关。

现代经济学认为,非市场领域中的行为具有和市场领域行为同样的机理,因此,我们可以将商品市场中的需求关系应用于犯罪市场进行分析。在犯罪市场中,需求方为犯罪人,需求量用犯罪数量表示,价格对应犯罪价格,“影子价格”的升降会影响那些对社会而言不可实施行为的数量水平^{[4]2-3}。通过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的分析得知,当前犯罪数量的变化是确定的,呈上升趋势,根据需求定理,犯罪数量变化包含需求量变动、需求变动两种情况。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量变动的原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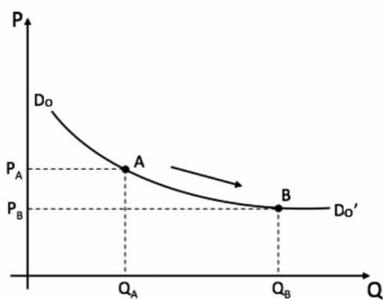


图7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量变动图

图7中,P代表犯罪价格,Q代表犯罪数量,曲线 D_0 、 D_0' 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已知犯罪数量 Q_A 向右递增至 Q_B ,根据需求定理,需求曲线上A点移至B点的原因在于价格P值的下降。如果说价格P表示犯罪人实施犯罪所要付出的最大代价,那么它就包含了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所有成本。成本—收益模型表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预期惩罚成本受惩罚概率和惩罚力度两个变量影响,难以确定其增减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引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犯罪人机会成本的下降。具体原因包括:

(1)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型犯罪提供了便利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犯罪人作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与传统“面对面”近距离、低效率的诈骗方式相比,犯罪人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实施诈骗活动,现实机会成本大为降低。犯罪人通过自行设立网络虚拟平台、制作虚假网络界面就可以引诱大批被害人“配合”诈骗方案,完成诈骗活动;在缺乏网络监管的情况下,利用网络广告就可以投放虚假信息,隐匿作案账号、IP地址;通过简单植入木马病毒程序就可以发现网络漏洞,盗取用户个人信息,对被害人实施精准诈骗;借助网络电话App就可以任意设置来电显示号码,轻松地伪装成平台客服、金融机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害人近亲属,编造故事,骗取被害人银行密码。随着网络支付平台的普及,许多的网络社交软件增添了转账功能,例如微信,已成为人们日常线下消费、网上购物的主要支付工具,而这又节约了到账时间,提高了犯罪人获取诈骗资金的效率。

(2)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加强,但仍然不够完善,底层人员的社会保障普遍存在参保率较低、最低生活保障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难以办理等问题。有些人虽然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政策漏洞或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济,这使得他们在失业、疾病时无法获得物质帮助从而顺利度过危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人口的流动,底层人员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源自血缘、地缘的社会支持逐渐缺失,工作不稳定之下业缘关系也很脆弱,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的精神支持也十分有限。电信网络诈骗的实施主体主要为农民、务工和无业人员,他们没有体面的职业、优厚的薪资待遇,易产生犯罪动机。尤其无业或失业状态更容易促成犯罪,因为与辛苦劳动获得微薄收入相比,狱内最起码衣食无忧,再加上精神支持缺乏,道德和文化规范的控制减弱,犯罪耻辱效应不再明显。

(3) 被害人普遍存在心理弱点,防范意识不强

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人之所以能频频得手,除了犯罪人的精心设计以外,被害人心理弱点作祟,自我保护意识欠缺也是重要的原因。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害人普遍存在贪图利益、盲目崇拜、轻信他人、易受暗示、侥幸投机等心理弱点。在贪利型电信网络诈骗中,贪欲是被害人普遍的心理弱点,面对金钱诱惑,求财心切,丧失理智分析的能力,妄图不劳而获,掉入犯罪分子的预设圈套;在避险型电信网络诈骗中,轻信他人是被害人普遍的心理弱点,缺乏生活常识,过度迷信国家公权力,疏于防范上当受骗

骗。很多被害人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反诈骗宣传教育,而是从内心里侥幸地认为自己不会受骗,过于自信,对犯罪分子常见套路不注意辨识,不注重个人信息保护,当诈骗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又不具备识别、中断犯罪的能力,进而一步步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遭到物质和精力的双重损失,前有清华教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常有大学生陷入校园网络借贷诈骗,都是防范诈骗意识薄弱的体现。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变动的原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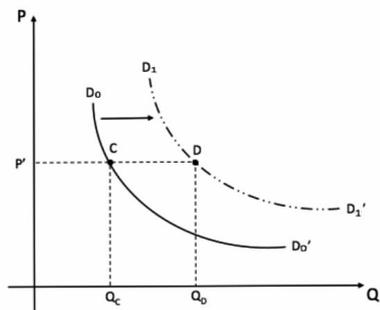


图8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变动图

如图8所示, P 表示犯罪价格, Q 表示犯罪数量。当价格为 P' 且不变时, 已知犯罪数量 Q_c 向右递增至 Q_o , C 点移至 D 点, 根据需求定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曲线会由 D_0D_0' 右移至 D_1D_1' ,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在于犯罪价格以外的因素引起犯罪人需求增加。影响犯罪人需求增加的因素有:

(1) 犯罪人趋利心理

计划经济体制下, 各阶层生活水平差距不大, 国家实行的“平均主义”政策足以抑制社会金钱欲望的产生。但改革开放以后,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致使贫富矛盾逐渐激化, 滋生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一系列消极心理, 伴随西方腐朽思想及生活方式的侵蚀, 社会物质欲望畸形膨胀, 民众趋利性较以往大为增强, 一些意志薄弱的不法分子为获取经济利益走上犯罪道路。电信网络诈骗属财产型犯罪, 具有收益高、成本低的特点, 这对犯罪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心理刺激。犯罪人只需要购买几张电话卡、银行卡就能够完成诈骗工具的准备工作, 凭借自己手里的手机、电脑就可以随时开展犯罪活动, 直接成本低; 公安机关方面案件侦破概率不高, 犯罪人作为风险偏好者, 基本上忽略预期惩罚所带来的成本;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大多为底层人员, 从事犯罪的机会成本也很低, 对于他们来说, 违法犯罪能够月入上万、几十万甚至更多, 这比守法更具吸引力。

(2) 社会管理存在漏洞

社会管理漏洞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电信管理漏

洞, 体现在无记名、冒名电话卡泛滥, 短信群发装置、改号软件、VOIP 网络电话业务管理真空。随着诈骗手段的升级及全国范围内“断卡”行动的有效开展, 犯罪分子对电话卡的依赖大不如从前, 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要彻底解决两卡泛滥问题还需加大打击力度; 短信群发装置、改号软件在租购方面监管不到位, 易被个人利用, 已成为犯罪分子常见作案工具; VOIP 网络电话显号规范管理混乱, 犯罪分子随意改号就可以冒充被害人亲属或公检法机关实施诈骗, 特别是 400 前缀的号码可信度非常高, 有不少被害人上当受骗。二是金融管理漏洞, 表现为银行卡未严格落实实名登记, 网银等金融产品存在安全风险, 第三方支付企业监管不力。银行卡实名制未落实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贩卖银行卡现象普遍, 犯罪分子收购银行卡就能实现赃款的套现; 网上支付存在实时监控困难, 大额资金到账时间快, 转账限额过高等问题, 为犯罪分子资金获取提供了方便; 第三方支付平台受开户“实名制”和实际地域条件的限制小, 公安机关在侦破案件时常面临查询速度慢、反馈期限长的局面。三是网络管理漏洞, 表现在虚假网页、钓鱼网站充斥网络, 以假乱真。例如在百度搜索某个官方网站, 会弹出很多个同名网站, 其中的大多数是“克隆网页”, 如果不加以识别, 很容易点击进入不明链接, 威胁账户资金安全, 而一旦设备被植入木马病毒, 个人信息将暴露无遗, 直接为犯罪分子的诈骗活动提供了便利。

(3) 诈骗亚文化的不良影响

犯罪亚文化是指容忍、促进或者使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可能的亚文化。我国学者大多认为, 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对于地域性犯罪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5]。在诈骗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 早期电信网络诈骗先行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凭借经验将相关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身边的人, 保障他们成功实施诈骗, 逃避侦查打击。同乡、亲戚、朋友在经济利益诱惑下逐渐接受犯罪的价值观念, 互相效仿和学习。这种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实施的诈骗活动逐渐形成产业化运作, 诈骗在当地形成一种文化, 被当作一种职业, 成为许多民众的主要经济来源。某一特定地域的诈骗手段受诈骗亚文化影响, 大多如出一辙, 如河北丰宁县地区常见的手法是冒充黑老大进行诈骗、广西宾阳县地区流行的手法为假冒 QQ 好友实施诈骗。当前犯罪主体呈低龄化趋势, 根据学习理论, 特定地区的诈骗亚文化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 诱使他们实施犯罪。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控对策——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一) 提高惩罚概率

1. 建构以大数据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提升技术反制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是借助电信和互联网技术开展犯罪活动的,大数据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着力提升侦查本领,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立全新的信息化侦查模式。在事前预警阶段,以大数据为分析工具,对已发案件进行分析研判,瞄准犯罪高发区域,加大警力部署实现升级管控;在事中阻断阶段,依据大数据辨识目标信息的真伪,锁定犯罪嫌疑人全力开展盘查抓捕,多级拦截资金流转可疑账户,尽可能挽回损失,安抚受害人;在事后溯源阶段,通过大数据筛选、提取犯罪人行踪信息,查找犯罪线索,缉拿诈骗分子。公安机关要及时关注犯罪手段和方式的变化,不断进行技术的更新与升级,引进技术人才,强化技术培训。

2. 强化内外联动,优化警务协同作战机制

鉴于当前跨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现状,内部方面,公安机关除了有针对性地组建专门机构负责案件以外,还要创新“以块为主”的传统警务模式,联合多部门、多警种,开放信息,共享资源,实现全国公安一盘棋,协同作战把握良机,快速破案以威慑犯罪分子;外部方面,国内近几年对电信网络诈骗始终保持高压打击,犯罪分子也开始走出国门作案,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向全球各处流窜,这就需要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合作机制,加强国际警务合作,最大程度地破除国家间因法律体系差异所带来的案件侦破壁垒,从而解决资金追缴、账户冻结、证据固定、犯罪嫌疑人跨境抓捕等一系列难题。

3. 保持从严打击,堵截上下游关联犯罪

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和三大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展了“断卡”专项行动,现已完成第五轮集中收网,有力震慑了“两卡”犯罪团伙,阶段性成效显著。公安机关要继续坚持依法严打方针,深入推进“断卡”专项行动,将打击合力作用于犯罪源头。目前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还形成了一系列黑灰产业,滋生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等大量的上下游关联犯罪,这些违法犯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近年来持续蔓延的催化剂。公安机关要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打击还须从各犯罪链条入手,瓦解犯罪利益联合体,严惩提供外围支持的关联犯罪。对

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严格管控,捣毁网络虚拟平台,加大对“伪基站”设备、短信群发器的拦截销毁力度,加强对频繁中转资金、代办金融业务行为的预警监管力度。从电信网络诈骗的首尾入手,源头治理与环节攻坚相结合,筑牢打击防线以应对犯罪高发势头。

(二) 加大惩罚力度

1. 跨境犯罪人境内执行

当前以冒充公检法为主要骗术的涉两岸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虽发案量有所下降,但危害程度不减,由台湾籍诈骗集团实施的大要案件仍时常发生。以往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通常是由两岸各自将同一犯罪团伙中的本方涉案人员带回处置。这些犯罪团伙的主犯大多为台湾籍居民^[6],但犯罪结果却发生在大陆,这就涉及跨境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以及不同的司法制度下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轻重的问题。台湾地区警方虽将本方涉案人员带回,但由于缺少报案纪录和充足的证据,最后也只能将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处以轻微的刑罚。从量刑幅度上看,大陆处罚最高可达无期徒刑,而台湾地区最高刑期仅为十年,处罚力度较轻,导致重复犯罪问题严重。对此,大陆司法机关应根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冲突解决规则。从维护民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以具体案件为出发点,按照管辖权具体分配原则进行台湾籍犯罪分子的遣返工作,积极推动建立协商管辖机制,提高打击实效。从刑事执行方面体现刑罚的严厉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保证刑罚的严厉性,加大刑罚执行力度。

2. 限制适用缓刑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量刑时是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犯罪样态,依次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三个徒刑档次。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根据犯罪金额来区分犯罪样态从而划分徒刑档次的,涉案金额规定跨度较大,徒刑档次划分幅度又较小,导致刑罚在结构上缺乏弹性。特别是对于涉案金额远超五十万元,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案件,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分级处遇的规定,适用当前刑罚明显弹性不足,法律威慑力被削弱可能会刺激犯罪人实施诈骗数额更为巨大的犯罪。此外,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的处罚也普遍过轻,表现为常以财产刑代替监禁刑,缓刑适用率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实际破

案率和起诉率并不高,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诈骗分子仍逍遥法外,司法惩罚力度再不够,无疑是在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对此,建议减少缓刑的适用数量,对于涉诈金额特别巨大达到百万元、千万元级别的犯罪分子,以及多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职业犯罪人从重处罚,严格限制适用缓刑的条件和范围,提高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数量。

(三)提高机会成本

1. 加强行业监管,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各方必须共同承担监管责任,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环节进行严格管控,逐步消除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堵塞社会管理漏洞。电信行业要完善电话卡实名认证机制,加大网络虚拟电话审批、监管力度,建立常态化的拦截封堵机制,及时封堵涉诈的域名、电话、短信;银行部门要落实银行卡实名登记工作,规范网上银行转账制度,及时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健全支付冻结工作机制,加大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力度;网络部门要严厉打击“钓鱼网页”、屏蔽涉诈敏感词汇、虚假信息、垃圾广告、不明IP地址,净化网络环境,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严密监管网络的目的在于加大犯罪实施难度,提高违法犯罪的现实机会成本。

2. 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数量逐渐减少,技术型企业岗位需求有限,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职业构成中无业占比高,为就业弱势群体。针对此群体的扩大就业的重要方向是重视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启动资金少,就业范围广,入职门槛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还可以通过扶持中小企业来实现,中小企业创办成本低,应对市场灵活多变,发展速度快,在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政府要积极落实失业保险,加强对无业人员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鼓励、引导其创业,为他们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针对相当比例农民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问题,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加岗位供给,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资金投入,特别是群众普遍关心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缩小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提高预期机会成本以降低犯罪危险性。

3. 增强社会联系,加强社会控制

社会上层人士之所以较少犯罪,是因为拥有的

社会资源较之底层人员更为丰富,他们从社会资源中获得信息、归属感、信任、交易机会、物质及精神支持,一旦犯罪,不仅付出的机会成本巨大,名誉和人格也会受损,波斯纳将这种制裁称之为“放逐”,它比刑罚成本还要大。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社会关系松散,跨区跨国作案流动性强,基本不受社会联系的控制,减少此类犯罪发生必须强化社会控制。首先,在制度层面上,一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保证他们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公平待遇,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二是建议制订举家迁移一系列福利制度,以维持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形成对犯罪的道德约束。其次,在社会联系层面上,一是实行住房、租房优惠政策,以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二是提高底层人员聚集地社区服务水平,增加他们参与合法活动的机会,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抑制犯罪动机的产生;三是大力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增强守法信念。这样一来,实施犯罪的意念就会自行消弭,犯罪数量也会相应减少。

(四)减少犯罪供给

1. 加强防诈骗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反诈骗意识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应和式”特征,犯罪的发生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互相“合作”产生的后果。鉴于受害人普遍存在反诈骗意识薄弱、防范知识欠缺、摆脱诈骗锁链能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重视被害人预防,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第一,在宣传对象上,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宣传。目前大多数宣传是面向所有人群,针对特定对象的宣传较少。对于学生、老年人、公司财务人员、个体户等易上当受骗人群,应采取重点宣传和教育的方式。具体通过两方面途径来实现:一方面可依据公安系统已录入的信息对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改变以往逐户宣传模式,缩小宣传对象范围,公安机关可以通过上门宣讲、发放宣传彩页、推荐下载反诈骗App等形式,让重点人群熟知常见诈骗伎俩,提高警惕性;另一方面可根据用户上网浏览痕迹对重点人群进行筛选,提取被害人特征标签,收集案件的地域分布信息,向用户定向推送防诈骗相关消息,随时调整对象范围,提高宣传效率。

第二,在宣传形式上,要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线上宣传可采取网民广受欢迎的形式,如编写防诈骗段子、制作防诈骗短视频、开发交互式游戏、VR实时模拟诈骗场景等,并同步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吸引更多人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线下宣传,则可以采取节目表演、有奖竞猜等形式,使防诈

骗宣传深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宣传方式令宣传效果最大化。

第三,在宣传内容上,要仔细剖析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并明确提出防范对策。无论采取何种宣传形式,都应尽可能包含犯罪情节和脚本,通过解析典型案例,揭秘诈骗套路,突出防范要点。鼓励民众及时上报自己发现的线索,主动揭发电信网络诈骗可疑人员,强化被害人积极报案的理念。

2. 凝聚群众力量,营造全民反诈骗氛围

公安机关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力军,但这种打击具有滞后性,很难及时、有效控制犯罪。经验表明,依靠群众,推进社会共治,才能取得打击犯罪的良好效果。在日常防范宣传工作中,公安机关除了可以通过见面攀谈、上门劝阻、拉网排查、开展讲座等方式,让民众潜移默化地学习防诈骗知识,降低被骗风险,还应发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犯罪预防,建立多部门、多机构、多主体联合宣传模式。比如,电信部门可以利用网络通信优势,定期发送防诈骗提示信息,提高用户安全意识;金融机构可以在营业网点张贴警示标语、在办理业务时附带发放防诈骗宣传单,防止客户财产损失;村组可发动志愿村民以广播形式定时宣传,社区可整合义务巡逻员在布告栏集中宣传,高校可开展知识竞赛重点宣传,企业可通过晨会不定期宣传,媒体可通过新闻

报道、公益广告常态化宣传等。通过发动群众投入防诈骗工作,营造浓厚的反诈骗文化氛围,纠正诈骗环境中错误的经济利益观念和法治观念,挤压诈骗亚文化传播空间,令诈骗分子步步受限、处处受限,不得不放弃犯罪。

参考文献:

- [1] 葛磊. 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J]. 河北法学, 2012, 30(2): 107 - 112.
- [2] 吕美琛.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理论研究: 以情景犯罪预防理论为视角[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0(5): 96 - 103.
- [3] 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 2020 年共破获案件 32.2 万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870 余万元[EB/OL]. (2021 - 04 - 09) [2021 - 05 - 31]. <https://www.mps.gov.cn/n2254314/n6409334/c7847027/content.html>.
- [4] 沈海平. 寻求有效率的惩罚: 对犯罪刑罚问题的经济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 [5] 徐永胜, 徐公社, 韩冰.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8, 30(1): 121 - 129.
- [6] 王伟. 海峡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2): 71 - 7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elecom Network Fraud Cr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Based on Cost - benefit Model and Demand Theorem

ZHANG Qiao

(School of Criminolog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telecom network fraud has become the fastest increasing criminal crime in China,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Becker's cost - benefit model and demand theor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rime in depth.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benefits of telecom network fraud are considerable but the cost is low, and the huge profit difference is the main reason to stimulate the perpetrator to commit crimes. In addition, loopholes in social managemen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raud subculture and the weak awareness of victim prevention are also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crim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economic analysi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om four aspects: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punishment, strengthening punishment, increasing opportunity cost and reducing crime supply.

Key words: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fraud crime; economics of crime; cost - benefit model; demand theorem

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中索要债务行为之认定标准

——法解释学视角下民刑交叉问题治理探究

周景斌, 马 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我国“校园贷”风险治理是规范校园金融市场和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校园贷”索要债务及其衍生行为涉及行政、民事和刑事各领域,而司法领域对“校园贷”索要债务行为这一核心问题的规制却较为有限。我们反思“校园贷”治理现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索取债务行为作为正当权利行使和涉嫌犯罪的边界仍旧较为模糊。基于民事不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分原则,从民法领域重新厘定“校园贷”中借贷行为、债权的性质以及具体索要债务行为的合法性,并从客观归责论角度再次认定刑法中“校园贷”风险中不良行为。

关键词:校园贷;风险治理;索要债务;民事不法;刑事犯罪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8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48-07

一、我国“校园贷”索要债务行为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一)源头活水: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的社会背景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技术、理念与金融和实体的加速融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网络借贷平台为满足大众消费和资金需求提供了新的契机。2009年7月,原中国银监会基于一些大学生在信用卡使用中频繁出现违约而提高向大学生发放信用卡的门槛,规定向年满18周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时,要经过其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面同意,导致各大银行暂停向大学生发放信用卡。网络借贷逐步蔓延至校园,从2013年第一家网贷平台成立,到2014年校园分期平台崛地而起,再到2015年获得井喷式发展,顶峰时期增长到108家^[1]。这种以互联网金融为载体,以在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线上消费借贷——“校园贷”悄然兴起。

从性质上划分,大多数学者认为“校园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传统电商平台提供的信贷服

务,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其二,专门为高校学生提供的分期购物平台,如“趣分期”和“分期乐”;其三,专门从事现金借贷服务的贷款平台,如“名校贷”“投投贷”等。因此,“校园贷”行为发生的媒介是P2P(Peer to Peer)、B2C(Business to Customer)为主的网络借贷平台。由于网贷市场形成初期权责不清,大学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等问题,“校园贷”平台乱象频出,包括审核虚设、门槛极低,高额费率、变相高息,违规、违法催收等。现实中也时有发生因为“校园贷”造成的“欺骗借贷”“裸贷”“肉偿”“暴力催贷”等严重侵犯大学生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这些都给“校园贷”贴上了沉重而负面的标签。

(二)弥补空白:我国“校园贷”治理问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于不良“校园贷”的治理思路是多方参与,协同共治。学者大多从政府、社会、学校以及个人多维度切入解决“校园贷”出现的不良问题;具体治理方式集中在学生自身消费观、借贷平台的市场监管以及高校管理教育工作等较为宏观层

收稿日期:2021-08-29

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GJ2020B17)

作者简介:周景斌(1996—),女,河北衡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面^[2]。就实践情况而言,行政主导的多元治理颇有成效,但是预期稳定性、法秩序协调性仍有不足^[3]。法学领域“校园贷”规制进路在刑法领域探讨较多。研究思路主要是对“校园贷”可能涉及的危害行为进行类型划分并对涉及罪名进行具体分析,大多围绕传播、出售借贷人裸照行为,以公开裸照要挟大学生催收贷款行为,以公开裸照等方式逼迫“肉偿”行为以及出售、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领域规制进路展开^[4-5]。

不难发现,“校园贷”的风险直接表现为高利贷、暴力催贷等不同类型的索要债务行为带给大学生财产、人身以及精神的伤害问题。原则上,法律决不允许以伤害他人的行为行使自身债权。但是,并非所有“校园贷”都是不良行为,也并非所有债权人索要债务的行为都不会得到司法保护。债务合法性及索要债务行为在“校园贷”风险治理中作为正当权利行使和涉嫌犯罪行为的边界较为模糊。这一直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问题。本文中,我们站在客观立场,通过目前立法基于权利确认与责任分配情况对“校园贷”风险治理现状进行梳理,再次厘定债务合法性之判断标准,从而确认“校园贷”行为在民事违约发生时正当权利行使与涉嫌刑事犯罪之间的边界。

二、我国“校园贷”风险治理中债务合法性厘定

(一)良法善治: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进路探究

在立法方面,我国通过宏观指导到具体责任落实逐步细化对于“校园贷”的治理机制和模式。2016年4月,教育部联合原中国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通过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加大不良网络借贷监管力度。该年8月至12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校园网贷风险防范集中专项教育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网贷整治工作的通知》接连发布,在体现国家整治不良“校园贷”决心和行动的同时,从宏观上指出了对“校园贷”整治的方针、日常监测以及加强监督的重要意义。2017年6月28日,原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规范管理工作通知》)为杜绝网贷机构发生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行为,进一步明确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逐步消化存量业务,有序清退校园网贷业务待还余额。

禁止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良“校园贷”的业务,降低了大学生消费贷款面临的风险。2021年3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监管工作的通知》),禁止小额贷款公司、非持牌机构对大学生发放贷款^[6]。该通知一方面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排查,严格落实风险管理责任;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对非法拘禁、绑架、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可以看出,立法上以行政主导的“校园贷”治理模式从责任主体以及监督、管理的层面进行调整和保护,但是当前并未从司法领域对“校园贷”中出现的索要债务等具体问题提出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

在司法方面,有学者认为,目前风险较高的“校园贷”作为新型借贷模式由于不属于正规金融机构开展而被称为“民间金融”。我国司法机关对于民间金融的社会控制逻辑是:借款不属于纠纷,非法催收是犯罪^[7]。公安部曾多次出台规定^①以保障民间金融有一定发展空间,三令五申指出应当划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线并且严禁各地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类案件。实践中,公安部门对于侦办经济犯罪案件的审慎态度体现在涉及借贷合同的民间借贷或有关纠纷问题一般不予刑事审查,“校园贷”在治理中极易被框定在民事纠纷范畴中。迄今为止,就具体债务问题的认定以及索要债务行为的规范,司法领域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校园贷”平台各类索要债务行为涉及的权利边界并没有严格的规范予以认定。何种行为属于“借款”而具有索要的正当性,何种行为属于民事纠纷,“非法催收”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的具体行为和认定标准如何界定,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理论检视:我国“校园贷”治理中债务厘定

客观而言,“校园贷”的发生媒介中,B2C网络借贷平台中的电子商务企业拥有独立的风险防控体系,可以筛选和跟踪客户、监控贷款使用情况,发现逾期问题后及时规范处理,因此具有特定适用范围、门槛较高但风险很低。大学生在此类平台借贷往往额度有限,不容易出现借款后高额利息无法按期还款后以暴力、威胁等方式催债的可能。同时,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正本清源地将P2P网络借贷平台定义为“信息中介”,肯定了P2P借贷的合法地位^[8],但是改头换面的隐形“校园贷”实质上多是P2P模式下通过网络平台的各种渠道打着“快速审核、快速到账”等

名义开展的借贷业务,披上“培训贷”“创业贷”“回租贷”“求职贷”,以及今年以来出现的“注销校园贷”的“马甲”,部分大学生依旧会落入不法机构故意模糊本身经营范围,进行夸大、虚假宣传,隐瞒贷款风险等种种防不胜防的圈套。

具体而言,“校园贷”中索要债务的风险表现形式有:(1)以威胁方式催债。此种方式基于“校园贷”中债权人掌握债务人裸照或者威胁性交易方式“还款”等以恶害相通告,逼迫债务人或者其家人基于恐惧心理偿还债务以及高额利息。(2)以暴力方式逼债。该索债方式需要根据债权人实施暴力行为的伤害程度以及贷款本身的性质具体分析。(3)以骚扰等新型“软暴力”催债。此种方式表现为掌握债务人私密信息的债权人通过电话“轰炸”、跟踪盯梢并可能联系债务人朋友、同学、老师以侵犯具备识别性的个人信息进行追债,涉嫌侵犯债务人的个人信息自由、隐私以及安全。

对“校园贷”债务进行认定时,我们应当坚持区分原则,即严格区分刑事犯罪和民事不法的性质。其一,刺破法律关系形式特征的面纱还原犯罪行为本质面貌。具有形式思维的民法往往强调法律关系,而刑法具有实质判断的性质。对于以民事借贷关系为幌子掩盖诈骗、敲诈勒索、高利贷、套路贷等犯罪行为的不法“校园贷”应当及时认清其犯罪本质。其二,有些行为形式上看似是刑事犯罪行为,实质上是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实务中,法院一般采纳民事纠纷阻却财产犯罪的观点,这已经成为刑法学界的共识^[9]。不良“校园贷”中索债行为即使不能清晰界定出权利行使的具体范围,但可以就某一行为是否在权利范围内能简单明了地判断。比如,债权人以胁迫或者轻微暴力索要合法债务很难认定超出合法权利的边界甚至构罪。然而以胁迫手段索要非法债务虽然不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一样可能触发刑法介入机制构成他罪。总之,在判断索债行为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不法之时,我们应当首先依据行为本身厘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抑或是刑事法律关系,之后再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任何权利都与互相制约的附随义务相伴相生。严格来讲,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并不存在重合。从债务性质看,大体包括合法之债和非法之债。就索要债务行为而言,首先存在的是民事债权和债务关系。要认定索债行为是否因具有正当性而被法律所保护,我们应当分析债权人实现的债务本身是否合法以及实现债权的手段是否合法,而不能由于索要债务行为仅仅可能存在过度维权状态而以维权的

性质将债务人看成受害的弱势一方。其次,应当理性看待债权人维权行为可能超越正当权利行使边界从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具有构成犯罪的可能。不能因为“校园贷”不良行为的时有发生而以有罪推定的眼光将索取债务行为一律划定为犯罪,即便基础事实涉嫌犯罪,也不能以此否认案件本身的事实。比如采用非法手段实现合法债权的行为只能按其手段所构成的违法犯罪行为处罚,不能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10]。

三、我国“校园贷”中索要债务行为之民法边界

(一)正本清源:借贷行为性质的认定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索关键词“校园贷”,公开发布的1093件与之相关的案例中71%涉及合同纠纷问题(图1)。某种意义上,不良“校园贷”的发生包含着借贷纠纷。因此,我们首先厘定债务性质,区分合法之债与非法之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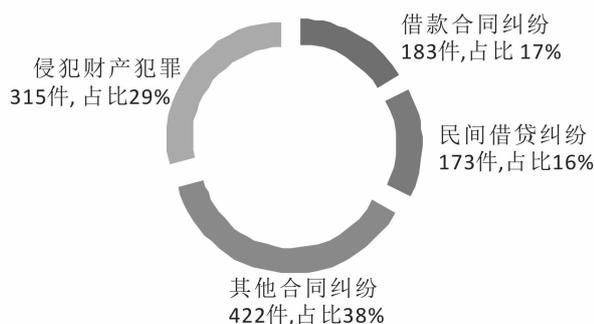


图1 “校园贷”案由分布

我国司法实务中将借贷行为明确区分为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两种类型,各有其适用规则和利率标准。但是上述结论目前尚未得到立法的明确认可^[11]。多年来,由于不良“校园贷”多发生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各网贷平台,就债务性质来讲,法学领域在划定“校园贷”债务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时候,通常依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两线三区”这一民间借贷利率表达的裁判规则进行划分^[5,8],即不良“校园贷”被默认为具有非官方性、逐利性的民间借贷。2020年8月,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12],从而取代传统“两线三区”民间借贷利率规则,标志着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线的政策落地。那么,不良“校园贷”真的都是民间借贷吗?

在《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国家对所有“校园贷”

行为规范主体界定为“小额贷款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其中,明文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将大学生视为目标客户并向其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加强贷前调查评估以及贷后监管监督;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6]。反观实践,“校园贷”索要债务不良行为的实施主体多是经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②与其他无牌照机构。虽然目前我国对于金融机构定义和外延争议较多,但是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划定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3]。因此,不良“校园贷”中借贷行为并非都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比如实施主体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则属于金融借贷。

(二) 回归理性:债权合法性与索要债务行为之判断

1. 债权合法性之判断

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校园贷”之债权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是:首先,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有效性。对于出现不良“校园贷”更多的民间借贷领域,基于多年来对“非法金融业务依法取缔”的原则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增加“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14]。因此,“校园贷”中对大学生放贷的无牌照平台或者相关机构与大学生签订的合同本身无效,借款人应当单方返还财产,过错方应当赔偿损失。其次,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范畴的债务,以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为标准^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原则之精神,规定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最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的金融借贷认定。虽然2017年《规范管理工作通知》中明令禁止小额贷款公司继续给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并逐步吸收存量,但是如果此类网贷公司依旧开展相关业务,那么行政违法并不能阻却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支配下合同本身的合法

有效性,因此依据传统上合同有效性之标准进行判断即可。

2. 民事领域索要债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民事领域,就行为表现形式及其结果而言,“校园贷”索要债务问题容易引发三类问题。

其一,大学生的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不良“校园贷”发生往往伴随着大学生无法还款后出借方将学生“裸照”或者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进行公开、出售,或者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此类无论是否得到大学生本人的同意,人身权利、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都不能也无法作为对价进行商业交易。《民法典》第四编为不良“校园贷”发生侵权行为时大学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民事救济提供了实体依据和司法保护。

其二,出借方企图利用暴力、胁迫、骚扰等非法方式获取合法债权行为。民事领域中,该行为客观方面有证据证明签订的合同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之前提下,还要确认行为人主观上目的正当性,即主观上是为了获得正当债权利益从而行使权利,不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此基础上,首先应当承认债权本身合法有效;此时正如上文提到的,非法行为本身应当单独评价,如果涉嫌构成犯罪,则以刑罚方法处罚;涉嫌违法,应当以行政方式制裁。正如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44、146、153和154条以及该解释第13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其三,如果出借方企图以非法手段实现非法债权,在认定时依旧要坚持手段行为和目的二分法,特别应当反思索要非法债权的行为是否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目的。虽然非法之债一经审判将收归国库,但法律评价后果不能否定前交易过程中行为实施的主观目的。该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

总之,债权人私力救济的范围仅限于在合法债权范围内,否则超越债权范围索要额外财物,即便债务人有一定过错,维权行为依旧会变成侵权行为。

四、我国“校园贷”中索要债务行为之刑法边界

刑事司法领域中,判断风险是否得到允许,应当依据该风险是否会造成法益受到侵害。基于客观归责论的主张,不法行为判断的重心在于客观构成要件^[15]。而“校园贷”可能引发的人身、财产等不良

后果往往超出被害主体大学生对足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之认知能力,因而“校园贷”创设的风险也和行为人主观方面有关。某些情况下,其客观行为也需要主观方面辅助判断。

(一)传统方式:暴力、威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索要债务

“校园贷”中企图以暴力索取债务的客观行为认定。其一,就暴力行为索取债务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我国刑法早有规定。原则上对债务人及特定关系人采用拘禁方式、纯暴力行为索取非法之债或合法之债。但因为出借方更多时候是为了获取非法债权,实际上“校园贷”中以非法拘禁形式索债并不常见。其二,就纯暴力行为而言,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方式直接损害他人生理机能。立法上一般将损伤严重程度分为三级:轻微伤、轻伤和重伤。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包括轻伤以及重伤,轻伤一般不构成犯罪。“校园贷”的索债行为可能涉嫌强迫借款人“肉偿”、故意伤害等具有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此类行为根据行为、损害后果进行认定即可。其三,就索取非法之债行为而言,扫黑除恶一直以高利贷所衍生的暴力催收问题为焦点关注借贷纠纷中各类违法犯罪问题。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高利贷行为本身的规制争论宣告结束。因此“校园贷”中暴力方式索取非法之债这一客观行为构成非法经营。

“校园贷”中以威胁方式索取债务的客观行为认定。由于胁迫方式更容易达到索取债务的目的,此种行为在“校园贷”的索取债务中更为常见。具体行为方式多表现为以公开、传播、出售借款人的裸照相威胁催收贷款甚至逼迫“肉偿”。该行为直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以及复制、传播、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首先,淫秽物品的判断标准在于把握物品实质属性的前提下,客观地从作品整体性、淫秽物品描写与作品关联性方面进行考察^[16]。其次,“传播”行为认定的关键在于通过出借、赠送等方式散布、流传淫秽物品,让不特定人或多数人感知。其三,前罪应当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判断标准在于传播数量、次数、后果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量。其四,后罪行为可以分解拆开使用。行为人实施复制、传播以及贩卖一行为的,即可成立本罪;同时实施上述行为的,也只认定为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威胁行为同时涉嫌敲诈勒索罪。这也是“校园贷”刑法治理中各学者研究的重点。我们在上文中就民事领域对合法债权与非法债权的划分是判断客观行为是否构罪的评价条件之一。原则上讲,以非法手段要挟实现原始合法债权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以非法手段为要挟实现衍生非法债权的行为却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10]。因为债权人只是以非法手段索要其合法债权或者双方合意的非法债权范围内的财物,则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反之,超越合法债权范围索要额外财产,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一刑事推定的逻辑判断是基于特定基础事实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除非被追诉人提出证据证明特定基础事实的确不存在或是自身行为与主观故意方面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否则这种法律推定可以确认“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方面。^④

就具体行为而言,虽然敲诈勒索罪中常见的恐吓行为也包括暴力,但敲诈勒索的主要目的在于索取债务,特别是为获取非法衍生债务,出借方更多地利用胁迫手段以恶害相通告并使学生陷入恐惧心理,从而逼迫学生及其亲人偿还债务。实践中,由于大学生往往没有收入来源,“校园贷”中债权人更可能手持所谓“借条”向其父母索要债务。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威胁大学生公开、传播、出售裸照或是语言上逼迫对方“肉偿”,抑或是同等程度、其他形式的胁迫方法,“校园贷”中债权人达到对大学生甚至其家人产生精神控制的程度,使其在双方地位、力量严重不对等情况下产生不自愿地交付财产的行为都会构成敲诈勒索。

(二)新型“软暴力”:骚扰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我国“校园贷”中以各种通信媒介进行骚扰,公布或售卖个人信息等新型“软暴力”催贷的客观行为认定。在该行为判断依据方面,虽然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已经推出拦截骚扰电话的服务,并起到一定效果,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与制度规范,骚扰电话的认定难度很大。^⑤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联邦专门立法同时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具体规则的治理思路。^⑥例如,美国2003年《谢绝来电执行法》的出台明确建立全国性的线上“谢绝来电”登记处。消费者可在此登记电话号码以防止接到营销电话,并进行骚扰电话投诉。该法为结束各部门治理骚扰电话各自为战,实现协同负责“谢绝来电”登记机制奠定了基础。

公布或售卖“校园贷”中债务人的个人信息的行为也直接威胁到公民具有识别性乃至排他性的个人信息安全,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大学生

通过不良“校园贷”借款后无法归还欠款,债权人为了泄愤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打包方式将学生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或者单位,就是常见的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学界对于该罪名保护的法益有“个人信息说”“人格说”“隐私说”“公共信息安全说”等各种观点,但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明晰刑法保护的核心性法益实际上是个人信息安全背后与之相关联的人身、财产安全才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被害人权利^[17]。因此,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相关联的个人信息才是刑法最后性保护的法益。在“校园贷”犯罪中,根据《刑法》第253条规定的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判断标准如下:(1)出售行为直接为了谋取非法利益;(2)出售者没有非法目的但是被他人利用实施了违法犯罪;(3)没有非法目的,根据信息被利用情况和被害人受害结果综合判断。这些行为均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三)“校园贷”案件中被害人承诺问题

大学生往往提前与“校园贷”中的债权人签订合同,基于自由意志书面同意将自己的照片或者其他信息用于任何用途,在索取债务中债权人也会拿此作为筹码要求高额利益或者其他不当利益。大学生及其家属往往不知道某些合同本身无效以及索债行为具有的违法犯罪可能,基于恐惧或者息事宁人的态度答应债权人的种种要求。

反思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功能。马克昌教授从被害人承诺应当“有益于社会”角度进行判定,也有学者根据德日刑法中被害人承诺不得违背“善良风俗”进行论证此种承诺的无效性。我们基于底线思维认为,即便大学生因基于借款的需要而不顾后果地主观上表达了同意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愿,但其所作出的同意并非一般社会人的理智、谨慎判断,甚至所答应的条件本身涉嫌违法犯罪,该承诺丧失了可期待的正当性,所以不为刑法所认可。反之,如果出现被害人为了保护另一重大法益而承诺伤害自身的情形,承诺人在年满18周岁的前提下,其承诺应当得到尊重。

注释:

- ①公安部曾三次出台规定严禁公安机关干预经济纠纷。通知包括:《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
- ②据悉,近期,部分互联网小额贷款机构通过和科技公司合

作,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虚假、诱导性宣传,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诱导大学生在互联网购物平台上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参见:《“校园贷”泛滥,严禁小贷公司提供信贷服务》,http://www.wzsee.net/law/2021/0318/03184711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6月26日。

- ③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④中国刑事法所确立的推定,都是不确定的推定,也就是可推翻的推定。推定的核心特征在于,基础事实的成立是推定事实成立的前提,而推定事实的成立,并不是举证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而是由法律通过推定而自动成立的。在相反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推定事实就将被推翻,相反的事实也就得到证明并转化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参见: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法学》2015年第5期,第113页。
- ⑤2019年3月,工信部发布的《2019年信息通信行业行风建设暨纠风工作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及建立“谢绝来电”平台,采用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用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并依据用户意愿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防侵扰服务。参见:孟伟,《时隔5年再修订,骚扰电话何时休》,《公民与法(综合版)》2020年第9期,第19页。
- ⑥1991年《电话消费者保护法》(简称TCPA)首次确立了“未经事先同意不得使用人工或预录音频拨打住宅电话”等原则性规定,并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执行条例与规则。1994年《反电话营销与消费者欺诈滥用行为法》(简称TCFAPA)的出台旨在治理欺诈性电话营销及其他电话营销滥用行为,并授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

参考文献:

- [1]范亲敏.大学生不良校园贷的危害与治理[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8(4):22.
- [2]王康,周君君.我国“校园贷”问题的现状及对策:基于上海、河南两地的实证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6):40-48.
- [3]席月民.构建司法主导的校园贷多元治理[N].经济参考报,2020-09-01.
- [4]李永升,李晓.“校园贷”侵犯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刑法规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9(1):66-68.
- [5]何俊.校园贷的刑法规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63-67.
- [6]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EB/OL].(2021-03-17)[2021-06-28].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7/content_5593571.htm.
- [7]邱格屏,梁涛.民间借贷领域的社会控制逻辑:基于高利贷和套路贷的考察[J].江西社会科学,2021(3):157.
- [8]舒铭.“校园贷”网络借贷平台的刑法规制[J].社会科学

动态,2018(8):38-39.

- [9]陈兴良. 刑民交叉案件的刑法适用[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2):168.
- [10]李会彬,戴罡. 过度维权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认定[J]. 河北法学,2016(9):193-195.
- [11]肖峰. 重释民间借贷的定性和范围:如何理解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条[J]. 法律适用,2021(3):86.
- [12]最高法修正并发布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一年期LPR的4倍”[EB/OL]. (2020-08-20)[2021-06-28].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49051.html>.
-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EB/OL]. (2020-12-29)[2021-06-28]. ht-

[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85171.html](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85171.html).

-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EB/OL]. (2020-08-20)[2021-06-28].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49031.html>.
- [15]孙运梁. 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客观归责:以特殊认知为中心[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5.
- [16]张明楷. 刑法学(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167.
- [17]姜涛. 新罪之保护法益的证成规则: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论证为例[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3):5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the Behavior of Demanding Debt in the Risk Control of “Campus Loan”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Hermeneutics

ZHOU Jingbin, MA K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risk management of “campus loan” in China is a necessary measure to regulate the campus financial market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ampus loan” claim for debt and its derivative behavior involve administrative, civil and criminal fields, while the judicial field has relatively limited regulation on the core issue of “campus loan” claim for debt behavior. In this paper, we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mpus loan” governance, and find tha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boundary between asking for debt as a legitimate right and suspected crime is still vague.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illegality and criminal behavior, we redefine the nature of loan behavior, creditor’s righ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specific debt demanding behavior in “campus loan” from the field of civil law, and rethink the criminal problems of “campus loan” bad behavior in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ve imputation.

Key words: campus loans; risk management; the act of demanding debt; civil illegality; criminal offence

学深悟透“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顾了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刻总结了伟大建党精神,系统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牢牢把握的“九个必须”经验启示和根本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法宝,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一以贯之的主线即民族复兴,并鲜明提出青年在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挥的重大作用,提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凝聚青年,以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年,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和造就青年的立德树人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引领新时代青年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人、红色血脉的赓续人、红色文化的传播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七一”讲话;民族复兴;青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09

中图分类号:D24;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55-0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要反复研读,在字字句句上下功夫。总书记的讲话贯穿一条主线就是民族复兴,鲜明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并充分肯定了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的先锋作用,深情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1]。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新时代青年的谆谆教导、殷殷嘱托,又是殷切期望和指示要求,为我们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总结党百年奋斗辉煌历程的经典政治文献,是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纲领。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向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科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总书记科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指出“九个必须”是成功经验,是历史规律,是历史启示,是国之大纲,更是政治纲领。总书记分别从根本保证、依靠力量和初心、指导思想、正确道路、安全保证、外部条件国际大战略、精神力量、复兴法宝、自身建设、政治保证九大维度论述,阐明“九个必须”构成了党的新辉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纲领。

(二)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丰富并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收稿日期:2021-10-20

作者简介:周春辉(1962—),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思政、传统文化。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九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和启示。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党史观、唯物史观的重大成果和重要发展凸显党学逻辑。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巨大发展，从路线斗争史、革命史到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党的自身建设史、到初心使命史，都显现出党学逻辑，党学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二、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髓和主要内容

（一）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一百年一个主题。习近平总书记追溯自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180多年来的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必须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二）总结历史经验、规律和启示，展望未来

我们解读成功密码，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九个必须”就是百年奋斗史的根本经验、本质规律，是历史启示和政治纲领。

第一个必须，是根本保证，是领导核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个必须，是基本力量、是根基，更是血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三个必须，是灵魂旗帜。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必须，是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第五个必须,是安全保障。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第六个必须,是外部条件,是国际大战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七个必须,是强大精神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第八个必须,是复兴法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九个必须,是政治保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

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全面学习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视野宏阔、高屋建瓴、观点鲜明、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凸显了强大的政党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七一”重要讲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形成的建党精神和红色精神谱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九个必须”宝贵经验,集中回答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和新概括,充实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了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学深悟透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凝聚青年

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凝聚青年。思想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就是力量。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党一百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的非凡勇气,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理论与时代青年结合产生的实践伟力,更加坚定了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头脑的政治自觉。高校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思想工作十分重要并有着深远的意义。校内宣讲团要充分发挥宣讲优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要利用好课堂优势,全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做好“七一”重要讲话的宣传阐释工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全校教师都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青年,讲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讲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史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为青年学子的成长打下科学思想基础。我们要发挥好“青马工程”“青马社团”的

作用,每位教师要上好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有机融入学校思政教育教学中。在教学科研、理论宣讲等实践锻炼中,宣传部、教务处、科技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要注重培养造就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的青年理论骨干,推动更多青年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模范践行者和积极传播者。

(二) 坚持以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年

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伟大建党精神是知、情、意、行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精神源头和精神谱系是渊源和流长的有机统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我们党树立了崇高的精神丰碑、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更有基础和信心用伟大建党精神感召青年学子,滋养青年学子,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教育、提升青年,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此,我们作为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3],要发挥党史资源的育人功能,结合省内革命圣地、博物馆、英烈馆、党史馆、校史馆等红色资源,讲好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故事,诠释解读好我们的党“为什么出发”,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引导教育广大青年学子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增强爱党爱国情怀,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中。

(三) 坚持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和造就青年

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和造就青年。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我们党百年辉煌史概括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主题”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我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青年学子是有远大理想抱负和深厚家国情怀、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青年在党旗下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急先锋。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又向广大青年发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1]的伟大号召。为此,我们广大教师要积极面向广大青年学子讲好我们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壮举,讲好我们的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铸就的伟大精神。我们广大教师要积极引导好青年学子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广大师生也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防洪救灾、疫情防控中践行使命担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 在新的“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1]毛泽东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提出“进京赶考”之问,解决的是执政考验的历史问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赶考之路”,解决的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问题。学深悟透在于落实。如何深入谋划将“七一”重要讲话转化为学史力行中去,如何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我们广大教师当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校目前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期。迎接教育部本科合格评估迫在眉睫,航空港新校区建设亟须推进,巡视整改与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当前我们要紧紧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实施“一二三四”工程不动摇,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水平。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着力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根本问题和瓶颈问题,释放办学活力。坚持从严治党不放松,深入开展党史主题教育,全面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加快推进“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广大师生、校友的殷切期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新的辉煌。

[2]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谢春红)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Deeply Learn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Speech Delivered by Xi Jinping on July 1, 2021 and Cultivate Talents Dedicating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a New Era

ZHOU Chunhui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b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e meeting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recalls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PC's hard struggle for a hundred years, elaborates its original inspiration and mission, and summarizes the great spirit brought by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speech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at the “nine musts” are inspiration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ignificant requirements for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and creating the future. They are essential and invaluable for the success of CPC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speech is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youth in the Party'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speech calls for guiding and rallying the youth with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moving and nourishing them with the great spirit brought by the CPC founding, and cultivating and shaping their ideology and talents in the great cau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o as to guide them to inherit the red genes, pass down the communist tradition, and transmit the red culture.

Key words: speech delivered on July 1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youth

新时代奋斗进程中不断创新革命精神

关 琛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新时代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挑战之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以及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是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遵循的原则。实现伟大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贯彻“三个新发展”、落实人民主体性和培育斗争精神,是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把握的几个向度。深化对革命精神理论的研究、拓展传播革命精神的途径、加强革命精神的实践体验,是新时代革命精神创新的路径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向度;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0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60-04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血脉承接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优秀品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历史时刻,探究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相关问题,对于铸牢干事创业的“根”和“魂”,凝聚人民磅礴伟力,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而矢志奋斗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必要性

(一)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之需

在对世界转型过渡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历史交汇期的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

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合、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产生发展,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形成了‘东升西

降’的新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时仍然秉持冷战思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异常恐慌,想方设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进行围堵和打压,不断输出他们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动辄对他国挥舞所谓的制裁大棒,逆世界潮流而上,破坏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党始终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秋伟业,坚持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敢于斗争、守正创新,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奋进拼搏,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二) 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之需

首先,我们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一百年,且具有70多年全国执政的经历。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有些信仰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干部逐渐脱离人民群众,易出现腐败堕落、权力失控的现象。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推进,经济成分变得更加多样化。由于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产生,带动了社

收稿日期:2021-10-19

作者简介:关琛(1994—),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

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带来了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将政府与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面临的一大考验。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也愈来愈大。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党不断传承革命精神,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积极应对各种严峻考验。

其次,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得过且过,致使党的好政策很难落实到群众中去;一些干部党员存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心态,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缺乏实干精神;一些党员干部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功绩,作风功利腐败。因此,迫切需要用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克服“四种危险”带来的风险挑战。

(三)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挑战之需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等幌子,实质上是为了颠覆政权而作的“思想铺垫”。“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3],企图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并未彻底消灭。一些别有用心者,企图用历史的支流和局部来否定历史的主流和整体,通过无限放大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遭遇的挫折来全盘否定我们党所完成的伟大事业。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尤其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以及先进典型、革命烈士等进行丑化和污化,妄图以此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险恶政治阴谋。

二、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不断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根本动力,也是革命精神在新时代赓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集中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因此,在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紧密融合,坚持党性即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亦是坚持党性。

(二)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矢志不渝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上的“钢筋铁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最稳定持久的政治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系中最强大的共性品质。因此,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要挖掘出由伟大建党精神生发出的红船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个性精神中蕴涵的永恒不变的共性特征,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

(三)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路就像一部“赶考”史,伟大建党精神如同一座丰碑巍峨矗立在这部“鸿篇巨著”的开篇序言,“奋斗”一词贯穿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守天下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知和运用,民族性构成它的载体,时代性则构成它的内核。因此,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必须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四)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要做到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增强革命精神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规范性、权威性,将革命精神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精神的认知认同。同时,要把握革命精神的实践性特征,将革命精神融入社会实践锻炼的参与性教育中,在社会实践中传承革命精神的内核。

三、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把握的几个向度

(一)新时代之革命理想:实现伟大中国梦

革命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新时代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4]它既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追求的根本出发点。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带领人民进行救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懈怠、没有自满、没有动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靠着自己的顽强奋斗守护着红色的人民江山。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丰富发展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新时代之革命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理论上

内在贯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新时代的革命战略。其中,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宏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演进的新要求,二者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任务,二者在实现目标和方法上也具有高度统一性。“法治精神”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灵魂,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注入了新理念、补充了新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的当代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新的发展变化,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标志着我国迈入了新征程。

(三)新时代之革命重心:贯彻“三个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即“‘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5],这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到2025年和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美好愿景。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新常态下如何发展的科学认识。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发展理念上的深刻变革,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对当前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同时新发展阶段又是我国经过几十年不断发展积累之后,站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新的起点上。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新发展阶段之前阶段的伟大胜利、正向着夺取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伟大胜利奋勇前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国内外形势变化准确识变,为实现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而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重大战略安排,是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逻辑必然。

(四)新时代之革命动力:落实人民主体性

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观点。

突出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高度自觉的运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人民至上,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本质体现。

突出人民主体性,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揭示了人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依靠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积极践行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事业的根基和底气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帝”“老师”。

(五)新时代之革命品格:培育斗争精神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是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6]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讲究斗争的方法和艺术,考验我们斗争的能力和智慧。因此,需要我们传承好我们党的革命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砥砺奋进。

四、新时代革命精神创新的路径思考

(一)深化理论研究,丰富时代内涵

第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提高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知。人们往往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日用而不觉”,缺乏学理的深入探讨。在新时代,要充分挖掘更多、更具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体现精神的事件和人物,把史实讲清楚、讲透彻,强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学理支撑,用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和客观事实提高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知,筑牢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往深里走。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梳理考察革命精神发展史及其谱系发展史,强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丰富内容等问题的研究,加大有理有据、有血有肉的中国故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引导人们深入了解革命精神的实质内涵,正确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增强理论武装头脑的自觉性,提高抵御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二)拓展传播途径,厚植红色基因

第一,积极发挥高校在革命精神传播中的主渠道作用。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要

加强对大学生革命精神的教育,培育大学生厚植爱党爱国情感。一要结合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学习特别是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融入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之中,让学生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二要制定科学计划、精心安排组织,支持鼓励学生党团学等组织开展相关理论学习活动。三要积极为大学生创造参与接触社会奉献社会的劳动机会,帮助大学生在理论结合实践、知行合一中体验并接受革命精神的熏陶和洗礼。

第二,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网络革命精神传播新高地。以“学习强国”APP、人民日报客户端等为代表的央媒党媒官媒数字化的免费使用,让普通人能够非常方便地通过这些新媒体来知晓天下大小事。因此,要大力推进融媒体建设,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扩散优势,讲好党史、讲好中国故事,厚植红色革命基因,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三)加强实践体验,坚定信仰信念

第一,围绕重大节日、纪念日、重大主题教育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利用抗战胜利、红军长征胜利、抗美援朝胜利等纪念日,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诞辰日,开展丰富、生动的纪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走访事件亲历者、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等,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力量,不断增强对革命精

神的心理认同、情感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坚定信仰信念。

第二,探索利用现代化展示方式传播革命精神。通过设置革命精神虚拟实践体验项目,综合应用3D、VR等新技术,打造网络虚拟空间感受环境,增加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沉浸式体验环节,增强革命精神的感召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学习强国,2021-07-01.
- [2] 朱雪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方略[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2):50-55.
- [3] 高长武,茅文婷.“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谈党史必修课[EB/OL]. 新华社新媒体,2021-02-23.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6.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 人民日报,2021-03-13(001).
- [6] 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新华网,2019-09-0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Constantly Innovat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GUAN Chen

(College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the need to deal with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four tests”, “four dangers”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wrong ideological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nature,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nationality and times,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innovativ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era; Realizing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harmonizing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implementing the “three new developments”, implementing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and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re the dimensions that should be grasped in the innovativ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era;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expanding the ways of spread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are the path thinking of the innovation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rectivity; route

论 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白贵一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是逐渐摆脱地方性、地域性、特殊性,走向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和社会生活一致性的过程,是族群融合并形成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党总结以往治疆经验,建立管理指导边政事务的党政机构,纳边疆区划与组织整合于国家建设,推动边疆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改良。通过边疆建省和组织整合,建立统一行政体系,实现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体化,开始了历代边政由军事控制到民政建设、从军事首领治理到组织治理的结构转型。

关键词:民族国家一体化;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1

中图分类号:D69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64-05

国家治理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在一定价值理念、道德和政治原则指导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引导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政策及价值理念。晚清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陷入全面危机。边疆危机经晚清、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消除危机,稳定开发建设边疆,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历届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和使命。在晚清和北洋政府大臣、地方官员、学者边疆政策主张基础上,在国民党国家政制和行政制度建构催促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形成了认知边疆、充实巩固边疆,到开发建设边疆的治疆政策。其边疆治理既有应对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更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久远考量。

一、南京国民政府疆治兴起的逻辑

具有共同生活区域、共同历史记忆和联系、相同或相近生活习性的不同族群形成统一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一致性的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应对内外生存压力和挑战的必然选择。南京国民政府是近代以来完整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其国家权力结构、政府组织、

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具备了现代国家雏形。当时边疆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不利于形成政治统一、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一致性的民族国家。整合边疆区划与行政组织,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形成新的国族、国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实现由军事控制到民政建设、由军事首领治理到政府治理,是自然逻辑和历史逻辑发展的结果。

(一) 中国传统民族国家特征

1. 历史上广袤庞大的帝国不是经济联系紧密、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高度一致统一巩固的民族国家。

自秦始皇建立秦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以来,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具备了形成民族共同体必要的生存区域、主权行使、行政体系、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基本元素,但还不是政治长期统一、经济联系紧密、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一致巩固稳定的民族国家。一是国家疆域是变化着的动态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或强或弱,统治和管理疆域因之或辽廓或狭小,纳入政治共同体和行政管辖下的周边民族或融入或同化或脱离,变化不定。二是国家存在统一和分裂,中原王朝

收稿日期:2021-10-19

作者简介:白贵一(1962—),男,河南西平人,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地方政制。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对边疆的控制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断断续续,时强时弱。三是中原中心政权周边存在部族政权,对中央存在归附、汉化或反叛独立状态。外部势力威逼利诱下,边疆民族反叛中央,另立政权时有发生,这种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依然存在。

2. 历史和现实需要中国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共有的生活区域和历史记忆,共通的语言文字,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行政统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标志和本质。边疆地区行政组织、经济生活、文化、习俗乃至语言文字与中原地区迥异。从政治认同、行政体系、宗教、语言文字共同的民族国家构成要件看,中国只是具备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疆域、行政等基本要素,远非统一巩固稳定的民族国家,更谈不上政治认同基础上制度统一、行政完善且运行有效、经济联系紧密的统一国家。欧洲民族国家成长表明,要应对内外挑战,走向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经济联系基础上,使具有或曾经有过政治联系、历史记忆、共同生存区域和相同语言文字的不同部族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一致的共同体,形成新的国族和民族国家。

(二) 边疆建制不利于形成现代民族国家

1. 传统行政以控制为目的。

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成了中国固有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权力组织。传统政治以建立社会秩序为目的,以控制为手段。中国自秦形成了完善的官僚组织和行政体系,尤其是元明以来,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建制主要目的在于以中央监临地方,结果是兵权凌驾于民政,军事统御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行省制是蒙古族政权为控制广土众民的中国社会而采取的一种分区宰御制,一种分权统御制,目的利于中央管辖地方,非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省制之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平时足以干预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与中央之隔阂;而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借。“中国的省确不是纯粹的行政区域的地方。虽则也是一种区域,然其性质有历史他种意义夹杂其间。”^[1]军事管制在清代总督和巡抚制中得以体现,边疆更是如此。辛亥革命成功,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军民分治呼声高涨。边疆区域,北洋政府仍取军政合一制。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热河现行官厅组织暂行章程》和《都统府官制》,实行都统制,成为军政合一的一级行政区域。

1914年,政府设立察哈尔都统,改绥远城将军为都统,均为军政合一的特别行政区。民初设宁夏将军,1914年改为护军使,亦是军政合一的特别行政区。民初,呼伦贝尔镇守使为军政合一行政区域,后取消特别行政区,改为镇守使。边疆行政组织时有变化。

2. 传统边政不具组织结构功能。

中国历史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周边开疆拓土,扩大统治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辐射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历史。中心区行政体系完整,组织完备,共同体联系密切。边疆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复杂,历届政府多采行以怀柔、羁縻、诱导、利用和控制为主的特殊政策和特殊治理,多以军事控制为主,虽对边疆部族有影响力,但难以形成持久力量,亦较少建设职能,影响力、吸引力有限。军事统御下的边疆是归附安定、还是混乱乃至反叛脱离,既取决于中央政府之边疆政策及力量强弱,亦取决于戍边军政长官之行为。其次,边疆人口稀疏,流动性强,行政组织阙如,难以形成持久力量,中央政府的政治、教育、文明开化难以达及民众。以上因素影响边疆治理效果,使得边疆与内地难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联系紧密的共同体,更难因民族联系同化融合而生长出共有的生活习俗和民族精神,形成新的血缘民族和政治一致性。共同地域基础上的政治、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一致性是统一民族共有的血缘纽带和心理精神。“中国边政之废弛,其原因故多,然中枢无健全之边政机构,恐为其主因。”^{[1]18}

(三) 边疆行政不统一

世界近代史既是扩大统治基础史,也是走向行政统一史。英、法、西班牙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表明,“民族——国家之高度的行政力量不仅对于巩固国内资源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应付所有现代国家所处的庞大国际政治网也是必要的”。“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国家机构的行政力量很少能与业已划定的疆界保持一致。”^{[2]220}传统边疆治理以军事控制为目的,附之以羁縻、怀柔、恩惠、利用,没有稳固的政府和行政体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难以开展。没有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和社会事业进步,边疆部族难免不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出路。这正是近代边疆部族易受外部势力利诱反叛脱离中央、另立政权的主因。其次,军事组织难以适应近代工商、教育、社会事业发展需要,难以形成走向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地方特别行政区,缩小省区,整合原有行政组织,边疆建省,建立统一的、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的历史和现实动因。

近代边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唯有国家成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有境内各民族的富裕、安定和发展。传统边疆政策及治理组织不适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即使没有民族危机煎迫,现代国家建构也要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党五大宣言十大政纲之一是“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这是国民党重视边政、建立管理指导边疆事务的边政机构,各省有各种名称边政机关,学会、大学院系、研究院开展边政研究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结果。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

为实现政治统一,促进边疆开发巩固稳定,民族融合,形成新的国族和民族国家,国民党总结历代治疆经验,将边疆区划及组织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相结合,建立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推动边疆经济、文化及社会改良。

(一) 建立管理指导治边的边政机关

1. 政府建立蒙藏委员会及西陲、蒙旗宣化使公署。

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政制、行政体制和名称发生变化。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决《蒙藏事务局官制》。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公布《蒙藏院官制》。为推动边疆政制建设和社会改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3次会议议定《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组织机构及职权。委员会采取委员制,委员7至9人,由国民政府任命,隶属行政院。“掌理关于审议蒙藏行政,及计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首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认为,蒙藏偏处西北,道途迢遥,言语隔阂,建议在北平设办事处。1929年,立法院通过《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规则》。1932年对该组织修正:委员15至21人,由国民政府选择熟谙蒙藏政教情形者任命之,并指定6人为常务委员,各委员轮流分往蒙藏各地视察;该会于北平及蒙藏或其他适当地方设办事处,并设招待所;科长名额为9至12人,科员为50至70人。^[3]蒙藏委员会建立后对边疆人口分布、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进行了调查。为“抚绥边陲,怀柔远人”,经内政部、军政部及蒙藏委员会并邀参谋本部会商,1932年政府制定并公布《西陲宣化使公署组织条例》和《蒙旗宣化使公署组织条例》,两公署置总务、宣传处,设秘书、处长、科长、科员,并得酌用雇员、聘任名誉顾问及谘议,秉承中央宣慰边民之意,掌理西陲宣化事宜。1933年,蒙

藏委员会、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组建具有官方性质的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关于边地政情,多所探讨。

2. 中央组织部设蒙藏科。

国民党是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治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发挥政治领导和决定作用。民族平等,少数民族汉化,满、蒙、汉、藏、回五族共和,形成中华民族是孙中山国内民族主义理想和愿望。为推动三民主义至境内各民族,共襄三民主义大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蒙藏科,指导民族地区党务。“国民政府承总理之遗教,受本党之领导,无日不努力于边疆各地民族之团结与夫本党民族政策之施行。故党务方面,中央组织部特设蒙藏一科,以期推行主义于边疆,政府方面,于处理边疆日常政务之蒙藏委员会外,行政院复添设边疆政教制度委员会,关于边地政情,多所探讨,参谋本部更有边务组织之设立,罗致边事专家,以研究安边御侮巩固边防诸要政。”^[4]

(二) 整合边疆行政区划,建立行政组织,推动政治一体化

中国边疆广袤,人口稀疏,流动性大。历代王朝因地制宜,因俗施策。西藏、新疆、内蒙古、西南等地行政体系及名称繁歧。内蒙古有盟旗,西南诸省有土司,西藏政教合一。为统一政治行政,实现国家政治由军政转向民政,推动边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促进民族一体化,国民党整合地方行政体系,统一组织和名称。缩小省区,取消特别行政区,边疆建省,实行省县两级制,行政一体化。

1. 缩小省区,以期国家长治久安。

缩小省区,军民分治,是对元明清军事凌驾地方体制的矫正。为维持庞大帝国统一,中国历来都是中央控制地方。优点是利于维持统一,缺陷是一旦中央权势式微或失去道义,地方容易出现割据。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军人专横、清朝总督权限至上,均是军事势力强盛的结果。缩小省区,军民分治,釜底抽薪,从制度上终结军事体制,解决军阀割据,是对晚清督抚专横的矫正,也是对地方行政制度的矫正。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完成地方自治更定地方区划案》,肯定三大决议矫正历史上重省轻县易以孙中山重视县级政权、实施县级政权自治、以立宪政基础案。“现行省区,非为之更定区划,尽量缩小,终不能祛省权过大之弊,打破封建恶习,以确立民国之基础。此一决议,将为元明以来行政上最大之改革,对于县自治之发展,中央指挥地方之灵活,与国家统一之保障,必有最显著之影

响。”^[5] 鉴于事关重大,中央政治会议认为如何划分及其实施办法,交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专门委员会,详细研讨,拟具方案,送中央常务委员会提交全国代表大会或国民会议决定。方案一出,来自政府、军界、学者、个人缩省的吁请不断,他们从行政、军事、政治等角度提出缩省理由,边疆学兴起。边疆建省,整合组织,实行省县两级制成为各界共识。内政部吸收学者建议,拟定具体缩省方案。国民党缩省思想在兼及晚清、北洋便于国家行政和选举、教育等社会事业进步同时,重点关注避免地方割据分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2. 边疆建省,由军事控制向民政建设转型。

省县两级制为孙中山手定,是其行政思想重要内容和地方行政体制主张。民国肇兴,内蒙古、西藏、青海仍取前清旧制,设督军管辖。京兆地方、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特别区和东省特别区,实行特别管理。根据孙中山省县制,特别区于法无据,不足以昭划一。边疆区域过大,组织不健全,开发建设难以开展,中央政令、教化难以达及民众。1928年,政府废除特别区,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特别区为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省(西康暂时设立建省委员会,1939年1月西康成立省政府);将甘肃旧西宁道所属之西宁等七县合并设置青海省;以甘肃宁夏道所属各县与旧宁夏护军使管辖地阿拉善和额济纳旗地为范围,设宁夏省。地方制度变革推动边疆由军事组织向民政组织转变,推动省县政府组织化。

(三) 建立边政学会,推动边政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家制度初创。党政军学对训政与宪政、五权分治与三权回归、地方行政体制与效率、自治与官治,进行深入探讨,各种学会纷纷建立。县政学会、行政效率研究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等都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学会建立后出版刊物,刊发研究报告。地方行政制度和蒙藏委员会的建立推动了早期因边疆危机而引发的边疆研究,研究团体不断涌现,刊物盛极一时。刊物大体分为边疆或民族的政治性刊物,如《中国青年》《青年中国》《时代精神》等;边疆或民族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学报》《史地杂志》《地理学报》《科学》等;普通边疆研究刊物(包括副刊),如《边事研究》《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周刊)》《贵州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等;分区边疆研究刊物,如《东北月刊》《东北论坛》《西北论坛》《西北资源》《回教大众》《新西北》《西南导报》《西南实业通讯》《西南边疆》等;还有边疆研究或民族学研究专门刊物,如西南边疆研究社主办的《西南研究》、金陵大

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办的《人类学集刊》等^[6]。这些机构和刊物推动了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习俗、资源等综合研究,推动政府边疆治理结构转型和文明开化。

三、国民党边疆治理评析

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体现在生产方式、文化、政治制度、行政体制诸方面。厘定传统行政区域,建立新行政组织是国民党地方行政的体制建设,是晚清以来边疆政策的继续。边疆建省和省县两级制实现了由传统军事控制为主到民政治理的制度转换和治理结构转型,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边疆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改良。

(一) 边疆治理是晚清边政的赓续

完善边疆行政组织是晚清以来边疆危机引发的现实思考。设立新省,改定省区,建立行政组织,以组织充实开发边疆,着眼点是巩固边疆,防御外敌入侵引发的不安和动乱。1883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于1885年从福建析出台湾,台湾建省。188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新疆建省。1907年清政府将奉天(盛京)、黑龙江、吉林三个将军辖地改为行省。1903年,清政府内有人主张蒙古建省。1904年,清政府有人再次提议蒙古建省。《时报》评论认为,蒙古建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蒙古,也有利于汉民,不利者惟虎视眈眈之俄耳。日俄战争后政府进一步关注蒙古,蒙古建省主张再次出现。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系列开发西北边疆,建议整理西北行政区划,将由热河、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将军管辖之地和山西部分地方整理,建立热河省、开平省和绥远省,建议得到一些疆臣支持。他还建议在川边建立川西省。清末,英国入侵西藏、云南,四川受到威胁,西南边疆危机。英国支持的西藏分裂势力不断蚕食西康边区,大肆劫掠牲畜财富。1904年,建昌道尹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提出将西康改土归流、设立行省、开发边疆、加强国家在西南的力量。辛亥革命后,军民分治、缩省乃至废省呼声再起。1924年,北洋政府职方司在晚清缩省思想基础上,指出省区过大带来的教育、选举、自治、交通、生活等不便,向参议会提出缩小省区具体主张。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是晚清以来边疆政策的赓续。

(二) 边疆建省有利于国家一体化

边疆建省与组织整合目的是国家统一和安全。通过边疆组织整合,建立统一的地方行政组织,实现国家行政体制、组织结构、名称统一。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设建设、财政、教育、民政四厅,

县政府设建设、财政、教育、民政四局,有条件的地方根据需要设地政局、卫生局。边疆省有条件的设县,条件暂不具备的设设治局作为过渡。与军事管理相比较,边疆建省在于发挥组织和制度力量,发挥政府行政组织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中的管理建设职能。与军事首领治理相比,政府是持久的客体存在,比将军治理更全面、更细化、更持久。国民党通过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等,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政治建构框架内,实现行政统一,达到政治一体化。这对于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促进民族文明开化具有组织结构功能,有利于巩固边疆,更是实现国家政治一体化,走向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和主要内容。

(三) 边疆治理推动边疆事业开展

经验证明,要稳定巩固边疆,必须开发建设边疆,使边疆与内地成为命运利害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国民党五大提出贯彻落实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扶助国内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培养其社会及家族个人自治能力。国民党在边疆建省与整合组织的同时,注重边疆文化教育、习俗改良和经济建设,制定颁布了系列关于边疆开发、教育和社会改良议案法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政治、教育等问题案》,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边疆建设决议案》《开发西北决议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行政院通过教育部 1937 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民国时期则把经济和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更

多地注意到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由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把边疆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制定一系列发展边疆经济、教育的政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在边地屯垦及移民实边,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建立边疆经济的重心,改善边疆的交通与邮政,改良边疆民众的生产技术,设立边疆金融机构并兴办实业等措施,来发展边疆经济。开展边疆教育,提高各民族的文化。通过统一语言文字运动、提倡通婚运动、统一服装运动等达到同化目的。”^[7]

参考文献:

- [1] 许公武. 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J]. 边政公论, 1947, 6(1):16.
- [2] 吉登斯. 民族: 国家与暴力[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58.
- [3] 谢振民. 中华民国立法史: 上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85 - 386.
- [4] 边铎半月刊社. 创刊词[J]. 边铎, 1934: 28.
- [5] 革命文献: 49 辑[M].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76: 221.
- [6] 徐益堂.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 边政公论, 1942, 1(5/6): 18.
- [7] 林文勋. 边疆与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7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by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BAI Guiy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nation - state is a process of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locality, reg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y and moving towards the consistency of politics, economy,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t is a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 - states.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 state, the Kuomintang summarized its previous experience in governing the border, established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o manage and guide border affairs, integrated border zoning and organization into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rovement of the bord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vinces an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a unified administrativ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untries, and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border politics in previous dynasties from military control to civil affairs construction, from military leader governance to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bega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ountrie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之盛

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有清一代,湖南宾兴组织大致经历了发轫、勃兴及盛极而衰三个阶段。清前期,湖南宾兴数量甚少。清中后期,各府州县宾兴呈现勃兴之势,并在嘉道、咸同年间出现两个高峰期,尔后渐趋衰退。这些宾兴组织或代付卷资,或资助乡试、会试旅费,减轻了士人的经济负担,赴考人数增多,最终促成了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通过统计各府州的举人、进士数量,可以看出各地科举人才与宾兴组织颇有关系,这表明宾兴对科举人才培养亦有贡献,是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兴盛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清代;湖南;宾兴组织;科举制;人才分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2

中图分类号:D691.46;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69-06

谭其骧先生曾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然湖南在古代向称“蛮荒之区”,又因山川阻隔,“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2]。自秦汉迄至五代,湖南名人见诸史传者仅蔡伦、蒋琬数人,寥若晨星。至两宋之际湖湘学派兴起,湖南人才荒芜的情形略有改观。及至清中后期,湖南人文蔚起,渐成人才鼎盛之势,并产生了几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群体。对于清中后期湖南人才兴盛的原因,学界多有探讨,如“南北分闱说”^[3]“学术兴盛说”^[4],然而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笔者现就管见所及,不揣简陋,拟提出一种新意见,即“宾兴昌则人才盛”论。

“宾兴”源自《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原指大司徒教化民众,并以宾客之礼将贤能者举荐给周王。明清时科举制度臻于完备,“宾兴”泛指科举制,或乡试,或赴试钱行礼仪,或各种科举经费。近十年来,有关清代宾兴研究成果丰硕^①,但尚未见有湖南宾兴组织的专论。缘此,本文拟在发掘方志、宾兴簿册等史料的基础上,梳理有清一代湖南宾兴组织的发展脉络及其助学助考成效,由此考察

宾兴与清中后期湖南人才兴盛的关系。本文所言“宾兴”,即指地方社会资助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专项教育基金或组织,其慈善公益性特征显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清代湖南宾兴组织的发展

宾兴作为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其雏形可追溯至南宋时期的贡士庄、兴贤庄,即由地方政府置买或拨给没官田庄,以租课资助士子应考。绍定年间,魏了翁在湖南靖州建有兴贤庄。^[5]明末,临武、邵阳等县曾设有科举店、宾兴田,但鼎革之变后皆无踪可寻。

为直观展现清代湖南科举宾兴事业的发展情形,本文依方志载录,梳理出宾兴组织的创设时间及其地理分布,相关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清前期湖南宾兴组织尚属寥寥,至清中后期始大规模勃兴发展,尤以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数量最多,共计79个,约占总数的八成,各府州厅普遍创设于此期间。而咸同之际宾兴发展略有起伏,至光绪时已趋式微。下面拟分阶段对有清一代湖南宾兴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

收稿日期:2021-10-17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慈善公益视阈下的清至民国时期湖南宾兴研究”(17K063)

作者简介:曾桂林(1975—),男,湖南蓝山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慈善公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

表1 清代湖南宾兴组织时空分布表

府州名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小计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长沙府	1		4	6	2	6	2	21	
衡州府	1	1	1	1	2	3	1	11	
宝庆府	1		2		3	2	3	11	
岳州府					1	2	5	8	
永州府				1	1	2	1	1	6
辰州府					3	1	1	5	
沅州府	1				1	1	2	5	
常德府				1	1			1	3
永顺府					1	1		2	
桂阳州				4			1	3	8
郴州			1	1	2		1	1	6
澧州					1	2	2	5	
靖州			1		2			3	
苗疆三厅				2	1		1	4	
合计	4	1	5	14	25	16	24	9	98

资料来源:《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全8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故宫珍本丛刊·湖南府州县志》(全2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湖南》第一、二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975年版。

(一)清前期湖南宾兴组织的发轫

至康熙中期湖南社会渐趋安宁,经济逐步恢复,始创有宾兴。细检方志,清前期湖南捐置科举助考的宾兴甚少,仅4例。清代湖南最早的宾兴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田庆曾分巡辰沅道时倡设。他“尝捐俸二百金,拟买田为士子应试费,先以所捐资畀州牧权息,计三年所得,足给沅士赴闈资斧,士翕称之”^[6]。随后,康熙三十二年(1693),邵阳知县王省“置膳士田二百三十八亩有奇,每岁获租可四百石”^[7],匀给学师、馆师和诸生膏火。康熙末年,安化县捐置卷田,“派绅经管,召佃耕作,岁入租谷九十五石,每逢县试变租办卷”^[8],衡阳县绅衿也“备用丁银充应科之费”^[9]。总的来说,清前期湖南宾兴组织尚处于发轫阶段。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这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另一方面则受湖广合闈的科举政策影响,湖南士子惮于江湖险阻,应试者少。偏沅巡抚潘宗洛在题请分闈的奏疏中就称,每逢乡试,洞庭秋涨,浪遏行舟常有因之误期痛哭而返者,而冒险扬帆遭覆溺者时有所闻,“以致多士畏虑,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10]。可见,湖南士子因风涛险阻却步,人文寥落也就可想而知。

及至雍正初年南北分闈,乡试设于省城长沙,贡举有定额,登科及第的机会骤增,从而激发了湖南生儒的功名进取心与应考积极性。而分闈后,士子们就近赴试,已无风涛之险,奔波之苦大为减轻,旅费相应减少,一般书生亦可承受得起,由此赴考人数增

多。为光耀乡里,地方衿绅也乐于捐资助学助考。雍正十三年(1735),衡州府酃县(今炎陵县)贡生谭显名捐出祖辈遗业并新置田产23亩,将田租用于修葺学宫外,“所余之银存为两廩三年乡试卷烛之资”^[11]。此后,湖南各地宾兴组织便渐趋勃兴。

(二)清中期湖南宾兴组织的勃兴

乾隆时,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国力强盛。在此大背景下,湖南生儒参加科举考试人数逐年增多,一些府州县纷纷创设宾兴组织,乾嘉以后湖南科举宾兴事业进入勃兴发展期。如表1所示,乾隆年间湖南有5州县初设宾兴,嘉庆年间有10州县初设或增设宾兴14处,道光年间21州县设有宾兴25处。

乾隆初年,酃县官绅议定学田每年额租,折谷备银,除支饷银、首事劳酬及学宫修缮费后,“每年存银八两五钱,积至三年,合计银二十五两五钱”,循例按文二武一分发,“于乡试之年七月初一日已刻应试者明伦堂当两师散给,以垂永久”^[11]。清中期湖南宾兴事业由此萌蘖。随后,邻县纷起仿效。如桂东县,因南北分闈,“衡湘以南布衣韦带士莫不弹冠相庆,邑之士人由是观光者众,自癸卯、丙午以来,科甲后先辉映”,然而距省城仍遥远,寒士虽满腹经纶,却乏旅资,“裹足不前者有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士绅李敷蕃以邑人士赴闈道远,艰于资斧,“捐租五十一石五升五斗,岁助之,积三岁得百五十余,士林称便”^[12]。乾隆三十六年(1771),耒阳县伍先拔等绅在南城外创建文会堂。^[13]

在地方官绅的倡导下,地处湘西南的宝庆府城步县、武冈州也先后设立宾兴款项。乾隆三年(1738),城步县武生孟才美、附贡杨于芝合捐田三丘,以田租助考,后捐入宾兴会。^[14]武冈州“距省稍远,庠序之士寒峻为多,每届乡试恒以旅费维艰中止。乾隆季年,里人河南粮储道刘文徽首捐田四十一亩为之倡”,道光间邑绅邓仁堃、夏立建等人陆续捐田计277亩,“以其租息助文武诸生乡试旅费,咸利赖焉,故近数科观光者人士几倍于昔”^[15]。

嘉道以后,清王朝渐入衰世,不过湖南社会经济仍有所发展,并未戛然而止,这给宾兴组织创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桂阳直隶州属临武、蓝山两县就陆续创建多个宾兴文会。嘉庆初年,临武县两任知县杨方岳、李方谷先后倡捐置乡会田十余亩,为士子应考之资。^[16]在蓝山县,城北六里、太平墟、洪观墟、总管庙、田心铺等城乡多处,在嘉道年间相继兴设宾兴文会田或宾兴公局,“备生童岁科试卷费、诸生乡试、举人春闈廪仪”^[17]。在郴州直隶州,永兴县诸乡绅于嘉庆十年(1806)创设宾兴会,“众捐以为科

举程费”，额设花红、盘缠银 50 两，科举之年按文七武三分发给生员，遇恩科减半。^[18]

嘉道时宾兴组织在湖湘大地的发展，不单是湘南、湘西南地区，湘中、湘北地区也多有分布，乃至在偏远闭塞的湘西亦始创设。在湘中地区的衡州府，清泉县耆绅杨健于道光初年倡捐成名公田，有租谷近 1000 石，“为乡会试朝考盘费用”。^[19]状元彭浚在道光年间解组归乡后，捐田 360 亩设衡山县成文公所，“以助邑中乡会试资斧”^[20]。长沙府安化县，嘉庆年间由九乡绅民捐资存典生息，每逢乡试、会试资助寒士考费，后置有田产，并正式创设培英公局。道光十六年（1836），两江总督陶澍省墓回乡，追念先父遗志，捐置水田 120 亩，呈县立案。^[8]嘉庆中，湘潭县以修志余资买田百亩，不久郭世款续捐田百余亩，“岁入租二百余石，以给学府县试卷纸印之费”，至咸丰初置产创设梯云堂。^[21]道光年间，攸县、醴陵县亦先后建立兴贤堂，以为嘉惠士林之所，凡有志观光者均有资助。

在湘北地区，常德、岳州及澧州等府州各属宾兴也较瞩目。《龙阳县志》载：“邑夙无宾兴一项，嘉庆二十五年因修葺文庙……剩钱千缗，存典生息，创为宾兴资本，息取一分五厘，三年合得息四百五十缗，文生分三百缗，武生分六十缗，北上计偕人各十六缗”^[22]。岳州府平江县义民凌星曜乐善好施，为“培合邑文风，兼助乡会试宾兴费，自道光丙午迄咸丰戊午，阅四科乡试，人助三缗，会试十倍之”^[23]。道光二十二年（1842），澧州绅士在文昌阁左侧设宾兴馆，并捐田收租，“作三年宾兴文举贡生监乡、会试路费”^[24]。正缘于地方衿绅的资助，一些州县的宾兴组织得以创设、发展，解决了士子赴考费用。此外，湘西永顺府及乾州、凤凰等苗疆诸厅也有官绅设宾兴会，置田收租，资助生童卷资及盘缠。

（三）清后期湖南宾兴组织盛极而衰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湖南几度沦为战场，多地遭战火焚毁，一些宾兴的屋宇及款产亦遭侵挪，经费支绌，运营维艰。同时，清廷谕令地方官绅帮办团练，湘军迅速崛起并成为“同光中兴”之砥柱，而捐输广额政策也使湘省士绅获得更多的功名机会。这深刻地影响着清后期湖南宾兴事业发展的进程与样貌。如前表所示，咸丰年间湖南 9 府州新置宾兴 16 处，迨至同治年间兵事结束则有 11 府州厅增设宾兴达 24 处，然过光绪年间见诸文献的新设宾兴仅 9 处。

咸同之际，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湖南各州县宾兴的屋产田业、钱款典息，大多易主或散佚，租息匮竭，陷入困境。桂阳州蓝山县“旧置宾

兴田及廛店取税，寇乱廛毁”^[25]。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堵剿流寇盗匪，湘绅奉令帮办团练乡勇，包括宾兴在内的地方公款公产常常被挪用，所谓“无事为宾兴公馆，有事为团防公局”^[26]。这让宾兴组织捉襟见肘，雪上加霜，不得不停辍解散。

战争阻碍了湖南宾兴顺势发展，却也是其在战后迅速恢复的刺激因素。咸丰初《捐输广额章程》规定，凡一省捐银 10 万两，准广文、武乡试中额各 1 名；捐银 30 万两，加文、武乡试定额各 1 名，均以 10 名为限。^[27]在广额政策激励下，湖南绅民纷纷捐输，数年间捐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咸丰后期，湘抚先后三次奏请加广定额 10 名。^[28]据统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湖南各厅州县文生员学额总数为 1219 名，之后则增至 1647 名，还有暂广学额 42 名，两者合计 1689 名，居全国前列。^[29]乡试永广定额以及州县学额增多，激起了湖南诸生应考的热情，促发了地方社会重建或新设宾兴的意愿。

咸同以后，湖南出现一批新宾兴，尚存的旧宾兴亦得到续捐增资。道光初年创设的邵阳县宾兴，邑绅王承泽曾措意增筹经费，后因连年兵防，筹费维艰而未果。“越己未，粤逆犯郡，当事檄邑中五十六都按粮派费，募勇助防剿。迨寇退，各都有未罄用者，仍如数缴军需局，计钱三千五百缗有奇。”^[30]咸丰十一年（1861），王承泽、姚敦诒等人呈请宝庆府知府，获准“将此项都费余款三千五百串提归宾兴会”^[30]。同样，新化县绅邓显鹤曾倡议设宾兴会，然终未成。咸丰末年招勇筹饷以保境安民，“事定后，计存军饷近四千余缗，众议以二千余缗充宾兴资，以一千余缗建宾兴公所”。嗣后众绅议定，“乡场每名送钱一千五百，合卷费为二千，武闱总送钱一百千，举人拔贡北上送十千，进士北上倍之”^[31]。

同光中兴期间，经湖南地方官绅齐心协力，一些宾兴组织亡而复兴，如桂阳直隶州，同治五年（1866）陈士杰“出资增田三十余亩，入租五十二石有奇，备乡试投卷经费。其余各家公田不可胜数，士之赴试者不赍粮而用饶焉。”^[25]在兵燹后，常德府桃源县宾兴义举“几于废坠”，同治九年（1870），谭知县令士绅清查各处佃户租课，并续捐田若干，“备案禀详，以资科举”^[32]。咸丰时湘潭县初设梯云堂，同治年间罗汝怀等绅士“集城乡巨室贖资置田，并文武乡、会、院、府试皆助其试资”，先是捐谷 1000 石为首倡，后每都出谷 50 石，建起宾兴堂，“明年遂贖田三千余亩并梯云堂入之”。至光绪十五年（1889），湘潭县宾兴堂公田 3802 亩，梯云田 204 亩，共 4006 亩，岁入谷约 4000 石，园屋租钱八九万，资

产颇为雄厚。“县人应会试者，咸丰以前不至十人，后乃二三十人，正科粟谷千三百石，易银寄京师，按人均分之。”^[21]这些宾兴款产的增置，为湖湘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提供了有力的后援保障。

还值得一说的是，湖南作为湘军故里，宾兴组织也得到湘军集团的鼎力资助，湘乡、宁乡、衡阳等县获赠尤多。这些凯旋归里或荣膺疆臣的湘军将士，纷纷慨解仁囊，助力家乡科举会社，推动了清后期湖南宾兴组织出现一个发展小高潮。

不过，湖南宾兴事业在光绪年间已趋缓，仅见9处新建宾兴，总体上走向衰落。一是囿于清末民国所纂方志数量有限，或阙载所致，二是在近代中国遭遇千古变局的情势下，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不得不进行改革，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光绪后期朝野舆论的焦点，地方社会对宾兴之兴设难免有些踌躇，这或为其主因。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停废科举考试，由此与众多士子前程命运攸关的宾兴组织也发生重大变化，有的改设学堂，有的则被学务所、劝学所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接管，最终彻底消亡。

二、从宾兴视角释读清中后期湖南人才之盛

清代湖南科举宾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始于康熙，勃兴于湖广分闈后的乾嘉道三朝，咸同之际兴废起伏，至光绪时渐趋衰落，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宾兴组织设立的宗旨在于襄学助考，故而最直接的影响是为湖南士子提供了川资旅费，增加了科举中试的机会，进而促进了清中后期湖南人才的兴盛，以致晚清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景况。

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学界通常认为，它与湖湘学术兴盛、书院发达以及南北分闈等因素有关，尤其是“分闈说”颇有影响。客观地说，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全面。而揆诸史册，湖南宾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分闈，采取分省分额录取举人，湖南乡试中额增加，固然为湖南士子跻身仕途提供了条件。但不应忽视的是，科举考试毕竟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士子习举业，各项开销实属不菲。除求学期间送与学师的束脩以及岁科童试的卷资、印金等费用外，他们参加乡试、会试，因距省城、京城远近不同，赴考盘费多则耗银数百两，少也需数十两。如果考生春风得意，一举中榜，花销还较有限，倘若不幸名落孙山，接连数科赴考，费用之巨实难估算。这些举业支出，往往只有中户以上方能承受，而对贫寒之家显然无力措置。一些寒士若无宾兴资助，纵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能望闈兴叹，无缘科场，更无脱颖之日。因而，湖南各府县宾兴的设立，士子们可从中获得卷

资、盘缠资助，让其无后顾之忧而潜心问学，从容赴考。这样，清中后期湖南宾兴事业蓬勃兴起与发展，为各地士子获取功名铺就了前行之路。

从地方文献来看，湖南宾兴的成效还是显著的，它让众多士子专意于举业，有机会走进科场，施展才华。如邵阳县在道光年间设宾兴局，资助诸生应考，然日久经费渐绌，衿绅虽有意增筹，却因兵燹而停辍，战后以团练余项购买田产，重设宾兴公局，嘉惠士林甚多。光绪初年，地方绅士纪其始末即言：“从兹三载宾兴，士子连茹汇征，虽寒微亦且踊跃，无复向时之欲前仍却矣”^[30]；同样，武冈、城步等州县宾兴助考之效亦较显著。武冈寒峻之士，“每届乡试恒以旅费维艰中止”。自乾隆末年至同治年间，官绅“历有捐置，以其租息助文武诸生乡试旅费，咸利赖焉，故近数科观光者人士几倍于昔”^[15]。道光初，城步知县查惠鉴于应乡试者寥寥，“劝谕士民各立宾兴公项，以为科举资斧，迄今观光无即次之虞者”^[14]。可见宾兴组织的创设，为诸多贫寒士子免除旅资盘费之忧，当属不虚。

其他府县宾兴组织的实际功效也当如此，它不仅减轻了众多生儒科举应考的负担，而且给干才杰士提供了崭露头角之机遇，也有助于地方社会振兴文风。嘉庆年间，蓝山县宾兴局创建后，子弟多束发受书，亦有才俊脱颖而出。同治二年（1863），萧玉春赴都会试，金榜题名，成为清代蓝山县第一个进士。他后来认为这与宾兴有着莫大关系，所谓“宾兴局之设，其椎轮矣”^[17]。咸同之际，湘潭县宾兴堂产业增置，资助力度大，赴试者倍增，“县人应会试者，咸丰以前不至十人，后乃二三十人”^[21]。赴考士子增多，各州县登科中榜机率或将随之增大。湖南宾兴组织的创设，基本上达到了嘉惠士林的初衷。

下面将对各府州县所中举人、进士数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进一步阐述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人才兴盛的关系。据光绪《湖南通志·选举》载录，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九年（1646—1883），清廷开科取士，两百余年间共举行乡试96科，湖南士子取中举人4857人；举行会试100科，湖南登榜进士645人。在各府州县厅中，尤以长沙府中试者最多，计有举人2356人，进士361人，冠绝湖湘，详见表2。^[28]

由表2可见，清代湖南科举人才呈抛物线状分布，具体言之，清前期湖南举人、进士的数量甚少，在全国的比重也较低；清中期举人、进士的数量有大幅度上升，在全国占比增大，至嘉道之际遂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说；而清后期湖南科举人才骤减大半，其中有因战事停考、统计时段短等因。

表2 清代(1644—1883)湖南科举人才分布表

府州名	州县 厅数	举人数				进士数			
		前期	中期	后期	小计	前期	中期	后期	小计
长沙府	12	316	1430	610	2356	41	221	99	361
衡州府	7	88	368	73	529	17	48	15	80
岳州府	4	118	269	65	452	11	23	12	46
宝庆府	5	54	225	98	377	8	18	8	34
常德府	4	62	168	58	288	17	17	6	40
永州府	8	57	89	43	189	4	15	5	24
辰州府	4	13	64	20	97	3	7	1	11
沅州府	4	4	18	5	27	1	2		3
永顺府	5		18	12	30			1	1
澧州直隶州	6	41	149	50	240	6	9	4	19
郴州直隶州	6	34	99	14	147	2	11	2	15
桂阳直隶州	4	2	35	8	45		4	4	8
靖州直隶州	4	6	15	3	24		2		2
苗疆三厅	3		36	20	56			1	1
合计	76	795	2983	1079	4857	110	377	158	645

注:本表不含荫赏举人、顺天乡试(京闈)及在其他省乡试中试或占籍入闈者,仅计湘籍生员在湖广/湖南乡试中试者(含正榜、副榜)。光绪九年后,乡试、会试中试者,囿于资料未统计在内。

从表1可知,有清一代湖南共设宾兴组织98个,其中前期5个,中期44个,后期49个。若以府及直隶州厅行政层级而论,清中后期长沙府创设宾兴最多,计20个;其次为宝庆府,有10个;再次为衡州府,9个,又次是岳州府、桂阳直隶州,各8个;永州府、郴州直隶州各6个,并列第五;辰州府、澧州直隶州各5个,位居第六。再看表2,各府州的举人数,清中后期长沙府以2040人独占鳌头,傲视诸府州厅;其次为衡州府,441人;再次为岳州府,334人;紧随之,宝庆、常德、澧州、永州、郴州、辰州、桂阳州等府及直隶州跻身前十位,举人数分别为323、226、199、132、113、84、43人。清中后期各府州厅的进士分布情形也大体如此,长沙府、衡州府、岳州府位居前三甲,其余依次是宝庆、常德、永州、郴州、澧州、辰州、桂阳州。^[28]将两表结合起来看,可知各府州厅的举人、进士数与其宾兴组织数量基本上成正向关系。长沙、衡州两府宾兴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科举人才名列前茅。宝庆府、岳州府宾兴总数分居第三、第四,两府科举人才数亦在伯仲之间。永州、郴州、澧州、辰州等府州的宾兴数稍少,其科举人才相应少些,而湘西永顺府及沅州、靖州等地也类似,宾兴设立甚少且较晚,科甲寥落。稍微不尽一致的是,常德府宾兴仅3个,然其举人、进士数颇为可观,而桂阳直隶州宾兴数不少,但其科第业绩却差强人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并非朝夕之功,宾兴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或许也与人才成长规律有关。

各府州厅宾兴助学助考的成效虽不尽然显著,但对维系或提升一地科举考试的中榜率确有实效,

而且对提振地方士气也有益助。故而,不论从相关个案的定性描述还是从整体的定量分析来看,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科第蝉联,乃至后来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宾兴组织亦有相当贡献,其助力之功不应忽视。

三、结语

清代科举制度已臻于完备,而雍正初年湖广分闈更为湖湘士子赴考拓宽了仕进之路,湖南宾兴遂在康雍之际发轫。清中后期,湖南官绅商民踊跃捐输置产,各府州县创设宾兴约计90余处。这些宾兴或代付岁科卷资,或资助乡试、会试旅费,大大减轻了士人科举应试的经济负担,乡会试应考人数也增多。与之相应,清中期以后湖南科举水平得到提升,登第人数众多,探杏折桂亦代有闻人,巍科人物在全国各省名列前茅。嘉道年间,湖南渐成人文渊薮,涌现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著名经世派人物,而咸同年间更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湘军将帅。他们都曾受到各县宾兴组织的泽惠,得到过卷资与乡会试盘缠资助。正缘于清中后期湖南诸府州县大力捐设各种宾兴组织,历数十年而不坠,至嘉道以后始收科甲连绵、人才蔚起之效,从而促成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

注释:

- ①主要著作有:毛晓阳《清代科举宾兴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毛晓阳《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品优《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论文甚多,兹不詳列。

参考文献:

- [1]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C]//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70.
- [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 [3]彭大成.清朝两湖“南北分闈”与湖南人才之兴起[J].船山学刊,1996(2).
- [4]刘四平,吴仰湘.论湖湘学术之兴与湖南人才之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
- [5]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C]//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4-95.
- [6]同治沅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45.
- [7]道光宝庆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
- [8]同治安化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8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66,372.

- [9]乾隆衡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34.
- [10]潘宗洛.潘中丞文集[M].刻本.1757,卷一-30.
- [11]乾隆酃县志[M].刻本.1766,卷廿二-10,16-17.
- [12]嘉庆桂东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2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62.
- [13]光绪耒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34.
- [14]同治城步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73,162.
- [15]同治武冈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6,86.
- [16]同治临武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97.
- [17]民国蓝山县图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58,266.
- [18]光绪永兴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2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09-410.
- [19]同治清泉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63.
- [20]光绪衡山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70-171.
- [21]光绪湘潭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553,553.
- [22]光绪龙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76.
- [23]同治平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45.
- [24]同治直隶澧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55.
- [25]同治桂阳直隶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3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24,224.
- [26]光绪宁远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98.
- [27]光绪钦定科场条例[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1724-1725.
- [28]李瀚章等纂.光绪湖南通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2647,2648-2718,2578-2590.
- [29]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4-125.
- [30]姚敦诒,纂.邵阳宾兴公款汇记[G].刻本.邵阳:邵阳宾兴公局,1876:序1,札2,序1-2.
- [31]同治新化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13-214.
- [32]光绪桃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80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0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Binx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sperity of Hunan Imperial Examination Tal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ZENG Guil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Hunan Binxing organization roughly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initiation, vigorous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Binxing in Hunan was very small.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such factors as the division of Hugua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nd the amount of donations, Binxing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as booming, and there were two peaks. Meanwhile, it also declined due to the war and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inxing organizations either paid for examination papers, or subsidized the travel expense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nd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which alleviated the scholars' economic burden.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people attending the examination increased, which finally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Hunan imperial examination tal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Juren and Jinshi in each prefec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imperial examination talents in each reg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local Binxing organizations, which shows that Binxing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alents,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prosperity of Hunan imperial examination tal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Hunan; Binxing Organiza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alent distribution

系统视域下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研究

文媛媛

(九江学院 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唐代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和统治者对尊养老人问题的重视使得尊老养老问题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政策导向——行为示范——礼制约束——法律惩戒”这样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尽管这样的运行机制基本系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地保障了老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营造了良好和谐的尊老养老社会风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关键词:系统视域;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3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75-05

唐代尊养老人政策是对先秦汉魏以来中国尊老养老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并对宋元明清尊老养老模式的逐渐完善起到借鉴作用,在中国尊老养老文化史的地位可谓是承上启下。在对前代相关礼制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唐代尊老养老政策呈现出营造尊老孝亲和谐氛围、统治者率先垂范和树立社会典范、礼仪和制度约束、对不尊养老人行为进行法律惩戒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尊老养老风气在之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大致遵循着“导向——示范——约束——惩戒”的良性发展模式,孕育了良好和谐的尊老养老社会风气,具有时代进步性。系统研究唐代尊老养老风气的生成机制,对于全面了解唐代老人状况以及改善当今尊老养老社会风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策导向

政府的政策导向在良好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民精神追求的潮流。唐代统治者通过实施各种尊养老人的政策来引导全社会塑造尊老养老的美德,营造尊老养老的和谐社会氛围。

“立国之道,始于亲亲。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

化之本”^{[1]387}。通过亲族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支撑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而统治者十分重视强调崇尚骨肉亲情的美德,以达到教化明、民心顺的目的。古人将孝视为百善之首,在统治者看来,顺应长辈的孝义之人,会更好地对国家尽忠。天宝三年十二月,唐玄宗“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2]218},令百姓精勤颂习。唐政府对80岁以上老人,依据年龄分别配给侍丁人数不等,“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3]79}。至天宝八年,将给侍的年龄范围扩大到男子75岁以上,女子70岁以上,“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岁以上、妇人七十岁以上,宜各给中男一人充侍,仍任其自简择。至八十岁以上,依常式处分”^{[1]54}。侍丁可根据家丁人数择其一二免除徭役,为了使百姓高年得到存养,对于单丁之家,特令不再派发防边御寇等劳役。

唐代几乎所有皇帝都有赏赐高年、版授高年的记录,且一般在皇帝行幸(34%)、祭祀(11%)、改元(10%)、加尊号(8%)、宴请(6%)、即位(5%)、平叛(5%)、立太子(4%)、巡狩(3%)、封禅(2%)、疾

收稿日期:2021-10-2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系统视阈下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研究”(JD17095)

作者简介:文媛媛(1987—),女,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

愈(2%)、立皇后(2%)、出征(2%)、其他(6%)^{[4]42}等国家重大政治事件时实施。根据老人年龄大小,赐物数量和版授级别有所差别。“天下百岁以上老人,版授下州刺史、米粟五石、帛十段;九十以上,版授上州司马、米粟四石、帛七段;八十以上,版授县令”^{[1]19}。有时还会赐予老人笏和杖,“特赐老人九十以上绯衫牙笏,八十以上绿衫木笏”^{[2]158}。“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鸠杖”^{[1]460}。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事频繁,财政吃紧,赏赐高年的记录虽无前期那么频繁,对高年赐物数量也有所减少,但有唐一代,统治者对尊养老人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另外,版授高年的对象不仅有老年男子,而且对老年妇人也行版授和赏赐。“老人年百岁以上者,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九十以上者,版授上州司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以上者,版授县令,并妇人节级量赐粟帛”^{[1]1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除此之外,还对素有才望且能身体力行的老人委以职任。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敕,每乡置“望乡”,“取耆年宿望、谙识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5]1195}。唐武宗时,因僧尼还俗,悲田养病坊无人主持,敕令诸州府“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2]607}。这样的措施一方面使得人尽其才,另一方面也可充实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朝廷允许年老的官吏退休,对于退休后的官吏,朝廷给予禄料,以供他们安养晚年。另外,统治者还会根据官阶对现任官的父母给予追赠和授予邑号。安史之乱后,为了安抚藩镇,对魏博、镇州、幽州等藩镇大将的父母也格外优恤。“其大将等,虽已颁赐官爵,或虑有遗,并判官等,宜委弘正具名衔闻奏。如或父母在者,别具上闻,当加优恤。”^{[1]611}因犯事而遭贬斥的官员,如遇父母亲丧或年老疾病,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其放还服丧或停官终养。天宝十三年二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离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礼之间,深可哀恤。如有此类,并宜放还,仍申省计至服满日,准法处分。自今以后,编入常式。”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节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缘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强盗,如有亲年八十以上,及患在床枕,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者,许停官终养。”^{[5]860}

与此同时,对孝子顺孙加以旌表赏赐,对有才能的孝亲之人则举荐为官。“其有孝悌闻于郡邑,力田推于邻里,两事兼著,状迹尤殊者,委所由长官,特以名荐。”^{[1]542}至德二年正月诰:“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命县长官采听闻奏,孝子顺孙,乐于玄化也。”^{[1]523}朝廷旌表的事情是官方提倡的意识

形态,目的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不孝敬老人的倾向。旌表的事实也未必完全反映当时老人的实际处境。但是,这种官府旌表活动对于遏止家庭里虐待老人的行为、倡导尊老的社会风气无疑也有正面意义。^[6]

唐代的尊养老人政策既包括对老人给侍、存问、赏赐、重用、优恤孤寡等,也包括对孝子的旌表和举荐。给侍制度、优恤孤寡保障了老有所养;存问、赏赐体现了老有所尊;对老人进行重用,实现了老有所用;旌表、举荐孝子则是通过荣誉激励的方式引导世人懂得孝敬老人是值得尊崇的美德,由此从国家政策角度形成了尊老养老的正面导向。

二、行为示范

示范在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统治者和典型人物的行为示范会起到感染作用。如唐太宗励精图治、善于纳谏就对后代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纳谏如响,任贤勿疑。致俗于太平,垂范于永代。”^{[1]391}上行下效,统治者的垂范不仅对之后历任统治者起到示范作用,也会引得众人对其行为的效仿和精神的推崇。唐代统治者在尊老养老方面不仅率先垂范,而且对民间孝行进行表彰宣传,树立典范,用以教化百姓尊养老人。

唐代历任皇帝皆重视孝道和《孝经》的宣传。开元年间,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写序,并令天下百姓家藏《孝经》一本。唐高宗李治尚为太子之时,便因孝行感天下,成为万民之典范。“皇太子爱敬所覃,格于四海,仁孝所感,周于百姓。自春监国,既处定州。首创风规,在乎兹境。所以事亲敬养之道,有隐无改之情,爰自中山,流乎率土。地居宣化之本,人禀纯孝之深,有足可嘉,特须优异。其定州管内,孝行著闻者,宜与宗姓老人,同赐宴会。”^{[1]458}永徽初年,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并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者参加讲筵学习。高宗对众臣表示弘扬孝道的重要作用,“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习睹。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为大也”^{[2]4922}。用孝道侍奉父母,德行便会感化百姓,从而树立典型于天下。上元末年,代宗李豫尚为皇太子之时,“两宫不豫,太子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不解带者久之,及承监国命,流涕从之”^{[2]268}。唐宣宗李忱在位期间,勤政爱民,力行节俭,“非母后侑膳,辄不举乐”^{[2]645}。

唐宪宗、唐宣宗、唐懿宗皆曾下达因侍亲疾而辍朝之敕。唐宪宗元和十一年三月,又因皇太后寝疾,下达权不听政敕:“朕闻事亲之礼,问安虽限于晨昏;为子之心,就养在勤于左右。斯实虞帝明训,周

王遗风，朕率而行之，不敢有坠。伏以皇太后母临万国，子惠兆人，存神保和，养素全道。属韶阳改候，濡露感思，旧恙有加，常膳顿减。夙夜惶惕，不知所宁，今当专奉庭闱，躬尝药饵。脱冠解带，且无暇于寝兴；负宸临轩，安能亲于听断。起今月三日以后，权不听政。故兹宣示，宜体朕怀。”^{[1]429}唐宣宗大中二年五月，因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敕：“朕闻孝发乎心，勤于遗体。周典著问安之范，戴经存就养之文。垂为格式，式示达礼。……起今月二十日以后，权不听政，故兹宣示，宜体朕怀。”^{[1]429}咸通六年十一月，唐懿宗因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敕：“朕闻存养之道，发于内心，诚敬之文，著在前典。平居以问安自慰，寝疾则省侍宜专……起今月三十日以后，权不听政，故兹宣示，宜听朕怀。”^{[1]430}

唐初，雍州万年人宋兴贵家累世同居，躬耕致养。唐高祖听闻此事后，深为嘉许，下令对其进行褒奖，以树立典范，垂教世人。武德二年，诏曰：“人禀五常，仁义为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皆尚于斯。……宜加褒显，以劝将来。”^{[2]4919}唐代宗大历五年下令对孝义之行进行旌表并颁示天下，为众人之典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著者，特加旌表，颁示中外，知朕意焉。”^{[1]483}雍州武功人元让，因母亲生病，躬亲药膳，承侍致养，数十余年不出闾里，“及母终，庐于墓侧，蓬发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唐高宗咸亨年间，下令旌表元氏门闾。因其孝行，人们感佩于心，将其奉为榜样，对其倍加信任。邻里之间出现纷争之时，不到州县找官府解决，而是找元让出面裁决。苏州吴郡人丁公著，丧父之时，悲痛难抑，“居父丧，躬负土成坟，哀毁之容，人为忧之，里闾闻风，皆敦孝悌”^{[2]4936}。受其影响，附近的乡邻也都敦睦孝悌之义。

言传不如身教。唐代尊老养老政策中的版授高年，无论是版授州级官员还是县级官员，除了显示对老人本身的尊敬外，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年的地方表率作用^{[7]110}。唐代皇帝不仅用政令来引导百姓崇尚尊老养老之风，而且通过身体力行感化百姓，使得百姓更加信服。通过树立典范教化百姓，使得尊老养老社会风气更加深入人心。

三、礼制约束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这两种形式对应到唐代，可以解释为礼仪规范和制度（政令）约束。对尊老养老行为进行礼仪规范，对可能存在的不尊养老人的行为进行制度约束，是良好社会风气生成的必要因素。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六月诏：“父老宜约勒乡党，教导后生，亲束子弟。务从忠孝，使风俗敦厚。”^{[1]601}在唐代统治者看来，忠和孝是使风俗敦厚的主要因素，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关键，因此诏告父老约束教导乡党和后辈，以使他们成为忠君孝亲之人。唐代乡间主要通过举行乡饮酒礼来倡导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举行乡饮酒礼之时，依据年龄高低，座次和菜肴均有所差别，以此来显示对年高望重之人的尊敬。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乡饮酒礼的推行。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5]580}开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颁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5]581}。

丧礼是中国古代众多礼节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尤其对重视“以孝治天下”的朝代更是如此。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丧礼的仪制，只要不是从军之人，不分贵贱，都要按制度规定为父母服丧。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尚书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缞之义。丁忧之士，例从起复，无识之辈，不复戚容，如不纠劾，恐伤风俗。”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丧，听去职。”^{[5]805}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借颁行新律令之机，再次重申，“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2]15}。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有遭忧者，请百日之后，量追赶上。”奉敕依。侍御史刘思立奏曰：“窃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礼，贵贱咸遵。”长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丧，自非从军更籍者，不得辄奏请起复。”至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5]806}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不遵从亲丧之礼”的不正之风，龙朔二年三月敕：“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宴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楸，曾无戚容。既点风猷，并宜禁断。仍令周线捉搦，勿使更然。”^{[1]462}令文中明确规定，初遭父母丧，不得嫁娶、不得欢宴，禁止一切对父母不敬和有伤风化的活动。

另外，唐代崇尚累世同居，以使高年之人得到给养，对于百姓中父母健在却别籍析家之人，令州县勘察劝诫。“如闻百姓之内，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

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1]21}对于百姓不孝敬父母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施行杖责甚至发配边远之地。“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点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奏闻”^{[1]384}。“其有父兄见在，别籍异居，亏败名教，莫斯为甚。特宜禁绝，勿使更然。并亲歿之后，亦不得令有分析。郡县切须勒令在籍推行。自今以后，如有不友不恭、伤财破产者，宜配碛西，用清风教。”^{[1]417}

开元四年七月六日下令，不准差遣父母年迈且家中无中男以上之侍丁，“缘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中无中男以上者，其侍养不须差遣”^{[1]531}。天宝元年敕：“侍丁者令其养老，孝假者矜其在丧，此王政优容，俾申情礼。而官吏不依令式，多杂役使，自今后不得更然。”^{[1]21}天宝四年六月十四日又重申：“顷以乡闾侍丁，优给孝假，官吏等仍科杂役，天宝初已遣优矜，如闻比来乃差征镇，岂有舍其轻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恤然。自今后，将侍丁孝假，不须差行。”^{[5]1799}

旌表孝义、赐高年粟帛是树立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重要形式，然无论是唐前期还是后期，都有贯彻不力的现象，只能通过敕令敦促所司尽快将赐予高年的粟帛等物落实到位。开元十一年规定，诸州侍老，百岁以上赐粟七石，九十以上赐粟五石，八十以上赐粟三石，令“所由速付，勿淹时日”^{[1]373}。咸通七年规定，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各赠米五石、绢两匹、绵一屯、羊酒有差，并令各县县令就家存问。然而，“今州府官员多不给付，所用无几，系体则深。宜令上供余钱物充给讫，各具分析闻奏”^{[1]491}。

道士、女冠和僧尼是唐代比较特殊的两种人群，有唐一代，道教和佛教在不同时期所处地位时有反复，但是几乎历任统治者都强调无论道士、女冠，还是僧尼，都要依礼拜会父母，而不能受父母及尊者礼拜。唐高宗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2]83}。显庆二年二月诏曰：“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戮彝典。自今以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5]979-980}唐玄宗开元二年闰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2]172}。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敕，

“道教释教，其归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高。近者道士女冠，称君子之礼，僧尼企踵，劝诫请之仪。……自今以后，僧尼一依道士女官例，兼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无违僧律，兴行至道，俾在于兹”^{[1]589}。

四、法律惩戒

唐律以法令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惩戒，违法者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唐律在继承秦汉魏晋律令的基础之上，对不尊养老人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法律惩戒规定。

对不尽心尽力供养父母的子孙，剥夺其一定期限的自由并强制服劳役。“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8]1636}疏议曰：“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家道堪供，而故有缺者。各徒二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8]936}对于祖父母、父母健在，而子孙另立户籍及分割财产者，给予剥夺三年人身自由的处罚。作为官吏，如果祖父母、父母患病不侍奉在侧，而委托他人照顾；在父母丧礼期间，生子娶妾、另立户籍分割财产，居丧期间求仕等，都将给予罢免官职的处罚^{[8]217-218}。另外，“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即妄增年状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8]806}。可见，有以上这些不尽心尽力供养祖父母、父母的行为，除了免官外，还将剥夺一年的人身自由。

对诅咒、谩骂、殴打父母及长辈的不尊行为，据实际情况和情节轻重实施徒刑、流刑、绞刑或斩首。“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8]1561}“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8]1565}除辱骂殴打父母外，殴詈尊长也会受到相应的刑罚。另外，无故或父母无重大过失而状告父母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罚。“诸告诸父母、父母者，绞。”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有忘情弃礼而告者，绞。”^{[8]1623}只要父母没有犯谋反、大逆及谋叛之罪，其余子孙告父母皆处以绞刑。另外，状告尊长也会受到相应的惩戒。“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8]1629}如遇祖父母、父母被他人杀害，私下与仇家议和者也会受到严重的刑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

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8]1287}作为官员,遇父母死,理应解官居服,但若内心贪恋虚荣权位,诈称其他亲属死亡而不辞官者,将被处以两年半的徒刑;而祖父母、父母健在,为了求假期诈称父母死者刑罚更重。“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若诈称祖父母、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三年,伯叔父母、姑、兄姊徒一年,余亲减一等。若先死诈称始死及患者,各减三等。”^{[8]1755}

对在父母犯罪受刑期间、居父母丧期间,不举哀反作乐者,视情节轻重实施杖责、徒刑、流刑等惩罚。为官者,在祖父母、父母因犯死罪被囚禁期间,还作乐及嫁娶的,给予罢免官职惩罚。“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免官。”^{[8]1212}父母丧期未滿而嫁娶者,处三年徒刑,明知故犯的受连坐。“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8]1023}“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8]1027}至亲身陷囹圄,而子孙却行嫁娶之事,为名教所不容,故根据至亲所犯罪行轻重对子孙施以相应的惩罚。除嫁娶外,作乐亦不允许,“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者,徒一年半”^{[8]807}。隐匿父母死事者、丧期未滿改换吉服者、忘哀作乐者、杂戏者,都将受到相应的徒刑。“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8]799}即便是遇到奏乐而顺便倾听者、恰逢吉席而参加礼宴者,也将受到杖责一百的惩戒。另外,居父母丧期间,为他人主婚的,也会受到杖责一百的惩罚。

当一个社会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反之,当一个社会风俗败坏的时候,法律就是严峻的。通过免官、杖责、劳役、流放、绞刑、斩首等刑罚对不尊养老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法律惩戒,一方面警示人们不尊养老人必受法律制裁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让世人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从而形成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唐代尊养老人社会风气的生成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唐政府通过“政策导向——行为示范——礼制约束——法律惩戒”的模式,有针对性地引导人们树立尊老养老的正确态度,生成了良善的尊老养老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一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也为后世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效仿,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 [1]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4] 盛会莲. 试析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政策[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5]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6] 张国刚. 关于唐朝的老人问题[N]. 光明日报,2005-10-18“史学”版.
- [7] 夏炎. 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J]. 史学集刊,2005(2).
- [8] 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the Elderl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WEN Yuanyuan

(School of Marxist,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attention paid by the rulers to aging population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operating mechanism such as “policy orientation – behavior demonstration – courtesy restraint – legal punishment”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operation mechanism is to maintain domination, it also guaranteed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elderly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created a good and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thu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cultivating culture of respecting and supporting the elderl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system field of view; Tang Dynasty; respect the elderly; social atmosphere

媒介情境视域下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探析

——基于D健身房的学术考察

赵红勋, 付月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在健康理念全面普及以及身体管理意识增强的当代社会,健身已经成了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健身运动的空间塑造中,健身房以一种媒介化的情境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塑着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话语。本研究在媒介情境的理论观照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D健身房的15名青年健身者为对象,考察其健身实践中的自我呈现问题。研究发现,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主要通过外在妆容和媒介表达的“前台设置”,健身心理的“剧本期待”,自我身体形塑的“印象管理”等方面进行体现。但在其过程中受到了空间、他者以及自我等多重话语的规训,从而在主体意识日渐“式微”的情形下加剧了自我呈现的“异化”进程。

关键词:媒介情境;青年;健身;自我呈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4

中图分类号:G206;G8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80-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媒介的宣传和消费文化的浸淫,形塑了国民的健康理念、身体管理意识和身体审美观念,人们对于健康和身体美的追求意识达到空前程度。伴随着健身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普遍渗透,一大批形式多样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得人们日益增长的专业安全、高标准的健身需求得到满足。健身房作为身体形塑的专业性场所,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尤其是青年群体构成了其主要力量。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健身房不仅提供了一种物理化的空间场所,而且以媒介化的方式建构了新的社会情境。著名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论述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时,将媒介与场景进行了意义的融合,并由此形塑出“超越地域限制”的媒介情境^{[1][31]}。梅罗维茨认为,媒介通过塑造不同的“信

息系统”,控制了信息的流动和区隔,进而决定了规范个人行为的社会场景框架。

按照麦克卢汉“万物皆媒”的观点,健身房在提供健身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内在地黏连糅合了一种媒介化场景,并建构出一套富有丰富意涵的媒介信息系统。健身房的装饰、宣传海报、电子秤、权威的教练,以及各种各样的器械,共同搭建了一个充满着信息交流与碰撞的媒介化展演舞台。那么,在这一媒介化场景中,青年的健身运动究竟是如何进行呈现,这种呈现又是在何种环境机制中得以展开,对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回答。目前关于健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身理念^[2]、健身产业^[3]、健身健康^[4]等方面,虽有研究涉及了青年健身运动^[5]以及身体实践^[6],但是鲜有研究将青年的健身场所视为一种媒介,并在这种媒介化情境展演中探讨其健身的自我呈现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将在

收稿日期:2021-09-14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依赖及其矫正机制研究”(21YJC860028);2021年度中国青年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媒介化时代青年游戏实践的社会交往研究”(2021A07);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媒介化交往研究”(2020BXW004)

作者简介:赵红勋(1984—),男,河南濮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媒介情境理论的观照下,以 K 市 D 健身房的青年人为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考察其健身实践的自我呈现问题。

二、研究方法

D 健身房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高校和生活区,周边商业发达交通便捷,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源。高校在读学生以及附近居民和上班族构成了健身房主要的顾客群。健身房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大约 250 平方米,有四个健身区,分别是有氧器械区、力量区、多功能操房、动感时速单车房,以及十台跑步机、十五台健身单车和较为完备的健身器材,是一个综合性的健身俱乐部,提供的课程丰富多样,包括动感单车、杠铃操、瑜伽、健美操以及私人定制化课程。据了解,健身房中配有多名教练,来此健身的多为中青年学生群体,占比六成以上。该健身房会不定期举办打折促销活动,针对目标受众需求和特点,推出年卡、月卡和体验卡。从以上地段、顾客特征以及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可以看出它属于中低档次健身房。

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蹲点观察与现场访谈,一共访谈 30 人,访谈时间为 30—60 分钟不等,排除重复和无效样本,最终选出 15 位青年的访谈结果进行呈现。为了使采访人群更加多元随机,访谈时间选定在每天健身房人数最多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 10:00—12:00、14:00—16:00、18:00—20:00,访谈地点在健身房的休息室。本研究访谈对象丰富多元,包含了在校大学生,工作的青年群体,健身房的青年教练,全职妈妈。在访谈问题上,笔者根据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特点设置不同的问题,其中既包含了开放性问题,也有一部分为选择性问题,此外根据访谈中所出现的临时变化对问题进行了灵活调整,挖掘受访者在健身房这一经验场域中的自我呈现以及社会交往。因此本文围绕青年群体在健身过程中的行为、动机、媒介相关的需求、社交行为等方面进行提问。本研究采用 K 市拼音的首字母 K 作为编号代码,男性编号字母为 M,女性编号字母为 F,依次是访谈顺序的阿拉伯数字、被访者性别、被访者年龄,中间用短横线“-”隔开。例如“被访者 1 号,男,20 岁”表示为“K1-M-20”。

三、研究发现

(一)表征的形式:健身实践的自我呈现

梅罗维茨曾指出:“恰当角色和行为观念的变化常常可以追溯到社会场景的结构变化,人们的行为与心理在社会场景的变化中也进行了改变。”^{[1]48}在同一场景中,每个人都是利用符号进行表演的演

员,不同的群体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和表演。青年在健身房舞台中展现出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的表演欲望,他们主动在前台表演、印象管理、剧本期望等方面包装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化妆师。

表 1 访谈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健身频率	健身动机
K1	男	20	学生	一周 2 次	发泄情绪
K2	男	21	学生	一周 3 次	减肥
K3	男	22	学生	一周 4 次	减肥、增强自信心
K4	男	25	电器销售	一周 3 次	工作需要、减肥
K5	男	23	学生	一周 5 次	塑形,吸引异性
K6	男	28	教师	一周 1—2 次	保持身体健康
K7	男	27	创业者	有空就来	减肥、发泄情绪
K8	男	28	教练	基本每天	塑形,工作需要
K9	男	34	教师	一周 4 次	休闲、保持健康
K10	男	19	学生	一周 4 次	增肌、增强自信心
K11	女	21	化妆师	一周 5 次	塑形、社交
K12	女	22	学生	一周 3 次	减肥、塑形
K13	女	24	公务员	一周 2 次	放松、发泄情绪
K14	女	28	全职妈妈	一周 1 次	减肥、塑形
K15	女	27	教师	一周 6 次	塑形、保持健康

1. 前台设置:外在妆容与媒介表达

如果用健身房指称为表达性装备的场景部分,不妨用“个人前台”指称表达性装备中能使我们与表演者产生内在认同的那些部分。个人前台的组成部分可能有衣着服饰、年龄、身材和外貌、仪表、言谈举止、面部表情等。^{[7]2}每个人都是利用符号进行表演的演员,青年在进入健身房舞台前,会提前做好充足的信息编码,以求能够快速适应舞台环境。对自己的编码越完善,越可以优先获得他者解码权和更多的他者目光。青年对自我信息的编码主要通过外在妆容和媒介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展现。

首先,通过整合外在妆容,塑造全新自我。在自我呈现的表征方式中,外在妆容的呈现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又是吸引他者关注的重要标识。在健身房这一特定的空间情境中,青年对自我的信息编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在妆容的重新结构化,而后显示出自我的特殊意义。

受访者 K11 是一名化妆师,热爱健身,已经坚持健身一年,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她会根据不同的健身运动项目搭配不同的运动服装。

“我为健身准备了好几套衣服,练瑜伽我就选择高弹紧身的衣服,跑步就选择透气性强的,舞蹈就选择宽松无束缚的。”

(K11-F-21)

受访者 K11 还说到,她健身前还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妆容,每次都提前化一个简单的健身妆,为的是能在异性面前展现自己美丽健康的一面,享受被他

人欣赏的瞬间。

“有人会问为什么健身还要化妆,我认为化妆和健身是两个完全不冲突的事情,我画的是轻薄的底妆,当然这些是我专门买的,是防水型的,非常适合健身时使用。一个简单的妆容可以让我在运动中看到镜子中美美的自己,让心情更加愉悦,也会成为健身房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被帅哥盯着看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K11-F-21)

其次,在社交媒介界面进行自我呈现。健身房作为一种媒介化的空间,建构了互动的场景。在这种互动的场景叙事中,青年不仅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还会借助社交媒介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所以社交媒介界面的自我呈现也成为健身实践中自我呈现的一种表达面向。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既会选择微信朋友圈、QQ空间这样熟人化的媒介社交圈,同时他们又会在keep、悦跑圈、薄荷健康等专业化的软件上呈现自我。在呈现自我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软件上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甚至在不同的社交软件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文案。

K11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美美的自拍,配上文案:“健身打卡第三天,感觉自己更美了,明天继续加油。”而在keep运动上,她配文:“健身第三天,真的好累,有没有同样快坚持不下去的,我们一起互相监督啊。”他们提前预设不同解码对象,在社交软件中差异化的呈现文案编码和自我表露的行为诠释出青年在健身实践中独特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意涵。

2. 剧本期待:自我呈现的心理归因

剧本期待指社会规范对于社会角色的限定,它分社会规范内容和个人角色两个方面。戈夫曼的拟剧论,将社会比作舞台,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演员,我们被期望要按照社会设定的剧本进行表演,尽管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健身房中,按照既定的剧本期待,我们经常会看到很明显的性别区隔现象,力量健身区基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瑜伽、健美操的区域也看不见男性的身影。这仿佛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默契,男性就应该扮演健壮勇猛的角色,训练力量器械,去瑜伽、健美操区会被视为“异类”。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就该扮演纤细柔弱的角色,她们对于健身的理解是减脂塑形、“蜜桃臀”、“马甲线”,性感才是她们的终极追求。

受访者K7原本是一家国企的员工,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状态,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选择创业。他来健身房的次数和时间并不固

定,但是对于健身他有自己的个性与想法。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蛮在意大家对投来的异样眼光的,第一次来瑜伽课,教练还当着那么多女生的面,给我来了一个‘隆重的介绍’,引来一片笑声。一段时间后,我成为万花丛中的一道风景线。渐渐受到我的影响,瑜伽课又陆陆续续加入了几个男生,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我们定义我们自己。”(K7-M-27)

现实社会交往中,大多数青年都会在意他人的目光,因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实践中,身份认同显得极为重要,当有一点偏离于大众的审美,就会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内在生命意识和精神中,青年抓住身体控制的主动权,不断进行自我反思,通过个人定位、选择和规划来实现自我认同。

3. 印象管理:身体的形塑

我们的表演都是有目的的,想在公众面前呈现怎样的形象,就会为自己定制怎样的印象管理方案。青年群体通过“表演”重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幻象,而背后的驱动因素来自观展和自恋。

笔者发现在D健身房中,青年们最重要的表演就是“健身攀比”,这类类似于街舞式的现场“battle”,多发生在包括教练在内的高段位健身者之间,他们约定一个规则,比如在固定时间内举多少次的杠铃、做多少组的开合跳,期间吸引大家围观、喝彩。在这场表演仪式的自我呈现中,健身者通过身体与力量的展示,获得大家的目光和掌声,同时也激励观者对于身体形塑的欲望。

“每次进行这种比赛时我都特别兴奋和紧张,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其实是需要对自己身材有很大的自信才可以,当我接受别人的邀请时就意味着做好了心理建设,赢要有风范,输也要有风范,但是不管输赢能够获得他人的掌声和喝彩我会很开心很享受。”(K5-M-23)

健身器械作为一种身体雕刻的工具,代表着一种专业性与高端性。健身房中有种类繁多的健身器械,不同的器械都有不同的功能,对于身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塑造。健身者通过调适器械的负重量以及高度,使之与身体的交流运作更加贴合顺畅。在这些器材的使用与磨合过程中,也是一种自我的重塑与习得的过程,获得了“理想的自己”。

“在健身前我一直比较瘦弱,细胳膊细腿,整个人也不是很自信,我健身的目的

就是增肌。在健身教练的推荐下,我通过不同健身器械的组合锻炼,对我的腿部肌肉、手臂肌肉进行强化训练。在这过程中仿佛重塑了自我,随着我逐渐健壮起来,我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更加自信,并且整个健身过程就是对我个人毅力的一次锻造。”

(K7-M-27)

青年健身者有着不同的“身体期待”,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定制不同的形象管理方案,体现出自我意识和张扬的个性,但同时他们对于身体的形塑往往也会受到现实生活中众多因素的影响。

(二)规训的力量:自我呈现的“他控”机制

青年群体在健身房实践中,实现了多样化的需求,但是在健身房这一复杂的意义系统中,各种消费符号、权力象征相互交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健身实践。

第一,空间的规训。健身房既是一个规训空间也是一个商业空间,在这种双重压力下,青年的健身实践行为也在不断地被形构。首先,空间实践是人们创造空间的方式。^[8]健身房的宣传页、广告语、宣传片,所创设的消费符号无不在强化着空间的强大规训。D健身房电子屏循环播放的健身运动宣传片,健身区两侧墙上张贴精美的海报,其主角都是青春洋溢的俊男美女,男性都是古铜色的皮肤,拥有壮硕的臂膀、宽阔的身形,彰显着男性的雄壮。女性拥有完美的曲线身材,马甲线等无不凸显着健康美丽的因子。在通往健身区的走廊,最为醒目的就是巨大的激励语“放飞梦想,唤醒青春活力,为梦想而年轻,为梦想而坚持”,楼梯口的标语如下:

成功的阶梯你在哪一步?

今天你足够努力吗?说的就是你

性感的诱惑无人能挡!

瘦猴!再不努力,女神都和别人跑了!

无论是广告文本、图像还是视频文本都在强调健身房的附加意义。这些信息媒介贩卖身体焦虑,恰到好处地利用受众的情绪。在宣传内容上,这些广告将健身与“年轻”“自律”“时尚”“健康”等概念直接关联,仿佛在告诉人们,只要健身你就可以拥有一切美好的代名词。

“这些海报里面的女生身材都太好了,我在单车或者在跑步机上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仿佛时刻都在提醒着自己是个‘废物’,看完顿时就没了想偷懒的想法。”

(K13-F-24)

“说实话,看完之后我都有点自卑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的身材,这得吃多少苦才能练成这样呀。”(K1-M-20)

其次,健身房中的体重秤,也是极其重要的规训工具。D健身房的每一个健身区都配有体重秤,并且放置在进门最醒目的位置。笔者在健身体验过程中,发现青年群体具有很强的“体重秤情节”,健身前得上秤一次,健身完之后又得上秤一次,仿佛在进行着一种媒介化的仪式。

“健身那么辛苦,每次健身结束,我最期待的就是上秤,看到体重数据的下降,真的非常激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是我坚持健身下去的源动力。”(K1-M-20)

“我现在手下带着三个学员,他们主要是对自己体重不满意,体型偏胖,我需要定期给他们的体重做好记录,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做好教学的调整。”(K8-M-28)

显然,体重秤上的数字,在这里已经脱离或者超越现实中显示体重的作用,它成为一种信息符号,传递着消费社会对于个人标准体重的定义,成为教练为学员制定健身计划的参考指标,个人自我量化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大家交流健身的重要议题。

“我发现在健身房中,不论男女都不太忌讳谈及体重的问题,甚至会互相询问对方的体重,但是一旦走出健身房在其他场所谈论别人的体重貌似就很不礼貌了。”(K6-M-28)

健身被各种媒介建构健康时尚的代名词,其中充满了各种消费主义元素,无时无刻地在健身房空间中发挥着规训作用,时刻提醒你要注意形象管理,坚持锻炼,只有这样才是健康自律的,才能抵抗身材焦虑成为时尚达人,在社会交往的自我呈现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二,他者的规训。布尔迪厄把场域比拟为一种具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存在的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9]在健身房这一媒介化场域中,主要是由教练和学员组成的关系网络,其中教练占据健身房场域关系网络中的核心和权威的位置。教练在健身课程中,一般处于教室中心位置,他们通过展示规范的动作、专业的健身术语,向关系网络中低一级的学员传达着讯息。大部分学员们将教练的指示奉为圭臬,按照教练的叮嘱严格执行。

“我报了教练的私课,因为我非常了解自己并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我需要有人可以监督我,健身房教练刚好可以带来很好的监督作用。教练给我开的健身食谱我

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K3-M-22)

但是通过访谈得知,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健身教练能够有愉快畅通的交流,一部分学员从未报过私教课程,甚至十分抵触与教练的交流。

“每次教练问我各种情况时,我就十分抵触,而且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意愿,因为我总感觉这些教练与我交流的是有目的的,可能又想推荐他的私教课程,这些课程可不宜呢,但是我真觉得没必要。”(K15-F-27)

权威的教练、他者的目光,共同搭建成一个无形的媒介化展演舞台,发挥者强大的规训力量。他们对于健身者对身体的规训不仅局限在健身房内,而是通过其他的媒介形式的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第三,自我的规训。健身可以被视为是在处理身体和自我的关系,健身者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一种“身体预期”。在这种身体预期的指导下,对身体进行积极的干预,通过健身活动主动管理自己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交流”。不可否认,部分健身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社会标准的影响,但是更大程度上青年群体的个性化追求在身体管理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身材匀称,不胖不瘦,选择健身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我还是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我想要锻炼出适当的肌肉,这样看上去会更加精神更加健康,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K5-M-23)

当然,青年在健身过程中的主体意识是因人而异的,自律并且拥有较强主体意识的青年能够掌握自己身体再建构的主动权。青年群体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健康管理,他们制定翔实的减肥计划,从饮食上的健身餐、蛋白粉、鸡胸肉到穿着上的运动鞋、运动衣、弹性裤,都体现青年对于个人身体管理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自我的规训已经渗透到健身者的日常生活中。

“我现在已经把碳水都戒了,主要吃一些教练推荐的健身餐,因为想要增加肌肉我会搭配一些蛋白粉供日常使用。我朋友们一开始总是要找我撸串,我拒绝好几次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主动约过我了。因为这种坚持,我的身材和生活都变得更健康了,同时也提升了我的自信心。”(K5-M-23)

青年的健身房实践受到多重的规训限制,在发挥主体意识与反规训之间反复折返,在矛盾纠结中螺旋上升,他们以身体作为交流的媒介,展现着健康的身体,呈现着积极的精神面貌。

促进身心健康是体育健身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归因,体育健身的社会文化意涵也与参与者在场实践息息相关,体现在自我认同、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但是,在这一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存在意义逐渐偏离运动健身本质的行为,脱离其价值归因,形成异化的健身行为。

(三) 异化的生产:自我呈现的批判反思

异化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或多或少不属于他,这些产品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主体无法控制,他们甚至拥有凌驾于主体之上的权力。^{[10]36}在消费社会和娱乐至死的时代,很多事物的概念和本质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或者在逐渐的异化过程中。

首先,健身不以单纯的锻炼为目的,而是日渐融入了消费炫耀的心理。“健身十分钟,拍照一小时”,这是来自健身中一位被采访者的自嘲。他们并不关注运动健身真正价值与意义,将过多精力放在如何在健身中自我表现和如何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光鲜靓丽的一面,他们在社交软件上频繁晒出健身照,渴望获得自律、健康的人设和美好的赞扬,事实上健身是一项需要毅力长期坚持才会有回报的运动。

“我的工作其实比较忙,但是每周再忙还是得抽个时间来健身房四个造型拍照发个朋友圈,因为我之前已经把每周坚持锻炼的人设给立起来了,我要尽一切方式维持这积极健康的形象。”(K4-M-25)

其次,为了吸引眼球,想方设法拍出造型优美的高难度照片和视频。很多人不顾自身的身体素质和条件盲目从众,冒着损害身体的风险,学习难度过高的动作,模仿“网红动作”来吸引更多的关注。有的是为了秀力量,盲目加大训练力度和难度,如各种倒立、加大举重的负重量,这些行为早已背离了健身追求身体健康的本质。

“前段时间抖音上有个特别火的秀腰的变装视频,视频中的人物要借用一个凳子,人物面向地板仰着,双脚垫在凳子上,双手支地的动作。这个视频引来大量的模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抖音账号下会出现‘动作危险,请勿模仿’的字样。”(K2-M-21)

最后,商家的过度消费主义的宣传行为。消费主义在当代社会不仅只局限于物质消费,也注重符号消费。^[11]健身房会尽一切办法唤起消费者对身体的重塑欲望,并将身材管理纳入日常生活中。通常健身房的营销员或教练会夸大身体焦虑和健身的功

效,通过许诺给消费者一个健美身材,诱导大众盲目走进健身房,办理月卡、年卡、私教课程。另外,健身者的自我呈现过度追求社会认同,会导致大众对于健身本意的曲解,只注重表面浅层的作用,从而将健身房异化为充满商业、利益与庸俗的场所,忽视了其锻炼身体且愉悦身心的作用。

四、结语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健身房这一新兴的场景,承载着丰富的符号系统,既是一个规训空间又是一个商业化的空间。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健身房不仅成为一种消费选择,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青年注重生活体验,勇于尝试和突破,他们在健身房这一符号意涵丰富的空间中,通过积极的身体管理,演绎着身体在场的丰富实践,强化了自我认同,是一种健身房的外在规训与健身者自我主体意识相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面临来自社会中多重规训的枷锁,自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另一方面,青年对身体有自己的坚持,在规训与反规训的斗争中,按照自我意愿雕刻身体,在健身实践中完成了身体的重塑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

[1][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2]于永慧.“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的理论阐释和政策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2):25-35.
- [3]王志文,沈克印.我国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8(5):20-26.
- [4]文才新,江超.广场舞与健步走对中老年女性心血管功能影响的对比[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1):109-117.
- [5]王静.街头健身青年参与者的状况调查:基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域[J].中国青年研究,2020(9):90-97.
- [6]彭秀祝.“雕刻身体”:青年健身群体的身体实践与情感体验[J].中国青年研究,2020(3):78-84.
- [7][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8]赵红勋.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的空间实践探析[J].新闻界,2018(7):38-44.
- [9]黄红东.场域—惯习论:农民心理文化研究的新工具[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7):87-90.
- [10]陆海林,程代熙.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 [11]赵红勋.青年媒介依赖视域下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论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3-2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Self – presentation of Youth Fitness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Situation

—An Academic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D Gymnasium

ZHAO Hongxun, FU Yu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the concept of health is universal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body management is enhanced, fit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aily life of young people. In the shaping of fitness space, the fitness roo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media situation, and shapes the self – presentation discourse of youth fitn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dia situ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elf – presentation of 15 young exercisers in D gym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 – depth inter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 self – presentation of youth body – building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Front – stage setting” of external make – up and media expression, the “Script expectation” of body – building psychology, and the “Impression management” of self – body – building. The process of self – presentation of youth fitness is regulated by multiple discourses, such as space, other and self, which intensifies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of self – present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eclining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edia context; youth; fitness; self – presentation

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策略及典型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薛春璐,孔晔晗,王元杰*,齐秀丽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100081 北京)

摘要:在分析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的影响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的三大传播策略。为调研各种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基于《智慧农业(中英文)》期刊,构建了微信公众平台、头条号、新浪微博和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多种学术期刊传播模式,讨论了学术期刊的APP模式。本研究可为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和内容传播提供参考,扩大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新媒体;学术期刊;传播模式;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86-06

一、引言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新媒体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类新兴的传播介质、平台或终端机形态^[1-2]。新媒体传播的介质分图文类和视频类,图文类的传播媒介包括传统类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豆瓣、简书、美篇、知乎、今日头条、小红书等;视频类传播媒介除了目前熟知的抖音、快手、西瓜视频、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视频平台,如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视频和土豆视频等。在“互联网+”时代,读者对于获取期刊内容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纸媒形态已难以满足读者要求,更多的读者依赖于移动阅读终端以及其他内容获取方式^[3]。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最早提出了媒体融合概念^[4-6]。当今,媒体融合通过一些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与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移动APP等)进行优化组合,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处理与共享,从而衍生出形式多样的信息产品,最后通过移动终端传播给读者。

学术期刊作为传统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向网

络化、在线化转型出版相对较早,但其利用新媒体传播却有些迟缓。具体表现在“三少”:一是在新媒体平台上开通官方账号的期刊少。二是官方账号发布的内容少,更新速度慢。三是官方账号的关注人数少,远少于其他内容传播主体。学术期刊并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体在内容传播方面的优势。视频摘要是比较早的期刊新媒体传播方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Moshe Pritsker博士首先提出了视频论文概念,并于2006年创建了视频期刊JoVE(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是全球第一个面向专业科研群体的正式出版发行的视频型学术期刊,近年来每期发表视频论文100篇以上^[7-8]。传播力决定了期刊的影响力,本文以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工作为基础,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影响要素,提出了内容传播策略,在调研了多家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模式的构建实践,探讨了学术期刊视频传播模式和APP传播模式,为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和内容传播提供参考,促进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

收稿日期:2021-09-18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JBYW-AII-2021-19)

作者简介:薛春璐(1987—),女,辽宁沈阳人,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期刊新媒体发展。

通信作者:王元杰(1986—),女,山东潍坊人,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质量期刊建设策略。

二、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力影响要素

在订阅时代,期刊传播力影响要素一般为出版内容、订阅数量、报道范围等,此外还受经济水平、科技条件等因素影响。例如,订阅用户的多少直接影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覆盖面。而在新媒体时代,影响并决定传播力的要素有了变化,在传播内容依旧是核心要素的前提下,增加了传播介质、读者参与度等中观和微观因素。

(一) 优质内容——基本保障

内容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和根本,也是期刊的核心资源。新媒体时代强调“内容为王、网络为霸、终端为重、技术为先、资本为要、受众为主、人才为本”等“七大核心理念”,其中“内容为王”依然排在首位,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均无法撼动。经营好内容,媒体的传播力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在基于新媒体传播时,如何对期刊内容进行开发和再利用以获得读者关注度,也就是流量,是目前我国期刊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二) 传播介质——基本手段

学术期刊在订阅时代一般更重视内容生产环节,而忽视对内容的传播,从而制约和影响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然而,目前期刊界的共识已改为:内容生产只是期刊发展的第一步,有效传播出去才能实现内容的最终价值。

根据团队研究结论,传播介质直接决定了受众面,因此,在人力资源有限与国外出版集团的双重挤压下,如何保障期刊内容最大程度上通过多种平台进行不同类型传播,是出版方面面临的问题。

(三) 读者用户——补充力量

期刊订阅时代,作者和编辑是期刊内容传播的主体,控制着读者的知情权和思维模式,即作者写什么,编辑出版什么,读者就看什么,读者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对内容的选择余地较小。

新媒体时代,尤其自媒体时代,读者不再只是被动接收信息,他们也可以集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三位”于“一体”,担负起期刊内容的发现、传播与分享的角色,成为内容传播的重要补充力量。期刊出版方可以通过多种奖励方式,积极发挥读者传播内容的积极性,提高内容传播力。

三、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策略

(一) 生产精品内容吸引读者

新媒体传播由于具有双向性、个性化、接受方式灵动化、传播速度实时化以及交融性等特点,使得其与学术期刊传播采用的传统媒体方式有很大区别。学术期刊在传播内容时,应注意考虑以下两点:

1. 传播的内容应具备连续性。期刊内容传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制作不同内容类型通过不同新媒体重复宣传期刊内容,以固定频率连续更新等,以达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加深记忆度的目的。

2. 内容兼具科普性和新闻性。学术期刊因其报道内容非常专业,并不容易吸引更多读者。部分学术期刊在新媒体层面实现了兼具科普性,如《植物保护学报》的公众号“人呆手户”,用生动的语言和高清图片推送关于昆虫、植物等科普知识,深得读者喜爱。而通过新媒体发表对某些热点新闻事件的专业化解读,也为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带来更多受众。“专业知识+新闻热点”的传播方式往往会为学术期刊新媒体账号带来意想不到的关注度。

(二) 积极探索多平台分发模式

传统订阅时代仅有的印刷纸媒和后来的电子版,以文字图片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受众的多元需要。如引言中所述,新媒体时代诞生了多种媒介,传播介质大量增加。当下期刊新媒体传播策略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多平台运营,多平台内容分发,根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画像和属性生产不同的内容最终实现引流或者信息推广,如采用短视频传播实验视频,采用微信公众号传播内容文字,采用直播平台向读者授课等,从而最大化满足新媒体时代读者对传播方式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三) 瞄准受众群体提高有效传播率

期刊内容传播针对明确的读者,每种期刊均有其明确的读者群。因此在传播内容时,应针对特定时期和一定区域的读者的需求特点而采取传播措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刻画用户画像,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阅读爱好、受教育程度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采用精准推送平台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提升。常用的期刊精准推送工具有 AMiner、Kudos、TrendMD 等。

(四) 重视互动交流提升读者忠诚度

在新媒体时代,读者的主体性得到实现和满足,从而对期刊的忠诚度得到了强化。学术期刊应建立期刊与读者的良好沟通关系,实现期刊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样才能促成读者需求得到满足和期刊获益的双赢结果。尤其是采用一定的激励措施,让用户享受到参与传播的自由和乐趣,在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增强了亲身体验的舒适度,把内容传播融入用户的生命血液中,变成自己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一部分。媒体的传播力便逐渐

得到发展和提升,其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四、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一) 新媒体传播规律探索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农业近年来成为我国较为重视的产业,连续多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被提及,行业也得到一定发展^[9]。随机选择近1年在《智慧农业(中英文)》新媒体矩阵上发布的11篇推文,分析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和新浪微博的传播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用“传播力度”衡量新媒体的传播效力。

表1 《智慧农业(中英文)》新媒体平台传播情况分析

序号	题目	推文类型	浏览量/次			传播力度/次每人		
			微博	微信	头条	微博	微信	头条
1	专题征稿:作物表型前沿技术与应用	期刊资讯	1468	495	7440	1.21	0.04	0.27
2	赵春江院士:抓住四个关键,做好智慧水产品冷链物流	行业资讯	3249	580	12,000	2.68	0.05	0.43
3	本刊编委吴文斌研究员:当前国内智慧农业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	行业资讯	1117	1141	6085	0.92	0.10	0.22
4	赵春江院士: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	行业资讯	1116	1334	8635	0.92	0.12	0.31
5	智慧耕地管理平台,助力构建耕地保护监管新格局	行业资讯	2429	364	16,000	2.00	0.03	0.58
6	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视觉导航系统设计与试验	文章摘要	7956	587	9580	6.55	0.05	0.35
7	基于订单位置聚类的雏鸡配送车辆调度优化模型	文章摘要	5468	337	6676	4.50	0.03	0.24
8	自动驾驶与测控技术在保护性耕作中的应用现状和展望	文章摘要	1249	672	12,000	1.03	0.06	0.43
9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合作伙伴”奖	期刊资讯	2581	653	8111	2.13	0.06	0.29
10	2021 智慧农业青年学术研讨会	活动资讯	589	1334	3627	0.49	0.12	0.13
11	杨万能教授: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助力作物表型组学协同创新	专家访谈	703	835	6798	0.58	0.07	0.25

从表1可以看出,头条号浏览量较高,新浪微博次之,微信公众号浏览量较低。“传播力度”是基于新媒体平台粉丝数量的推文平均阅读次数。“传播力度”计算结果显示,微博传播力度较大,头条号次之,微信公众号较小。而在实际运营中,编辑部对于微信公众号内容付出了更多精力。可见基于公共关系和裂变规律传播的头条号和新浪微博传播效果优于基于“熟人好友”传播的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因此在各平台发布内容时应注意读者受众的区别,从而提高传播效果。

(二) 常见平台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1. 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是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10],是主流即时通信工具之一。当前,建设微信公众平台已成为学术期刊传播内容的重要举措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期刊动态,提供文章检索、过刊浏览、当期目录、投稿、查询稿件状态等服务^[11]。还有的在纸刊、网站上添加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期刊目次,实现纸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协同传播^[12,16]。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特点在于可以引导读者阅读推送信息,使用公众号菜单功能。学术期刊要从微信的这种功能突破口发挥传播优势。

微信公众号分为服务号、订阅号和企业号三种。学术期刊传播适合使用服务号和订阅号,在传播功能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号每月能发送4次,订阅号每天可以发送1次。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学术期刊传播可总结为“微推送”模式、“微书架”模式、“微书店”模式和“微互动”模式。

“微推送”模式是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群发消息功能构建的,向读者传播学术期刊相关的图文消息、文字、图片、语音或视频。期刊除了可以将期刊内容“微信化”推送给读者之外,还可以推送相关的活动、科普知识等资讯,根据当前热点话题寻找与学术期刊传播主旨相关的内容,引导读者将推文分享到朋友圈,以实现扩大传播的效果。

“微书架”模式主要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定义菜单”功能和“页面模板”功能构建。读者可以在公众号主页下方浏览菜单内容。在“自定义菜单”中可设置图文消息、语音、视频、链接和小程序,可将期刊目录、电子刊、热点文章、期刊网站链接等集中于此。“页面模板”可以将图文消息和视频定制化归类呈现给读者,可复制页面链接放到自定义菜单发布。但发布内容的容量有限,微信公众平台目前最多支持设置3个主菜单和5个子菜单位置。

“微书店”模式主要基于“微信小店”功能卖刊,包括电子刊、纸刊和期刊周边产品等,这种模式在开通微信认证、微信支付功能后才能使用。通过在公众号上售卖刊物等商品,增加学术期刊发行量。读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阅读,对期刊产生兴趣,有可能产生买刊的行为,通过“微书店”模式方便读者购买,是新媒体传播反哺传统传播的一种方式。

“微互动”模式主要基于“消息回复”功能进行构建。“消息回复”功能包括关键词回复、收到消息回复和被关注回复,适用于与关注用户交流沟通,通过公众号为读者提供1对1的互动服务。“关键词回复”可根据收到的“关键词”回复相关信息,读者根据指定关键词获取信息,如在推文中引导读者回

复“01”下载“某资料”,以此吸引读者关注,增加关注用户数量。

2. 头条号

头条号是今日头条的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产品,可发布文字、图片和视频。基于个性化推荐引擎技术,根据用户社交行为、阅读行为、地理位置、职业、年龄等自动计算并推荐其感兴趣的资讯。今日头条实现了信息实时推荐,0.1秒内计算推荐结果,3秒完成文章提取、挖掘、消重、分类,5秒计算出用户的新兴趣分配,10秒内更新用户模型。基于此特点,期刊在头条号上发布的内容在不刻意推广的情况下就能被相对精准地推送给感兴趣的读者。如《中国猪业》的头条号“猪业资讯”在2018年发布的《刚刚!西南出现疫情 全国扑杀生猪超20万头》自然阅读量达102万次。头条号的“同步助手”支持与微信公号推文内容同步,有微信公众平台的期刊可采用“同步”模式,节约推文编辑时间。

经调研发现,头条号传播力度普遍高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力度。微信公众平台上专家报告类的内容阅读量多,平台粉丝基数大,传播力度一般比头条号低。头条号上新闻报道类的内容阅读量多,而且平台粉丝基数小,表现出其传播力度远高于微信公众平台。期刊内容方面的两篇推文主要是期刊摘要或全文,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阅读量高于头条号。其中,赵春江院士的推文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阅读量和传播力度都很高,而在头条号上与其他文章的阅读量和传播力度区别不大,反映了微信公众平台基于熟人的传播特点。期刊建设类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阅读量高于头条号,而且传播力度相当,甚至高于头条号,侧面反应期刊建设的内容在头条号上传播效果不如微信公众平台。会议资讯类的内容在两个平台上传播规律不明显。通过《智慧农业(中英文)》实践经验表明,头条号是较微信公众平台更能快速传播资讯的一种媒体平台,由于阅读群体和阅读目标不同,同一条推文产生的阅读效果不同。采用“同步”模式在头条号上发布内容能捕捉到不同群体的读者,有利于扩大学术期刊读者范围。

3. 新浪微博

与基于熟人社交的微信相比,新浪微博是基于公共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接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传播互动。新浪微博具有信息发布门槛低、随时随地传播、传播方式裂变和信息交互简便快捷的特点。基于公开的平台架构,学术期刊能够公开实时发表内容^[17],通过裂变式传播,

让学术期刊与读者互动。微博与微信相比更具有公开性,不仅仅局限于“好友”之间的社交,学术期刊应充分运用微博平台特点吸引读者关注,达到裂变传播的效果。学术期刊可以在新浪微博上申请媒体认证以示权威性,基于新浪微博平台提供的服务,可采用“话题+”模式、“互动”模式和“推广”模式传播期刊信息。

“话题+”模式。学术期刊官方微博可发布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的消息。“话题+”模式即在发消息时在双“#”之间加上关键词句作为“话题”或“超话”,其作用:一是微博会基于大数据技术根据读者阅读内容向读者推送消息,引起读者注意;二是起到内容分类搜索作用,读者在主动搜索感兴趣的“关键词”时会更容易被搜到,从而引起读者关注。

“互动”模式。与微信公众平台相比,新浪微博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既能随时回复评论,又能发送私信,还可以@微博用户,更易于与读者粉丝互动起来,而不局限于关注用户。很多官方机构已经把微博作为一个客服平台。比如,有时线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发个微博@某些机构就能解决。学术期刊可以以微博为平台与读者互动,在回复读者评论的同时再次转发消息,即增加了发布内容的上网次数,又增加了读者互动性。学术期刊在发布消息的同时可以@相关的微博用户,如同类期刊、合作伙伴和读者粉丝等,扩大学术期刊的传播和影响力。

“推广”模式。主要是基于新浪微博中的推广服务,即通过微博平台投放广告。通过“推广”模式,学术期刊官方微博发布的内容可以被推送给更多的微博用户。微博可通过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识别学术期刊潜在读者,如某个领域、某个研究机构的学生、老师或研究人员,将博文推送给相关读者粉丝,还可以将博文推送给特征相似的读者。这是学术期刊主动传播的一种模式。

4. 视频传播模式

视频给人一种直观的体验,通过声音与图像结合,人们更容易接受视频表达的内容。虽然国际上有发表视频摘要的期刊,但对国内普遍的学术期刊来说独立完成视频出版还不容易,需要考虑视频文件存储硬件和软件技术等问题。成熟的视频社交平台为学术期刊视频传播提供了支持。学术期刊可以借助视频社交平台发布专业领域的视频,扩大学术期刊宣传力度。视频传播可归纳为“短视频”模式和“直播”模式。

“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逐渐获得各大平台和粉丝的青睐。“短视频”模式可利用视频社

交平台实现,如抖音短视频平台支持不到1分钟的配音视频发布,并能根据用户观看习惯推荐相关视频,也支持视频发布的推广。这种短视频具有迅速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有创意性、新观点的视频,在不足1分钟的时间里给人一种冲击性,这种瞬间的吸引力能激发用户关注,学术期刊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发布与期刊主旨相关的视频,传播学术观点。

网络视频直播是指人们通过网络收看远端正在进行的现场音视频实况^[18]。学术期刊“直播”模式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发布实时有声影像,比如举办读者见面会、行业会议、专业领域座谈会等活动,拉近读者距离,提升学术期刊权威性和影响力。

5. APP 模式

在移动 APP 方面,国际上一些知名期刊,如 Science、Nature、Cell 等都推出了自己的 APP^[19]。美国化学会的 ACS Mobile 和 ACS2Go 支持快速检索文章和自定义筛选期刊,能保障读者简便快捷获取文章,提供全文下载^[20],其纳米功能社区平台通过融合新媒体在线提供视频(Nano Tube)、播客、图片库等多种多媒体服务。在移动互联网 APP 旋风的席卷之下,传统媒体纷纷开发各自的 APP,以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读者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保证原有品牌的保值或增值^[21-22]。

学术期刊开发独立 APP,应在阅读电子文献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集成视频、讨论互动、资讯发布等功能,突出专业领域特色和传播主旨。学术期刊由于品牌、资金、人力等问题,开发独立的期刊 APP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核心力量薄弱,传播力与基于第三方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相比较弱。因此,基于 APP 的学术期刊更适用于以期刊集团或期刊数据库平台为基础进行研发,在大数据与“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形成学术期刊云 APP。据了解,中国知网、维普、超星和中科期刊已构建了学术期刊集群 APP。但这类期刊 APP 供读者集中查阅学术期刊文献,传播普遍的专业知识,而对于某个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作用不大。

(三) 瞄准不同用户群体的传播模式

由于不同平台用户阅读特点不同,可以根据平台用户群体阅读特点,对用户进行分类画像,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宣传策略、传播模式。具体实施策略包括:

(1) 依据用户分类建立分享即奖励机制,促进用户保持活跃状态。建立完善的奖励机制,例如最佳粉丝评选、转发留言送礼物等,调动用户积极性,促进整个学术社群的知识共享。

(2) 建立用户认证体系,从知识获取角度为用

户节省时间。如微信群开启人工认证或知识认证,筛选目标用户。将用户间分享的有用的知识,认证为有用建议,在其他用户搜索时给予优先显示权,加快用户有针对性的筛选过程^[23]。此外,考虑到工作人员和工作量的原因,运用大数据设置自动分类标签,也可增加平台的用户流动与知识传播。

(3) 建立及时、有效的互动机制。新媒体平台使用户与期刊的交流不受时空限制,对用户的留言建议仔细评估后给予回应,一方面要考虑反馈的及时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反馈方式,可以根据问题选择性开放用户参与讨论反馈。对于个别用户聚焦的某个问题,编辑部还可采用其他通信方式回应,提高新媒体的服务质量和用户的沟通体验。

(4) 建立情感评价体系,在促进知识行为的同时做到人文关怀。期刊应重视用户评价,研究可以自动识别评价中的用户感情倾向的分析工具,对那些负面情感强烈的用户及时安抚,主动提供帮助;对那些正面情感强烈的用户给予感谢和肯定,凸显期刊编辑部对用户评价的重视。知识行为和情感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发挥新媒体的强大功能,增加用户黏性。

(5) 建立用户关注分类,通过用户选择实现精准推送。例如微博的推送往往是基于用户关注的用户。再比如今日头条号的读者更侧重于阅读会议资讯、新闻报道和期刊内容类的文章,而微信公众平台的读者侧重于阅读专家报告、期刊建设、会议资讯和期刊内容类的文章,期刊可以基于不同群体进行内容推送,实现精准推送。

五、结束语

移动互联技术改变了读者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为学术期刊传播提供了新路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的影响要素,之后提出了传播策略,并在调研各种新媒体平台传播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新媒体融合的学术期刊传播模式。

学术期刊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学术期刊的学术把关和评价作用,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受众人群,实现学术期刊与目标读者群体的全方位零距离接触,从而使知识成为受众人群日常工作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而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及传播力。新媒体碎片化传播能加强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术期刊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扶文静,周泉. 新媒体新常态下科技期刊的新发展[J].

- [2] 龙秀芬,丁岩,冉文清,等. 新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的功能定位及融合发展策略[J]. 科技管理研究,2018,14: 44-48.
- [3] 马晓悦,薛鹏珍.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背景下再论情报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协作发展路径[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3):37-43.
- [4] 刘毅,李岱素,赵恒煜. 基于公众影响度分析的科技媒体融合比较研究及对策建议[J]. 科技管理研究,2017(20):77-81.
- [5] 苟东涛. 浅谈媒体融合[EB/OL]. (2014-09-25)[2018-06-28].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925/c244089-25733441.html>.
- [6] 张文字. 地方媒体融合发展的难点与对策[J]. 学习月刊,2016(8):14-15.
- [7] 鲁翠涛,赵应征. 国际科技期刊视频摘要发展概况及其启示[J]. 编辑学报,2018,30(1):25-28.
- [8] 李仲先. 科技期刊论文增强视频的自我实现[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29(10):1006-1011.
- [9] 赵春江. 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及战略目标研究[J]. 智慧农业,2019,1(1):1-7.
- [10] 李燕. 微信社区信息行为研究:基于“信息场”理论[J]. 农业图书情报,2019,31(3):56-64.
- [11] 高军,王甦,蒋锐,等.《激光技术》数字化出版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J]. 编辑学报,2017,29(S1):64-66.
- [12] 郭焕芳,岳瑞,郑爱莲. 新媒体技术下的科技期刊出版[J]. 中国科技信息,2017(3/4):131-132.
- [13] 陈奇. 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及策略分析[J]. 创新科技,2018,18(6):82-85.
- [14] 辛亮,黄雅意,黄锋. 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平台与纸刊融合的关键点[J]. 编辑学报,2018,30(4):410-412.
- [15] 陈玲,李禾. 借助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学术论文:以《中国中药杂志》为例[J]. 传播与版权,2018(10):106-108,111.
- [16] 付丽萍,代万雷,李仲先. 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优质内容的创作思路[J]. 出版广角,2018(10):48-50.
- [17] 刘晨霞,魏秀菊,王柳,等. 学术期刊影响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2019,31(7):66-73.
- [18] 王颖. 自媒体平台下网络直播类节目主持样态研究[J]. 上海艺术评论,2018(5):98-100.
- [19] 谢征. 移动客户端在科技期刊中的应用[J]. 编辑学报,2013,25(6):581-583.
- [20] 戚义姣. 美国化学会期刊 APP 出版的特点及启示[J]. 科技与出版,2017(1):41-45.
- [21] 李慧. 中国商业类与公益类少儿数字阅读 APP 的比较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2019,31(9):13-20.
- [22] 郭小霞. 大数据时代大众期刊 APP 的运营模式、问题及对策[J]. 出版发行研究,2015(8):60-62.
- [23] 李旭光,肖思琪,李珊珊,等. 基于知识行为的小米社区用户画像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1,33(8):4-1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rategies and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Modes Based on New Media Convergence

XUE Chunlu, KONG Yehan, WANG Yuanjie, QI Xiuli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the content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new media era was analyzed, and on this basis, three strategies for the new media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 content were proposed. Then by investigating the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new media platforms, several academic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modes based on the mature new media were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new media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periodicals,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Key words: new media; academic periodicals; dissemination modes; strategy

消费文化视域中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阐释

王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作为时尚的重要元素,服饰潮流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符号,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及社会生活深度联动。在某种程度上,解读服饰艺术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就是在解读时代脉络的关键。从消费文化视角阐释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通过服饰表达其文化意义的深层蕴涵,并进一步探究服饰艺术在富有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一种无限性可能,丰富了服饰这一物质体系的内容,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富有价值的参照。

关键词:消费文化;服饰艺术;符号;意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6

中图分类号:TS941.3;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92-05

一、引言

消费涉及每一个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与社会和文化相关的问题。从消费具有的属性来看,消费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消费者的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且是融通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渠道。在后现代社会,随着媒介“内爆”的不断加剧,以速度和力量为目标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机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也在不断膨胀。“作为今天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消费文化被作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商业以及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1]。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下,服饰产业以其强大的发展态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而中国长久以来作为礼仪之邦、“衣冠上国”,服饰文明早已渗透并且固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而言,服饰作为一种符号载体,在特定阐释语境中,取决于接收者如何理解这个载体所携带的意义。因此笔者拟从消费文化视角来分析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深入挖掘服饰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更能深刻地了解服饰艺术符号所独具的文化魅力及其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二、通向服饰消费文化

“消费的服饰文化”或“服饰消费文化”既指消费中的服饰文化,又指服饰中的消费文化,因而是服饰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服饰消费文化所指涉的主要是在消费过程中服饰的符号象征属性。诚然,当服饰不仅作为自然的或物理的物件而存在,而且作为受某种规则制约、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载体而出现时,它就成了—种“文化符号”。人们不断地借助服饰的“符号魅力”来装扮自己以彰显自我身份与认同,也追求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服饰与文化的发轫之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服饰融入文化的过程亦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敏锐地指出,各类服饰被使用的时刻,即与生产、分配、使用和再生产的循环相对分离。它们不只是一系列使穿戴者装扮身体、保暖御寒的物件,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记,是对于人类本质的一种提示:—件衣服可以代表或者作为—个部落及社会群体的象征,传递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信息,体现了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感(如男人和女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也揭示出男女两性或者社会等级关系间在根柢上存在的本质差别。于是,“服饰可以被视为传达了每

收稿日期:2021-09-20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19QNCX06)

作者简介:王位(1991—),女,河南开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

一类人所固有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又是区分他们的基础”^[2]。由此看出,服饰既是自然之物,同时又是文化物品,代表某种文化符号,其含义与它所传递的个人抑或群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秩序息息相关。正是借助于服饰的符号化功能,我们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其底层及诸隐喻层上的多维意义。

三、理论阐释

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符号的物受到消费社会里文化价值变幻的影响。物变为符号,那么被消费的不再是物的物质性,而是其所指涉的关系。换言之,物背后关涉的是一个体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可能是具体的,抑或是抽象的。借由符号化消费,旨在探讨消费文化生成逻辑,涵括了符号规则以及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以下三个理论维度解读人们更为关注的服饰消费文化背后的符号价值,可以窥见其符号化特征与文化意涵。

(一) 消费文化内涵及其流变

消费文化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提出“有闲阶级证明其自身的方式有两种: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3]。通过消费,有闲阶级的闲暇时间得以利用,金钱的优势得以体现,相应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社会关系、世界观和价值观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20 世纪 40—50 年代为消费文化的初级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拓宽了其研究路径。二战后,伯明翰学派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可行的发展空间。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下,消费文化作为当今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被视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业和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在普泛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语境中,人们日益察觉到物欲对人的精神的一种深入骨髓浸渍的作用。服饰、美妆、音乐、汽车、美术、网络……一切似乎皆被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前所未有地依赖于物质财富、现代技术平台和信息媒介的力量。于是消费轻而易举地超越了性别、种族和年龄的隔阂,构筑起感性共和国和品味共同体。

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转变也意味着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新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并完成了从

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控制中心在生产,而 20 世纪后控制的焦点转向消费者。在此期间,新消费手段不断涌现,在物质、资金和心理诸层面驱使人们超出“应然”进行消费,或者冠以满足其所谓的更高级需求之名,如精神层面、审美层面、智力层面抑或是基于纯粹的享乐主义心态,从而间接地把人类愿望所给予的情绪、想象、情感等释放出来。需要指出的是,该阶段消费文化的新主角们(如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主动对某种既有的风格脱敏,大胆逐新,甘做时尚的“弄潮儿”,在某种意义上,也暗示出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与客观物质世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意愿。这一现象已经促使先前一系列区隔的界限被打破,比如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渐次消失,从而使得审美消费活动具有了大众化、通俗化和平面化等倾向。依此逻辑脉络,新兴消费群体倡导所谓的“快乐道德观”,而且他们主张快乐、追求快乐以促使个人快乐地工作,唯恐“不开心”对自我价值构成威胁。

在后现代高消费社会,物品与符号形式密切相连,它们代表着愈来愈多的不断变化的意义,相应的是,人们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消费社会中获得和表达意义的方式也显现出历史性的变化。后现代社会信息过剩的反噬效果,反而带给人们消费时的虚假满足感和被异化的精神成就感。某种意义上,“消费品不仅仅是一包包中性的‘效用’。它们是由其在符号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产生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对象”^[4]。具体来说,人们消费的更多的是服饰的符号价值,并且通过购买不同的服装来表征他们自身所定义的东西。而整个大规模生产系统亦不乏可以操控人心和制造幻梦的各种服装文化符号,这恰如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这种符号化消费模式与商品符号化相伴而生,在市场营销、广告媒介、公共关系乃至泛文化行业为消费主义所起到的润滑剂作用下,人们似乎对商品有了非常特殊的、浓厚的个人情感,从而作出符合其价值观的选择。笔者在此主要探讨的正是在消费过程中服饰的符号象征属性,试图通过对服饰艺术符号的剖析寻求其超越传统本体论之外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当服饰作为受某种规则制约并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载体而出现时,它就被纳入文化世界,在一个因缘整体的存在场域被赋予各种意义。因此人们不断地借助服饰的“符号魅力”,寄托情感于客观事物,营构着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诗意梦想。

(二) 服饰的符号功能和符号价值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符号是携带着意义的具体

物件或具体行为。任何物质产品都不仅是实体,也是符号,而物件生产伊始就被人类赋予了某种目的和意义。确切地说,人的精神,人的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均浸染在符号之中。诚如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5]。的确,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因而人就是符号的动物,唯其如此,人之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径,即文化之路。

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以其独特的属性(如色彩、质料、线条、图案、式样和风格等),攫取人类内心深处转瞬即逝的灵感生发、情绪流溢和心理体验。服饰艺术潜移默化地依循其所营造出来的文化幻象的意志,而致力于埋下草蛇灰线的情感线索,于是服饰的符号象征性就不单单具有再现性特质和一般符号共有的价值,而且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和建构性特质和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前现代社会里,每一件物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可以被感知到。简要地说,每一件物品是相对单一化、个体化和可视化的。销售者和消费者能够互相感知到彼此对对方价值的承认,从而保证了交换的天平两端不会失衡,这与黑格尔-科耶夫(Hegel-Kojève)的“承认理论”(“Theory of Recognition”)颇为契合。确实,昔日服饰是寄生在物品实用功能上的产出物,它具备皮肤的保护膜、体温的调节器、运动的辅助工具等功能。然而,随着人类生活世界日益丰富化和复杂化,个人购买行为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且与人的社会身份和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缘此,物品逐渐融入了意义领域,从“功能”和“实体”走向了“符号”和“象征”,为现代社会营造出以价值链上游产业为代表、以属性和符号为尊的精神幻梦。这样看来,抛开功能性这一固有观念,重新审视人的服饰,在服饰体系和意义体系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生产中寻找到价值依归,我们能获得更多有灵魂的、有情感的劳动结晶。

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服饰代表了人们对世界的“分类”。人们最初识别事物来认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一就是首先对自己及其所属群体进行分类。无论是中国西汉初的《尔雅》(Erya)中的动物分类,还是西方的林奈氏分类系统(Linnaean),或者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依据逻辑方法区分物类,抑或是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所考察的人类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人们正是通过分类,找到了世界的某种基本秩序。在分类的过程中,

人们赋予各类事物以不同的名称和意义,而事物本身即可用符号彰显其意涵。符号牵涉文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作为意义的载体而被制造出来的服饰独特性更体现在,以强大的力量于日常生活中组织人们的生活经验。服饰“进入了人的日常生活,被人赋予某类特殊意义、价值、身份的同时参与了人的身份的构建,他们通过消费某物进行自我表达和评估”^[6]。譬如我们知道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男女衣着分别凸显不同的文化含义;衣装风格映射出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同时又传达出自我希冀与他人持有的距离。似此相关例证,尤其是渗入现代社会的流行逻辑,为此提供了适切的认知与思考空间。就更深层次意义而言,服饰艺术符号思想和观念方法绵绵不断地启迪着人们对人类文化的创思。

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所强调的,“首先,人的具体存在的三大范畴在它们的原始关系中向我们显现出来:作为(做)拥有,存在(是)”^[7]。缘此,我们想要拥有某件东西即是确认我们的自我感知。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例证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决定我们的身份。比如,张爱玲对奇装异服的刻意追求,亦富有同样的意涵。对于张爱玲来说,要将自己的肉体生命凸显出来,就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传奇人物,通过此种方式使得自我的生命看上去热烈而绚烂。张爱玲在《更衣记》(Changing Clothes)中坦言自己乐于做女儿身,有穿红着绿、随性打扮的权利与自由。她为出版《传奇》(Legend)到印刷所去校正稿件,穿着奇装异服,引起整个印刷所的工人侧目,如此装扮一般来说是惊世骇俗的,而张爱玲追求的正是惊羨与别致的效果,亦是她为世界苍凉的底色着色赋彩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由此可见其衣装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一如她的文字,同样给中国文坛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还有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对服装质感的关注使人们倾向于从皮肤感受出发来观照身体,将“衣服作为皮肤的延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热量控制机制,又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8]。衣服一旦成为人的皮肤,自我的表面就会翻转到衣服上,所以衣服不仅是遮盖身体的存在,而且成为确认自我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把衣服比作存在的“接头”或“合页”可谓切中肯綮。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之所以追逐考究的材质、流行的风格、独特的色彩外观等,仍然在于穿衣服这件看起来很表面、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实则是生活中确定自

我的手段。衣服的用途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的功能具体说来就是见人、衬人和助人——将其外观与内蕴投射到人们身上,而穿衣服界定着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的内涵、身份与价值也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三)服饰的符号转换

服饰作为符号,其代表和彰显的意义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语境。服饰在不同场合的运作导致了其意义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为服饰的符号转换。当代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指出,物宛若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社会生命,对应的一项研究方法就是写出物的文化生命传记。通常来说,人们看一个作为客体的物的时候,经常是静止地看它。然而如果把物看成是处于运动中、不断流变的状态,同时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凸显其在根柢上强调一个事物也是一个过程、一个事件,而非一个纯然的、与人类社会文化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也就是说,物在其生命流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积极介入人类生活、参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物处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并展示其丰富多样的生命片段。于此,“我们需要运用有限认知的、肉体的和物质的资源来应对动态的环境”^[9]。服饰的符号转换过程同样可以被视为服饰作为一个动态流程,在不同场合意义发生了变动,它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服饰的商品化是服饰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也即是说,服饰被置于商品语境中,其可交换性使得服饰在人类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流动,从而衍生出不同的文化意涵。诚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从物的交换环节入手,进而对物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商品化,亦即哪些物可以交付市场出售,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10]。在此需要指出,阿帕杜莱提供了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非常关键的分析角度,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过于偏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倾向。或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面对一件物品时,是以对待普通商品的态度看待它,还是视其为特殊的物质实体?比如将之视为礼物、信物、方物、珍物等等,因之物所传递的意义已然存在于语言与符号编码的连接之中。“能指的物质性:一方面,可以指向朴素的物质网络,如所谓的‘物质’能指即字母、声音、文字记载等,它们维持着语言记忆和程序感受(或阐释);另一方面,这个物质能指自身又引发和产生各种物质性的指涉、价值或相关体系。”^[11]那么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服

饰从原材料到消费商品的转变过程,必然涉及服饰进入其社会和文化生命轨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服饰作为商品,它的符号价值并不止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完成,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服饰的符号化从购买行为完成之时才揭示了其所携带的丰富意涵。

然而,商品的符号化隐含着悖论。简要地说,商品化和可交易化意味着赋予物件定义该商品意义的过程,但同时意味着在数量上对该商品已进行等量化计算。因而,许多具有所谓崇高含义的物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商品化或市场化的一些限制。比如当消费者把很形而上、宏大的抑或是极富个人化的情感和意志融入其所拥有的服饰上,服饰就逐渐改变了其原初的符号所指,超脱于一般符号所共有的再现的特质,而成为彰显消费者个性化特征的符号。这也是服饰的符号转换的第二种情况,即“去商品化”过程。诚然,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服饰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有很强个人情感价值和意义,并在意义的链条中被阐发。毫无疑问,所谓的“服饰”这一符号浓缩了人的思维、情感和想象等主观色彩。从根本上来讲,服饰艺术符号不诉诸一般,而是集特定表现意义和隐喻特质为一体的一种更高形式的综合。此方面最典型的是服装收藏爱好者,而被收藏的服装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却被拥有者赋予了某种独特的意义。当这种作为“准商品”的服饰被重新交易抑或被拍卖时,服饰符号转换的第三种情况即服饰的“再商品化”过程就产生了。

兹举“马克思的外套”为例。在经济困窘的年代,马克思将其唯一的外套送到当铺典当或商店出售,这件外套就成了一件商品。很明显,被送到当铺的外套只是拥有较少交换价值的商品。缘于此件衣物对马克思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价值和意义,此后当马克思将它赎回回来,它便被“去商品化”了。即使如此,这件外套仍然具有商品的潜能,即它可以“再商品化”。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外套只是常规的变旧而已,但是其在符号价值方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即是服饰的社会生命之体现。可见,纠缠在当铺中的种种关系,正是起因于服饰的社会生命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因此凸显出服饰在社会关系构成中的特殊的能动作用,亦彰显了服饰与人之间关联互动、双向建构的过程。服饰在人与物两极之间往复摆动,其生命就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身份,这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综合过程,如同科普托夫所强调的一样,“我们同样可以为服饰撰写其独特的文化传记”。也正

因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世上没有“纯粹”的事物;事物是人类用来建构生活的用品或者补给品,它们之间彼此不可或缺,而且无远弗届地存在着。

四、结语

当代文化处于一个符号时代。穿衣潮流渗入到现代社会的流行逻辑,这里探讨的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发挥着社会符号作用的以服饰为载体从而介入人的自然状态的一种文化行为。从文化功能属性上,服饰是符号形式之一,服饰背后潜藏着诸多无法单用功能性解释的因素,暗示着与人的活动的象征关系,人们因之赋予对象本身相应的意义。同物质状态相比,服饰是一种活生生的形式,承载了不同的语义内容,除了直观感受带来的材料组织,亦彰显出深层次的符号魅力。人们用服饰艺术符号解释生活并探索意义,使服饰成为凝聚着特殊价值、意义、情感、身份的动态物,并以其有意义的方式帮助塑造世界的各个层面。因而从事实的存在物走向动态的意义产物,这中间是服饰符号媒介的巨大作用。

本文从消费文化理论视角展开对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解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服饰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并且启发与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在当今社会的消费观念下,消费者既不是服饰的掌控者和毁灭者,也不是受制于服饰的被动者,而是处在与服饰缠连互动的多元动态关系网络中的一元。因此笔者所探讨的服饰艺术不仅仅是抽象的形式论,亦非零碎的形而下,而是通过服饰艺术符号表征与自我有关的文化活动,和人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及艺术思想深度联动。换言之,在现实生活中,借由学贯文理、知识汇通,服饰艺术的符

号意义研究才能保持与存在、与世界、与人的内在处于深广的意义价值关联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服饰代表着人本身,解读消费文化视域下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就是在解读时代脉络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罗钢,王中忱. 消费文化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
- [2] 西莉亚·卢瑞. 消费文化[M]. 张萍,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
- [3] 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李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
- [4] 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10.
- [5]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5.
- [6] 张进,王焱. 物的社会生命与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3):42-48.
- [7]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98.
- [8]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9.
- [9] Beth Preston. A Philosophy of Material Culture: Action, Function, and Mind[M]. New York: Routledge,2013:8.
- [10] 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6-16.
- [11] 张进. 物性诗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8.

(责任编辑 林川)

Symbolic Meaning of Costume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

WANG Wei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fashion, clothing trend is a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and symbol, which is deeply linked with people's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a sen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ternal forms and internal implications of costume ar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costume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express its deep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rough costume. Moreover,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costume art in the elastic social network, which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the material system of costume so as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consumer culture; costume art; symbol; meaning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分析

张 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档案馆,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在探寻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价值,从社会文化氛围、校园文化环境、高校思政教育方式和内容以及突发公共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进行探索和分析,以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097-04

一、研究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思想精华,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将其融入、滋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突出思想价值引领,强化思想育人实效。

在全媒体发展环境中,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文化思潮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认知,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诸多影响。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素养以及外化的行为表现是现阶段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对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进行研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和文

化之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多元文化思潮冲击,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特征,行为准则多元化问题也逐渐凸显。面对外来文化挑战,如何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是时代与社会的要求,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其内涵非常丰富,涉及文字、文献与文化经典,民族风情与家族文化,传统史学与艺术,传统生命信仰与人生修养,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与思想,传统法律与法制文化,传统武术与军事文化,传统医药与养生文化,传统节日与饮食文化以及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从

收稿日期:2021-08-17

基金项目: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2020年度部校共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2020YBXM001、2020YBLX001)

作者简介:张阳(1964—),女,河南永城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档案馆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中华民族精神“根”与“魂”、最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命脉的高度,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最深厚的软实力与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撑的高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立足点,是中华文化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的根基。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沧桑却绵延不绝的重要精神支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文人志士追求的家国情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诗句体现着饱满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组织结构、修身齐家的伦理道德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意识、仁爱重义的精神。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充分体现了家与国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彰显了国重于家,先国后家的价值理念。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爱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以仁义教化为核心,道家以顺应自然为中心,佛家以慈悲大爱为重,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在诸子学说中,儒家学说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最全面最客观,在时代创新方面又最符合民族特性和历史方向,经过漫长的积淀,内化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3]。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仁爱思想”,体现着浓厚的社会关爱和人文关怀精神。孔子对于理想社会的见解高度一致,孔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和谐发展,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众之间博施济众,乐善好施的仁爱之心。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将“德行”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主张道德对个人修养提升的重要性^[4]。理想的人格修养是社会文化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的集中体现。《大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人

格修养的“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达出了求真、求善、求美的理想和实践。“言必信,行必果。”“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亲亲而任民,仁民而爱物。”“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以“仁礼合一”为基本架构的儒家思想中所表达的孝悌忠信、诚实守信、修身慎独、崇德弘毅等人文信念,是大学生人格修养培育和提升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操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

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屈原、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及其中承载的爱国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史料资源。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在诸多诗句中,《礼记·儒行》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左传》的“临患不忘国,忠也”,《离骚》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等,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淡泊明志的品德。爱国是一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情感,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等,他们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和艰难困苦关头,用生命和汗水捍卫国家尊严。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操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启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导他们传承与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其个人前途与报效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实现进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二)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激发大学生奋发有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必备品格。《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告诫人们要坚定志向、矢志不渝。《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警示人们在富贵、贫贱、强权等形势下都要坚贞不渝、自强不息。司马迁、韩信、戚继光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是自强不息的代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表达了他们在逆境困顿中不屈不挠、发愤图强的优良品质。传统文化中的众多谚语和神话故事也体现着自强不息、坚定不移的良好品格,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这些传统文化瑰宝激励着中华儿女积极进取,砥砺前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大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在升学深造、职业规划与发展、个人情感等方面遇到困惑挫折。“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是“苏门四学士”张耒教子诗中的一句,他告诫儿子,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意志坚定,自强不息,不可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面对学业和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唯有保持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在逆境中愈挫愈勇,获得进步与提升。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礼诚信引导大学生崇德忠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代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基础,是促进其全面发展的前提。《礼记·祭统》有言:“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而追求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经典诗词论述了诚信的重要性,比如《礼记·儒行》言:“儒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周子全书·通书·诚下》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众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诚信典范,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公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土山三约”“夜读春秋”等典故都是他忠义诚信优良品德的体现。爱国将领冯玉祥有言:“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强调了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恪守诚信。当代大学生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德失范、诚信危机行为愈显。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诚为本,言行一致,恪守诺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在学习和生活中做诚信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具有凸显示范引领作用。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分析

(一)营造文化特色浓郁的全媒体氛围

除了运用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官方网站等传播媒介外,借助抖音短视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全社会重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随着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创新公共服务、推进文化与传播是我们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在短视频媒介领域,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官方网站)于2018年3月8日入驻抖音,成为抖音首家官方政务号。截至2021年8月26日已拥有粉丝2979.2万个,视频内容获赞10.8亿次。发布信息涉及国安立法、疫情防控、交通安全知识普及等内容,传播正能量。人民网(人民网官方账号)、文明中国(中国文明网官方账号)、文明西安(西安市文明办)、青春宜昌(共青团宜昌市委)等政务类抖音号、文化类抖音号相继开通,发布了诸多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频内容。例如人民网抖音号在2020年10月发布了一个名为“是什么让中国成为今天的中国”的短视频,讲述了从古至今,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从转发量和评论内容可以看出,该视频对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传承意识效果显著。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积极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营造文化传承氛围,使大学生在社会文化环境里受到热爱祖国、积极进取、诚实守信、和谐友爱、修身内省等文化传统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正能量的影响和熏陶,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引导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正确良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打造文化气息浓厚的育人环境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提出要提高学生文化修养,要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中外文学艺术经典,鼓励高雅艺术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民间优秀文化进校园。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文化资源,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在校园文化环境的塑造和建设,高校可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纳入校园文化环境的方式,加强人文景观建设,以渐进式、反复渗透的方式传播文化信息。通过校园文化墙、艺术走廊、教室展板展示古代圣贤关于学习、读书、立志、修身等方面的经典格言和励志诗句,在校园主要景观等地塑造历史文人雕像,以直观的形象展示历史文化,使大学生置身于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品味传统文化的内涵,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一方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重要建筑物、主要景观、路名都包含着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训的内涵,学校建有诗歌大道、名人名言警句墙,中华古代圣贤雕塑群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人、提升人、启迪人。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博物馆、档案馆、校史馆等场所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展览。历史名人、地方风俗民俗、地方戏曲文化以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非常具有宣传和教育意义的展览主题,通过图片、文献、文物等资料对文化资源以及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成就进行梳理记录和传播推广,达到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三) 拓展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内容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校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和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提升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实现内容融合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教师要主动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素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知识在课堂教学、与学生讨论交流中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跨文化对话法、经典诵读法、榜样模仿法等方法^[5]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是当代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高校思政教师要提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课程教学的能力,善于开拓两者结合的创新性路径。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培养和激发大学生的精神力量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重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其深厚的人文内涵,正是可以从内在力量上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支持和引导。“培养什么人”,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要问题,我国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深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高尚品德与真才实学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中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信念、民族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知行统一、人格修养等方面的思想价值,着力掌握其核心理念,积极探寻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通之处。在课堂常规教学中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引入有启迪价值的经典案例,在通识课程中设置传统文化专题教学,重视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开拓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将历史上文人志士的“矢志报国、自强不息、坚定不移、诚实守信”等宝贵的精神和信念通过教学传达给大学生。在此基础上,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

引导大学生讨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照反思自身情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答疑解惑词汇当中,有针对性地回应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和当今的话语结合起来,做到教育入脑入心,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内化为大学生的信念和操守,外化为其行为准则,助其筑牢精神之基。

(四) 重视突发公共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

无论是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还是校园内的突发事件,因其突发性,事件规模、程度、性质以及产生的后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事态蔓延速度快,信息交互程度高,防控难度大,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强烈的冲击和影响。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要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予以预防和处置,其中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守望相助精神,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英勇战斗精神,顾全大局、壮士断腕的“一盘棋”精神,舍生忘死、逆行而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心、勇于胜利的积极乐观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体现。在疫情防控志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忙碌在返乡人员信息调查、密切接触者信息完善、社区临时出入证办理、全民核酸检测协助等工作中,表现出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针对突发事件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引导,高校可创新地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突发公共事件中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将抗疫事例作为教学案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社会关怀、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和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大学生因社会阅历、知识储备等方面的限制,易出现思维和认知局限,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融入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方面的精神和内容,突出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法制教育、个人意志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在教育中重点关注其思想动态和心理情况,做好大学生的认知引导和人格培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EB/OL]. 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2014-02-25.

(下转第 111 页)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再思考

王双成¹, 孙浩冉^{2a}, 魏振枢^{2b*}

(1.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人民政府, 河南 郑州 451450; 2a.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b.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对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第四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事实证明,不少评论切中利弊,颇有些价值。但深感意犹未尽,对本著作再次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例如,教材内容要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要及时更新陈旧内容,及时出版新版教材,或者要有新意,要符合形势的要求。

关键词:环境保护;教材;生物多样性;固体废物处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8

中图分类号:G642;X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101-06

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著作颇多,有些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从2003年第一版开始,顺延递进先后出了三版,最新的(第四版)已经于2019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1-4],反映良好。2020年我们发文对本著作进行过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5]。实践证明,这些看法和建议切中利弊,很有必要。鉴于此,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该著作,再次提出一些我们的看法和建议,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研究。

一、评论文章发表后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1.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要科学、要立法、要从实际出发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形成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大量的中小城镇不断涌现,在这个过程中,各地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制定出科学可行的规划并实施之。只有进行科学实用的规划后,才能呈现出一个环境优美、简洁大方、宜居宜行宜就业的和谐优美环境。

以郑州市的市政建设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郑州市的市政建设方面存在许多短板。需要下大力气整改才能建造出市民满意的生存空间。郑州这些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在市政建设上却存在许多短板问题。拆墙透绿、交通导引护栏的建设不能根据当

前具体情况,过度盲目改造,已经引起不必要的混乱。郑州市的紫荆山人民广场内(包括紫荆山公园内部)把所有的院墙和过去建设的隔离栅栏拆除,致使各类自行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随意出入,乱停乱放,堵塞通道,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同时使一个休闲健身的安静场所乱成一团。有些街区的小道,只能允许两辆车对向而行,如果中间有交通导引隔离护栏的话,就能基本满足道路错车正常顺畅通行。事实是许多地方把护栏拆掉,马路的一边(甚至两边)有乱停乱放的汽车堵塞道路,形成拥堵。

郑州市的汽车保有量非常大,截至2021年8月底已经达到493.8万辆,处于全国第六位。应该在市区各地尽可能多地建设停车空间,加以整修利用,以便于解决一部分交通拥堵和汽车临时停靠的问题。紫荆山立交桥下,原来有多个停车场,可以停放100多辆汽车,对于疏通周边交通、群众出行很有好处。但是,2021年8月份的改造中,将立交桥下翻整成为简易的绿化带。立交桥下多出一个绿化带,作用不太明显,倒是少了一个非常必要的停车场,致使其周围乱停乱放的车辆增多了,造成周边的拥堵,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主干道中间的护栏在还能够使用的情况下,就频繁更换,高的换成矮的,护栏结构形状有些变化,加上花篮或者花盆等等不一而足,造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王双成(1969—),男,河南中牟人,化工工程师,现为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人民政府技术干部。

通信作者:魏振枢(1948—),男,河南镇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成浪费。

郑州市在 2021 年的 720 大雨灾情之前,正在大搞十纵十横道路改造工程及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工程。各个大街小巷都一直在建花坛,临街各个小区院墙或护栏网被一一拆除;不顾原楼体建筑风格的个性,强制包裹隔热层,并粉刷外墙,劳民伤财。前些年搞人行道隔离栏上挂花盆,几乎所有的街道隔离栏上都挂满了花盆或类似花盆花池的东西,种上草本花卉,每天都有绿化工人开着小型洒水车为这些花卉浇水,坚持了半年多,最后种的花儿都死了,浪费多少钱!有些街道景观树更新完毕不久,却又把原来栽好已经成活的树木挖掉,重新栽上另外一个新树种。曾经轰轰烈烈的海绵城市建设热火朝天!理论上可行,但具体到施工效果如何?不是哪个人说了算,应该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而后再视情况进行大面积推广。否则,一场大雨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竣工验收”。郑州“720 大雨”造成下水道堵塞,不能顺利排水,因此很多家属院和马路边上的各种房屋进水被淹。可以发现,各条道路上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总是把大路上的垃圾杂物有意清扫到下水道里,形成堵塞。在郑州大雨过去约 10 天左右,笔者就见到马路上原来疏通过的下水道又被杂物堆满了,这就是制度上存在不能统筹管理的弊端。如果马路路面的清洁和下水道的通畅捆绑在一起统一管理评价,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2020 年河南省 GDP 总量 54997 亿元,居全国第五位,但是常住人口 9640 万人,人均 GDP57051 元,仅占全国第 18 位(处在河南省后边的基本上都是西部边远省区和东北地区)。2020 年郑州市 GDP 总量 12003 亿元,人口达到 1260 万人,居全国第 8 位,但人均 GDP95262 元,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仅处于 44 位,因此郑州市的工资水平并不高,生活待遇也不是很好,退休工资更是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处于中下等水平。消费水平却不是很低,很多年轻人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留在郑州就业有些犹豫和彷徨。郑州市仅有的这些市财政收入不能科学地用于提高收入水平,而是花在没有科学计划的市政建设上,造成浪费,这可能会带来长远的短板效应。

2. 建设和谐社会,要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可盲目增益高层建筑

此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类大小城镇纷纷开发建设高层建筑,楼层越建越高,并且外观设计五花八门,奇葩外形频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150m 以上的建筑达到 2395 座,200m 以上的建筑达到 823 座,300m 以上建筑达到 95 座,三项指标均居

全球第一。由于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不少危急事件。深圳赛格广场坐落在深圳福田区,建成于 1999 年,是唯一由中国自行设计和总承包施工的高智能超高层钢管混凝土结构建筑。位于深圳市交通干道深南中路与华强北路交汇处,采用框架筒体结构,由深圳赛格集团投资兴建,是深圳市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含塔尖总高度达到 345.8m。2021 年 5 月 18 日 12 点 31 分,赛格广场租户反映,感觉大楼晃动。前不久,专家组通过对风致振动与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认为桅杆风致涡激共振和大厦(含桅杆)动力特征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大厦的有感振动。专家组认为,拆除桅杆可以有效解决大厦有感振动问题,桅杆原有的防雷、航标功能可以在桅杆拆除后在楼顶重新布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赛格广场大厦桅杆顺利拆除,已按照科学程序认定大厦结构安全,有感震动风险已经消除,但这也正好说明盲目建设超高层大楼是带来这种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另外,近些年来,不少高层建筑的火灾事故均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高层建筑的楼梯通道很高,火灾初期由于这种高层虹吸现象,能够迅速向上抽火,使其蔓延过快,不能留有充足时间快速逃生。

郑州市千年一遇的“720”大暴雨,暴露出高层建筑的诸多弊端,让高层住宅楼现出了原形。①多数大楼停水停电,停水了,就要携带盛水器物到楼下找水源,致使人们沿着楼梯(最高的高达 30 多层 100 多米)气喘吁吁地上下爬行。②由于建筑质量问题,造成室内多处下水管道、空调水管道等处有大量的水渗漏下来,把房间搞得潮湿一片,毁坏不少家居用品。③多数地下室或者车库被水淹没,停在其中的汽车被泡数日后才被拖出,造成财产损失。④很多高层建筑的输配电装置放置在地下或者地下车库中,这次暴雨使得多数小区(特别是高层住宅小区)的供电设施被水淹而无法工作。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笔者所在的小区还是处于临时拉线供电状态。

这种高层住宅的推广和普及,最初源自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了香港的住宅布局和推行措施,直观感觉高层密集型的住宅建设,可以节省土地,人员集中便于管理,“招、拍、挂”征地可以给当地的公共财政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事实证明,“招、拍、挂”带来了土地价格的飞涨,带来了资金低效率和极大的浪费,同时也滋养了一大批靠拆迁和炒房的好吃懒做的城市寄生虫,腐蚀干部队伍,致使多少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收受贿赂而犯罪判刑。当然,同时还存在

着救灾难度大、破坏文化景观、能源消耗大等诸多问题。

2021年6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1]910号)^[6]。《通知》要求,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严格限制新建250m以上建筑,不得新建500m以上超高层建筑。2021年住建部等15个部委又提出,县城要严格控制在18层以上楼房的建设。紧接着在2021年7月1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家发改委文件精神,发布《关于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1]35号)^[7]。《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强化城市总体风貌塑造、强化重点地区风貌塑造、强化建筑风貌塑造、严格管控超限和大型城市建筑、完善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制度等五项主要任务。《意见》明确提出,新建住宅建筑高度原则不超过26层,容积率不超过2.5。县级城市则要求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住宅原则上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70%,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容积率不超过1.8。我们知道,26层建筑物高度在100m左右,是目前云梯消防车能够达到的高度,如果发生火灾意外,基本上可以实现安全救护。《意见》特别强调,对于新建100m以上的建筑应相对集中布局,并与城市规模和空间尺寸相适宜,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其建筑设计方案审定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厅备案。河南省《关于加强城市电力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增强城市电网应对严重洪涝灾害能力,新建住宅小区配电房不得设置在负一层以下。中央和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必须不折不扣地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同步,才能真正提供给人民群众一个舒适美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二、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和宠物热的思考

中国十分重视外来生物入侵的防范工作,从2003年到2016年先后分四个批次公布外来物种(包括植物和动物)入侵名录,共有71种。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差异,还是有不少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大陆境内,造成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因此,大学生要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形成对生物存在区域性的正确认识,既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爱护各类动植物,还要防范外来生物的入侵,同时还要正确认识宠物热的现状及政策规范,以免对生物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

1. 全民要重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野生动植物是重要的森林资源。中国野生动物特有属种多,保护的 Task 和责任重大。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对大熊猫、东北虎、藏羚羊、朱鹮、川金丝猴、麋鹿、梅花鹿、亚洲象、扬子鳄、白鹤等十大濒危物种进行强力保护的作用下,它们存在空间有了显著的变化。国家从不同的层面加大宣传和处罚力度,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例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4个部门开展的“2020网剑行动”强调指出,落实电商平台责任,重拳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集中治理网上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严肃查处直播吃野生动物行为。这样做,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2. 对外来入侵动植物要严格管控,不能任其泛滥

中国对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一直很严格,有着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规定其中的71种外来动植物不准进入中国境内。

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能够见到很多入侵动植物品种,甚至还将其看作一种成果和荣耀。例如湖北武汉曾经出现巴西龟的泛滥,危及国家生物圈的和谐。还有群众把它当作宠物饲养,麻痹周围群众的分辨意识。开封市朱仙镇的“爱思佳农业嘉年华农庄”的展示品种中,把食人鱼作为展览用。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外环东路与明德街路西,路边花园有植物界杀手“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并有可能泛滥,这种植物如果在郑州蔓延将是生态灾难。一枝黄花和加拿大一枝黄花非常相似,前者为本土植物,无侵袭性,后者为外来物种,具有侵袭性。为避免潜在危害,绿化管养单位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将该植物进行清理,茎叶与根系全部清除并袋装运送到垃圾站深埋处理。如果对外来生物入侵失控,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灭顶之灾。

3. 关于饲养宠物的几点思考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最近10年来,每年有55000人死于狂犬病。这些病例中有95%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其中印度最多,占总数三分之一。中国以每年约两千人的死亡数量位居第二,被咬伤概率为1%~10%,被咬死概率为1‰~5‰,被咬的死因主要是成群流浪狗把人列为捕猎对象和狂犬病。仅在2021年,中国就发生多起比较严重的宠物犬伤人的事件,主要受害者多为少年儿童和老人。有些养犬人口出狂言,自认为有钱有势,不怕赔偿,有些人还自称自己的名犬比人命还值钱,等等,不一而足,形成很难处理的刑事案件。我们要认识到,饲养宠物

是一件耗时耗资、污染环境且不能显示爱心的一件事,不能过多提倡。①宠物不能在食物链中构成必须的作用,百害而无一利。宠物的食物与人类相似,与民争食。②宠物与人争空间,使人在行走时处处提防动物的突然袭击。③宠物过度发展必然会带来孕、产、养、病、葬等一系列相关事情的处理,并形成产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开支。例如一个报道曾说的,一位68岁的老太太养育的宠物,每月需要花费8万元,这样做有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钱资助贫困学生能增加很多社会的正能量。④形成社会攀比之风,以此炫富、比权势,污化社会风气。

郑州市于2007年出台的《郑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明确规定,个人携犬出户应当“携带养犬证和犬只标识、犬只束犬链,并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率领”。第七项规定,个人携犬“不得进入火车站、汽车站、广场、公园、运动场馆、游园、商场、饭店、露天餐饮夜市、影剧院、歌舞厅、浴池等公共场所”。科学治理流浪猫、狗等宠物问题,需要理智、高效、配合,才能收到效果。①教育广大群众,认识到宠物伤人,玩宠物丧志。人类社会,以人为本。养动物不等于有爱心,希特勒非常喜欢养狗,他有爱心吗?所谓的“喜欢小动物有爱心”“经常放生很善良”等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和做法。②对于宠物(特别是狗类)圈养类别必须有规定,要大大提高养宠物的门槛,严格执行持证圈养。外出遛狗必须规定时间、路线和范围。外出遛狗必须带好束犬链。③不能豢养大型、暴烈和进攻性强的狗类,大多数豢养大型猎犬的都是比较富有、具有一定影响和背景的人,他们财大气粗,关系网硬,敢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社会上已经形成宠物代表人的身份,宠物彰显人的钱权势力,必须加以纠正。④进一步提高收养宠物的门槛和费用,使一部分确需的还要收养,例如导盲犬的推广和应用。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脱贫,但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有不少困难儿童,也许每年一二百元就可以让他们重返课堂,用于救助中西部山区和有困难的儿童则更有意义。

有关生物多样性、濒危动植物品种保护以及宠物饲养的社会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调查专题,由同学们进行实地调研,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何适应社会的需求,如何正确看待“生物多样性”“外来入侵生物”“宠物热”等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垃圾分类问题应该引发深层次的探讨

早在1972年,德国就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

并于1986年改名为《废弃物避免及处理法》,在其中引入了垃圾分类、减量与回收利用。20世纪80年代,日本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并强化实施,例如琦玉市把垃圾分为20多类,并规定出各类垃圾的投放回收日,以上这些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需要国家集中谨慎处置。从国内外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几方面的效益。

从《环境保护概论》的第一版到第四版可以看到垃圾分类与处理内容的变化过程,并均已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2003年的第一版中,只是说明用简单的方法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处理的主要是采取填埋和焚烧的方法。在当时条件下,由于选择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的地址问题发生过多起纠纷事件,造成社会一些不稳定性。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明确论述了固体垃圾分类处置的重要性,随后逐步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部门的规章制度。2007年的第二版是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开始对固体废物的防治给予足够的关注,开始重视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问题,并且把生活垃圾初步分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类。分类回收预示着分类后要充分利用,并且提出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的三大技术政策,即无害化技术政策、减量化技术政策和资源化技术政策,这是一个明显而巨大的进步。2015年的第三版延续了前面两版的基本内容,没有其他大的变化。2019年以来,各省和中心城市纷纷出台相关规定,把垃圾分为四类进行规范化的回收处理。这个问题在第四版的《环境保护概论》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包括其中第六章的阅读材料)。2020年9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把城市垃圾作为专门的《第四章》43~59条加以详细的论述和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全民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认识。当前,我国在垃圾回收利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垃圾回收的重要性。不乱扔垃圾,并分类

收集,这个工作要从娃娃抓起,幼儿园到小学的初期教育就必须强化。通过参观、实践和各种社会活动,使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并从中获得各种知识,教育广大群众形成资源的多次重复利用的观念,克服过度追求享乐、不切实际地贪大媚洋。有些人不考虑自身的经济收入状况,追求大排量的国外知名品牌豪华汽车,而且更新换代过快。有些过分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的奢侈用品,并且不合自己需求时就随意丢弃。吸烟者几乎没有人把烟盒及烟蒂投入专门存放处而潇洒地扬手一丢,造成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且路面到处都是烟头,影响市容市貌。

2. 在物流转运中,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研制出各类新型优质耐用包装产品,减少包装材料,并且实施减量先行,并配合以资源化利用活动。实践证明,减量化能够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量。物流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材料主要有电子面单/快递运单、编织袋、塑料袋、封套、包装箱(瓦楞纸箱)泡沫箱及胶带等,其中塑料软包装材料是塑料包装材料中的一个主力军。能在商店购买的物品,不要网上购买、快递传送。过多使用快递和过度包装材料,既增加了运输过程中交通工具的过度使用,又造成交通的拥堵,浪费能源。同时外包装材料产生过多的废品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给环卫工人增加劳动强度。对于快递纸箱等外包装带来的浪费与污染,回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研发新型的包装材料、减少过度包装才是更好的选择。要在物流商品品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不断探索,变换各种材质和形态,以适应国家的环保政策,同时满足物流包装的需求。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业等产品产量整体保持增长,对塑料包装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2020年,使用的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比例已经达到50%,基本淘汰了重金属等特殊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基本建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系。进一步加快推广使用中转箱、笼车等设备,使编织袋和胶带使用量进一步减少,基本建立起一套快递包装治理体系。

人们必需的蔬菜可以要求清洗整理干净后上市,不让杂质参与流通。有计划添置家庭生活物资,不过度消费,减少无计划购物,城市不需要的各种衣被可以统一有偿收购,发往农村。有计划地组织和鼓励办好社区物质交流跳蚤市场,互相交换物件。学生之间组织物品交流大会,可以交流交换纸张、书本(含教材)、参考资料、日常用品、健身器材、乐器等。学生教材在版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廉价传递

给下一届使用,以减轻学生负担,同时为国家节约资源。国家要制定标准,对于具有很好互换性的一些设备,使物品物尽其用,多次使用,如充电器、外接电源、变压器、转换器、耳机、耳塞、各种接头等,可以节省很多原料和消费者的购买费用。

3. 科学规划好各类垃圾分类的逻辑关系,实施垃圾分类分步走,先易后难,先粗分,再精分。让群众有一个适应过程。例如,逐步推行不同颜色垃圾袋存放不同类型垃圾的工作,甚至在初期可以免费发放各类不同的垃圾容纳袋。教育群众逐步认识不同类型垃圾中的材质构成,以及可重复使用的可能性及适用范围。例如用过的湿巾纤维可能已经受损,存在二次污染风险,一般应归为其他垃圾,而不能作为纸制品回收处理。上海市目前把回收垃圾简单分为两大类^[8],厨余垃圾必须定点分装投放,以便于后期发电或制造肥料。可回收垃圾由专人分类分拣,回收利用。这样做有利于全面推广,并简单易行。对于能够科学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要实行奖励,可以奖励发放各种颜色的垃圾袋、收纳袋或者瓶装矿泉水等。

4. 充分发挥保洁人员、物质回收机构、城市拾荒者的积极作用,让他们能够对垃圾的收集处置起到应有的先锋作用。对于大量的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等五大类)进行先期的回收,这些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可以很好地回收利用。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到30亿个,方便面餐碗5亿~6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3%~7%,1t废塑料可回炼600kg无铅汽油和柴油;每回收1t废纸可造好纸800kg,节省木材300kg;1t易拉罐融化后能凝结成1t很好的铝块,其中95%可以循环使用,可少采20t铝矿;1t碎玻璃可以重新制造出2500个酒瓶;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进行堆肥处理,1t可生产0.6t~0.7t有机肥料。总之,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该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2021年9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9]发布,《通知》提出,到2025年,塑料污染治理机制运行更加有效,地方、部门和企业责任有效落实,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全链条治理成效更加显著,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遏制。在源头减量方面,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现象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1000万个。在回收处置方

面,地级及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塑料废弃物收集转运效率大幅提高;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cdot 104t/d$,塑料垃圾直接填埋量大幅减少;农膜回收率达到85%,全国地膜残留量实现零增长。在垃圾清理方面,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农村地区的历史遗留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塑料垃圾向自然环境泄漏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有关快递转运过程中,产生垃圾的回收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可以由同学们进行实地调研(包括剖析自我),分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不能有效治理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法,从而提高认识。

四、结束语

一本教材只有不断地进行总结、评价与修改^[5,10],不断地更新改版,才能使阅读者得到知识的真谛,作为用作培养大学生的一本教材,更应该起到应有的启迪作用。使阅读者能够从中认识到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国策,是世界各国都要引起重视并加以实施的重要举措,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整个地球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才能够真正生活在美丽如画的优美环境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科学简洁的总结。

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诸如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新型的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新能源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新生态垃圾(如太空垃圾)的回收与处理等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探索,使这本书真正与时俱进,成为广大群众与大学生的精神食粮。我们会继续关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各种新变化,及

时更新教材的内容,使之成为更科学更畅销的一部优秀著作。

参考文献:

- [1]魏振枢.环境保护概论(第一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 [2]魏振枢.环境保护概论(第二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 [3]魏振枢.环境保护概论(第三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 [4]魏振枢.环境保护概论(第四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
- [5]王双成,孙浩冉,魏振枢.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几点思考[J].中州大学学报,2020,37(5):104-109.
- [6]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EB/OL].(2021-06-19)[2021-08-10].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7/content_5622973.htm.
- [7]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实施意见[EB/OL].(2021-07-19)[2021-08-19].<http://www.henan.gov.cn/2021/07-27/2190307.html>.
- [8]杨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和对策浅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0(1):142.
- [9]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2021-10-23)[2021-09-16].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16/content_5637606.htm.
- [10]魏振枢,李靖靖,王炳君,等.高等院校进行环境教育问题的探讨[J].中州大学学报,2004(1).

(责任编辑 许峻)

Re - thoughts on the Textbook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NG Shuangcheng¹, SUN Haoran^{2a}, WEI Zhenshu^{2b}

(1. Zhengzhou Zhengdong New District Baisha Town People's Government, Zhengzhou, Henan 451450, China; 2a.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b. Editorial Board,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urth Edition) textbook edited by Wei Zhenshu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many comments are substantive and valuable. However, with deep gratitude, some immature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is work has been put forwarded.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should be scientific and forward-looking, while outdated content should be updated in time, and new textbooks should be published in time. Moreover, innovative content should be demonstrated so that it can cater to the demands of the tim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xtbook; biodiversity; solid waste treatment

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及未来展望

龚希丹

(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以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举办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高校网球文化建设层面,梳理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运动建设的文化属性,针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不足,从高校网球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的契合取向提出未来展望,以期对高校网球育人机制、管理模式、调动社会参与等提供借鉴,为我国高校网球运动的健康、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国网球巡回赛;高校网球文化;自创IP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19

中图分类号:G8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107-05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社会力量参与,不分年龄段,打通专业与业余网球人群的界限,面向各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巡回举办,贯穿全年的巡回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举办势必影响高校的网球活动,对处举办城市的高校影响尤为显著。高校是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人才的培养基地,网球项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时尚属性,网球文化是人类社会大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它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网球活动过程,围绕本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1]。网球文化在高校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运动效能,对拓宽高校网球文化维度和提升高校网球文化的层次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并在互联网背景下,依托高校培养人才模式,在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发展特征和特点,帮助高校探索出全新的网球人才培养渠道。

一、中国网球巡回赛概况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中国网协监管,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的全国性赛事。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P

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创立于2019年12月,尤其是在受全球疫情影响,温网取消、法网改期等全球网球氛围不景气的前提下,中国网球巡回赛于2020年开赛,全年共比赛2677场,涉及12个城市,参赛人数高达2975人次。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腾讯体育等主流媒体共同打造品牌赛事,有1000家媒体参与服务比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级别覆盖最广,品牌价值最高的体育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突出全民参与、用户体验及体育明星打造等形式,契合自创IP的特点和网球文化的普及。

二、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特点

(一)融合网球创新实践,构建真正的全民赛事

适逢中国体育协会改革,中国网球巡回赛的运营与传统赛事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网球巡回赛是在中国网球协会的监管下,完全交给社会力量参与与组织的一项全国性巡回赛事。中国目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网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全民运动才是体育更大的意义。健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全民参与,而网球项目并非我国的奥运优

收稿日期:2021-08-28

基金项目:河南理工大学202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自创IP视角下中国网球巡回赛对我国传统网球赛事运行模式影响的研究”(SKND2021-22)

作者简介:龚希丹(1987—),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势项目,对于中国运动员而言,众多国际职业网球赛事参赛门槛高,全国性网球赛事又数量稀缺,中国网球巡回赛以赛事为途径做到统筹、引领专业与业余及高校网球团体,既与国际接轨,又具备中国特色、开放包容的大型网球赛事平台。打通职业与业余之间的壁垒,除专业运动员外,使更多的业余选手参与进来,普及网球运动,实现全民参与网球,是世界网球运动发展的大势所在,也是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办赛初衷。中国网球巡回赛根据技术等级,分为CTA1000、CTA800、CTA500、CTA200四个级别,全面吸引各个年龄层次,技术水平的爱好者参与,鼓励与支持全民参与,整合国内职业、专业、大众网球赛事资源,网球技术等级认证,丰富了国内网球赛事。

(二) 依托国际网球先进经验,促进人才培养和储备

中国虽然是网球运动普及大国,但是中国网球基础薄弱,虽然国内举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众多,尤其是男子专业运动员普遍排名较低,许多国内顶尖男子球员依旧需要依靠外卡参赛,面临着参赛难及缺乏比赛锻炼经验等问题,这也导致许多未能尽早出成绩的网球运动员过早流失,中国网球巡回赛四个级别赛事的设置,更多从专业向职业过渡的运动员有了可以稳定参与的赛事,较高额度的奖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运动员的经费压力。通过赛事积累经验、发掘潜能,给网球生涯更多的可能性,为想走职业道路的青少年选手提供一个更为流畅的从业余到专业再到职业选手的晋升之路。这对于中国网球发掘人才、留住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网球巡回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必将为普及网球运动在国内的发展提高创造极为便利的条件,也为挖掘优秀的后备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捷径。

(三) 创新赛事牌照运营,铸就中国网球原创顶级IP赛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落户中国。为争夺赛事的承办权,主办城市需要斥巨资购买国际网球组织的赛事牌照,合作到期后又要重新购买,否则赛事取消,这对赛事品牌的运营、市场运作、商业开发有较大的限制性。而中国网球巡回赛打造自身原创IP,其承办城市不用付出举办国际赛事的高昂代价。另外,以往的国际赛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不利于全国网球事业的普及,中国网球巡回赛作为一项全国性巡回赛,除一线城市外,为国内其他城市带来了更多办赛选择,拓宽中国网球版图,推动中国网球商业价值的进一

步发展。

中国网球协会在对外借鉴和学习之后,开始总结和整理自己对于网球运动的经验和探索,并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制定了与其相配套的中国网球运动等级评定制度和中国国家网球排名积分系统,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强强联手,共同主办中国网球顶级盛事,依托国家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传播力,助力赛事商业影响力迈上更高的台阶。中国网球正在开启一个全新时代,而中国网球巡回赛正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中国网球巡回赛采用全新的网球赛事体系,打通职业与业余通道,明确标准和参赛方法,创立自主所有权与自主风格的赛事资产,整合资源和激活社会参与能力,为拓展网球人才上升通道,推动城市网球发展,建立网球地标,深度融合网球产业链,如培训、教育、经济等,以网球为媒介的公益项目,践行社会责任。

三、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 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优势

1. 物质方面。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硬件资源较完善,各项运动项目需要场地器材的物质保证,网球也不例外,场地器材是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物质基础,是网球文化在高校发展必要条件^[2]。高校具备利用自身经费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建设和维护网球运动场馆良好态势。从网球场地的数量、类型和设施条件优于其他部门,能够保证日常教学与训练。网球运动在高校属于潜优势项目,中国网球巡回赛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及与专业选手交流的机会,刺激高校网球竞技水平的提升、网球项目的普及以及网球文化的建设。

2. 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观念形态的转化成为硬壳外壳的支撑,高校校园体育制度文化建设是高校实施各项体育工作和进行体育文化宣传及交流的重要的组织保证^[3]。高校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及相应的体育法规和政策规定,高校系统内每年也有体育工作单位的综合考核、个人考核制度等,这些制度保障了高校各部门之间有序、协调的发展。另外,高校有相应的网球课程设置、制定了网球训练制度,设立网球协会、体育部等学生社团,具备有组织的参与进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竞赛活动和赛事组织的能力,充分发挥大学生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部门的功能,同时组织体育专题讲座,举办各种网球技能、裁判培训班,开放体育电视录像,欣赏网球比赛等,丰富高校网球活动教育形式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高校网球文化建设水平。

3. 精神方面。网球运动的文化属性优势突出,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赞誉。高校开展网球运动及竞技类比赛得到社会、高校、学生群体的广泛认同。当代大学生是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活跃,积极勇于探索新鲜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真正理解网球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赋予了重要责任与使命,成为大众网球文化传播的主体^[4]。高校学生的德智水平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对网球运动的认识程度高,在学习网球技战术、对网球文化的解读、赛事的运作等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网球巡回赛从赛事的运作、策划、营销及宣传方面要求大量的专业人员参与,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培植学生成为网球事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二) 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劣势

1. 物质方面,训练经费不足。高校网球水平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管理,校级比赛奖金较低,多数高校采用自负盈亏的模式,部分高校借鉴国外高水平运动队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向社会、企业寻求经济支持,多元化经济投入,将利益最大化,突出共赢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为高校建队模式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5]。这样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知名高校与地理优势突出的省份有其优越性,而竞技水平相对较弱的普通高校或发展较为缓慢的省份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难度较大,难以在比赛成绩与社会影响力方面达成共赢,发挥不出体育赛事的社会性功能,从而阻滞高校网球运动的发展。中国网球巡回赛共设立 20 余站,从地理位置上看,举办城市偏南方较多,这就造成区域化差异,南方的高校参赛机会较多,尤其是举办城市与相邻城市的高校,而距离举办城市较远的高校参赛成本较高,由于高校网球赛事的社会力量参与较少,品牌赞助,尤其是网球项目非优势项目的高校,训练及参赛经费难以充分保障,势必影响高校网球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2. 制度方面,参赛机制不完善。相比较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与参赛制度,高校学生多以学业为主,学生训练与参赛机会少,高校间的网球交流的机会较少,高校学生能参加的比赛多是以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为风向标的省、市(州)内的锦标赛以及赛区间的分站赛,受参赛名额和资金的限制,高校学生参赛机会微乎其微,且参加锦标赛的高校多注重比赛成绩而忽视了运动员的长远发展与运动潜力挖掘。另外,对高校原有的奖励和资助制度冲击较大,传统的校际比赛多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由学校包揽运动员与比赛相关的各类费用,中国网球巡回赛属于

单项比赛,根据比赛水平由低到高设立了 4 个级别,即 CTA200、CTA500、CTA800 和 CTA1000,每个级别的比赛都设立了分站赛和总决赛,总奖金高达 1440 万元,远远高于校际比赛和业余比赛的奖金,对高校原有的参赛制度、奖励和资助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

3. 精神方面,文化宣传目的不一致。高校网球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氛围于有形与无形影响着广大师生。学校组建网球队希望通过培养优秀竞技人才来提升本校竞技水平和学校知名度,教练员希望留住好苗子来提升自身地位和展现个人执教能力,学生运动员本身更是希望竞技水平来完成学业要求,更好地择业^[6]。总而言之,高校网球运动功利性太强,对于投入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建设期望值并不高。网球文化的育人价值在高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网球教师反映,网球课程实施中普遍存在重网球技术教学、轻网球文化教育的现象,既未能充分发挥网球文化在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完美人格和精神气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未能有效依托网球文化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培养他们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7]。文化一旦失去传承,势必将影响校园网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的协同发展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推出的,由政府主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P 赛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完善,我国网球运动朝向产业化、社会化的推进,从赛事筹划、调研、运行及后期的评估都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人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鼓励与引导高校学生参与网球赛事活动,实现校园领域的“全民健身”计划,也体现了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教育理念的契合,烘托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与高校学生有直接关系的国内最大规模的巡回赛事,除了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参赛机会外,还可以提供实践、工作的机会。随着中国网球事业的规模化、特征化,中国网球巡回赛除了不限参赛名额,不设参赛门槛外,还是向国际网联(ITF)报备运动员积分的唯一有效途径,为高校网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文化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效果,高校学生以运动员或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到中国网球巡回赛中,将高校文化渗透到网球赛事中,使专业运动员近距离感受高校文化的氛围,对专业运动员、教练员甚至管理部门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冲击,同时,高校学生感受运动员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对其身心品质的

塑造具有积极意义,做到高校文化与竞技体育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诉求及健身意识的提升,使我国全民体育事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开展必将提升人们对网球项目的认知度及提升业余网球的竞技水平。高校则可以由体育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专门人才为出发点,进行课程开设与制定。高校学生则可以选择赛事开发与运营、体育品牌的打造及社会体育指导等顺应市场需求的相关职业,也可以为网球事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保障。另外,也可以为专业运动员退役后提供就业市场,实现人才的保留与开发。

合理运用社会和企业的资金,利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相比较高校间的锦标赛,中国网球巡回赛有主流媒体和 APP 转播,在宣传途径多元化的环境下,高校学生参加中国网球巡回赛可以为资助企业和单位提供宣传效应及商机,高校与社会力量达成共赢,从而调动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推动高校网球文化的建设。另外,大学生已具备品牌意识与消费能力,企业品牌效应影响也会随着学生的成长带来长期利益。

五、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未来展望

现阶段网球赛事在我国发展火热,在政府引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背景下,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开展,势必对我国赛事运行模式、规章制度、政策方针的优化带来积极影响,成为体育赛事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及文化功能最大化的发展动力,对高校网球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积极影响。

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举办,势必协调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营造良好的物质文化氛围,较高竞技水平是取得成绩的保证,在丰富的物质保障下,组建与发展高水平网球队,以寻求竞技网球运动在高校发展道路上既可以增加运动群体基础,又可以适度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体育人才,此种模式可谓利大于弊。利用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主流媒体与 APP 转播,对参与的社会力量进行宣传,营造商机,从而引进更多优质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资金保障的基础上,高校通过对教练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场地训练体系的完善,学生网球竞技水平的提高,鼓励学生多参加比赛,清晰投入与产出的分化,便于高校网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参照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等级制度将高校网球赛制、级别、目标合理定位,从而健全高校网球运动发展及赛事管理机制,推进高校网球文化

建设,将网球文化的社会功能最优化。

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网球巡回赛的自主 IP 的特点,将对高校网球健全网球文化与育人体系有积极的影响。高校网球文化氛围影响大学生的网球行为,通过参加中国网球巡回赛提高大学生的网球认知水平,对体育赛事的全面理解,利用网球赛事运行、素质培训、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激励和引导更多大学生参与网球运动,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就业机会。学校方面则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为出发点,从课程开设、培养方案修订、学生实践与管理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育人和管理制度,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淡化学生的就业危机,从而将高校育人功能与社会服务效能融合发展。

精神文化方面,任何对于体育文化的研究,如果不首先考虑其对于人类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实际效果,必然会陷入形而上的误区^[8]。中国网球巡回赛利用社会力量的大量参与,主流媒体的宣传,大大提升了体育赛事的透明化,然而公平正义和规则至上是竞技运动的灵魂所在,将公平正义和尊重规则的理念植入到学生的意识中。不仅仅将中国网球巡回赛看作是一项赛事,更应当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生活方式和精神载体。通过参与中国网球巡回赛,培养学生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和蓬勃向上的人生观,改变高校学生的认知,用网球精神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培养高境界的网球运动人才为目的,重点打造参与者的思想文化机制内涵,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球文化的导向凝聚功能、整合创新功能,全面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使高校在强劲而深厚的文化动力中获得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邵峰. 对中国网球思想层文化的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0(3): 15-17.
- [2] 田小健. 高校竞技网球运动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契合的 SWOT 分析及对策研究[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7(3): 87-91.
- [3] 康亚. 文化强国背景下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诊断与提升策略[J]. 当代体育科技, 2019(9): 164-165.
- [4] 吉建秋, 陈颖川. 高校高水平网球运动规范化运行的体制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2(2): 44-46.
- [5] 汪凌. 城市文化视野下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建设研究: 以杭州市高校为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1(6): 105-107.
- [6] 王东. 高校网球运动的发展模式研究[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6): 92-94.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ennis Association (CTA) Tou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nnis Cultur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GONG Xid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CAT Tour on the tennis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like documentary, expert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SWOT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nnis culture level, it analyzes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CAT Tou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tennis sports. Targeting on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college tennis culture construction, it analyzes college tennis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It integrates CAT Tour with College tennis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college tennis culture construction. It hopes give some references for college tennis education mechanism, management model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a healthy,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ennis.

Key words: Chinese Tennis Association (CTA) Tour; college tennis culture; self-made IP

(上接第 100 页)

[2]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EB/OL]. <http://edu.people.com.cn/GB/n1/2017/0831/c1053-29506412.html>, 2017-08-31.

[3]李阳,曾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暨“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综述[J].孔子研究,2021(1):155-158.

[4]刘广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探析: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J].职业技术,2021,20(3):71-75.

[5]杜钢.当代中国教师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J].当代教育科学,2015(19):34-3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ZHANG Y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ed of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resource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 cultu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cultural atmosphere,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and content,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in public emergency, so as to materializ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功能性 MOFs 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研究进展

李玉玲, 范景珊, 王迎欣, 刘滢洁, 张 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近年来,人类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各大制药公司研制生产的抗生素通过废水、食物和生物富集等途径流入环境中,长此以往会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简称为 MOFs 材料,该类材料的优势是比表面积较大,合成条件温和,污染小,质量轻,因而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分析了常见抗生素及其去除方法,综述了 MOFs 化合物以及 MOFs 复合材料对抗生素的吸附研究进展,提出了功能性 MOFs 材料在高效吸附水体中抗生素的应用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展望。

关键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高效吸附;抗生素;研究进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20

中图分类号:TQ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112-05

随着科学技术的繁荣,抗生素作为一种生物体内的次级代谢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残留的抗生素会随着废水的处理排放和食物链被富集到环境中,最终进入到人体内并长期留存,对肝功能、肾功能和血液系统均能产生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影响,有时甚至会危及人类的生命。我国每年抗生素的使用量远远超过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常见的抗生素有氧氟沙星和青霉素等。在我国土壤和河流中采样进行抗生素检测,发现能检测到的抗生素含量逐年升高。因此,急需开发一类去除残留抗生素的材料。

1 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

1.1 结构特点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是一种具有分子内空隙的有机-无机杂化的材料^[1],简称 MOFs(Metal-Organic Frameworks)材料,由金属中心配位金属的阳离子或有机离子簇和有机配体组装聚合反应而构成,是一种具有周期性的晶态的多孔材料^[2]。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有以下特点:

(1)孔结构可控。模块特征可以实现拓扑结构和功能位点的合理设计和剪裁,多元的合成可能会得到拓扑结构相同但功能不同的晶体材料,其孔隙率高、结构可设计调控,结构功能具有多样性^[3]。

(2)比表面积大。恰当地改变金属和有机配体的类别、金属和有机配体的配位方式以及有机配体的长度等,可以有效增大其比表面积。

(3)材料结构和应用功能多种多样。由于构成 MOFs 的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种类繁多,可以通过改变金属化学离子与有机配体的结构种类及化学配位关系形式、有机配体的配位长度及结构修饰、合成材料条件及应用方法等,使构成的 MOFs 合成材料的化学结构多种多样,从而具有不同的应用功能。

(4)具有空缺的金属位点。在制备 MOFs 的过程中,由于水、乙醇、DMF 等溶剂的引入,金属离子未完全与有机配体配位,溶剂小分子会参与配位。通过加热、超声等技术手段可以去除金属溶剂中的小分子,形成空缺的金属位点,可应用于与溶剂吸附

收稿日期:2021-10-22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201106800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911068027);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30041048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20180115)

作者简介:李玉玲(1979—),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MOFs 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质料相结合,从而大大提高材料的吸附效果。

1.2 吸附性能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MOFs材料具备良好的吸附性能。该类材料具有以下优势:(1)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容易调控的孔尺寸,可容纳大量的小分子,具有较高的吸附分子能力;(2)组成结构成分(其中包括无机晶体构建连接模块和有机构建连接物)直观可调,可将各种有机官能基团直接引入一个MOFs的整体框架结构中;(3)MOFs的结晶性不仅有利于框架结构的直观表征,而且可以显示更好的结构重复性和吸附结构行为。通过不断改变有机配体和复合金属有机离子的结构种类以及与其配比方式,迅速获得理想的复合金属有机配体框架结构材料。MOFs内部为金属骨架构建,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之间不同的配位方式决定着其内部孔隙的不同,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吸附能力^[4]和催化能力^[5],具有极高的研究应用价值。因此,MOFs材料作为当前研究热门的新型有机化学材料,以其特殊的多孔结构在抗生素吸附运载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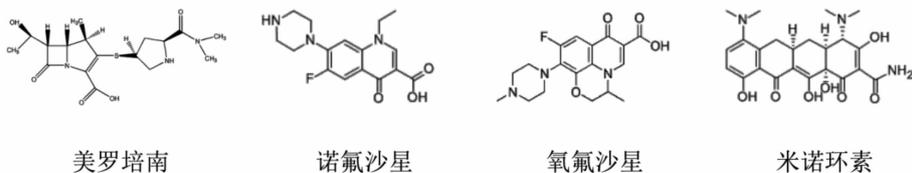


图1 部分抗生素的化学结构式

2.2 水体中的抗生素简介

水体中抗生素来源主要有:工业废水、人类生活用水及兽类残留的抗生素。抗生素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含有多种难以降解的生物毒性物质,它们能够抑制废水生化处理中微生物的生长。LUO等^[10]检测到土壤中四环素类抗生素含量在 $19 \sim 144 \text{ g} \cdot \text{kg}^{-1}$ 。在淡水养殖业中使用的能够促进水产养殖的抗生素,如果添加过量就会残留在水体中,导致水生生物疾病,从而使水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影响人类健康。有人检测了英国污水处理厂的排出水,发现甲氧苄啶含量为 $0.27 \mu\text{g} \cdot \text{L}^{-1}$,红霉素含量为 $0.18 \mu\text{g} \cdot \text{L}^{-1}$,磺胺甲恶唑含量为 $0.05 \mu\text{g} \cdot \text{L}^{-1}$ 。

2.3 水体中残留抗生素的去除方法

据文献调研,目前能检测出的水中抗生素浓度一般在纳克和微克之间,比较有效地去除抗生素的两种方法是物理吸附法和化学降解法。物理吸附法的优势是方便快捷、经济有效,目前关于抗生素的物理吸附法的研究,报道较多的是用多孔材料,如水凝胶、活性炭和一些高分子聚合材料等^[11-14],然而具

潜力。

2 水体中的抗生素

2.1 常见抗生素的分类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抗生素有四环素类、喹诺酮类和 β -内酰胺类等。四环素类抗生素^[6]是一类广谱抗生素,具有十二氢化并四苯结构,不易溶于水和酸碱两性物质。喹诺酮类抗生素^[7]是人工合成的抗菌类药物,基本结构单元为6-氟-4-喹诺酮-3-羧酸,常见的喹诺酮类抗生素有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和洛美沙星等。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8]的结构中都具有一个四元环的 β -内酰胺环,包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和其他的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苷类抗生素^[9]也是一类水溶性较好的碱性抗生素,含有两个或多个氨基糖,包括天然氨基苷类(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和半人工合成氨基苷类(阿米卡星、奈替米星)。磺胺类抗生素是一类合成抗生素,属于两性化合物。部分抗生素化学结构式如图1所示。

有不同孔道尺寸、孔隙率和活性官能团的多孔材料,其吸附效率差别很大。因此,寻找对抗生素具有较高吸附性能的多孔吸附材料是当前研究热点。化学降解法包括化学氧化、生物降解和光降解等,由于其操作方法复杂,不如物理吸附常用。

3 MOFs应用于水体中的抗生素研究进展

OLAWALE等^[4]选用谷氨酸和 Cu^{2+} 制得了 $[\text{Cu}(\text{Glu})_2(\text{H}_2\text{O})] \cdot \text{H}_2\text{O}$ MOF材料,晶体结构为正交晶型,铜离子采取的是八面体的配位构型,包括来自谷氨酸的4个氧原子和来自谷氨酸胺的1个氮,其MOF框架图如图2。SEM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具有吸附多孔性。研究该MOF对抗生素环丙沙星(结构如图3)水溶性药物的吸附性能,结果表明,该MOF材料在pH 4.0的水溶液中对环丙沙星药物的吸附量为 $61.35 \text{ mg} \cdot \text{g}^{-1}$ 。LI等^[5]发现,由ZIF-8结构衍生的含纳米多孔碳能够有效去除环丙沙星,吸附量高,可达 $416.7 \text{ mg} \cdot \text{g}^{-1}$,可见MOFs材料衍生出的纳米多孔碳很有可能成为去除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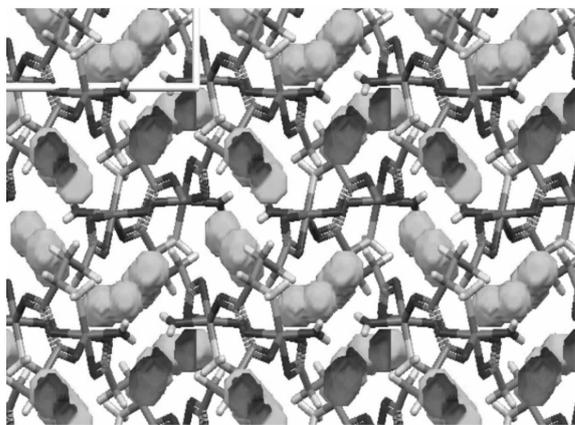


图2 $[\text{Cu}(\text{Glu})_2(\text{H}_2\text{O})] \cdot \text{H}_2\text{O}$ 的三维框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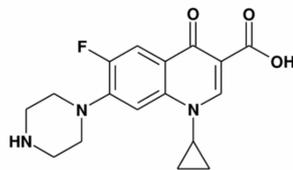


图3 抗生素环丙沙星的结构图

CHEN 等^[15]研究了 UiO - 66 对盐酸四环素 (TC) 和卡马西平 (CBZ) 的吸附性能。研究结果显示,该 MOFs 材料对这两种抗生素的吸附方式不同,对 CBZ 主要为物理吸附,而对 TC 主要为化学吸附。两种吸附过程具有不同的吸附位点,具体的吸附位点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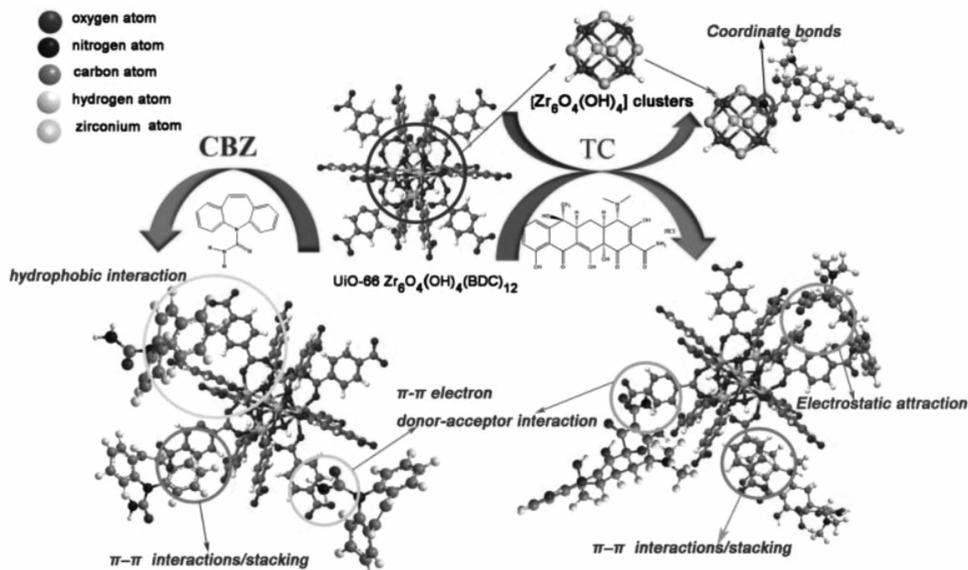


图4 UiO - 66 吸附卡马西平 (CBZ) 和盐酸四环素 (TC) 吸附机理示意图

梁春红^[16]将 ZIF - 67 进行碳化,制备出 Co - NPC 材料,合成过程如图 5 所示。该研究探究了 Co - NPC 材料对水溶液中抗生素氟诺沙星 (NOR) 的吸附性能,发现 30 °C 时 Co - NPC 对 NOR 的吸附量为 $414.8 \text{ mg} \cdot \text{g}^{-1}$,且该 MOF 材料的循环性能良

好。该研究还探究了 Co - NPC 材料对 NOR 的其他初始浓度的吸附性能的影响。如图 6 所示,当起始 NOR 浓度低于 $80 \text{ mg} \cdot \text{L}^{-1}$ 时,吸附量与 NOR 浓度呈正比例关系;当起始 NOR 浓度大于 $80 \text{ mg} \cdot \text{L}^{-1}$ 时,继续增加初始 NOR 的浓度,吸附量没有明显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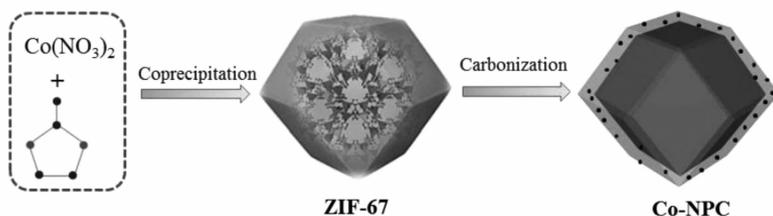


图5 Co - NPC 材料合成示意图

与传统的实心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相比,近些年研究较多的多壳层 MOFs 材料更利于客体分子的吸附和储存。张浩等^[17]通过对 4 种不同的多壳层空心 MOFs 材料的研究,得到了不同壳层的材料对土

霉素和四环素的吸附能力的测定值,且经 4 次测定后晶体仍拥有良好的结构特征(见图 7 和图 8)。由图 9 可知,3 层空心 MIL - 101 对抗生素的吸附效果最好,是实心材料吸附效率的 3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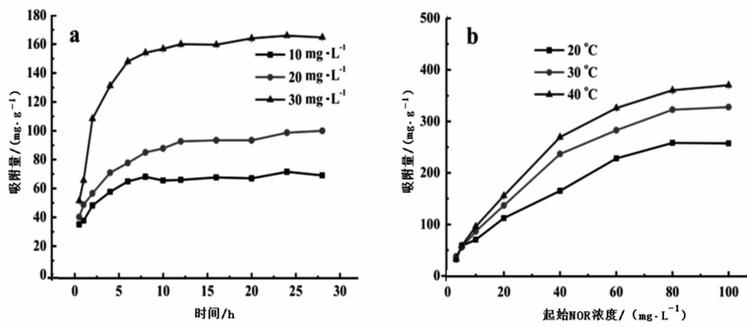


图6 Co-NPC材料在不同时间对不同浓度NOR的吸附量关系图(a), Co-NPC材料在不同温度下对不同初始浓度NOR的吸附量关系图(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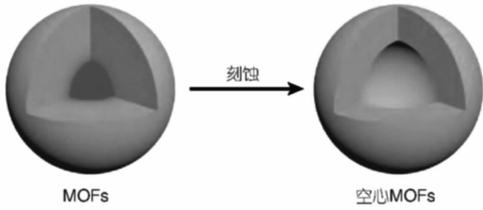


图7 空心MOFs-1材料刻蚀机理图



图8 多层空心MOFs材料吸附水体中抗生素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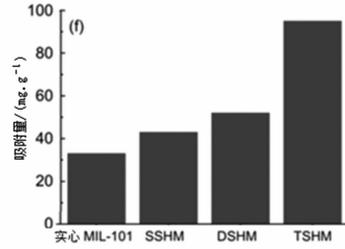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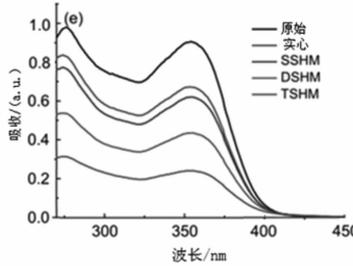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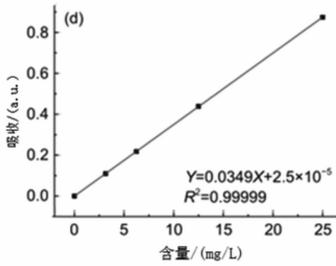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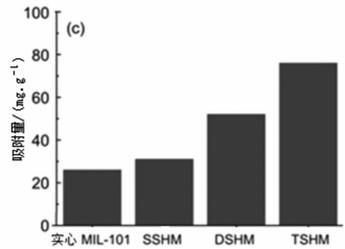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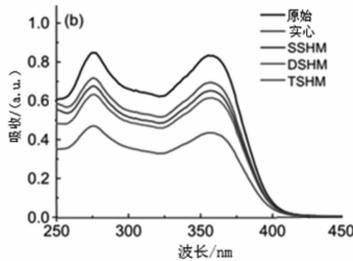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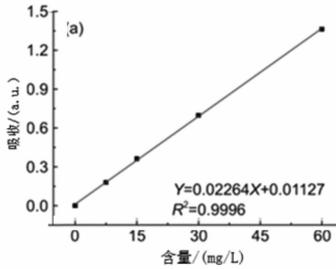


图9 水体中土霉素(a)和四环素(d)的UV-Vis标准曲线,不同壳层空心MIL-101的吸附前后UV-Vis光谱图(b)(e)和吸附量图(c)(f)

4 研究展望

MOFs材料以其特殊的多孔结构在抗生素吸附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水体中的抗生素难富集检测,MOFs材料应用于对水体中抗生素的吸附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对特定抗生素进行定向制备MOFs吸附材料,不断探索提高MOFs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吸附效率,为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LI Y L, ZHENG L P, NIE H,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 sorption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one dual functional

Zn(II) metal-organic framework[J].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020, 1204:427-434.

[2] 唐嘉仪, 罗佳斯, 卢帅.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吸附性能应用的研究[J]. 高分子通报, 2017(8):86-95.

[3] WANG Y F, WANG L Y, ZHOU X L, et al. Three Cd(II) complexes based on pyridine containing mercapto-triazole and aromatic multi-carboxylates: Syntheses, structures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J].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018, 1173:612-619.

[4] OLAWALE M D, TELLA A C, OBALEYE J A, et al.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a copper-glutamate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and its adsorptive removal of ciprofloxacin drug from aqueous solution[J].

- [5] LI S, ZHANG X, HUANG Y. Zeolitic imidazolate framework-8 derived nanoporous carbon as an effective and recyclable adsorbent for removal of ciprofloxacin antibiotics from water[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7, 321: 711–719.
- [6] DAGHRIR R, DROGUI P.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in the environment: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2013, 11(3):209–227.
- [7] VAN DOORSLAER X, DEWULF J, VAN LANGENHOVE H, et al. Fluoroquinolone antibiotics: an emerging class of environmental micropollutan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500:250–269.
- [8] ROBERTS J A, PARATZ J, PARATZ E, et al. Continuous infusion of beta-lactam antibiotics in severe infections: a review of its ro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2007, 30(1):11–18.
- [9] FAROUK F, AZZAZY H M, NIESSEN W M. Challeng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a review[J].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15, 890:21–43.
- [10] LUO Y, HUANG W, CHEN B, et al. Removal of tetracycline from aqueous solution by MCM-41-zeolite A loaded nano zero valent iron: Synthesis, characteristic, adsorption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J]. Hazard Mater, 2017, 339:22–32.
- [11] KHANDAY W A, AHMED M J, OKOYE P U, et al. Single-step pyrolysis of phosphoric acid-activated chitin for efficient adsorption of cephalixin antibiotic[J]. Bioresource Tech, 2019, 280:255–259.
- [12] WANG S, LI X, ZHAO H, et al. Enhanced adsorption of ionizable antibiotics on activated carbon fiber under electrochemical assistance in continuous-flow modes[J]. Water Res., 2018, 134:162–169.
- [13] LI Y L, ZHAO Y, KANG Y S, et al. Syntheses, structures, and sorption properties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with 1,3,5-Tris(1-imidazolyl)benzene and tricarboxylate ligands[J]. Cryst. Growth Des., 2016, 16:7112–7119.
- [14] LI Y L, ZHAO D, ZHAO Y,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magnetic and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metal frameworks with 2,2'-dinitro-4,4'-Biphenyldicarboxylate and imidazole-containing tripodal ligands[J]. Dalton Transactions, 2016, 45:8816–8822.
- [15] CHEN C, CHEN D, XIE S, et al. Adsorption behaviors of organic micropollutants on zirconium metal-organic framework UiO-66: analysis of surface interactions[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7, 9(46):41043–41054.
- [16] 梁春红. ZIF-67 及 ZIF-8 衍生的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吸附抗生素性能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 2018.
- [17] 张浩, 沈宇, 田丹碧, 等. 多壳层空心 MOFs 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J]. 科学通报, 2019, 64(34): 3632–363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fficient Adsorption of Antibiotics in Water by Functional MOFs

LI Yuling, FAN Jingshan, WANG Yingxin, LIU Yingjie, ZHANG Miao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use of antibiotic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he antibiotics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maj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flow into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waste water, food and bio-enrichment. In the long run, i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negativ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will bring about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beings.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aterials referred to as MOFs materials,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larger specific surface area, suitable preparation conditions, low pollution and light weigh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antibiotics and their removal methods, and mainly reviewed the excellent properties and progress of MOFs and MOFs composites for the adsorption of antibiotics. Finally,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functional MOFs in the efficient adsorption of antibiotics in water bodies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MOFs materials; efficient adsorption; antibiotics; research progress

基于分子对接研究甜菊醇、异甜菊醇 对赤霉素受体 GID1 的作用机制

张 军,王 杭,于宁康,张 珂,韩文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开发安全的类赤霉素分子,用分子对接的方法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与赤霉素受体 GID1 作用分子机制,阐明其结合自由能和相互作用关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检索文献确定赤霉素受体为 GID1 蛋白,以 GA_3 为对照物,利用 AutoDock vina 软件进行分子对接。结果表明, GA_3 、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的结合自由能分别为 -11.10 kcal/mol , -10.81 kcal/mol , -11.26 kcal/mol ,说明甜菊醇和异甜菊醇两种小分子都能与赤霉素受体 GID1 蛋白形成稳定结合,且异甜菊醇的作用效果强于赤霉素 GA_3 。

关键词:赤霉素 GA_3 ;甜菊醇;异甜菊醇;GID1 蛋白;AutoDock vina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21

中图分类号:TS2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117-05

赤霉素(gibberellins, GAs)是双萜类植物激素,是植物生长过程中必需的生长激素之一^[1-2],对植物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整个生长过程都担负着重要作用^[3]。1938年,日本植物学家数田首次发现赤霉素,至今已经分离确定了130多种,其中赤霉素 GA_3 因其分布最广、活性最强,成为研究热点^[4]。

随着“有机农业”的到来,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根据发酵工业网报道,全球赤霉素产量2016年达到480.9吨,年平均增长率为4.62%^[5]。人工合成赤霉素在工农业生产中被大量使用,所产生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EL-MOFTY等^[6]研究发现,赤霉素对小鼠肿瘤诱发率为18%(雄)和36%(雌),饲喂14个月小鼠肺中发现支气管肉芽肿;许春爽^[7]研究显示,赤霉素暴露可增加精子凋亡。因此,开发安全、对人类健康无任何毒副作用的赤霉素替代物成为重要的课题^[8]。

甜菊醇、异甜菊醇来自甜菊糖(stevioside)的双萜贝壳杉烯母环。由于甜菊糖高甜、低热,安全性好,被称为世界第三种天然糖源^[9],FDA等批准其作为饮食补充剂使用。甜菊糖(Stevioside)经酶解

或使用高碘酸钠和大量强碱处理可以得到甜菊醇(steviol),甜菊醇在酸性条件下发生wagner-meerwein分子重排,生成异甜菊醇(isosteviol),异甜菊醇也可以由甜菊糖经稀硫酸直接水解得到。甜菊醇与异甜菊醇互为同分异构体^[10],分子式为 $C_{20}H_{30}O_3$ 。OGORODNOVA等^[11]发现甜菊醇、异甜菊醇可以刺激小麦生长,增强低温抗性;张亮等^[12]研究发现,经异甜菊醇浸种处理的油菜种子发芽率、幼苗根长、叶绿素含量等明显提高;刘秀芳等^[13]指出,甜菊醇、异甜菊醇促进水稻种子发芽活性优于赤霉素作用,但是没有对刺激生长信号机理进一步探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配体-受体构效关系的建模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植物生理学、食品营养、制药等方面^[14]。近二十年来对GAs作用机制的研究,揭示了GAs信号转导机制依赖于GID1蛋白的配体结合,进而发挥作用^[15-17]。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子对接技术,以GAs受体蛋白GID1为靶点,以 GA_3 为对照物,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对赤霉素结合受体GID1蛋白^[18-20]相互作用模式和机理,探讨对接结

收稿日期:2021-10-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20B550009);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项目(22077)

作者简介:张军(1978—),男,河南淮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天然产物开发利用。

合自由能与活性相关性,为进一步开发赤霉素的安全替代物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AutoDock Vina 分子对接软件^[21]; AutoDock Tools 1.5.6 蛋白对接软件,从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官网(<http://autodock.scripps.edu>)下载; PyM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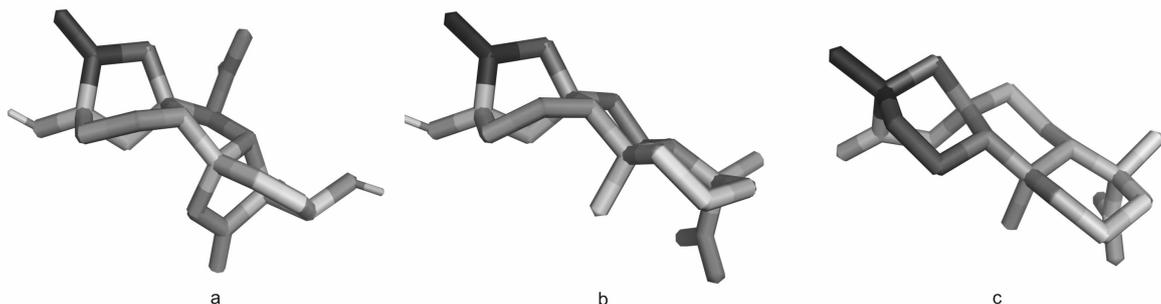


图1 (a)赤霉素 GA₃, (b)甜菊醇和(c)异甜菊醇分子结构

1.1.2 受体蛋白准备

从 PDB 数据库(<http://www.rcsb.org/>)下载赤霉素受体 GID1 蛋白晶体结构,保存为 PDB 格式。GID1 蛋白有 351 个氨基酸,来自于模式植物拟南芥。GID1 受体蛋白三维结构见图 2。

1.2 方法

1.2.1 配体预处理

对赤霉素 GA₃、甜菊醇和异甜菊醇小分子进行质子化、计算电荷等处理,并检测出小分子可旋转键(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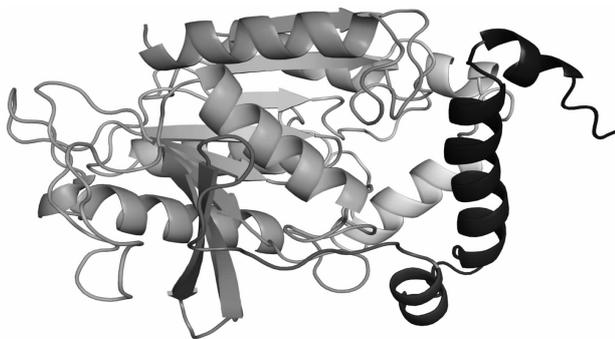


图2 GID1 三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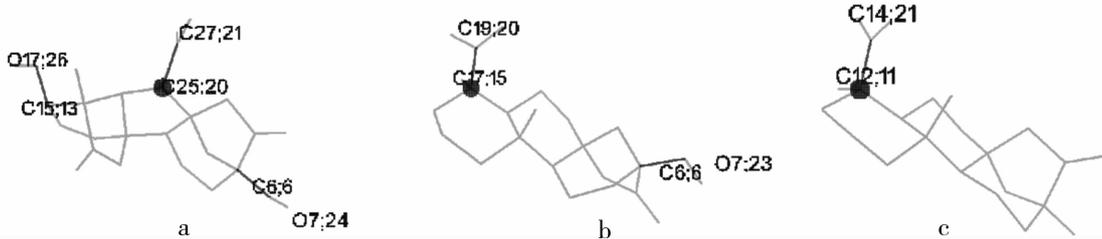


图3 (a)赤霉素 GA₃, (b)甜菊醇和(c)异甜菊醇小分子可旋转键

1.2.2 受体预处理

用 AutoDock Tools 软件在 PMV 导入 GID1 受体蛋白,打开 GID1 分子,确认其加氢、电荷计算、质子化状态,进行可旋转键的搜寻与定义,并保存为 pd-bqt 文件。

1.3 对接

根据赤霉素与 GID1 结合位点,设置对接参数:

```
receptor = D:\AutoDock\protein.pdbqt(受体蛋白文件位置) -> ligand = D:\AutoDock\ligand.pdbqt(赤霉素分子文件位置) -> out = all.pdbqt(输出格式为pdbqt) -> center_x = 52.855 center_y = 58.616 center_z = 39.571(设置对接中心坐
```

视图处理软件; LigPlot 疏水性分析软件。

1.1.1 小分子配体准备

从 zinc 小分子数据库(<https://zinc.docking.org/>)中搜索赤霉素 GA₃ (ZINC3860467)、甜菊醇 (ZINC6491272)和异甜菊醇(ZINC4044743)分子 3D 结构(见图 1),保存为 mol2 格式文件。

```
标) -> size_x = 20 size_y = 20 size_z = 20(设置对接区域) -> energy_range = 4(运算结果最大结合能之差) -> exhaustiveness = 15(运算精度) -> num_modes = 10(显示结果数),保存为 config.txt,之后运用程序语("D:\AutoDock\GID1\vina.exe" --receptor protein.pdbqt --ligand ligand.pdbqt --config config.txt --log log.txt --out out.pdbqt)进行对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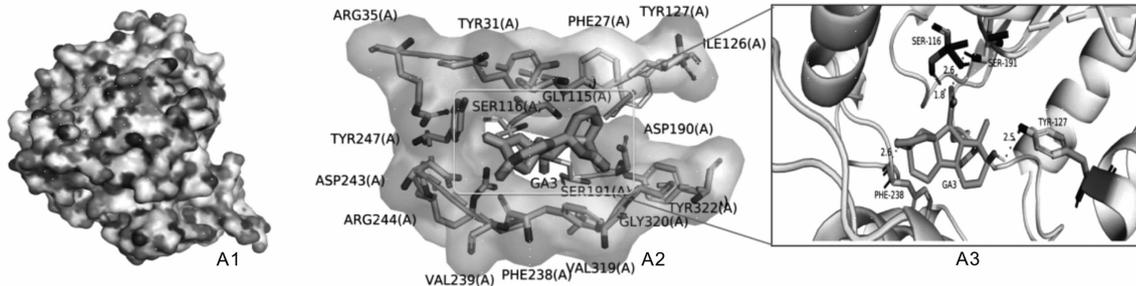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配体蛋白的对接验证

利用分子对接软件 AutoDock Vina 构建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酶的对接模型,确定并验证该条件的

准确性。图4展示了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酶的对接

模式和氢键相互作用。



(A1)GA₃ 与 GID1 蛋白结合区,(A2)GA₃ 与 GID1 蛋白口袋 ,(A3)GA₃ 与 GID1 蛋白相互作用

图4 GA₃ 与 GID1 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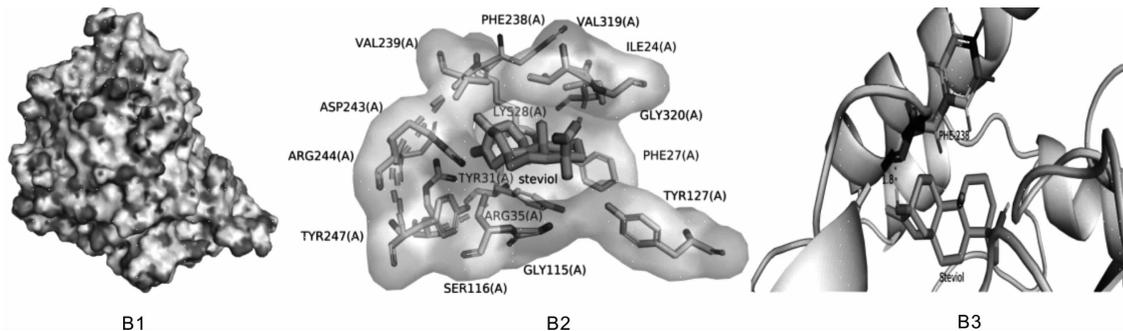
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的分子对接用 AutoDock 分子对接软件,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11.10 kcal/mol,其均方根偏差 refRMS 值为 1.36,一般 refRMS 值小于 2 就可认为小分子与蛋白质受体是有效对接^[22]。由图 4 可见,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酶能很好地结合,说明参数设置合适。把对接结果用可视化软件 PyMol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配体作用位点具体为:ILE2-4, PHE-27, LYS-28, TYR-31, ARG-35, GLY-114, GLY-115, SER-116, ILE-126, TYR-127, ASP-190, SER-191, PHE-238, VAL-239, THR-240, ASP-243, ARG-244, TYR-247, VAL-319, GLY-320, TYR-322 和 LEU-323,其中与 SER-116, TYR-127, SER-191 和 PHE-238 作用位点形成氢键作用。由此可见,对照物 GA₃ 与 GID1 的主要作用力是范德华力和氢键作用。

2.2 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配体蛋白的对接结果

为了进一步确定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的结合情况,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配体结合的本质,分别进行分子对接分析。经

AutoDock Vina 运算分析,采用半柔性对接方法,选择结合自由能最低的构象进行后续分析,得到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的最佳复合结果。

图 5 为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对接结果,表明其结合位点的位置。B1 可看到结合位点区域,B2 半透明区域表明甜菊醇进入 GID1 蛋白受体内部活性口袋,B3 表示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残基的相互作用。由图 5 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对接结果,发现蛋白活性中心点氨基酸残基中,ILE-24, PHE-27, PHE-28, TYR-31, ARG-35, GLY-114, GLY-115, SER-116, TYR-127, SER-191, PHE-238, VAL-239, THR-240, ASP-243, ARG-244, TYR-247, VAL-319, GLY-320, TYR-322 和 LEU-323 氨基酸残基最容易与甜菊醇配体相互作用,其中与蛋白受体 PHE-238 形成氢键。这些位于 GID1 蛋白受体的功能域内氨基酸均与甜菊醇相互作用形成氢键、范德华力等作用力,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10.81 kcal/mol,对于 GID1 蛋白受体的抑制活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B1)Steviol 与 GID1 蛋白结合区,(B2)Steviol 与 GID1 蛋白口袋,(B3)Steviol 与 GID1 蛋白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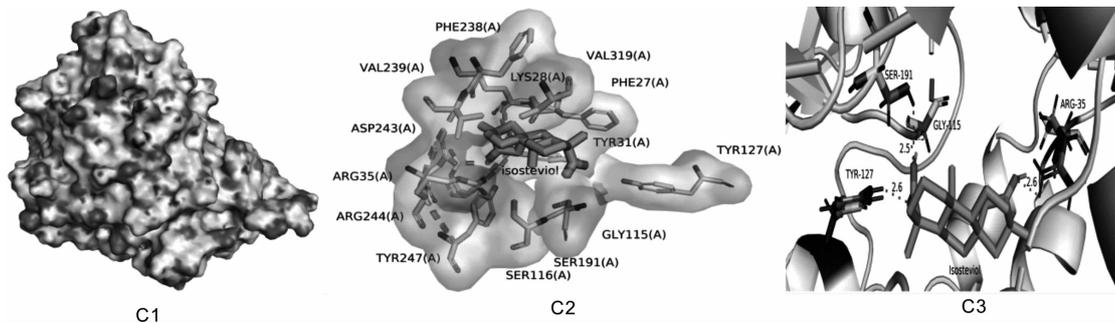
图5 甜菊醇与 GID1 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由图 6 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对接效果图发现,异甜菊醇能与 GID1 蛋白受体结合,并可以进入 GID1 蛋白受体蛋白内部,与溶剂等形成活性包裹口袋,能与 GID1 蛋白受体氨基酸形成氢键。图 6 中 C2 表明异甜菊醇与 GID1 蛋白受体活性中心点

ILE-24, PHE-27, LYS-28, TYR-31, ARG-35, GLY-114, GLY-115, SER-116, TYR-127, SER-191, PHE-238, VAL-239, THR-240, ASP-243, ARG-244, TYR-247, VAL-319, GLY-320, TYR-322 和 LEU-323 氨基酸残基相互作用,其中与蛋白

受体 ARG - 35, GLY - 115, TYR - 127 和 SER - 191 形成氢键, 这些氨基酸残基均与异甜菊醇相互作用, 形成氢键, 范德华力等作用力, 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11.26 kcal/mol。在分子对接中, 配体构象的结合

自由能越低, 构象越稳定, 与蛋白质受体结合的亲和力就越强, 对蛋白质受体可能具有的抑制活性越强^[23]。说明异甜菊醇对 GID1 蛋白的活性抑制超过了 GA₃ 的活性, 与刘秀芳等^[13] 研究结果一致。



(C1) Isosteviol 与 GID1 蛋白结合区, (C2) Isosteviol 与 GID1 蛋白口袋, (C3) Isosteviol 与 GID1 蛋白相互作用

图 6 异甜菊醇与 GID1 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3 结论

植物化学“生源的异戊二烯法则”研究表明, 赤霉素和甜菊糖都来自于同一代谢通路^[24], 二者结构相似, 都属于萜类。甜菊醇与异甜菊醇也是甜叶菊糖在动物肠道中自然代谢产物^[25], 其安全性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了解, 但其在植物赤霉素作用靶点 GID1 蛋白的作用机理方面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以 GA₃ 为对照物, 以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GID1 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作为安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可能性。

AutoDock Vina 分子对接结果表明, 赤霉素、甜菊醇和异甜菊醇与赤霉素受体 GID1 蛋白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形成氢键作用、范德华力等, 主要作用基团为羟基, 结合自由能分别为 -11.10 kcal/mol, -10.81 kcal/mol 和 -11.26 kcal/mol, 说明甜菊醇和异甜菊醇两种小分子都能与赤霉素受体 GID1 蛋白形成稳定结合, 且异甜菊醇的作用效果强于赤霉素 GA₃。分子对接技术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接结果可能有偏差或者假阳性^[26], 结果仅作参考, 是否真正有效还需通过后续实际验证。

参考文献:

[1] 王小菁. 植物生理学[M]. 8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2] HEDDEN P, SPONSEL V, LüTHEN H, et al. A century of gibberellin research [J]. *Journal of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2015, 34(4): 740 - 760.
 [3] OLSZEWSKI N, SUN T, GUBLER F. Gibberellin signaling [J]. *The Plant Cell*, 2002, 14(suppl 1): 61 - 80.
 [4] 李冬玲, 段红霞, 刘鸿晨, 等. 赤霉素及其功能类似物与赤霉素受体的研究进展[J]. *农药学学报*, 2013, 15(6): 601 - 608.

[5] QYRESEARCH. 赤霉素的产量从 2012 的 403.5 吨增加到 2016 年的 480.9 吨 [EB/OL]. (2018 - 01 - 15) [2021 - 09 - 30]. <https://www.cn-ferment.com/news/show.php?itemid=13443&page=>.
 [6] EL - MOFTY M M, SAKR S A, RIZK A M, et al. Carcinogenic effect of gibberellin A3 in Swiss albino mice [J]. *Nutrition and Cancer*, 1994, 21(2): 183.
 [7] 许春爽. 赤霉素对人精子运动力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D]. 青岛: 青岛大学, 2018.
 [8] YANG Z, WANG J, TIAN H, et al. Design, synthesis,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dynamic simulation study of novel thiourea derivatives with gibberellin activity towards *Arabidopsis thaliana* [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019, 27(20): 114969.
 [9] DYDUCH - SIEMIŃSKA M, NAJDA A, GAWROŃSKI J, et al. Stevia rebaudiana bertonii, a Source of high - potency natural sweetener: biochemical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J]. *Molecules*, 2020, 25(4): 767.
 [10] MOSETTIG E, BEGLINGER U, DOLDER F, et al. The absolute configuration of steviol and isosteviol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63, 85(15): 2305 - 2309.
 [11] OGORODNOVA U A, SAPUNOVA A S, TIMOFEEVA O A, et al. Stevioside has the maximum biological activity among natural stevia diterpenes [J]. *Doklady. Biological Sciences*, 2020, 492(1): 79 - 82.
 [12] 张亮, 李玉婷, 夏文静, 等. 盐胁迫下异甜菊醇浸种对油菜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J]. *福建农业学报*, 2020, 35(8): 883 - 890.
 [13] 刘秀芳, 黄曦, 徐汉生. 甜叶醇的结构改造及生物活性试验 [J].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1994(2): 74 - 78.
 [14] FONSECA S, ROSADO A, VAUGHAN - HIRSCH J, et al. Molecular locks and keys: the role of small molecules in phytohormone research [J]. *Front Plant Sci.*, 2014, 5: 709.

- [15] SUN T. Gibberellin – GID1 – DELLA: A pivotal regulatory module for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Plant Physiology*, 2010,154(2): 567 – 570.
- [16] MURASE K, HIRANO Y, SUN T, et al. Gibberellin – induced DELLA recognition by the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J]. *Nature*, 2008,456(7221): 459 – 463.
- [17] HIRANO K, UEGUCHI – TANAKA M, MATSUOKA M. GID1 – mediated gibberellin signaling in plants[J].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2008,13(4): 192 – 199.
- [18] YOSHIDA H, TANIMOTO E, HIRAI T, et al. Evolu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lant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115(33): E7844 – E7853.
- [19] JIANMING W, HUANG X, QIU L, et al.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genes of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in plant [J]. *Agricultur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16(11): 2406 – 2411.
- [20] 齐蒙, 李国瑞, 黄凤兰, 等. 赤霉素的代谢途径及其受体 GID1 的功能研究进展[J]. *种子科技*, 2017,35(4): 122 – 123.
- [21] VALDÉS – TRESANCO M S, VALDÉS – TRESANCO M E, VALIENTE P A, et al. AMDock: a versatile graphical tool for assisting molecular docking with Autodock Vina and Autodock4[J/OL]. *Biology Direct*, 2020;15[2021 – 10 – 02]. <https://biologydirect.biomedcentral.com/track/pdf/10.1186/s13062-020-00267-2>. pdf. DOI: <https://doi.org/10.1186/s13062-020-00267-2>.
- [22] COSCONATI S, FORLI S, PERRYMAN A L, et al. Virtual screening with AutoDock: theory and practice[J]. *Expert Opinion on Drug Discovery*, 2010,5(6): 597 – 607.
- [23] JOSEPH NAGUIB M, MOUSTAFA KAMEL A, THABET NEGMELDIN A, et al. Molecular docking and statistical optimization of taurocholate – stabilized galactose anchored bilosom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sofosbuvir absorption and hepatic relative targeting efficiency [J]. *Drug Delivery*, 2020,27(1): 996 – 1009.
- [24] GEUNS J M C. Stevioside[J]. *Phytochemistry*, 2003,64(5): 913 – 921.
- [25] KOYAMA E, SAKAI N, OHORI Y, et al. Absorption and metabolism of glycosidic sweeteners of stevia mixture and their aglycone, steviol, in rats and humans[J].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03,41(6): 875 – 883.
- [26] PAGADALA N S, SYED K, TUSZYNSKI J. Software for molecular docking: a review [J]. *Biophysical Reviews*, 2017,9(2): 91 – 10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Steviol and Isosteviol on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by Molecular Docking

ZHANG Jun, WANG Hang, YU Ningkang, ZHANG Ke, HAN Wenlo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safe gibberellin like molecule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eviol and isosteviol and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was analyzed by molecular docking method, and the binding free energy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were elucidated. Gibberellin receptor was identified as GID1 protein by searching the literature, and GA₃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substance for molecular docking using autodock Vina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inding free energies of GA₃, steviol, isosteviol and GID1 protein were –11.10 kcal/mol, –10.81 kcal/mol, –11.26 kcal/mol,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both steviol and isosteviol could form stable binding with gibberellin receptor GID1 protein, and the effect of isosteviol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GA₃.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teviol, isosteviol and GID1 protein, an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Key words: Gibberellin GA₃; Steviol; Isosteviol; GID1 protein; Autodock vina

基于机器视觉的动铁装配检测研究

李浩, 庞爱民*, 黄攀, 陈家浩, 张熙
(武汉纺织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针对自动装配线中的零件装配检测需求,以提花面板中动铁的装配检测为例,选用 CMOS 工业相机与 PLC 控制系统在装配线上搭建视觉平台。利用视觉相关理论和算法,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用 Canny 算子提取二值图中的轮廓,根据轮廓的面积及矩形度参数识别轮廓,只保留类矩形框轮廓及其中心坐标,在分析了异形零件中角点较规则零件普遍较多的特性后,提出了通过 Harris 角点与 Hu 矩结合改进的算法获得图像上的动铁 RIO 中心坐标的方法,最后计算类矩形框中心坐标与 RIO 中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是否错装,结合 Python 和 OpenCV 图形处理库编写检测软件。实验证实该检测系统准确率达到 99.7%,可实际应用于企业生产中。

关键词:零件;装配检测;视觉;Harris 角点;Hu 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6.022

中图分类号:TP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6-0122-07

0 引言

目前大批量的服饰绣花主要是用电子提花机加工^[1-2],提花龙头是电子提花机中的关键零件之一,由 8 块提花面板总成叠加而成。提花面板的装配工艺较为复杂,提花面板的组成包括动铁,弹簧,复位键,电磁铁芯,滑轮组合 5 个零件。虽已实现提花面板的自动装配,但由于装配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零件的装配会出现漏装错装等现象,其中一个零件的装配出错将会打乱整个提花面板装配线节拍,如不及时检测每个零件的装配合格性,将无法保证提花面板的装配良品率。目前的防错检测是采用人工检测,每个装配工位后都配备一个检测人员,根据装配线的节拍划分,每个零件装配完成到另一个零件的装配间隔只有 2s,检测员要在 2s 内完成对该零件装配的检测。检测环节具有高时效性,高重复性的难点,检测人员难免会出现错检漏检等现象,因此快速准确的零件装配检测十分重要。

机器视觉技术时至今日应用尤为广泛,不少业内人士都对零件装配检测进行相关研究。任永强

等^[3]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差速器卡簧装配检测系统,提出改进的快速检测圆形轮廓方法,通过判断卡簧双耳圆心距离判断装配合格与否。李勇^[4]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车门锁拉簧装配状态检测系统,分析对比了基于模板匹配和基于 SVM 检测的方法效果,得出基于 SVM 的检测准确度更高。侯天龙等^[5]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高铁白车身装配质量检测系统,提出根据像素坐标与物理坐标的映射关系实现了车身装配质量检测。吴亚渝等^[6]设计了油气悬挂液压装配检测系统,通过机器视觉和压力传感器获取工件状态信息,实现了其中几个关键工件的检测。目前国内外少有针对异形零件的装配检测相关视觉方案,本文以提花面板的动铁装配检测为例,设计了一种视觉检测系统,可有效避免人工检测过度用眼产生的视觉疲劳,长时间做单一重复性工作引发的循环工作乏力期等现象,显著提高检测正确率,并可根据装配线节拍要求柔性调节检测时间,大大提高自动装配线的生产效率^[7]。

收稿日期:2021-09-30

基金项目:宿州市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研究院产学研项目(18107)

作者简介:李浩(1995—),男,河南鹤壁人,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图像处理、机器视觉。

通信作者:庞爱民(1968—),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纺织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制造、机器视觉。

1 视觉检测系统

1.1 动铁检测分析

动铁及提花面板的三维建模如图 1(a),动铁为异形金属件,尺寸约为 45mm * 4mm * 3mm,上半部分的两个凸齿称为动铁卡爪,用于固定下一装配零件弹簧,中间镂空圆孔部分为装配孔,用以配合提花面板上的装配轴完成装配,下半部分为动铁卡勾。提花面板为黑色长条状 ABS 塑料件,尺寸为 310mm * 35mm * 7mm,其上有各个零件的装配预留位置,提花面板中间镂空类矩形框可减轻面板重量。提花面板上的动铁装配示意图如图 1(b),以动铁卡爪中心点与提花面板类矩形框中心点作为参考点,动铁装配合格时,动铁卡爪朝上方,卡爪中心点与提花面板中类矩形框中心点的距离较近,动铁倒装时,动铁卡爪朝下方,卡爪中心点与提花面板中类矩形框中心点的距离较远。利用这一实际情况,可通过提取面板中的类矩形框中心坐标与动铁卡爪中心坐标,计算两点直线距离判断动铁的装配合格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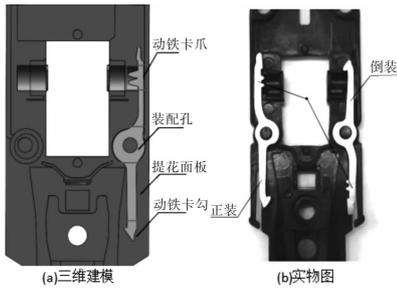


图 1 动铁及装配示意

1.2 方案设计

检测系统包括机械结构部分和图像处理两大部分。涉及的硬件主要包括相机、光源、计算机、光电开关、PLC 控制设备以及流水线装置等,软件主要包括图像处理算法和软件的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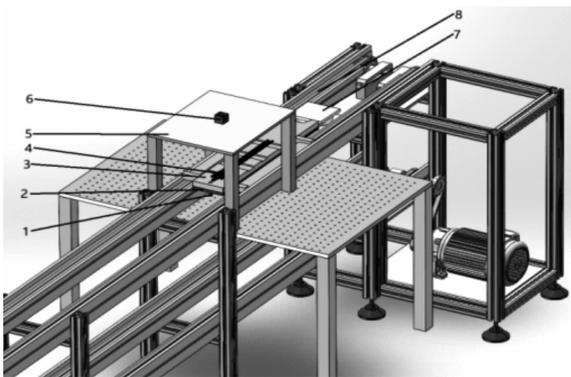


图 2 系统的机械结构

- 1 光电开关 2 抬升气缸 3 工装板 4 提花面板 5 支架
- 6 相机与光源 7 阻挡装置 8 流水线

整体机械结构如图 2。因 PLC 控制系统具有高

可靠性、实时性、系统配置简单、编程易于实现、扩展模块丰富、通讯方式可选且价格相对低廉等优势^[8],选取西门子 S7 - 2000 作为控制系统的核心。光电开关采用 M18 红外漫反射 NPN 型,阻挡装置、抬升气缸通过双控电磁阀由 PLC 控制启动和复位,计算机通过以太网与 PLC 互联,控制工业相机的图像采集,PLC 根据计算机输出的检测合格与否的信号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相关程序。系统的控制原理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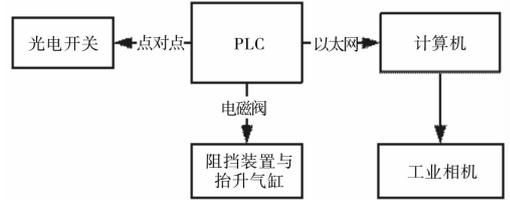


图 3 系统控制原理图

检测流程如图 4。具体检测步骤为:1) 工装板在即将进入视觉检测平台时触动流水线上的光电开关,阻挡装置升起阻止工装板随流水线进入下一个装配工位;2) 3s 后完全进入视觉检测平台,抬升气缸运行将工装板抬离流水线;3) 工业相机拍照,通过计算机检测动铁装配情况;4) 若装配合格,抬升气缸复位将工装板置于流水线上,阻挡气缸下降放行,工装板随流水线进入下一个装配工位;5) 若检测装配不合格,则装配线急停同时发出警报等待工人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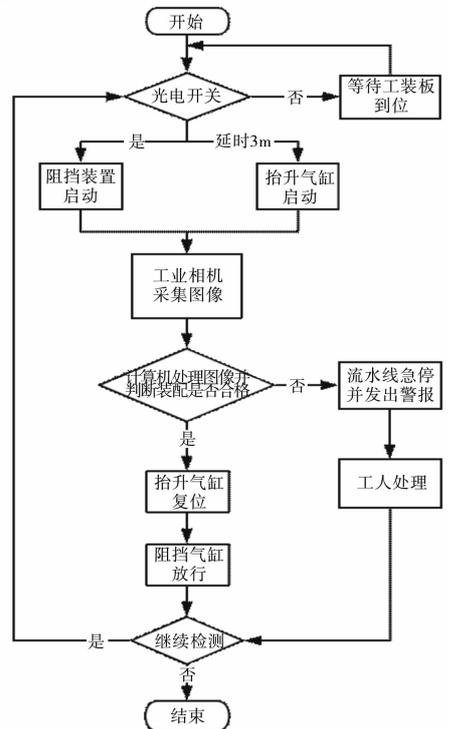


图 4 检测流程

2 图像处理

2.1 视觉检测

首先, PLC 控制相机拍摄待检测彩色原图像。其次, 计算机对图像进行预处理, 然后提取提花面板类矩形框轮廓, 记录其中心坐标。接着, 进行动铁卡爪的定位, 记录卡爪中心坐标。最后, 通过计算两中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的漏装错装, 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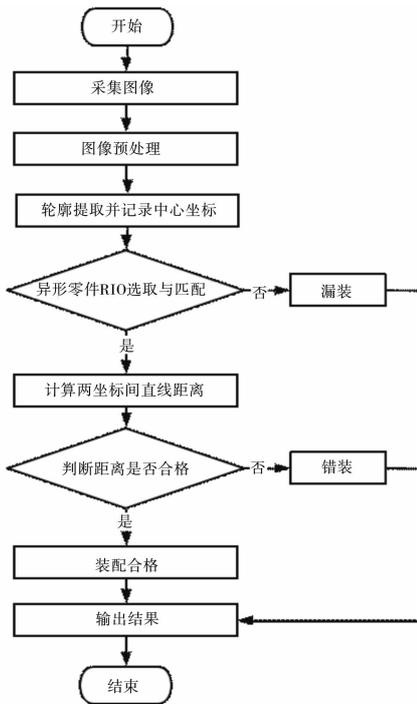


图5 图像处理流程

作为获取图像的直接元器件, 若通过相机能得到高质量的图像, 会给后续图像处理带来便利。考虑到被检测工件以及工厂环境等诸多因素, 选取某品牌的 CMOS 工业相机, 工作距离 350mm, 视野范围 50 * 80mm, 分辨率 800 * 1000, 像素 130 万, 配备 50mm 的中焦距普通镜头。光源配备环形白色二极管, 安装方式为正面明场^[9], 优势有: 1) 环形光源与相机同心安装, 光照均匀; 2) 白色光可更好突出动铁表面为银白色, 提花面板为黑色的颜色差异; 3) 发光二极管功耗低, 寿命长, 成本小。

2.2 图像预处理

经适合的预处理对后续图像轮廓提取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像预处理流程如图 6, 包括图像裁剪、灰度化和高斯滤波、二值化以及形态学处理中的开运算。



图6 图像预处理流程

首先, 因拍摄方式及位置固定, 为缩小数据处理量, 在保留动铁与感兴趣区域的图像特征完整性的同时去除非必要的背景区域, 将原图裁剪为 630 * 840 的尺寸, 然后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原彩色图像的 RGB 三分量亮度基本相同, 选取平均值法进行灰度转换最为合适, 公式为:

$$Gray(i, j) = [R(i, j) + G(i, j) + B(i, j)] / 3 \quad (1)$$

减弱提花面板和动铁表面加工粗糙度与拍摄环境引起的噪声, 对灰度图进行滤波去噪处理。作为一种线性平滑滤波, 高斯滤波通过高斯函数实现卷积核中间点的像素权重最大, 越远离中间的像素权重越小, 从而达到不改变图像边缘走向的特点^[10]。因此选取高斯滤波进行去噪处理。其中 σ 为方差, 值越小数据越集中, 值越大数据越分散。经多次试验选定窗口为 3 * 3, $\sigma = 1.2$ 的高斯核。公式为:

$$G(i, j, \sigma) = \frac{1}{2\pi\sigma^2} e^{-\frac{i^2+j^2}{2\sigma^2}} \quad (2)$$

然后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把动铁和感兴趣区域与背景分割, 得到像素值只有 0 或 255 的二值图。二值化公式为:

$$f(i, j) = \begin{cases} \maxval & \text{if } src(i, j) > thresh \\ 0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quad (3)$$

其中 $\maxval = 255$, $thresh$ 为阈值分割的临界参数。分割效果的好坏取决于 $thresh$ 参数的取值, 通过图像的灰度直方图获得像素分布情况以为选择合适的二值化算法。如图 7, 直方图为双峰, 迭代法最为合适^[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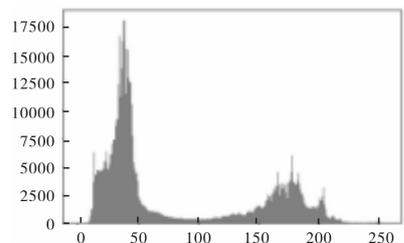


图7 灰度直方图

二值图中存在影响边缘提取质量的毛刺和孔洞, 经过开运算处理可以去除大部分毛刺和孔洞。开运算是先腐蚀再膨胀, 通过腐蚀消除毛刺和小区域, 通过膨胀连接边缘。公式为:

$$I \circ K = (I \ominus K) \oplus K \quad (4)$$

其中 I 为前景, K 为内部元素只有 0 和 1 的二维数组构成的结构元。分别取核为 3、5、7 的结构元对二值图进行开运算, 经效果对比, 最终选定核为 7 的结构元, 处理结果如图 8(d)。图像的预处理流程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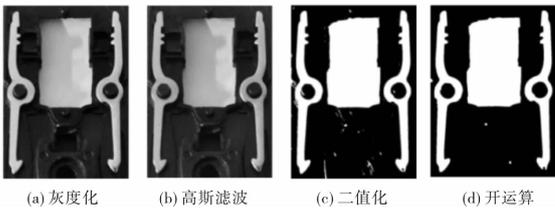


图8 预处理过程图

2.3 类矩形轮廓的提取

常用的边缘检测算子有 Prewitt、Sobel - Feldman、Schar、Laplacian、Canny 等^[12]。其中 Canny 有低错误率、高定位性、检测到边缘与实际偏差较小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其运用高斯函数的性质,不丢失重要边缘,将边缘检测问题转换为求解函数极大值的问题。

Canny 算子先通过高斯核 $G(i,j)$ 对图像 $f(i,j)$ 做卷积,结果输出为 $H(i,j)$ 。公式为:

$$G(i,j) = e^{-\frac{i^2+j^2}{2\sigma^2}} \quad (5)$$

$$H(i,j) = f(i,j)G(i,j) \quad (6)$$

再用一阶偏导的有限差分方向导数,计算梯度大小和方向,公式为:

$$H = \sqrt{H_i^2 + H_j^2} \quad (7)$$

$$\theta = \arctan\left(\frac{H_j}{H_i}\right) \quad (8)$$

利用非极大值抑制,只有局部最大值保留为边缘。最后根据设定的大小两个阈值,高于大阈值的为确定的边缘,低于小阈值的不是边缘。以图 8(d) 作为图像 $f(i,j)$ 进行 Canny 算子处理,结果如图 9(a) 所示。

根据图 9(a) 的结果来看,传统的 canny 算子进行轮廓提取时,将提取图像中所有连通区域的轮廓,而我们的目的是只保留提花面板的类矩形轮廓。通过以下步骤可去除其他轮廓:1) 去除开运算后仍存在的一些小孔洞的轮廓。通过设定提取轮廓面积的最小阈值^[13],在提取所有轮廓后将小于设定轮廓面积阈值的部分剔除。2) 去除动铁轮廓。通过矩形的度来识别动铁轮廓和提花面板类矩形框轮廓,矩形的度是轮廓的最小外接矩形面积和轮廓面积的比值^[14],因提花面板的类矩形框的形状非常接近矩形,矩形的度较大,通过 OpenCV 中的函数可以很方便地计算两轮廓的矩形的度,只保留矩形的度较大的轮廓即提花面板的类矩形轮廓。最终结果如图 9(b),并记录其中心坐标 $Q(i,j)$ 。

2.4 异形零件 RIO 的提取

异形零件 RIO 的提取和匹配是图像处理的难点,目前主流的算法首先都要人工确定零件 RIO 区

域,但有些异形零件人工难以确定最优 RIO 区域,提出通过 Harris 对零件上的角点进行检测,以零件上各部分区域的角点分布密度确定最优 RIO 区域,再用 Hu 矩进行 RIO 的提取匹配,以异形件动铁为例,算法应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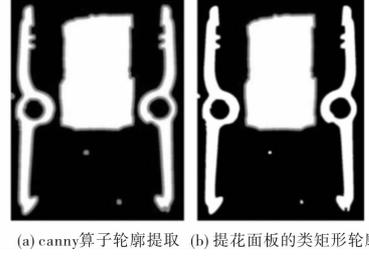


图9 轮廓提取

Harris 角点检测^[15]是在图像中设置窗口,在图像上遍历,通过窗口内的像素值变化判断是否为角点。如图 10,1 号窗口朝水平垂直两个方向移动时像素值都不变,判断该窗口区域为内部区域,2 号窗口朝水平方向移动,窗口内的像素值发生改变,当窗口朝垂直边缘移动,像素值几乎不改变,判断窗口包含垂直边缘。3 号窗口朝任何方向移动,窗口内的像素值都会发生改变,判断窗口内存在角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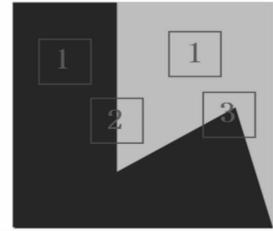


图10 灰度变化窗口

构造相关函数, $w(i,j)$ 表示窗口函数,向量 $[u, v]$ 表示在某方向及该方向上的位移, $I(i,j)$ 表示强度, $I(i+u, j+v)$ 表示偏移强度, $E[u, v]$ 表示窗口平移 $[u, v]$ 产生的灰度变化,即下式:

$$E(u,v) = \sum_{i,j} w(i,j) [I(i+u, j+v) - I(i,j)]^2 \quad (9)$$

根据泰勒展开式:

$$f(i+u, j+v) = f(i,j) + uf_i(i,j) + vf_j(i,j) + \frac{1}{2!} [u^2 f_{ii}(i,j) + uv f_{ij}(i,j) + v^2 f_{jj}(i,j)] + \dots \approx$$

$$f(i,j) + uf_i(i,j) + vf_j(i,j)$$

转换为矩阵形式得到式:

$$\begin{aligned} \sum [I(i+u, j+v) - I(i,j)]^2 &\approx \\ \sum [I(i,j) + uI_i + vI_j - I(i,j)]^2 &= \\ \sum u^2 I_i^2 + 2uv I_i I_j + v^2 I_j^2 &= \end{aligned}$$

$$\sum [u, v] \begin{bmatrix} I_i^2 & I_i I_j \\ I_i I_j & I_j^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u \\ v \end{bmatrix} \quad (10)$$

令:

$$M = \sum_{i,j} w(i,j) \begin{bmatrix} I_i^2 & I_i I_j \\ I_i I_j & I_j^2 \end{bmatrix} \quad (11)$$

将式 11 代入式 9 可得:

$$E(u, v) = [u, v] M \begin{bmatrix} u \\ v \end{bmatrix} \quad (12)$$

由式 11 可知 M 为一个 2×2 对称矩阵, 它的两个特征向量为 $\lambda_1, \lambda_2, \lambda_1, \lambda_2$ 的本质为椭圆曲率参数, 它们的大小表征了改变向量 $[u, v]$ 时, $E(u, v)$ 改变的幅值。 λ_1, λ_2 都很大, 向量 $[u, v]$ 在任何方向发生改变, $E(u, v)$ 都会发生较大幅值变化, 对应角点; λ_1, λ_2 一大一小, 向量 $[u, v]$ 在某方向发生改变, $E(u, v)$ 才会发生较大幅值变化, 对应边缘; λ_1, λ_2 都很小, 向量 $[u, v]$ 在任何方向发生改变, $E(u, v)$ 都不会发生较大幅值变化, 对应内部区域。

利用 λ_1, λ_2 设定阈值, 根据 CRF 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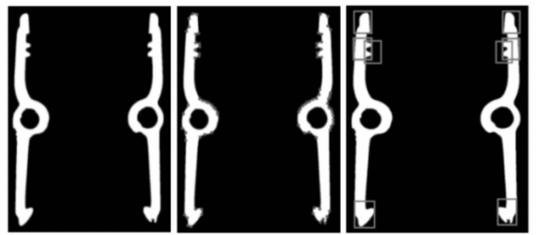
$$R = \det M - k(\text{trace} M)^2 \quad (13)$$

其中 $\det M = \lambda_1 * \lambda_2$ 为矩阵 M 的行列式, K 是经验取值范围为 $0.04 \sim 0.06$ ^[16], $\text{Trace} M = \lambda_1 + \lambda_2$ 为矩阵 M 的迹。图 10 为二值图, 取 $K = 0.05$, 经多次试验选定阈值 $R = 1000$, 当 $R > 10000$, 对应角点; 当 $R < -10000$, 对应边缘; 当 $-10000 \leq R \leq 10000$, 对应内部区域。

上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对图像中所有轮廓的识别, 首先填充除动铁轮廓外的所有其他轮廓, 结果如图所示 11(a) 所示。Harris 角点检测提取图 11(a) 中的角点, 用“·”表示出来, 结果如图 11(b) 所示, 可知动铁的外轮廓上角点的分布情况, 其中动铁中间部分装配孔上存在大量角点, 角点分布太密集, 不适合作为 RIO 区域, 其他部分几乎没有角点分布, 只有动铁卡爪跟动铁卡勾部分的角点密度适中, 具有较好的动铁特征, 作为动铁 RIO 区域最为合适。根据动铁外轮廓尺寸, 设置一个大小为 60×65 的窗口, 遍历图像, 计算窗口中存在的角点密度, 将密度符合的窗口都保存下来。部分结果如图 11(c) 所示。

Hu 几何矩表征图像的几何区域特征, 应用于图像的特征提取、匹配和识别, 具有平移、旋转、缩放、镜像不变性, 简称为 Hu 矩^[17-18]。

在图 11(a) 中截取窗口大小为 60×65 的包含动铁 RIO 特征的图像, 如图 12(a) 所示, 若该图像表示为: $A = f(i, j)$, 其二维 $(p + q)$ 阶空间矩为:



(a) 动铁轮廓 (b) 角点分布 (c) 部分待选框

图 11 动铁 RIO 的选取

$$m_{pq} = \sum_{i,j} i^p j^q f(i, j) \quad (14)$$

具有平移不变性的中心矩为:

$$m_{pq} = \dot{a}_{i,j} (i - \bar{i})^p (j - \bar{j})^q f(i, j) \quad (15)$$

其中图像重心为: (\bar{i}, \bar{j}) , 有

$$\bar{i} = \frac{m_{10}}{m_{00}}, \bar{j} = \frac{m_{01}}{m_{00}}$$

具有缩放不变性的标准中心矩为:

$$\eta_{pq} = \frac{\mu_{pq}}{\mu_{00}^{(p+q)/2+1}} \quad (16)$$

由以上公式可推导出 Hu 矩:

$$I_1 = \eta_{20} + \eta_{02}$$

$$I_2 = (\eta_{20} - \eta_{02})^2 + 4\eta_{11}^2$$

$$I_3 = (\eta_{30} - 3\eta_{12})^2 + (3\eta_{21} + \eta_{03})^2$$

$$I_4 = (\eta_{30} - 3\eta_{12})^2 + (\eta_{21} + \eta_{03})^2$$

$$I_5 = (\eta_{30} - 3\eta_{12})(\eta_{30} + \eta_{12})$$

$$[\eta_{30} + \eta_{12}]^2 - 3(\eta_{21} + \eta_{03})^2] +$$

$$(3\eta_{21} - \eta_{03})(\eta_{21} + \eta_{03})$$

$$[3(\eta_{30} + \eta_{12})^2 - (\eta_{21} + \eta_{03})^2]$$

$$I_6 = (\eta_{20} - \eta_{02})$$

$$[(\eta_{30} + \eta_{12})^2 - (\eta_{21} + \eta_{03})^2] +$$

$$4\eta_{11}(\eta_{30} + \eta_{12})(\eta_{21} + \eta_{03})$$

$$I_7 = (3\eta_{21} - \eta_{03})(\eta_{30} + \eta_{12})$$

$$[(\eta_{30} + \eta_{12})^2 - 3(\eta_{21} + \eta_{03})^2] -$$

$$(\eta_{30} - 3\eta_{12})(\eta_{21} + \eta_{03})$$

$$[3(\eta_{30} + \eta_{12})^2 - (\eta_{21} + \eta_{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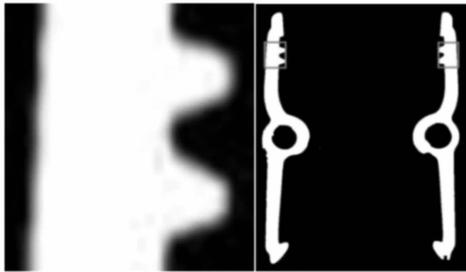
计算图 11(c) 中每个待选框中轮廓的 Hu 矩 $B_1, B_2 \dots B_n$, 与 A 进行匹配, 进行差异度计算, 公式为:

$$S(AB) = \sum_{i=1}^7 \left| \frac{1}{I_i^A} - \frac{1}{I_i^{B_n}} \right| \quad (17)$$

式中 I_i^A 和 $I_i^{B_n}$ 表示 A 和 B_n 的第 i 个 Hu 矩, S 为差异度得分, 分数越低代表两个轮廓差异度约小, 反之则表示差异度越大。设置 S 阈值为 $S_{\max} = 0.005$, 删选出 B_n 个待选框轮廓与 A 的 S 最小得分, 与 S_{\max} 比较, 若不大于 S_{\max} , 则认为该待选框为动铁卡爪在图像上的位置, 保留其中心坐标为 $Z(i, j)$, 结果如

图 12(b) 所示。

对以上改进算法与直接人工选取 RIO 进行提取匹配的两种方案分别进行实验 500 次,实验结果:改进算法的平均用时为 213ms,正确率为 100%;人工选取 RIO 方案平均用时为 250ms,正确率为 91%。结果证明提出的算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准确性。



(a) 局部动铁卡爪放大 (b) Hu 矩定阈结果

图 12 动铁 RIO 的提取

2.5 距离计算

通过两点间距离公式计算 Q,Z 两坐标的距离:

$$Distance = \sqrt{(i_1 - i_2)^2 + (j_1 - j_2)^2} \quad (18)$$

动铁装配合格时 Q,Z 两中心点距离较小,根据实际情况取距离 D 的范围为 275—295,在此范围内的距离均视为装配合格。

3 视觉防错检测软件

Jupyter 是交互性、数据可视化出众的 Python 代码编辑器^[19],以 Python 作为编程语言,结合 Open CV 视觉库通过 Jupyter 环境编写代码开发视觉检测软件^[20]。封装 Python 代码,打包成 exe 格式 win 系统可执行文件,软件参数设定界面与装配检测界面如图 13、14 所示。工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函数参数进行调整,查看或者删除检测结果。界面清爽,操作简单方便易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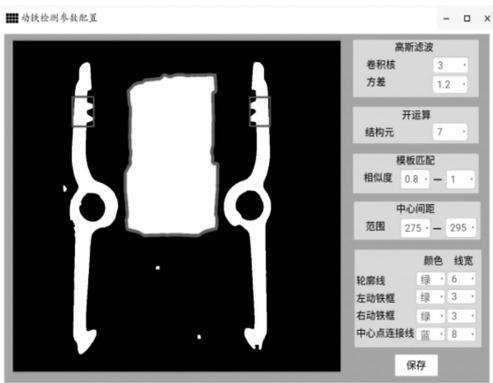


图 13 参数设定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将视觉检测平台与装配线结合,运行装配线和检测平台,实验检测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部分记录数据如表 1 所示。多次进行实验,分析数据可知

检测正确率达 99.7%,且用时符合在线检测标准。分析检测失败的数据,总结出以下干扰因素:



图 14 检测结果

- (a) 装配流水线运行稳定性;
- (b) 外界光线和噪声等环境影响;
- (c) 动铁与提花面板表面加工粗糙度;
- (d) 阻挡装置与抬升气缸定位精度与稳定性;
- (e) 光源与相机位置精度的稳定性;
- (f) 光源与工业相机的老化。

表 1 部分实验数据

序号	左动铁	右动铁	两中心点距离 (左,右)	装配 情况	用时 ms	检测 准确性
1	有	有	282,284	合格	498	准确
2	有	有	288,285	合格	499	准确
3	有	有	286,285	合格	503	准确
4	无	有	0,283	左侧漏装	521	准确
5	有	有	284,284	合格	499	准确
6	有	有	283,284	合格	496	准确
7	有	无	283,0	右侧漏装	497	准确
8	有	有	283,542	右侧倒装	503	准确
9	有	有	282,283	合格	510	准确
10	有	有	281,284	合格	504	准确

5 结论

基于提花面板装配线上动铁防错的人工检测现状,设计了针对该工位的视觉检测系统。对采集的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 Canny 算子提取提花面板上的类矩形框及其中心坐标,通过 Harris 角点与 Hu 矩结合改进的算法获取动铁卡爪中心坐标,计算两中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是否倒装,选用 Python 作为编程语言,结合 Open CV 图像处理库开发检测软件,实验证明系统的正确率达 99.7%。相较于人工检测,提高了装配线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减小了企业成本。目前系统已投入装配线实际应用,且性能可靠。

参考文献:

- [1] 宋和宋: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电子提花机品牌[J]. China Textile,2019(11):86-87.

- [2] Technology – Fiber Technology. Researchers from Sanming University Report Recent Findings in Fiber Technology (Embedded Electronic Jacquard Guide Bar: A New Approach to Warp Knitting Using the Machine Jacquard Control System)[J]. Journal of Technology & Science, 2018(6): 514.
- [3]任永强,杜瑞,李军.基于机器视觉的差速器卡簧装配防错检测研究[J].制造技术与机床,2018(1):30-34.
- [4]李勇.基于机器视觉的弹簧装配检测[J].计量与测试技术,2020,47(12):18-20.
- [5]侯天龙,孙永奎,马磊,等.高铁白车身装配质量的机器视觉检测方法[J].传感器与微系统,2021,40(7):142-144.
- [6]吴亚渝,高立强,符亭,等.油气悬挂液压系统装配防错设计应用[J].新技术新工艺,2021(7):1-4.
- [7]杜瑞.基于机器视觉的装配线防错检测技术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8.
- [8]黄海燕.工件装配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系统设计[J].机电工程技术,2020,49(4):85-88,203.
- [9]Carsten Steger, Markus Ulrich, Christian Wiedemann. Machine Vision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 [10]赵博文,张力夫,潘在峰,等.基于Open CV的图像滤波方法比较[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0,32(15):78-80.
- [11]Rafael C G, Richard E W.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 [12]李竹林,钱梦杭,白明.基于Canny算子的指静脉图像特征提取算法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0(2):91-95.
- [13]张万里,丁为民,刘瑛璎,等.基于机器视觉的莲子去芯位置的定位方法[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7(4):467-475.
- [14]任龙龙,冯涛,翟传龙,等.基于MATLAB图像处理的苹果大小、颜色、圆形度及缺陷度特征融合分级研究[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1,39(7):90-95.
- [15]胡晓彤,朱博文,程晨.基于Harris-CPDA的角点检测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21,42(2):504-511.
- [16]苗荣慧,杨华,武锦龙,等.图像块改进Harris角点检测的农田图像拼接[J].现代电子技术,2021,44(2):75-80.
- [17]商立丽,王慧琴,王可,等.基于Hu矩和TF-KSURF的多测度青铜器铭文相似性度量方法[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1,58(8):123-131.
- [18]江波,徐小力,吴国新,等.轮廓Hu不变矩的工件图像匹配与识别[J].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2020(9):104-107,111.
- [19]刘征,郭君红.探究Jupyter Notebook编程工具在项目式学习中的应用[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0(14):29-30,33.
- [20]Joe Minichino, Joseph Howse. Learning Open CV 3 Computer Vision with Python[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Assembly Inspection of Special – shaped Parts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LI Hao, PANG Aimi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assembly detection of moving iron of special – shaped parts in jacquard panel as an example, aiming at the assembly detection requirements of special – shaped parts in automatic assembly line, CMOS industrial camera and PLC control system are selected to build a visual platform on the assembly line. Firstly, the image is preprocessed by using the vision related theory and algorithm, the contour in the binary graph is extracted by Canny operator, the contour is recognized according to the area and rectangularity parameters of the contour, and only the rectangular frame like contour and its center coordinates are retained. Then, the Rio center coordinates on the image are obtained by the improved algorithm of Harris corner and Hu moment. Finall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er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ular frame and the Rio center coordinate of the moving iron is calculated to judge whether the moving iron is upside down, and the detection software combined with Python and opencv graphics processing library is written.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detection system is 99.7%,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p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parts; assembly detection; vision; Harris corner; Hu moment

《中州大学学报》2021 年总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 见证一个作家 40 年的文学历程
——“《李佩甫文集》发布会暨研讨会”纪要 张 丽, 杨 莉(1-1)
- 李佩甫的“文学启蒙”追求及其方法
——兼论《城的灯》的意义和问题 孔会侠(1-8)
- 我们应向作家李佩甫学习什么? 刘海燕(1-12)
- “平原”、李佩甫及文学呈现的可能性 刘宏志(1-17)
- 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需要深度解析模式 贺玉高, 鲁傲雪(2-1)
- 哈格洛夫与中西环境美学之辨 岳 芬(2-6)
- 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张 翼(2-11)
- 日本“国语高考”中汉文试题的选文来源研究 宋时雨(2-17)
- 论民间文学中爱国主义资源的价值及其开发 钱东晓, 孙家栋(2-23)
- 《现代人》创办时期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
——从果戈理和舍维廖夫的两篇文章谈起 耿海英(3-1)
- 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
——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胡艳萍, 马治军(3-12)
- 失落的希望
——解读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 郑彦离(3-18)
-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大地》中的土地情结 鲍成莲, 翟佳丽(3-22)
- 动物的复仇, 抑或人性的畸变
——论托卡尔丘克长篇小说《糜骨之壤》的生态叙事 汪树东(4-1)
- 论苏童《罍粟之家》的意象交叠与话语蕴藉 王俊虎, 张陆洋(4-9)
- 时空重塑·多重聚焦·诗画意境
——李子柒的古风 IP 短视频叙事策略探析 关 键(4-14)
- 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变 杨康恩(4-18)
- 方法和视域: 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研究 黄 轶, 杨高强(5-1)
- 寻找“灵魂”的家园
——评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 林 祁(5-9)
- 深度探秘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写作
——评杜禅的长篇新作《先知开花》及其他 刘海燕(5-14)
- 《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现代性”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 耿海英(6-1)
-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杨 波(6-8)
- 穆木天的一首佚诗及其他 陈佳慧(6-14)

· 经济与管理 ·

- 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2006—2018 年基于 VAR 模型的经验分析 赵 健(1-22)
-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问题研究 王 菲(1-28)
- 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对策研究
——基于 DEA-Tobit 模型 荀守奎, 程若静, 兰国辉, 李琬莹, 张梅芳(2-28)
- 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徐 琼, 程 慧(2-33)
- 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 梁 雯, 顾大超, 叶仁慧(3-26)
-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
——投贷联动框架下基于安徽省样本的实证分析 刘 妹, 李 会(3-35)

中国老年群体的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 CGSS 2017 调查数据的中介机制分析 杨毅, 黄延, 贺浩浩(4-23)

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探析 强敏(4-29)

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 秦晋(4-36)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周广澜, 俞立平(5-18)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马立呼, 潘玉君, 华红莲, 马佳伸, 牛福长(5-26)

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欧绍华, 范伟(6-2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李雪, 李晓翔(6-28)

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影响之研究 张欣(6-33)

· 法学研究 ·

论数字货币的占有及其转移 简筱昊(1-35)

司法数据的再利用及其规则配置 戴文怡(1-42)

“互联网+”环境下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章子旋(2-41)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曹叶(2-46)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 卢宇, 郑依婧(3-41)

论刑法与著作权法的有效衔接

——以两法联动修改为背景 王昕宇(3-47)

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苏佳伟(4-41)

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及其展开

——论妨害重大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罪与罚 白雅楠(4-48)

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研究 刘继虎, 殷煌(5-33)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经济法规制路径 吴小燕(5-38)

经济学视角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策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 张巧(6-40)

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中索要债务行为之认定标准

——法解释学视角下民刑交叉问题治理探究 周景斌, 马可(6-48)

· 语言文化与翻译 ·

多模态视角下的微信“语言”符号特征研究 付文莉, 白丽梅(1-48)

“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研究 王亚聪(1-54)

假设句的非现实性特征和表达功能 张雪平(3-94)

格的含义及其理论发展研究 司罗红(3-100)

《广韵》《集韵》中“戠”的字形与词义考 金欣欣(5-63)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的构建 陈双双(5-67)

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研究 梁海, 李畅(5-72)

· 社会与历史 ·

近代西风东渐下新疆的饮食新文化 贾秀慧(1-60)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研究述略

——兼论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胡金野, 张静, 齐磊(1-65)

战时妇女动员

——以 1948 年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为例 刘志鹏, 李艳丽(2-52)

多元与单一族群政策导向下社会治理刍议

——基于阿米什与阿伊努的典型性 高小岩, 薛长礼, 全美英(2-58)

论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 南大伟, 王秋香(3-53)

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途径研究

——以美国为例	黄 静,余 强(3-58)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探析	胡安徽(3-63)
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探析	陈清莲(3-68)
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柴生高(4-56)
论民国初年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刘国俊(4-61)
转型之道:莫里斯总督制的建立与影响	苏 聪,石 旭(4-67)
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国货运动(1931—1936)	刘 越(4-72)
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的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调查分析	程绍珍,张小丽(5-4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对女性解放的推动	曹晓辉(5-48)
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	张玉梅(5-54)
中国传统美学视角下的漏窗艺术探析	袁新华(5-58)
学深悟透“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周春辉(6-55)
新时代奋斗进程中不断创新革命精神	关 琛(6-60)
论 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白贵一(6-64)
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之盛	曾桂林(6-69)
系统视域下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研究	文媛媛(6-75)

· 传媒与艺术 ·

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现状与对策	刘 杨,林 璐,吴玉莹(1-74)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及其治理	
——基于全景敞视视角分析	李平芬(1-79)
近五年开放获取期刊新出版动态研究	彭 琳(1-85)
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林贺(2-65)
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陈文泰,赵慧晴(2-71)
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	黄月琴(2-76)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研究:价值、问题与对策	焦 丹,赵志男(2-81)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的路径选择	王运涛(3-73)
“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林延斌,刘仁春(3-78)
近代社会转型下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思想	刘加翠(3-83)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机遇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例	邹丹丹(3-89)
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公务员媒体素质与提升探析	冯 歌(4-77)
论新时代隐性思政的媒介环境价值及路径	张 雯(4-82)
论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共生性	王玉君,程 原(5-76)
《台湾民报》与鲁迅思想的传播	孙拥军,何亭龙(5-81)
电视媒体信息无障碍传播供给研究	白瑞霞(5-86)
媒介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传播的路径探究	窦飞月,李芳云(5-90)
媒介情境视域下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探析	赵红勋,付 月(6-80)
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策略及典型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薛春璐,孔晔晗,王元杰,齐秀丽(6-86)
消费文化视域中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阐释	王 位(6-92)

· 教育与教学 ·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身体锻炼的心理效益研究进展	郭玉江,宋亚亚,闫冰冰(1-90)
材料力学实践教学高阶性建设研究	李宏德(1-94)
《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路径优化	单红生,何艳冰(1-99)
新工科视角下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创新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段博楠(1-103)
疫情背景下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有效性探索	谭笑风(2-87)

新冠肺炎疫情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	孙钢军(2-92)
基于华为鲲鹏生态的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为例	曹敏(2-97)
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问题分析及教育对策	董华丽(2-101)
基于 LDA 模型的高校科研管理主题演化研究	薛培军,潘宋(3-106)
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调查与改革路径	
——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为例	陈一静(3-111)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探析	李彩萍(3-115)
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以 400 米项目为例	赵敦富(3-120)
功能性训练干预下拉丁舞运动表现、专项动作及 FMS 分值特征的研究	丁利荣(3-124)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几点思考	苏炜(4-86)
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焦涛,袁新华(4-9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模式研究	陈晓璇(4-95)
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刘旭琦(4-100)
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王献福(4-105)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名称思辨	孙书章,李华(5-95)
“产出导向法”理念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研究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谷峰(5-101)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思考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杨健(5-10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分析	张阳(6-97)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再思考	王双成,孙浩冉,魏振枢(6-101)
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及未来展望	龚希丹(6-107)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的渐近解	汪维刚,汪维莲,汪方圆(1-108)
基于局部序列比对相似度的用户会话聚类新方法	姚瑶,周铜(1-114)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设计	于志青(1-120)
基于主动推送的视频流优化传输算法	汪静,丁晓梅,赵丽红(1-124)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过程中有机酸代谢规律研究	张军,姚虹(2-107)
基于相互作用矩阵的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	王志强,辛晓斌,刘硕(2-112)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究	姜东民,张哲,何栋良,孟玮(2-117)
CPE 非视距路径与弱信号场景下 5G 毫米波接收研究	张永亮,刘洋(2-123)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	易礼秋,谷云东(4-109)
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研究	聂卉,李晓静,杜笑(4-117)
米酒黄瓜奶昔生产工艺研究	冯冲,姚虹,陈安琪,许明媛,冯茜杰(4-121)
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稠合氮杂环骨架方法研究进展	范威(4-125)
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及应用	秦小转,周峰海,乔瀚东(5-111)
山药多糖含量测定方法优化的研究	郑丽萍,朱重阳,张小梅(5-116)
回收磷酸铁锂材料金属元素浸出动力学研究	赵莉,王永志(5-120)
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静力性能有限元分析	
.....	黄春晓,潘福婷,赵莉,王颖(5-124)
功能性 MOFs 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研究进展	
.....	李玉玲,范景珊,王迎欣,刘滢洁,张森(6-112)
基于分子对接研究甜菊醇、异甜菊醇对赤霉素受体 GID1 的作用机制	
.....	张军,王杭,于宁康,张珂,韩文龙(6-117)
基于机器视觉的动铁装配检测研究	李浩,庞爱民,黄攀,陈家浩,张熙(6-122)